آخر طاهر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1）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2）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3）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4）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1）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2）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3）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4）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1）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2）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3）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4）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四（1）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四（2）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四（3）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1）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2）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3）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4）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1）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2）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3）
-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5）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6）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5）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6）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7）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5）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6）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7）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5）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6）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7）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8）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5）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6）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7）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8）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1）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2）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3）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4）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5）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7）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8）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4）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5）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6）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4）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4）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5）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6）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7）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4）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4）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5）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6）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七（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七（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1）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2）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3）
-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4）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一（1）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一（2）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一（3）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一（4）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1）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2）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3）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4）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5）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6）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7）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1）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2）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3）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4）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1）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2）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3）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4）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5）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6）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五（1）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五（2）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五（3）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1）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2）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3）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4）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5）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6）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7）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8）

-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9）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1）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2）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3）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4）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5）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1）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2）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3）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4）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5）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6）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7）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8）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9）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1）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2）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3）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4）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5）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6）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7）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8）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1）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2）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3）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4）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5）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1）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2）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3）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4）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5）
-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6）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一（1）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一（2）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一（3）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1）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2）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3）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4）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5）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1）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2）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3）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4）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5）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6）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7）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8）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9）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1）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2）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3）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4）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5）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1）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2）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3）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4）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5）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1）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2）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3）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4）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5）
-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6）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一（1）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一（2）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一（3）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二（1）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二（2）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三（1）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三（2）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三（3）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四（1）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四（2）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五（1）
-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五（2）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1）

1949年4月25日，解放不过数月的北平市（今北京市，时称“北平”）发生了一起损失价值为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的特大纵火案件。该案件的发生引起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周副主席闻讯后当即中断正在举行的重要会议，立刻亲赴现场踏勘，并对侦查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经过公安人员艰难曲折的侦查，案件终于得以侦破……

一

老北京大概都还记得，原先北平市崇文门外东四方位有一条玉北街，这条街上当时有一个大厂子——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本文所要叙述的这起特大纵火案件，就是发生在这里。

1949年4月25日，凌晨2时许，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中间生产区漆黑的厂房里，忽然冒出一团红色火焰；几乎在同时，火焰便迅速蔓延开来，在整个厂房里形成一片火海！等到值夜人员察觉时，灾难性的大火已经在横加肆虐了。

消防队接到报警，迅速赶来，奋力扑救至上午7时许，方才将大火全部扑灭。这起特大火灾，烧毁了修好的机车29辆、拖车11辆，未修好的机车13辆、拖车6辆，共烧毁59辆，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104间，所受损失以当时的物价计算为人民币2亿余元。

停车厂所在地属于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管辖范围，纵火案发生后，停车厂方面立刻向外三分局报警。外三分局按照规定即向北平市公安局第三处打电话作了紧急报告；市局第三处当天值班的负责人是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他接到报告后，未按规定向上级报告。没想到，就是这一失误，这起案件竟惊动了周恩来！

一个月前，即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北平，就是毛泽东主席戏言的“进京赶考”。自此以后，北平市的公安工作和社会治安问题就排上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工作日程。在一个月内，周恩来

曾数次向当时中央分管公安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询问过北平市公安局的工作情况，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李克农于是决定就此问题于1949年4月25日上午召集北平市公安局的部分局、处负责人开会，当面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2）

汇报会在东皇城根北街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举行，北平市公安局参加汇报会的有局长谭政文和第一、二、三处的正、副处长。会议原定上午9时30分举行，但是周恩来在9时10分就抵达了，这样，便立刻进行。会议开始后，谭政文局长首先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清理和对社会治安进行整顿的情况。周恩来听着不住地点头。

李克农向抽烟的同志散了一圈香烟，然后说："刚才谭局长谈了许多情况，那都是作为局一级的面上的东西，下面请在座的同志谈谈各自分管工作方面的具体情况，周副主席需要了解更多的具体情况。"

周恩来拿出了笔记本和钢笔，微笑着请同志们多谈谈基层的具体情况。

市局第二处（侦讯处）处长冯基平首先发言，谈了侦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一些情况。周恩来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打断，还往本子上记了一些内容。

冯基平之后，第三处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开始发言，他一开头就谈到了今晨发生的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大火。周恩来的脸色顿时变得严肃起来了，两道浓眉一耸，目光扫向谭政文，问是怎么回事?

谭政文事先没接到这方面的汇报，一点儿情况也答不上来，于是问分管治安的第三处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武处长，你知道这个事吗？是怎么回事？"

前面说过，此事在市局就到第三处第二副处长贺生高为止，所以，武创辰对此也一无所知。

这下子周恩来生气了，说这个会不开了。这么大个事情，竟然谁都不知道！建议现在就到现场看看去！

于是，周恩来便带领谭政文局长、市局第一处处长刘涌、第三处第一副处长武创辰当即前往崇文门外察看现场。

一行人分乘两辆汽车：周恩来、谭政文乘坐周恩来的汽车居前，刘涌、武创辰乘坐谭政文的汽车跟随其后。开车后，周恩来问：“火灾发生地段归哪个分局管辖？”

武创辰回答：“外三分局。”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3）

周恩来说：“我们先去外三分局。”

外三分局位于崇文门外手帕胡同内，可是，一行人包括两个司机在内都不认识这个地方。行至崇文门，周恩来让谭政文把正在路口执勤的一名交通警察叫上车来带路。那个交警上车后，听说让他带往手帕胡同，竟说不认识那里。周恩来望着他问道：“同志，你是哪里人？几时参加工作的？”

交警回答：“首长，我是从解放区来的，刚来北平两个月，领导让我来参加交通管理工作。”

大家便让交警下车，又找了一个老百姓，问了问，终于弄清了手帕胡同的位置，汽车开了过去。

到了外三分局，分局长慕丰韵见周恩来和谭政文来了，连忙热情接待。周恩来还没落座，便问起了火灾情况，慕丰韵对答如流，周恩来微微点头。

待慕丰韵说罢，周恩来问他什么时候到的现场？

慕丰韵回答：“我刚从现场回来。”

周恩来追问他是夜里去的吗？

“没有，我是今天早上去的。”

周恩来批评道：“又是一个官僚主义！你应该晚上就去现场！”

在周恩来的执意坚持下，一行人在慕丰韵的陪同下前往火灾现场踏勘察看。在现场，周恩来脸色凝重地望着已经烧成一片废墟的部分厂房，叹息道：“ 损失！这是人民的损失，也是新政府的损失。”

周恩来在现场走了一会儿，问厂工会负责人：“火灾是怎么发生的？”

工会负责人说：“我们向值夜的同志询问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是敌特破坏。”他简单地说了火灾发生的情况。

周恩来点点头，转向谭政文，命令要进行缜密的调查，查明结果后，报李克农部长和他。

谭政文点头称是。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一（4）

周恩来一行返回弓弦胡同李克农的办公处，那里已经准备了中饭。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特别是谭政文，午饭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下午，继续进行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北平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批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领导也不到现场，甚至都不知道。你们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国桢在上海、重庆当市长时，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灾或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的市长能做到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

就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专门作了指示：今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当天，北平市公安局就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以后凡发生重大事故，市局、有关业务处、分局的领导必须亲自到现场了解情况，指挥工作。

后来，周恩来的这个指示成为全国公安机关的一项制度，沿用至今。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1）

在李克农办公处举行的汇报会结束后，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就下达了指示：从市局第二处、第三处及外三公安分局抽调侦查员组建专案组对火灾进行侦查。

当天傍晚，新成立的“电车公司停车厂火灾专案侦查组”就在外三分局举行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

火灾发生后，外三公安分局就已派员前往现场会同消防队进行勘查。主持勘查的是副科长刘政道，他理所当然地被指定为专案侦查组成员。会上，刘政道汇报了现场勘查情况——

现场发现了3处中心燃点，都在靠近西北方向的那几间厂房，那里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处浴盆大小的黑色焦块，坚固的水泥地面都烧得迸裂开了，与别处的地面明显不同。那3处都是用于存放润滑油、回丝、木料等易燃杂物的地方，火一燃起，立即形成巨大的火源，借助北平地区春天常刮的西北大风，迅速蔓延至别处，最终酿成特大火灾。鉴于这3点情况，初步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具体准备的纵火案件。

刘政道接着出示了从现场拍摄的照片、消防队的鉴定书，专案组众人传阅后，一致同意外三分局的认定。接下来，就是如何展开侦查的事了。当时的公安局侦查员的成员结构，一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军人或者公安保卫人员；一部分是由警察局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则是就地招募的社会进步青年。“停车厂火灾专案侦查组”由于案情重大，组织结构要求很高，所以都是清一色的解放区来的同志。这些侦查员，具有一定的侦查实践，但是都缺乏在大城市工作的经验，只好边学边干了。众人讨论许久，决定采用共产党依靠群众开展工作的老办法，到停车厂群众中去摸线索。

兵贵神速，专案组决定连夜去停车厂开展访查。

侦查员分成4个小组，分别对厂工会负责人（也是当时尚未公开的党组织的负责人）、门卫、值夜人和其他群众进行个别谈话式的调查。

次日上午10时，专案组汇总了各小组调查情况，进行了分析：

1.停车厂自北平解放后，由新成立的工会出面选择了24名历史清白、作风正派、身强力壮的工人组成了一支夜间值勤队，4人一组轮流义务值夜，负责厂里的防盗、防火、防特。4月24日晚上值勤的4名工人在案件发生后，深为自己的失职而内疚，都没有回家，自觉接受审查。侦查员了解下来，这4人那天晚上都在一起活动，没有个别离开的事，因此排除了作案的可能性。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2）

2.据门卫反映，4月24日晚上11时左右，机修车间工人李成归突然骑了一辆自行车来到厂里。由于厂里没有“不准夜间进厂”的规定，所以放行了。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李成归才离厂。

3.据值夜人反映，晚上12时许，曾看见仓库人员傅今为出现在厂区，由于是熟人，双方也未搭话，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

鉴于李成归、傅今为是这天晚上本不应该出现在厂里的人员，所以疑点顿时就集中在这两人的身上。

专案组当即决定：传讯李成归和傅今为！

4月26日下午，戴越等3名侦查员赶到停车厂，通过工会出面传唤李成归和傅今为。一会儿，去车间传唤的工会副主席回来说，傅今为今天没来上班，也没有请过假，不知他上哪里去了。李成归在班上，已经通知他来工会了。

一会儿，李成归来了，那是一个30来岁的中高个子，穿着一身沾满油污的工装，狭长的马脸上有着一双滴溜溜打转的耗子眼，初一看很容易使人对其的任何行为都不得不打上一个问号。此人虽说其貌不扬，但在技术上绝对是一把好手，他11岁就学钳工了，心眼玲珑剔透，一点就明，一学就会，到18岁已是全厂出了名的技术尖子。停车厂的许多活儿据说就他和另一位姓张的师傅能拿得下来。所以平时人们甚至当时的日本工头都不得不对他客气些。长期的氛围使他形成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做派，看起人来常常斜着一只眼。此刻也是这样，他一进门就冲工会副主席吹胡子瞪眼睛：

“你叫什么叫？报丧一样！没看见我正忙着吗？”

他对坐在一旁的3个侦查员几乎看都没看一眼，也许是因为他们穿着便衣的关系。

工会那位不敢得罪李成归，笑了笑正要答话时，一位侦查员开口了：“ 你是李成归吗？”

李成归把目光从工会副主席脸上移到侦查员那里：“ 是呀，怎么着？”

“你坐下，有话问你！”

“哼哼，你3位是哪尊庙里的神？”

工会副主席说：“他们是公安局的。”

李成归还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公安局的？有证件吗？”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3）

戴越出示了证件，然后叫李成归坐下。李成归看了看自己身上那套油脏衣服，说不坐了，有话就快说，他还要去干活呢。

侦查员也不勉强，就让他站在那里。

“李成归，你很忙，咱们就长话短说吧，有个问题要你解释一下：4月24日晚上你到过厂里没有？”

李成归毫不迟疑地点头：“ 4月24日晚上来过的。”

“干什么来了？”

“你问这干什么？”李成归来了个反问。

戴越笑道：“ 干吗问这？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证件了，知道我们是吃什么饭的，又清楚厂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也应当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问你这了。是不是？”

李成归瞪大了眼睛：“这么说，你们是怀疑我放的火？”

“我们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这样想，我们只是需要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然后再作分析。”

李成归说：“那我告诉你，我是来拿表的。”

“拿表？什么表？”

“什么表都不知道，真是老土啊！”李成归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侦查员是太行山深处的山沟沟来的这一点的轻蔑，“告诉你，是挂表。”

但侦查员似乎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土：“挂表？什么牌子的？”

“嗯……这个，你问这干吗？”

“需要问呗。”

“说给你3位恐怕也不懂，是瑞士‘卡得’表，听说过吗？”

戴越显出一副非常谦虚的样子：“没听说过，请问是哪两个字？”

“卡车的‘卡’，得到的‘得’。”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二（4）

戴越把两个字写了下来，又问是怎么回事。李成归说他的那块挂表昨天洗澡后忘记在厂里了，半夜想想不放心，于是就来厂里取。这话如果是确实的，那放在那个时代倒是可以理解的，一块外国表，比一个普通家庭的全部家当还值钱哩！但是，也有可能是李成归在瞎说，那就需要核查了。

侦查员让李成归留在工会办公室，3人兵分两路前往车间和李成归家去调查。

车间的工人证明说李成归确实有一块瑞士“卡得”挂表，那是抗日战争胜利那年李成归为一个美国人修好了一辆汽车后获得的赠品。

但是，李成归的妻子却说李成归前天傍晚回家时并未忘记那块挂表，她清清楚楚地记得丈夫回家后像往常那样把表放在卧室的大柜子上的。

如此，李成归是说了假话，看来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侦查员顿时兴奋起来，马上去找李成归想来个二审。

哪知，李成归已经逃离停车厂了！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1）

按照一般常识而言，李成归的逃跑说明此人确实是有问题的。于是，专案组当即布置追缉。追缉人员了解了李成归的社会关系，估计他多半是往天津的姐姐那里去了，遂直奔天津。结果如何，暂且按下不表。

专案组刚刚布置好追缉事宜，受委托寻找傅今为的厂工会人员前来报告，说傅今为已经找到，现在家里，但他不肯这会儿到厂里来，说已经晚了，有什么事等到明天再说。

专案组长马及时笑道："这可由不得他了，去两个人把他请到外三分局来！"

两名侦查员和厂工会的两人带路去了傅今为家。那家伙已经躺下了，但还是给叫了起来，让他跟着到了分局。

这时已是晚上10点钟，马及时亲自讯问傅今为。傅今为是一个40来岁的大汉，身高足有1.80米，满脸横肉，相貌凶恶。他的资格倒没有李成归那么老，见了马及时那两道犀利如电的目光，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马及时问过姓名、年龄、住址等例行语后，直截了当道："这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如果说得清楚，那就立马走人——你在4月24日晚上去过停车厂没有？去干什么了？"

傅今为不敢正视马及时的眼睛，低着头嗫嗫嚅嚅道："我……我没去过。"

"再说一遍！"

"没去过。"

"真的没过去？"

"是的。我可以发誓：我如果去过厂里，就……"

马及时打断了他的誓言："别说这种话，你说没去过厂里，敢写下来吗？"

“敢啊！”

侦查员把纸笔拿过来，傅今为真的握笔就写下了一行歪歪斜斜的字：如我说的有假，甘愿杀头！

马及时一看，笑了笑：“傅今为，真是这样吗？你不要把门关得太紧哪，否则，到最后是要后悔的。”

傅今为摇着头：“没什么的，这是事实。”

“好吧，让我们看吧。”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2）

马及时写了个纸条，吩咐一个侦查员跟停车厂联系，让速把证人送来。在等待的当儿，也没让傅今为闲着，马及时要他说说4月25日、26日的行踪，因为他这两天都没去上班。

傅今为用满不在乎的口气道："没去上班又怎么着？厂里扣我的钱就是了，跟你们又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一定呢，说不定也是有一点儿关系的。"

傅今为抬眼望着马及时："有什么关系？你倒是说说看。"

"再说，再说吧。"

这样似乎不着边际似地又聊了几句，马及时让侦查员去外面叫了夜宵，每人一碗面条，也给傅今为弄了一碗。但这家伙似有心事的样子，没能吃得下去。

吃过夜宵，停车厂的两名证人来了。马及时让他们先别进审讯室，再给傅今为一个机会，要他重新说一下究竟去过厂里没有。傅今为仍是一口咬定没去过，于是就叫证人进来。

两个证人就是4月24日晚上在停车厂警卫室值班的门卫，都是50多岁的老头，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一看就是一生都没说过一句假话的人。两人说了傅今为那天进厂的时间、所穿的衣服、跟他们说过的话。

傅今为到这当儿，干脆一赖到底了："没有的事，完全是一派胡言！你们都是这么一把年纪了，怎么还作兴诬陷人哪？老爷子，那是丧阴德的事哩！"

证人之一、58岁的老朱给气得满脸通红，下颏的山羊胡子直哆嗦："你小子说咱诬陷你？好你个'狗疙瘩'！"

"狗疙瘩"是傅今为的绰号，因为他那张脸上终年长满了高高低低的疙瘩，据说是因为18岁青春勃发那年与一条母狗"闹着玩儿"时让狗舔后萌生出来的。这是一段见不得人的丑事，傅今为最怕别人提起

了。多年来，只要有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提起，他就会像疯狗似地跳起来跟人家打架。现在，老朱一说，傅今为气得一跃而起，正要向他扑去，被侦查员一把扯住："老实点！撒野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

老朱冷笑道："你还想抵赖？好得很！我这里还留着你给我抽的那支'大前门'哩！"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3）

原来那天傅今为进厂时，停下跟老朱两人说话，顺手每人发了一支“大前门”香烟。当时的工人生活贫穷，抽的都是旱烟杆，弄到一支哪怕是最廉价的纸烟已经了不得了，何来“大前门”抽？所以老朱特别珍惜，一时舍不得抽掉，就留了下来，想等几时遇上喜事儿时再抽。

这话一说，侦查员马上搭过了话岔：“有他给的烟？真是好得很哩！这烟上有他的指纹，我们只要鉴定一下就清楚了。”

老朱来了劲：“在我家里搁着呢，我这就去拿来。”

其实，以当时公安局的技术鉴定水平，这支烟上的指纹是否鉴定得出还很难说，但是这一家伙唬住了傅今为，他一听，脸色就变了，青中泛红，红后变白，之后就固定成了灰土色，一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侦查员。

马及时示意证人离开，然后问道：“傅今为，你怎么啦？”

“我……”傅今为的声音没了底气，瓮声瓮气就像是从一口很深的洞穴里发出来的：“我刚才写的那条子……”

“嗬嗬，你说那条子？是想收回？重新来一个说法？”

傅今为的头点得像公鸡啄米：“是！是！是！”

“可以，可以。”马及时拿出那张纸条，划根火柴烧了。

“这你总放心了吧？”

傅今为于是承认他那天晚上确实是去了停车厂的。

“你去干什么了？”

傅今为眼神怯怯地望着侦查员，欲语又止。

马及时说：“没关系，你说吧，是什么就说什么。你现在主动说出来，算是你自己交代的。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坦白了，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从宽的。”

傅今为双膝跪地，哭着道：“我犯罪啦！我太糊涂了！……”

侦查员见傅今为这副样子，心里不禁一喜，寻思这家伙准跟纵火案搭上边的，否则决不至于如此言语举止。马及时站起来上前去扶起傅今为：“别这样，有话就说，我们听着。”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三（4）

傅今为坐回到他的位置后，交代了他的罪行，却是令侦查员大失所望！原来，这家伙4月24日晚上去停车厂并不是搞纵火破坏，而是和李成归两人结伙盗窃机修车间的铜轴瓦了，这已经是他们的第四次作案了。傅今为昨天、今天没去上班，就是去郊区销赃的。

侦查员详细记下了傅今为的供词，审讯就进行到这里了，傅今为当时就被拘捕了。

4月27日下午，去天津追捕李成归的侦查员押着李成归回来了。马及时立刻让人讯问，李成归的交代与傅今为完全一致。

当日，侦查员从郊区一个铜匠那里追回了赃物。

这次调查意外地侦破了一起盗窃案，但是纵火案的线索却断了。李成归和傅今为后来都被判了刑，押往东北松江省（该省建制于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撤销）服刑。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四（1）

1949年4月28日晚上，专案组举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会议。会议经过长达3小时的讨论，决定下一步开始从政治方面寻找纵火案犯。

次日，侦查员戴越等几人前往停车厂，通过工会的帮助，得到了一份该厂解放前参加敌特组织、国民党以及政治上不清白分子的名单。这份名单共有21人，其中有13人参加过国民党，3人参加过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2人参加“军统”，2人当过汉奸，1人是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的小头目。北平解放后，其中有4人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2人已经病亡，1人已经离开停车厂回家养老；剩下的14人在年初北平解放时均已向人民政府登记。

侦查员向停车厂尚未公开的党组织提出要求：秘密开展对上述14人的调查，调查内容有二:一是查明4月24日晚上这些人的行踪;二是查清这些人最近与什么人有过交往。

停车厂党组织刚开始进行调查时，专案组又获得了一条线索。那是4月24日晚上在停车厂担任值夜人的4位中的一个姓王的工人悄悄向侦查员提供的：那天晚上，大约12点钟左右时，他们4人刚从外面巡逻了一圈回到值班室，他出门小便时，似乎看见大约20米开外闪过一条黑影。从其身形和步履估计，那人是停车厂财务科的焦先生。王某对他未在那天侦查员向他们4个值夜人谈话时提供这一情况作了解释，说因为当时他看得不清楚，又不能估计出对方像谁，出于慎重便没有说出来。这两天，他一直在中午待在食堂里留心寻找与黑影相似的那个人，结果终于发现那人很像焦先生，于是就决定向专案组报告。

接待王某的侦查员小周问道：“焦先生叫什么名字？”

王某摇摇头：“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姓焦，大约50来岁。”

原来当时的工厂还是解放前留下来的那一套，白领与蓝领层次分得非常清，一般的工人也即蓝领基本上与管理人员也即白领接触很少甚至没有接触，因此并不知道白领成员的姓名，有的甚至连姓氏都不

晓得。不过这难不到侦查员，一查便知了。小周查了查，弄清焦先生者名叫焦一星，是停车厂财务科的老科员，解放后，他被调往停车厂材料仓库当管理员。这个名字交到专案组长马及时那里，马组长一看便暗自一愣，原来此人的名字也列于停车厂党组织搞的那份名单之中的，他是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的！

到这当儿，专案组不得不对焦一星特别予以“关照”了。侦查员专门为其设立了一份档案，把关于此人的所有材料都列入其中——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四（2）

焦一星，男，49岁，河北省清河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其父系当地有名的恶霸，于1944年被共产党的武工队镇压。焦一星的两个弟弟都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在两年前死于东北战场，当时是个团长；另一个在国民党军阀汤恩伯的部队当着副师长，驻军江南。

焦一星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成为“中统”的秘密情报员，专为该特务组织收集共产党地下党的情报，后因七七事变的爆发而与“中统”脱离。抗日战争结束后大约一年许，焦一星又与“中统”搭上了钩，正式成为该特务组织的一名成员。

北平解放前夕，北平电车公司的一名地下党员被“中统”抓去，命系一线。地下党在组织营救时，听说焦一星与“中统”似有关系，于是通过这个党员的家属找到了他，希望出面营救。焦一星花了些钱，把被捕者保了出来。北平解放后，焦一星是电车公司系统第一个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的。根据其罪行，“焦一星”这个名字应当列于在之后进行的拘捕行动的名单，但是，考虑到他营救地下党员一节，故予网开一面，法外施仁，没有动他。不过，财务科这样的岗位是不能让他继续待下去了，于是把他调到材料仓库当了一名管理员。

停车厂是上常班的，难得有机修工在有紧急抢修活儿时才加班，管理人员则终年也不会轮到加班，因此，焦一星在夜间出现在停车厂这一情况就成为一个疑点。专案组于是决定传讯焦一星。

4月30日下午，焦一星接到停车厂工会转达的公安局的通知，让他即时前往外三分局一趟。焦一星不敢怠慢，马上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外三分局。

两名侦查员已经在一间空屋里等着他了，一看，进来的是一个身高不过1.6米的瘦弱小老头，一张皱纹斑斑的脸显出一种肺结核患者特有的苍白。已经进入暮春时节了，他还穿着薄丝棉长袍，尤是一副抖

抖索索的样子，进门未及开口，就爆出一连串剧咳。好不容易咳停了，他便弯腰冲侦查员鞠躬：“同志，焦一星奉命前来晋见。”

侦查员让他坐下，还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要他谈谈4月24日晚上的行踪。

焦一星的脸上显出惊异的神色：“4月24日晚上？您二位说的就是厂里失火的那个晚上？我在医院啊！”

轮到侦查员惊异了：“在医院？”

“是的。那天我吐血了，事先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就吃了几片饼干，喝了几口牛奶，医生就让我留在观察室，挂了两瓶葡萄糖盐水。我是第二天中午才出院的。”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四（3）

“哪家医院？”

“就在我家附近的‘博爱医院’。”

“看病时留下病史记录了吗？”

“留了，还在我身上呢。”焦一星说着从怀里取出了病史卡。

侦查员看了看，上面果然写着病人自4月24日上午10点半入院，挂了葡萄糖盐水，留院观察24小时，于次日中午出院。

讯问结束后，侦查员向专案组长汇报了讯问情况。马及时皱眉道：“ 如此说来，焦一星没有作案时间？可是，王某怎么看见他那天晚上出现在停车厂呢？看来，这里面还有问题啊，要么是焦一星在说谎，要么是王某看错人了。这一点，需要查查清楚。”

就在侦查员着手对上述情况开始进行调查的时候，案情侦查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突破——有人来向专案组自首！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1）

那是传讯焦一星的次日，也就是1949年5月1日。这天是国际劳动节，但是当时还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没有法规规定可以放假休息，所以还是像往常一样上班。专案组的一大半侦查员都派出去调查了，只有组长马及时几人在外三分局的临时办公室里。上午10时许，门口警卫打进来一个电话，说有人求见专案组领导。

马及时感到有点奇怪，因为一般人并不知道专案组设在外三分局，如果是停车厂的工人有情况要反映，那也会直接找正在厂里调查的侦查员的，何必舍近求远要上这里来呢？直觉告诉他：来人必定是与案件有着密切关系的！

一个侦查员出去把来人带了进来，那是一个30多岁的中高个男子，一进门就冲在场的每个侦查员鞠躬，口称“长官”。

马及时说：“我们不称长官的，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对方打量着马及时，吞吞吐吐道：“不敢动问，您老是……？”

“我姓马，是这里的负责人。”

那人定睛打量着专案组长，突然马失前蹄跪了下来：“长官，我向您老请罪来了！”

马及时连忙示意侦查员把他扯起来：“有话好好说，不要这样子嘛。你坐下，说吧，是什么事情？”

“停车厂的那把火，是我放的！我向政府自首来了。”

“哦？”在场所有的人都注视着那人，一时间屋里寂静无声。稍停，马及时的声音打破了这种使对方难挨的静谧：“你来自首，我们欢迎啊！”说着亲自动手给他倒了一杯水，“你坐，喝口水，然后把事情讲清楚。”

自首者作了如下交代——

此人名叫牛言斌，36岁，北平人，家庭出身店员，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在近20年中，牛言斌先后干过小贩、跑龙套、卖膏药、车

夫、工人、店员、职员等多种行当。1946年，牛言斌经一位朋友的介绍，参加了“中统”在平津地区的外围组织，一年后又正式成为“中统”特务。他的本领不过是跑跑龙套，所以在“中统”也是如此，上司并未安排他正正式式干哪一门，或情报，或行动，而是哪里需要就叫他到哪里去，这次收集情报，下次搞盯梢，也曾经参与过绑架和暗杀，但都是望望风的小角色。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2）

由于牛言斌参加“中统”活动属于秘密性质，所以北平解放前夕“中统”安排潜伏特务时，他就理所当然名列其中。当时他的职业是在一家医院看门，那是“中统”安排的，这是一份闲差，具有相当的自由度。北平解放后，那家医院的经营人可能不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也可能有点儿数而故意装不知道，还是让他这么干着。“中统”潜伏特务采用的是“单线联系”，牛言斌的上家也就是领导是一个中年妇女，自称姓喻，究竟姓什么他就不清楚了，他称对方“喻小姐”。这位喻小姐很大气，隔三差五给牛言斌送钱送物，但从未要他执行过什么任务。不过以牛言斌的社会经验，知道这等优待法不久必有重任要委派的，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果然，1949年4月9日，喻小姐突然来电约牛言斌去前门“仿膳斋”吃饭。席间，喻小姐向牛言斌传达了上峰的命令：于月内在北平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制造一起纵火事件，要求必须“伤筋动骨”，即要造成实质性的损失，越大越好。

牛言斌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再说事先又有了心理准备，自然爽爽快快应诺。但他要求“组织”给他提供执行任务的方便。

喻小姐说那是自然要提供的，当下拿出了一份情报，包括停车厂的各种情况和地形图，以及执行任务的方式。

喻小姐又拿出两根金条，说是给牛言斌的行动经费及预付的赏金。行动成功后，将根据停车厂所受损失的大小发给相应数额的赏金。

牛言斌接受任务后，曾先后4次潜入停车厂去窥察地形；还在夜间多次去停车厂围墙外观察值夜人的巡逻路线和时间规律。当一切都准备妥当后，牛言斌便于4月24日晚上潜入停车厂纵火。

牛言斌没想到这起案件竟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应，心中不禁恐慌至极。那位喻小姐又给了他3根金条后，便再也不露面了。这几天，派出所又在不断地进行对“三类人员”（指特务、恶霸、逃亡地主）的查缉，牛言斌的一些熟人朋友中颇有几个给逮了进去。更令牛言斌不安的是，街坊中的一位热心于社会工作的大娘不知怎么的不断地跟他接触，一句句话里似乎都藏着“骨头”，不得不使他疑心自己已经列入了公安机关的嫌疑人名单。牛言斌在这种情势下，决定走“坦白从宽”的路，于是便来自首了。

牛言斌交代完后，交出了喻小姐给他的5根金条。

侦查员在随后所作的讯问中，着重要求牛言斌详细交代作案的具体过程。据牛言斌交代，他是以点燃的棒香裹在从鞭炮中取出的火药棉条中，然后又把火药棉条放在浇过柴油的棉纱上引燃明火的。事先已经多次计算过提前量，所以能在点燃棒香后从容逃离现场。他是在大火燃起前大约3刻钟潜入现场的，先在那里洒上火药和柴油，然后根据预定的提前量点燃了棒香。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3）

牛言斌的自首对于专案组来说，自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情况，但是，作为侦查员，应当把他交代的情况一一查实，予以认定，然后才能结案。侦查员弄来棒香，按照牛言斌所交代的那种方式进行了验证，表明确实可以引发火灾，提前量也基本相符。

但是，光凭这似乎还不能定案。专案人员又在夜间把牛言斌带到现场，要他根据所交代的情节摸黑翻墙越入停车厂车间，摸遍作案时所经过的位置。牛言斌实施起来也不怎么犯难。

如此，按照办案规矩，是可以结案了。专案组长马及时出于对该案的重视，决定亲自书写结案报告。在写结案报告前，马及时还要对牛言斌提审一次。5月5日，马及时和两位侦查员去了外三分局看守所，提审牛言斌。

谁也没想到，这次提审竟然否定了牛言斌是作案嫌疑人这一可能性，从而使这起案件的侦查又一次陷入了迷惘之中！

那天，马及时担任主审，事先他已经反复阅读过以前对牛言斌的几次讯问的记录，凡是已经问过的就一言带过，而对于没有问过的那些细节，则问得特别详细。事后，马及时说，他当时这样做倒并不是有先见之明，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怀疑，而纯是出于一种职业性的缜密，想要让这个案件的侦查经得起检验。这一缜密，便使自首者露出了作假的马脚。

讯问中，马及时突然问到一个问题："你作案所用的棒香是哪里弄来的？"

牛言斌回答："我买的。"

"从哪里买的？"

"是在香烛店买的。"

"哪个香烛店？"

"我家附近的那家香烛店，就在胡同口第四个门面。"

一般问到这当儿也就可以了，殊不料专案组长还不罢休，还要追问一句：“什么价钱？”

这句话把牛言斌问了个愣怔，但他还算是反应快的，一愣之后马上回答了价钱。马及时早有准备，事先专门了解过，一听就知道对方回答得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上下相差甚多。他顿时警惕起来，却不露声色，继续讯问下去，增添了几条事先没有准备过的内容：柴油的来源及价格？作案那天的天气情况特别是风向？几次去窥察现场时所见到的值夜人的个子、服装、人数和巡逻时间等等。牛言斌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均显出或多或少的窘相和迟疑。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五（4）

讯问结束后，马及时马上通知举行案情分析会。侦查员听马及时一说讯问时出现的种种疑点，都对这个案件产生了疑窦，于是决定立即进行针对性的调查。

一查之下，除了棒香的价格出现漏洞外，其他几个内容也都有失实现象。于是，专案组终于认定：牛言斌是假自首者，作案人不是他，而是有人指使他冒充作案者前来自首的。

是谁指使牛言斌向公安人员假自首的？弄清了这一点，真的案犯也就可以弄清了。当天晚上，专案组决定对牛言斌进行突审。

当侦查员向牛言斌指明其假自首的伎俩已被戳穿并列举种种证据后，牛言斌再也不开口了。审讯进行了将近7个小时，只有侦查员在说（政策攻心），牛言斌始终埋头不语。看看天色，已是5月6日的黎明时分，侦查员只好暂时停止审讯，打算到下午继续提审。

哪知，上午9时许，从看守所传来消息：牛言斌上吊自尽了！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1）

牛言斌的自杀，对于专案侦查而言，是断了线索，但是同时也证明了他是假自首，在其背后指使的人便是作案嫌疑人。

5月6日中午，专案组举行紧急会议，就牛言斌自杀一事进行了分析，最后研究出了下一步的侦查方向——对牛言斌生前的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详密调查，从其生前接触的社会关系中梳理出新的线索。

一张大网张开了，凡是与牛言斌有过关系的人都被罗列其中予以查摸分析。短短的两天中，就有187人列入其中。这些人中，有牛言斌的亲戚，也有朋友，以及以前曾经一起干过活的同事，其中有少数人已经过世或者离开中国大陆了。

侦查员特别注意这些人中是否有电车公司南厂停车厂乃至整个北平市电车公司的人，但牛言斌生前交往的三教九流中并无这类人。上述已经查摸到的人员中，经初步调查，并无任何疑迹。这样，看来有必要扩大调查面了。

专案组决定派侦查员去访问牛言斌的家庭，指望在与其家人的接触中发现线索。牛言斌的家属成员有5位：其母、妻和3个子女，考虑到便于工作，专案组特地从市局临时借了一位女侦查员仇伽参加这次特殊的家访。

5月10日，侦查员戴越和仇伽踏进了牛言斌的家门。牛言斌自杀的消息当时还没通知其家属，戴、仇两人前往的话由是给牛言斌取些东西。牛言斌的家人正为牛言斌的被捕而惴惴不安，不知道牛言斌犯了什么事，这会儿见侦查员上门，自然要问一问。于是，侦查员就跟她们拉上呱了。聊了一会儿，侦查员便从牛妻口中捕捉到了一个消息：不久前，曾有一个气度不凡的南方人到她家来找过牛言斌，还吃了一顿饭。

戴越和仇伽互相使了个眼色，仇伽便以似乎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那是你家的什么亲戚啊？”

牛妻说：“不是亲戚。”

“那是朋友了，要不怎么还请吃饭呢。”

“也不是朋友……”牛妻见仇伽脸上显出惊奇的神色，又补充了一句，“最多算得上朋友的朋友吧，那人是牛言斌在广州的一位朋友介绍过来的。”

戴越开口了：“那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个模样？”

牛妻边想边说：“他叫什么我不清楚，我就听牛言斌称他‘莫先生’。莫先生是一个大胖子，又高又胖，脸色白净，嘴唇上留着八字胡子，穿黑色华毛葛长衫，戴一顶黑色礼帽。”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2）

“那位莫先生是几时到你们家来的？”

“记得是3月中旬吧。”

“莫先生从南方哪个省过来的？”

“听说是广州，他带来的也是广州的礼物。”

“在北平待了多长时间？”

“这我们可不知道了，你们可以去问问牛言斌，也可以去向旅馆了解。莫先生在我家就待了几个小时，后来就由牛言斌陪着去旅馆了。”

“哪家旅馆？”向牛言斌了解已经不可能的了，只有去旅馆碰碰运气了。

“这个……”牛妻摇头，“我可记不清了，因为我不是陪着他们的。不过我听牛言斌陪他出门时说过一句话‘旅馆离这里不远’。”

这时，牛母开腔了：“我知道，那位莫先生就住在天坛那里的‘鸿运旅馆’。”

戴越回来向马及时一汇报，马及时说：“这个‘莫先生’有问题！马上去‘鸿运旅馆’调查。”

侦查员去了“鸿运旅馆”。当时的旅馆还是私人开的，但是自北平解放后，北平市公安局第三处已经有规定：各旅馆必须对前来住宿的旅客进行登记，保留登记本备查。这一点为侦查员调查提供了方便，可是翻遍了登记本，却没有那么一个从广州来的旅客，也没有姓莫的旅客来住过。

一位侦查员说：“要么不住在这家旅馆？”

另一位侦查员说：“咱们问问掌柜的吧。”

掌柜的不在，于是改向账房先生打听。账房先生是一位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鼻梁上架着一副酒瓶底般厚的眼镜，他的记性甚好，一说那么一个大胖子，马上说“有”，说着翻出了登记本，指着一个名字说：“就是此人！”

侦查员一看，登记本上的名字是“胡南索”，从哈尔滨来北平办事的。侦查员一愣之下，问道：“他从哈尔滨来的？”

“是的，他出示的就是哈尔滨的路条，我们是按路条登记的，这是公安局的规定。”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3）

就此一节看来，“莫先生”就是一个可疑分子了。于是，侦查员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旅馆账房先生、伙计、厨师什么的开会，要求他们回忆“胡南索”其人在旅馆住宿时的情况，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好的。按说旅馆每天要接待不同的旅客，要他们回忆一位一个多月前只住过几天的旅客是不大可能的，幸好这位“莫先生”是个引人注目的大胖子，而且很大方，“鸿运旅馆”自掌柜到厨房拣菜的老妈子他都打点到了，所以大伙儿还记得他。当下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侦查员笔走龙蛇一一记了下来。

侦查员回到分局把调查记录一整理，发现好几人都提到了“顺兴米行”的贾老板，说曾见贾老板3次坐了三轮车把胡南索送回旅馆来。于是，侦查员便对贾老板进行了秘密调查，了解到此人虽是做生意的，却一向喜欢广泛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旧北平的军、警、商、工、艺一直到讨饭叫花子都有他的拜兄盟弟，不过未见他有过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敌的行为，1946年时，还利用朋友关系营救过一位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委员。因此，初步可以认定此人并无问题。

专案组发现贾老板结交的朋友中，有一位现在北平市公安局二处工作，此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与贾拜过弟兄。共产党人当然不讲拜不拜弟兄，但是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去做贾的工作，让他说明“莫先生”的真相。于是，经市局领导批准，专案组找了那位党员刑警，自是一说就行。那人找贾老板喝了一顿酒，就弄清了情况——

那位“莫先生”确实姓莫，名叫大竭，是贾老板在上海的一位朋友介绍过来的。莫大竭是3月19日来北平的，住了3天就离开了。在平期间，曾在贾老板开的米行里设宴请过客，一共来了两位客人，贾老板作陪。那两位客人，一是牛言斌，另一人是焦一星。

专案组一听这两个名字，个个惊喜不已。即使是从来没搞过侦查工作的人，也会对此巧合产生联想了，别说是专案组诸君了。侦查员

几乎用不着分析，马上得出结论：牛言斌的假自首是为了掩护已经被我注意了的焦一星！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博爱医院再次对焦一星所说的4月24日“住院”的情况进行调查，终于查明那是焦一星玩的障眼法，他在进医院挂上盐水后，不久就溜了出来，为了让人给他做证明，他还塞给了护士一枚金戒指。

焦一星再次被传到了外三分局。老家伙还是一副痨病腔，和侦查员玩弄“去医院看病”的那一套把戏，但很快就被侦查员抛出的证据压得软瘫在地下，哀求让他自己坦白。

1.周恩来亲自踏勘现场的特大纵火案 六（4）

原来，焦一星是“中统”潜伏特务，北平解放前夕，他受上司指令“长期潜伏”。正好这时有人托焦一星营救那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他考虑到要取得共产党的好感，便向上司提出把那人释放，获得了许可，于是，他便成了有功人员，逃过了北平解放后的那次审查。今年3月，焦一星接受上司（就是那个莫先生莫大竭）的秘密指令，要求给共产党政权制造障碍，于是他想到了纵火烧毁电车。上司很是器重焦一星，考虑到他身负“长期潜伏”的任务，担心纵火作案后会被公安机关怀疑，于是就向另一潜伏特务牛言斌下达指令，要其届时如果公安局真的疑上了焦一星，就由他出面去“自首”顶替。

4月4日夜间，焦一星带着也在停车厂工作的一名同伙潜入该厂，两人分别在多处放置了棒香、火药和浇过柴油的棉纱，点燃棒香后顺原路逃遁。

案件发生后，我侦查员果然疑上了焦一星，于是他就指令牛言斌实施“假自首方案”。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尽管他事先对此进行了精心详密的策划，但是在我机智的侦查员面前还是露出了破绽，阴谋终于败露了。

至此，这起惊动周恩来的特大纵火案的侦查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1）

1949年，国民党特务机构为破坏即将回归人民的新上海的金融秩序，策划部署了“伪造金圆券”阴谋。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在江南梅雨时节悄然拉开了帷幕……

一

1949年5月23日凌晨两点，丹阳城内一座已显陈旧的庭院中，一幢2层小楼的一个窗口还亮着灯光。这里是上海战役总前委、华东军区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临时驻地，陈毅正在接待一位午夜时分刚从上海赶抵丹阳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络员。

这位联络员向陈毅汇报了上海目前的最新情况，提供了地下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其中一条看似简单、平淡的情报竟然当场引起了陈毅的特别注意。这是一条经济方面的情报，简单得只有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伪造金圆券。

用今天生长在新中国红旗下的读者的角度来判读这条情报，可能是很难捕捉到其中的重大价值的。伪造金圆券？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使用。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到时候市面上流通的是人民币，这当儿还伪造金圆券干吗？难道准备运到尚未解放的那些地区去使用？

但是，对于正在审阅并准备签发一份重要文件的陈毅来说，对于这条一句话情报的重大价值却是一目了然。这份目前已经载入史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的重要文件，对于整顿新上海的经济秩序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

这是一个可能由于岁月有点久远而已被人疏忽了的问题：一座城市的统治权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这个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的更换，在经济上来说，会有一个谁也无法绕过去的问题：货币。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

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的金圆券。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了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了，共产党接管了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重要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2）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陈毅为什么对于这条只有一句话的经济情报会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时候，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向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这无疑是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首任市长的陈毅坐不住了，站起来在屋里踱了数步，问这位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侦缉大队在浦东的内线向他们密报的。"

陈毅稍一沉思："同志，请你就该情报写一个材料好吗？现在就写。"

这位联络员于是就在陈毅的办公室里写下了这份简单但又重要的情报。

陈毅在这份情报上批示：请李士英同志布置对此事进行调查，如若属实，则应迅即予以严厉打击，以确保我金融不受破坏，维护人民的新上海的经济秩序。

次日，经陈毅批示的这份情报就到了李士英手中。

李士英这个名字，是新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上的丰碑之一。这个1912年12月21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贫农家庭的汉子，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1930年开始就出现在党的隐蔽战线上，从那时起一直到渡江战役的19年中，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上海中央特科第三科成员、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科长、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特派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兼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济南市公安局局长

等。渡江战役前，奉命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不久前来到丹阳后，又被内定为兼任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后来上海解放最初阶段的公安工作，就是由李士英主持的。

当时，李士英正和梁国斌、胡立教、扬帆等负责接管旧上海警察系统、组建新上海公安战线的领导在一起商议接管伪警察局以及接管后如何开展公安工作的问题。几个人正谈得热烈时，机要员送来了陈毅的批件。李士英一看，说看来上海滩可真是一个复杂之地，我们还没打下来，案子就已经发生了。这是一个重要线索，必须迅速调查。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3）

好吧，那就派人着手干吧。

上海还没解放，公安局还没成立，李士英这个未来的局长派得出人手去搞侦查吗？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早已考虑到并且作了安排。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规定，这些干部中的15000名完全由山东负责提供。因此，从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局长任上调派过来的李士英带来了一支公安干部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全都是有过侦查工作实践经历的，后来被誉为“江南名探”、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处长的端木宏裕就是其中的一位。不过，当时这个“伪造金圆券案”的侦查任务，李士英并未下达给这位未来的名探，而是点了一位名叫徐伯龙的25岁的共产党员的将。这是因为徐伯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氏，参加革命后才去的山东，现在这个案子发生在上海浦东，李士英想派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主持该项工作较为合适。

徐伯龙参加革命后先是做地下工作，主要是替地下党侦察敌情。后来地下党中出了叛徒，组织上命令凡是跟叛徒相识的同志立刻四散撤离，他于是就去了胶东半岛，在许世友部队当了一名战士。后来，因为作战勇敢，提升为班长、副排长、军区保卫部干事。济南战役

前，奉调去了华东局社会部接受保卫工作训练。受训结束后济南已经解放，徐伯龙被分派到了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手下从事侦查工作。这次跟着上级领导渡过长江准备接管旧上海市警察局，想到自己是浦东人，对上海情况熟悉，此番到了上海定能大大发挥。这可不是，待在丹阳正学习着城市政策还没动身哩，就被上级召去接受了这个使命。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徐伯龙并不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侦查员，他于公安侦查工作不过是进入济南后接触了一些。所以，可以想象，当他听了李士英下达的那份根据“一句话情报”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任务后，心里不禁一个激灵，下意识地开口问道：“还有谁和我一起干？”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一（4）

李士英笑了，说目前没有谁了，就你徐伯龙一个。不过，到了上海后，可以根据需要给你派几位助手，成立一个专案侦查组。上海前线作战态势令人振奋，估计我军在明天就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最后防线进入市区了，因此，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丹阳前往上海。你从现在起不必参加学习，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开始琢磨这个案子吧。

这样，徐伯龙就正式接受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使命，开始独自考虑案情。按照通常的侦查思路，应当是去向提供线索的那个方面作进一步了解，掌握更多的情节和细节。但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性就在这里，其线索来源是严格保密的。当时，上级领导连该线索来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也没有对徐伯龙透露。这样，徐伯龙就只有靠自己本身的想象力去推测该案的侦查方向。

徐伯龙反复考虑了许久，总觉得一时理不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次日，上海前线传来解放军部队已经攻入上海市区的消息。5月26日，上级就下达了离开丹阳前往上海的出发命令。徐伯龙在离开这个工作和生活了正好整整一个月的小城时，对于该案如何开展侦查已经有了一个思路， 但心中仍是惴惴不安，不知是否行得通。

……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1）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徐伯龙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而徐伯龙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已经开始投入工作了。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作了大量准备。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4人作为徐的助手，5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徐伯龙的4名助手，都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其中曹孝先、关志存是中共地下党员，另一名叫杜奔的小伙子是1948年底参加地下共青团组织的，还有一个姓马的22岁青年刑警是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杜奔和小马在解放前夕都被担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保密局大特务毛森作为“中共地下分子”而列入秘密逮捕名单，意欲将他们处决。幸亏地下党组织及时获悉情报后通知两人迅即撤离，方才未遭毒手。解放军进入市区后，杜奔、小马从藏身的郊区返回市区，刚向“中共上海警察委员会”报到，就被派往专案组参加侦查工作了。

5月27日，徐伯龙在上海全市人民迎接解放的喜庆锣鼓爆竹声中，于福州路185号原上海市警察局三楼的一个办公室里，跟他的4名助手见面，宣布成立专案侦查组，随即就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徐伯龙向4名侦查员介绍了案子情况，说同志们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5人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使命。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

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徐伯龙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而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该布告主要规定如下：

（一）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账务，债务，票据，契约等均须以人民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本位。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2）

（二）伪“金圆券”自即日起为非法货币。但为照顾人民之困难，在6月5日以前暂准在市面流通，过期即严禁使用。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伪“金圆券”，任何人不得强迫其收受。

（三）规定人民币1元折伪“金圆券”10万元为本市第一次比价。但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在继续发行，伪“金圆券”还会继续贬值，故在暂准流通期间，市场使用伪“金圆券”，不受第一次比价之限制，人民可随时按其贬值程度更改比价。

（四）自即日起，本市物价，一律遵照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计算，不得因伪“金圆券”贬值而抬高。

（五）凡5月28日以前之一切债权、债务、契约、合同等，均须按本市第一次比价折合人民币，凡不依上述规定改订者，在法律上不生效力。

（六）为照顾人民困难，本市中国人民银行自5月30日起，以人民币按牌价收兑伪“金圆券”，收兑之比价、票面种类、期限及兑换手续办法，由人民银行规定公布。

徐伯龙介绍了布告的主要内容后，说这份布告将于明天在上海全市广泛张贴，做到家喻户晓。根据上级部署，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将于5月30日成立，届时将开始收兑金圆券，6月5日兑换结束。这就是说，事实上形势只给了我们3天时间，如果我们在5月30日之前未能将本案侦破，不法分子伪造的金圆券就将被兑换成人民币。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行动起来，争分夺秒抓紧进行侦查工作。请大家议议，看我们如何进行侦查。

众人就开始发表各自见解，最后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伪造金圆券的技术要求特点，对拥有相关技术和设备的方面进行调查；二是既然情报说线索是在浦东，那就派人前往浦东进行查摸，重点还是围绕印制钞票的技术和设备进行。

事不宜迟，于是就赶紧分工：徐伯龙和曹孝先去中央印制厂了解情况；关志存、杜奔和小马3人分别前往浦东地区的3区3县进行查摸，鉴于治安形势严峻，他们都必须化装前往。徐伯龙一边布置着，一边拿出一本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大印的介绍信，每人给了一张，上面写上姓名和调查事由，并写上了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的电话号码，说如果发生怀疑你们身份的情况，可以让他们拨打这个电话。另外，各人到了调查地后，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情况随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接听电话的同志会认真做好记录及时转告他这个专案组长的。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3）

徐伯龙、曹孝先前往的中央印制厂，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中央印制厂是国民党政权时期的财政部直接管理的一家专门印制钞票的工厂，共产党方面在发起上海战役准备接管上海时，将这家工厂列为首批必须迅即接管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华东局移至丹阳时，就已经与于1948年12月1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取得联系，由该行下令召集各解放区印钞厂工作人员集中于丹阳，随军南下。1949年5月27日，这些工作人员随军方代表一起接管了中央印制厂。徐伯龙、曹孝先过去时，该厂的工人群众正兴高采烈地把“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牌子挂在厂门口，这一行动宣告了国民党中央印制厂历史的结束。

军代表接待了两位侦查员，听了来意后，当即召来该厂的工程师和解放区随军而来的印钞厂工作人员，接受侦查员的咨询调查。

侦查员从对方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1.金圆券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以来，全部票面的钞票都是在该厂印制的，最先印制发行了20万亿元，后来加印到130万亿元，最大的面值是100万元。大票面值所用的纸张是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票面值是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2.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的印制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票几无差异的难度极大。但是，作为伪造者来说，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由于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的原因，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

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假钞在银行职员这种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徐伯龙经对方如此这般一说，心头的压力好像稍稍减轻了些，因为对方即使伪造成功了，其产生的危害也应该是很小的，而且暴露的可能性是会非常大的。他跟曹孝先交换了意见，对方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人决定也去浦东城厢进行实地查摸。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4）

之所以选定城镇作为查摸首选目标，这是因为从印制纸币的技术角度而言，不管印制地点是否在城镇，作案线索都离不开城镇，所以选定城镇作为首选目标乃是一条捷径。浦东地区，当时有属于上海市的高桥区、杨思区、洋泾区和刚被列入苏南行政公署的川沙、南汇、奉贤3个县。被专案组列入侦查范围的有以下几个城镇：高桥、洋泾、杨思、川沙县的城厢、南汇县的惠南、周浦和奉贤县的南桥镇。徐伯龙和曹孝先离开市区前往浦东时，分工前往南汇县查摸的侦查员杜奔已经在周浦镇找到了一条线索。

杜奔出身资本家家庭，家境富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兜售战备物资时，他从老爷那里取了钱去买了一辆二轮摩托车作为上下班的交通代步工具，平时休息日也常骑着这辆摩托车去上海近郊搞些旅游、钓鱼什么的休闲活动。这次，杜奔接受任务后，就化装成旅游者开了摩托车前往南汇调查。从上海市区过去，第一站是周浦镇。这是杜奔以前旅游时经常来的一个地方，他在该镇还有几位朋友，于是就把摩托车寄放到其中一位姓任的朋友家里。也不跟当地已经接管了伪警察署的军代表联系，凭着以前的记忆，去了周浦镇上惟一的一家印刷社。

杜奔佯装客户跟印刷社老板聊起来，得知该社不过是一家小小作坊，只能印制些名片、招贴、账册、信封、信纸之类的活儿，都是以铅字排印后上机印刷，然后再切边装订。他向老板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印制的招贴纸上需要有图片、照片呢，那应该怎么解决？对方告知说，如果是简单的图片，那就用木刻制版，至于照片，那就得去市区大印刷工厂专门制作版子了，制作好版子后，他这里也可以印制的。

杜奔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估计照片制版的价格一定不菲，货比3家不吃亏，老板您是否知道市区哪里照相制版价格最便宜？

老板的回答使杜奔有点惊喜，他说要说便宜，那就找私人去。所谓“找私人”，就是少数掌握照相制版技术而且在印刷工厂供职的技师，在业余时间偷偷接私活干。老板不等杜奔打听，就提供线索说周浦镇上就有这样一位师傅，姓白，是上海市区一家大印刷厂的技师，家住周浦，最近因为战乱工厂不开工，已经在家待了半个多月了，先生您如果想制版可以去找他的。

杜奔于是就去拜访那位白技师，还是以客户身份出面。白技师在闲谈中无意间说到了一条线索：大约半个月前，有人曾来向其询问是否可以制作纸币版子。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5）

哦？这人是谁呢？白技师这时有点感到奇怪了，用警惕的眼光盯着这个穿着入时、谈吐不俗的上海小伙子，再也不肯吐露什么了。杜奔只好出示了军管会公安部的介绍信，白技师仔细辨认了介绍信上的公章，这才说出了那个找过他打听能否制作钞票版子的人的情况：那人是本地人，什么身份什么职业不清楚，家住何处也不了解，但是白技师每周回家一次住一二夜时经常会在周浦镇街头遇到他的。此人30多岁，自称姓方，曾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几年水手，能用英语跟洋人会话，喜欢喝酒饮茶，有几次白技师路过镇上的茶馆时总是看到他在里面高谈阔论，因为脸面布有许多凹点，所以人都呼其“方麻子”。

杜奔如获珍宝，叮嘱白技师保密后马上前往警署，找到军代表后说明来意，要求迅即协助查找“方麻子”。军代表便召来两个本镇出身的留用警察打听，得知周浦镇上确有这样一个人，名叫方阿祥，家住北油车弄。

于是就登门查访，方妻说丈夫外出已有十余日，没有说过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因为丈夫从来不说这些的。杜奔年岁虽轻，刑警却已当数年了，在上海滩的市警察局干得了这一行可不是混饭吃的，即使你在工作中从未单挑大梁独立办过案子没有任何建树，而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当小三子跑跑龙套，几年龙套跑下来所看到的听到的，也足够你到周浦这样的小地方来显摆了。当下，杜奔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听说方阿祥是撑外国轮船的国际海员出身，性格豪爽，平时是很喜欢交朋友的，他都交了些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方妻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周浦人，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丈夫平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是否已经违犯了法律，但她听说眼前这个说上海话的小伙子是市里下来的，便料想对方阿祥不会有利，正想摇头来个一问三不知，却被陪同杜奔登门的那两个留用警察凶神恶煞的一吼给吓了个激灵，于是就脱口而出说丈夫最近和一个绰号叫“大牛”的男子接

触较多，那个“大牛”到方家来过多次，每次来都要带一些礼物，从大米、食油、猪肉、咸鱼到糖果点心、糕团水果，有一次还送给她一块花洋布衣料。丈夫最后一次离家就是“大牛”登门后跟着对方匆匆而走的。

杜奔问了日期，发现方阿祥离家的日子正好是他向白技师提出是否能制作钞票版子的次日。于是就盯着追问，但方妻却提供不出更多的细节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二（6）

离开北油车弄方家后，杜奔看看时间已是下午6点了，于是便邀那两个留用警察去一家小酒馆吃晚饭。喝酒时，杜奔向那两个警察打听是否知道“大牛”此人。那二位摇头，但说他们可以负责打听，如果是南汇本地人，应该是打听得到的。杜奔向他们敬酒，说二位老兄此事小弟多多拜托了，因为要调查的情况时间很紧的。

3人正说着，小酒馆外面来了一辆自行车，一个穿摘去了原国民党警察衔章的旧警服的男子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接着就喜出望外地叫着那两个同事的名字闯了进来，却是向杜奔说话的。原来，徐伯龙和曹孝先两人也到了周浦镇，直接去了警署找军代表，这才知道原来杜奔早已抵达而且已经在开展侦查工作了，于是就让赶紧把杜奔找去见面。军代表于是就派这个留用警察骑着自行车全镇乱转寻找杜奔。

杜奔骑着那人的自行车前往警署，向徐伯龙、曹孝先两人一说侦查情况，两人大喜。由于时间紧迫，当即决定连夜调查“大牛”和方阿祥的下落。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1）

这边，徐伯龙和曹孝先、杜奔在周浦镇挑灯夜战连夜查访。另一路侦查员关志存也是精神抖擞，因为他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关志存分工去高桥镇查摸，他没有摩托车，只好乘车前往。但他的运气很好，在路边车站候车时，正好遇到一个熟人驾驶着卡车前往高桥镇对岸的黄浦江边的码头去装货，于是就搭车到了码头，又搭乘摆渡船到了对岸的高桥镇。

在高桥镇，关志存的好运气又一次得到了体现，他在街头转悠着想寻找这个镇是否有印刷工厂或者作坊之类时，竟然遇到了一个熟人老洪。这个老洪以前也是干刑警的，在国民党上海市卢家湾警察局，因为工作关系，跟市警察局刑警关志存接触较多。当时关志存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了，见老洪正直、正派，追求进步，于是就发展对方加入了地下党，一度还是关志存领导的。半年前，老洪因参与营救被捕的民主人士而暴露身份，被迫潜至浦东乡间隐蔽，上几天刚重新出山。被组织调派至高桥协助军代表接管了警署，此刻也算是领导了。

关志存听老洪一说情况，自是大喜，说那你赶紧助我老关一把，我这任务可是火烧眉毛般的紧急啊！话这么说，因为需要保密，他也不便透露案情，只说需要了解高桥区最近是否有跟印刷行业相关的情况。老洪自是心领神会，当下也不问，说那就去见一下军代表，商量一下应该如何做好这个工作。

警署军代表看了介绍信，自是热情配合。3人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召集几位可靠的留用警察前来向关志存介绍情况。这一介绍，使关志存获得了一条线索：10天前，曾有人从本镇“宏泰机修厂”购买过一台印刷机。

“宏泰机修厂”是宁波人范宏泰于抗战中期到高桥镇开办的一家小厂，主要是以修理船舶机器为主。抗战胜利后，日本海军以及日本渔业老板惶惶逃命，顾不上认真处置一些无法开动的坏船舶和陆上机修

设备，而接收的国军还没有来得及过来，于是一些本地人就乘机哄抢。他们弄到手后自己又不能使用，就以废铜烂铁价卖给了“宏泰机修厂”。

范宏泰11岁从宁波来上海滩学手艺，所学主要工种是当时被称为“外国铜匠”的钳工，但这人极富技工天赋，到6年后满师时，已经是车钳刨铣焊电诸工种精通。干到自己开机修工厂当老板的当儿，其技艺以及经营本领自然已经炉火纯青。他把那些低价收购来的机械配件一一看过，烂熟于心，指导手下师傅拆拆装装，竟然折腾成了大大小小一件件的各类机器，工业用家庭用分门别类标价出售，如坏包修。报纸、电台广告一做，上海滩和江浙两省邻近地区的主顾纷纷登门选购，这位范老板着实发了一票。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2）

自此，“ 宏泰机修厂”就形成了一个惯例：收购各类旧机器、零配部件，大到整台车床整条机帆船，小到螺栓螺帽垫圈，来者不拒，童叟无欺。与此同时，“ 宏泰机修厂”廉价出售各类大小机器的广告也是隔三差五出现在上海滩的报纸和电台，引来了许多主顾，据说连苏北地区的新四军（后称解放军）也通过上海地下党向“宏泰机修厂”定制过枪械修理设备。

“宏泰机修厂”有这种收购废铜烂铁和客户定什么制作什么的业务，自然要受到警方的特别关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曾专门下文要求高桥警署对“宏泰机修厂”的业务活动“严加监督”。而机修厂的那个范老板是一个11岁就闯荡十里洋场的老江湖，阅世经验既丰富，又有一身技术，当年上海滩各租界巡捕房都请他修理过警车、枪械，人头稔熟，这种人还有什么险滩闯不过去的？没几日，他就和警署、警局的上上下下搞得亲如一家，享受着眼开眼闭的特殊优待。不过，这位宁波老板也理解警察弟兄的工作性质，体谅他们的苦衷，不时也提供些捕风捉影、虚虚实实的消息让他们向上交差。10天前有人向其购买一台小型印刷机的消息就是他在这天中午主动提供给高桥警署的留用警察老季的。

据范宏泰说，这台小型双面胶印印刷机还是抗战胜利后机修厂第一批向社会广泛收购“废铜烂铁”时收购的，是日本东京大业印刷机械株式会社为侵华日军特制的军用产品。运到中国后分配给了侵华日军海军驻沪的第三舰队，但在使用时发生了故障，因而废弃不用，日军投降时就被人弄走，卖到了“宏泰机修厂”。范宏泰亲自动手对机器进行了检修，终于使之恢复了正常功能。可是，尽管一连两年每次做广告时都将其列入出售产品的单子，但竟然没有一个客户哪怕是打个电话来问一下的。时间一长，范宏泰自己对于这台机器是否卖得出去也

失去了信心，索性就不再做广告了。这台机器，也就被扔在仓库一角，形同废品。

解放军开始进攻上海时，见多识广的范宏泰虽然没有学过军事，但是翻开地图一看，再一听炮声，就认定高桥这边多半是一块险地：这里是黄浦江通往东海的必经之地，国军打不过解放军，最后必定是要途经高桥往海上逃窜的。而解放军事先必定料到国军有此招，还不派兵阻击？因此，高桥这边多半要大打一场。后来的形势发展跟范宏泰估料的几乎一模一样，只是因为解放军的动作神速，赶在国军败退之前就已经拿下了高桥堵住了国军的退路，这才没有发生“高桥争夺战”。但当时范宏泰则依据自己的判断果断作出决定：全厂停工，留下部分人员护厂，其余人员回家待命。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3）

这道命令下达后刚刚得到执行时，一个操浦东本地口音的中年男子前来敲响了“宏泰机修厂”刚被关上的厂门，要求跟范老板谈一笔生意。使范宏泰出乎意外的是，这个中年男子开口询问的是“宏泰机修厂”是否有现成的印刷机器出售。范老板马上想到了扔在仓库一角的那台日本产品，于是就跟对方商谈意向，当然不说真相，只说可以在几天内帮其解决这个问题，免得被对方大杀价钱。双方商议下来，最后定了一个成交价，约定5月17日银货两讫。

客户告辞后，范宏泰就叫人从仓库里抬出那台日本印刷机，拆开后重新擦拭上油，再装配起来，调试下来一切正常，外形看上去也跟刚出厂的新机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5月17日，这台机器就被客户用一条小木船装运走了。

关志存于是就要求跟范宏泰见面，要当面了解情况。这样，范宏泰就来了警署。范老板所说的情况跟那个留用警察老季所介绍的并无出入，关志存于是就询问那个中年男子的情况。范老板先回忆了那人的年龄、外形、衣着、口音，这些对关志存目前迫在眉睫的使命并无帮助，他需要的是获得怎样迅速找到对方的直接线索。范宏泰说先生这就颇有些犯难了，因为按照生意场上的规矩，我作为出售方，对方不自我介绍，我是不作兴询问其来路的。

关志存只好连连拱手，请范老板仔细回想回想，看看是否有什么情节细节有助于了解对方下落的。范老板想了一会儿，眉峰一耸，说我想起一个细节，不知是否有用——我记得客户那条载运机器的木船的橹上，用红油漆写着“和元记”三个字。

“和元记”是什么意思？范宏泰解释说，可能那是某个商行或者作坊的字号，说明那个客户的这条木船是从该商行或者作坊所借。那什么商行或者作坊会在日常经营中使用船只呢？范宏泰扳着手指头一一道来：油坊、鱼行、租船铺。关志存听着心里窃喜，寻思这3个行当并

不多，应该算是容易寻找的。一事不烦二主，顺便向范宏泰请教：这高桥镇上是否有“和元记”字号？范宏泰摇头。

这时天色已晚，关志存想吃了晚饭再跟老洪商量商量，看如何取得他们的帮助趁热打铁追查“和元记”的下落。吃晚饭前先得跟市里通个电话，向专案组长徐伯龙汇报一下情况。电话打到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接听的同志说徐伯龙不在，但留下过话让留言由他们转告。关志存于是就把在高桥镇发现线索之事说了说，又留下了老洪这边的电话，如果徐伯龙有指示下达就让值班室同志打这个电话，这边的人会迅速通知他来接听的。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4）

然后就和老洪他们一起去吃晚饭，由老洪掏钱作东，那几个留用警察也去了。几个人一边吃饭一边就“和元记”下落问题商讨，最后决定先用一个笨办法试试：一会儿去警署向杨思、洋泾两区和川沙县城城厢镇的同行熟人打电话，询问那里是否有“和元记”。

这样，关志存就连夜守候在警署的电话机旁，由那几个警察轮流相帮拨打电话。那时候的电话都是人工转接的，即使是浦东城镇之间也算是长途电话，转接速度原本很慢，这当儿又正是上海解放当日，自有许多电话业务要急着进行，所以这两区一镇3处的电话打下来，竟然打了两个多小时。

两区一镇了解下来，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的商行、作坊以及其他任何经营者。

关志存这下差点傻眼了，愣怔了片刻，说有地图吗，看来我得往浦东其他城镇考虑了。

这样，尽管老洪出面将关志存安排在高桥镇上最好的一家旅馆里，但关志存哪里睡得着？对着地图反复考虑，忽而又对老洪他们打电话查摸的可靠性起了怀疑，寻思别漏了哪一家那不是糟糕了吗？如此，关志存一直到清晨3点多钟方才迷糊过去。

话分两头，这边让关志存安静休息，让我们看周浦那边杜奔他们查摸那个“方麻子”和“大牛”的情况进行得如何——

徐伯龙、曹孝先赶到周浦后，杜奔顿时信心倍增，寻思3个人一起查还怕找不到那两个主儿？3人商议下来，认为还是得请警署军代表协助发动留用警察一起查找那个“大牛”的线索。估计只要找到“大牛”，另一主儿“方麻子”也就差不多该露面了。军代表一听自是积极协助，连夜召集了全部留用警察，说上海市区来同志急找怎么怎么一个人，请大家帮忙提供线索。

那些留用警察很是积极，随即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要说这些郊镇旧警察的侦查本领，那确实不敢恭维，实在有限，不过这些人对于周浦本镇的情况，却是了如指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东西南北四方八面挨家挨户口头排查下来，发觉本镇没有一个居民是姓牛的。徐伯龙提出：那么是否此人本身不姓牛而生肖属牛呢？军代表于是就让拿出户籍档案，众人一起动手分查，但凡生肖属牛的成年男子都给另列出来，但跟方阿祥的老婆所说的那个“大牛”的家伙的外形模样稍稍一比照，就都一一排除了。

这样，侦查员终于不得不接受一个对于他们来说有些不幸的事实：这个“大牛”不是周浦本镇人，这就大大增加了查摸难度。

徐伯龙看看时间已是下半夜了，于是就掏钱请众人吃了顿夜宵，合并道谢过请各自安歇，明天再麻烦大家。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5）

3个侦查员奔波劳累了一天，自己也已经很累了，于是也休息了。那曹孝先和杜奔是干惯了这种事的，即使工作再不顺利，也照样吃喝，照样大睡。但徐伯龙就不同了，他是地下工作者出身，后来当保卫干事，派到华东局社会部受训学的也是政治保卫，最后到济南市公安局则是政治保卫和刑事侦查一起搞，参加调查的案子虽然沾过好几个，不过拢共也只有半年左右时间，还没有形成像曹孝先、杜奔那样的良好职业习惯。手头这个由陈毅市长亲自批侦的大案，又是限时限刻的，心里自是紧张，此刻哪里睡得着？躺在旅馆的床上翻来覆去的心里只觉得憋得慌，最后干脆悄悄起来，到下面的院子里坐着考虑，一直到鸡鸣声四起，方才有倦意袭来。

徐伯龙回到房间准备上床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忽然如流星划破夜空似的掠过了一个思路，不由得一阵兴奋，自言自语道：何不这样试试？

别看曹孝先和杜奔正在沉沉大睡，却保持着一份职业性的警惕，徐伯龙的声音尽管压了又压极为细微，但还是马上把两人惊醒了。一醒之后脑子竟然出奇的清醒，同时从床上撑起来，问徐伯龙有了什么新思路，想怎么试试？

徐伯龙的新思路是：那个国际海员出身的“方麻子”既然性格豪爽，喜好交友，那他肯定不止有“大牛”一个朋友，在周浦镇上肯定还有若干朋友跟他有着长期交往的历史。而方阿祥有着“大牛”那样一个经常往他家送东西的朋友，也肯定会在其他朋友面前提及。因此，如果了解到方阿祥在本镇有些什么其他朋友，登门造访，或许可能获得那个神秘人物“大牛”的线索？

这个思路立刻为曹孝先、杜奔所接受，于是徐伯龙也不睡了，3人去外面找了一家面馆吃了早餐，然后就再次登门造访方阿祥家。果然，方妻说丈夫确实有着若干名铁哥们儿，扳着指头一一说来，一共

有七八个，都是周浦镇上的中青年男子。这些朋友的住址方妻都是知晓的，一一对侦查员说了。巧的是，方阿祥的这些铁哥们儿中的一个正好就是杜奔昨天寄存摩托车的那个老任！

于是就登门拜访这位老任，他是镇上邮局的投递员，当时称为“邮差”。这个工作上班时间晚些，所以此刻正在门口葡萄架下喝着茶吃着大饼油条看《三国演义》。杜奔问到方阿祥，他说知道。3个侦查员心里一喜，可是这个希望竟然就像一颗风中的火星，只亮了一下就熄灭了：老任从未听方阿祥说到过“大牛”这个称谓！

徐伯龙心里一凉：糟糕！莫非是一场空欢喜？但老刑警曹孝先却似胸有成竹地说：“桃树上不长果子，咱们就到李树下去撞撞运气——不是说方阿祥有七八个经常来往的好朋友吗，那就去问问他的其他朋友吧。”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6）

杜奔就让老任提供了另外几位朋友的姓名住址，3人分头登门造访。这番折腾结束，已是过了中午，每个人都忙了个满头大汗，但结果却是令人沮丧，没有哪个朋友听方阿祥说起过“大牛”这个人的。

这是怎么回事？3个侦查员开始审视自己的思路，议来议去觉得没有什么差错，而且，以方阿祥如此健谈的性格，什么话都肯对朋友说的，却偏偏隐瞒了自己跟“大牛”的交往，这背后本身就颇有些反常，所以，方阿祥也好，“大牛”也好，两人肯定有问题，于是决定继续寻找这二位的下落。

这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率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日子。一般人没有想到，在接管伪警察局之前，新政权的侦查员已经在为保障新上海的经济安全付出辛勤的汗水了。

周浦这边，徐伯龙、曹孝先和杜奔3人第三次前往方家，想再从方阿祥的妻子那里了解情况。到北油车弄一看，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侦查员心里一愣：莫非合家开溜了？3人正对着紧闭的大门发怔时，右侧邻居家出来一个老者，问你们找谁？听说是找方家，便说方家娘子带孩子去看郎中了，孩子昨晚发烧，一夜咳嗽，看来病得不轻。徐伯龙便想那一会儿应该回来了，不如等一等吧。正好那老者开口邀请他们去他家坐坐，于是就进了老者家的院子。这一进去，想不到竟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

这老者在南汇县也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物，他曾中过清朝的秀才，后来又留过洋，主持过中学，抗战前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政府做过文官，参加过一二八事变跟日本政府的谈判。后来日本侵略者组织了汉奸政府，邀请他出任伪官，他坚辞不受，回乡出家做了道士，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传统气节。抗战胜利后，老者方才还俗，看到国民党官僚在接收时的情景，便断了重新出山之心，隐居在家，终日读

经，不问世事。但他毕竟是个有学问且见识过大世面的人，尽管徐伯龙3人穿着便衣，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不是凡夫俗子，当下便请他们入内小坐，喝杯清茶。

老者奉上茶水后，询问客人何故造访方家。徐伯龙见对方是一个可靠群众的样子，于是就亮明了真实身份，说是奉命来找方阿祥了解一桩公事的，同时还想找一找一个诨号“大牛”的人。老者听了“嘿嘿”而笑，说看你们一个个眼布红丝脸挂倦容，想来昨晚没有睡好，唔，若是早点到我这里来坐坐，那昨晚就不必折腾到深更半夜了。徐伯龙一听便知撞运了，连忙用浦东本地话请求老者说说方阿祥的去向。

老者说：“方阿祥到何处去了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叫‘大牛’的我却估料得八九不离十——他准是在‘彭公观’。”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三（7）

据老者说，那个叫“大牛”的汉子，其实跟方阿祥认识不过几个月，但这一段时间来得特别勤，而且每次来都没有空手的，必定要携许多礼物。有时方家没有人，也会接受他的邀请到他家小坐等候方阿祥回来。老者跟其闲谈之下，略知对方的些许经历：那人姓牛，南汇县新场人氏，以前曾在英国和葡萄牙的远洋轮上当过多年海员，后来因为患了关节炎不能出海了才歇手上岸。据说曾在国外喝醉了酒犯过人命案子，但因为逃得快没有受到过追究。不过这人迷信，最近两年老是不顺，干什么败什么，不知为什么事情还折进过局子，好像是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榆林分局关押了3个多月吧。“大牛”跟老者说起此事，请求指点迷津。老者说你出家吧，也许可以得到解脱。上个月“大牛”来对老者说，他已经跟镇外彭公观的道士说好了，就到那里去做道士。彭公观是老者经常光临的地方，那里的道士知道他出家过，将其视为同道之士，所以关系不错。3天前老者上街去购物时，遇见彭公观的一个道士，告诉他说那个姓牛的真的到他们那里做了道士，还捐了一笔钱，这几天一直在观里住着呢。

侦查员闻听之下，哪里还坐得住，当下问明彭公观地址，立马前往。到得那里，只一打听，果然说有一姓牛的在那里，只是还没有正式办理出家手续，就是还没有举行仪式，现在后院住着。3个侦查员直奔后院，果然在一间竹林中的幽静小屋内找到了“大牛”，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和“大牛”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脸上密布凹坑的主儿——方麻子方阿祥！

侦查员杜奔这一刻真是兴奋至极，对着那二位脱口而出：啊！朋友，终于找到你们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1）

侦查员是请彭公观的少年道士把他们引领至后院竹林的。这方面，就要说徐伯龙的细心了，步入竹林时，他让所有人都不要吭声，放轻脚步，慢慢地捱到小屋外面。

众人挨近小屋只稍稍一听就暗吃一惊：屋里传出两个人的对话声，说的竟是英语！曹孝先以前在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干过，懂些英语，听了听对徐伯龙附耳悄言道："他们好像在讨论关于机器动力和运转平衡的问题。"

徐伯龙马上断言："光这就有问题了！进去！"

于是示意小道士上前去叫门，里面不曾提防，那个叫"大牛"听清是小道士的声音，一边把门开了一条缝儿一边说："不是让你们没有事情不要来打扰我吗？"

杜奔冷不防往前一冲，硬生生地把房门顶开了，"大牛"差点跌翻。定睛看时，3个侦查员已经一拥而入。刚张口喝问了半句"你们是什么……"就愣住了，因为侦查员已经把手枪亮出来了。

这时，徐伯龙才看见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满脸凹坑足以证明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正主儿方麻子方阿祥，不禁大喜。那当儿也没有什么搜查证什么的手续，当下喝令那对会说英语的哥们去屋角蹲着，杜奔在后面盯着他们，徐伯龙和曹孝先就开始搜查。只见桌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书刊，略略一看，全是关于印刷和机械方面内容的，中英文版的都有。地上则有一些拆开的机器零部件，大大小小倒是分门别类放得很整齐，仔细一看，地板上还有铅笔写的编号。墙上，挂着几份机械图纸，也是关于印刷机方面的。

徐伯龙问那二位："你们这是干什么？"

方阿祥回答："没啥，闲着没事，研究研究机器。"

"大牛"接着说："对，没啥，这一阵外面很乱，闲着也是闲着，弄台机器来研究研究，以后开家厂子呗。"

徐伯龙冷笑：“ 不肯老实说？那好，把东西都带上，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

徐伯龙亮出了市军管会公安部的介绍信：“军管会公安部的。”

方阿祥和“大牛”被带到了警署，就地分别讯问。两人倒也爽快，一五一十就把事情说了个竹筒倒豆子——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2）

“大牛”名叫牛金虎，是南汇新场人氏，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水手、轮机匠。抗战爆发那年回到浦东家乡，那时浦东地区是一片混乱，有枪便是草头王。牛金虎凭着一支从国外带回来的左轮手枪，和几个狐朋狗友一起折腾了一年，案子作了不少，但队伍始终拉不起来，不禁有些沮丧。再一看那些拉起队伍的也是互相火并，弱肉强食，寻思这种勾当不能作为一门职业来做的，否则作兴就把性命做没了，于是就改行做起了小生意，后来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就回家种田。

这样，一晃十余年过去了。大约半年前，牛金虎到周浦来办事，在街头与方阿祥不期而遇，两人都是一怔之下又一喜：原来，他们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干时，一次曾在法国马赛港停泊时见过面，相处过几天，这就算是老相识了。方、牛从此就开始互相往来，喝酒时闲谈，面对着国民党行将败退的乱世，他们产生了乘机捞一把的念头。怎样捞法？抢劫型的暴力行动牛金虎已经从事过了，觉得危险性太大，而且方阿祥天生不是一块做强盗的料，一看到手枪就要发抖。于是两人就商议如何用“非暴力方式”获取社会和他人的财产，反复商量下来，最后牛金虎从他手里留着的一张当初在外轮当水手时买下的英国债券得到了启发，提出何不伪造外国债券后抛售出去，迅速获取一笔巨款后埋头伪装良民，过一辈子富裕日子？这个主意比较适合方阿祥的性格和现状，于是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两人于是开始考虑如何进行这桩活儿，从安全角度考虑，当然是自己动手伪造合适，况且牛金虎以前在外国轮船上当过轮机匠，对于机械设备有些熟悉，自信像操作印刷机器之类的活儿还难不倒他。不过债券的版子倒是一项技术难度甚大的工序，自己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那怎么办？牛金虎就让方阿祥去打听物色这方面的专门师傅予以协助，代客加工，以重金相酬，保密料无问题。

这样，方阿祥就开始物色制作版子的师傅，结果就找了本镇的白技师。而牛金虎则在上海解放前大约七八天从上海市区的工业品旧货市场淘得一台报废了的胶印机和一些零部件，又买了一些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方面的书刊资料，买通了彭公观的主持道士，以“出家当道士”为名，在观内借得一间房子，把废旧机器等搬入后，叫上方阿祥躲在里面“攻关”，一心想自己装配一台印刷机，然后去请白技师制作要伪造的外国债券版子，具备条件后开工生产。

没有想到，对于印刷机的“攻关”还八字不见一撇的时候，侦查员已经登门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3）

徐伯龙3人本来对这二位正在日夜操劳的“攻关”朋友寄予着满腔希望，指望将这个案子一举拿下，没有想到竟是这么一个结果，不禁目瞪口呆。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对于这两个被捕者的处理，当时先是暂时关押于周浦警署内，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成立后，由于牛、方两人的案子是上海市公安局侦查员破获的，所以尽管当时已将南汇县正式定为隶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但还是将两人关押进了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不久上海市公安局将方阿祥释放，牛金虎因解放前所犯的抢劫杀人罪行而被逮捕。后交法院审判，因历史罪行查证困难，牛金虎所交代的杀人罪行没有证据，最后于1950年1月仅以抢劫罪判刑15年。

这样一折腾，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天。5月28日下午，徐伯龙通过电话向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了解了正在奉贤县城奉城镇进行查摸工作的小马的进展情况，得知那边没有发现线索，于是，他便指令曹孝先留在南汇县继续查找线索，让杜奔用摩托车载了他前往高桥镇跟关志存会合。此刻，徐伯龙心里对关志存查访“和元记”那条线索寄予着很大的希望。

徐伯龙、杜奔抵达了高桥镇，这时杜奔才知道徐伯龙是高桥镇人，离家已有10个年头，而且跟家里从未通过信息，便劝他应该先回家去看看。徐伯龙心里确实有着回家一看的强烈念头，但此刻身负重任，侦查工作八字还没有一撇，哪里放得下来？于是便让摩托车直接去了关志存下榻的旅馆。

38岁的关志存身体没有其他几位侦查员好，他以前患过肝炎，后来知道这时已经患上了肺结核，经过两天一夜的折腾，脸色非常难看，但还是强撑着一边咳嗽一边向徐伯龙汇报了对于那支上面用油漆写着“和元记”3字的木橹下落的追查情况。

关志存在从国民党川沙县警察局调来的地下党员老洪的协助下，对杨思、洋泾二区和川沙县城城厢镇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商行、作坊、工厂等进行查摸未获得线索后，想到了“和元记”可能是浦东另外两个县内商业字号的可能性。今天上午，他把这个设想对老洪说了，老洪说那就查吧。不过，老洪对于自己主持的前述对杨思、洋泾、川沙城厢镇进行调查是否有“和元记”字号的做法感到似乎有些草率，因为他所调查的对象并非是商业界人士，也许会出现遗漏呢？所以，认为应当重新进行更细致的调查。

老洪的这个说法获得了关志存的认同，两人商量下来，想到了一个稳妥可靠的法子：到商会去查资料。当时每个县都有商会，有的商会内部还设同业会。所以，商会的资料应该是齐全的，哪怕是多年前开的店铺而现在早已关闭了的，只要当时有字号，商会就会留下该字号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4）

于是，老洪就打算让手下人往杨思、洋泾二区的商会打电话查询此事。正好又获悉高桥驻军部队有一辆卡车去川沙县城城厢镇装军用物资，于是两人便搭车前往。到商会一查资料，川沙全县自成立商会建立档案以来，从未有过“和元记”这个字号。那么浦东另外两个县南汇和奉贤呢？县商会接待他们的那个职员说我这里可以马上打电话去向南汇、奉贤两县商会询问的。

电话查询下来，南汇、奉贤两县的商会档案里也没有“和元记”这个字号。

关志存满腹沮丧地和老洪回到了高桥，进了旅馆房间，只觉得身心交瘁，浑身疲惫，正想在床上躺一会儿后去警署往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值班室打电话进行例行汇报时，徐伯龙和杜奔来了。

当下，徐伯龙听了关志存如此这般一说，心里也是一阵失望，但他想到自己是专案组长，主持侦查工作的，脸面上便没有表露出来。他发现关志存不停地咳嗽，脸色也不好，便说现在咱们先不考虑破案问题了，到我家去吃饭吧。关志存听了也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组长就是高桥镇上的。

关志存和杜奔跟着徐伯龙去镇子南侧的家。徐伯龙家是开烟纸店的，他离开后还是开着，没有受到什么损失。父母兄弟姐妹见徐伯龙突然回家，自是喜不自胜，连忙准备饭菜，招待3人吃了一餐美食。吃饭时，徐伯龙让父亲把隔壁中药铺子那个兼做坐堂郎中的老板请来，让给关志存配了点治咳嗽的中药成药。

回到旅馆，徐伯龙执意让关志存休息，自己和杜奔另外开了个房间，喝着茶对“和元记”情况进行分析，谈到很晚，却始终没有突破。于是说次日上午前往“宏泰机修厂”拜访那位范老板，指望获得什么细节可以顺藤摸瓜追查下去。

次日，1949年5月29日，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内部看来，这显然是自定的最后破案期限了。因为根据上海市军管会事先的安排，明天5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就要成立挂牌，正式对外营业。同日，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正式流通了。与此同时，人民银行将在全市设立369个金圆券收兑点，以10万圆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值，在7天内按照“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方针，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而如果在29日当天还不能侦破伪造金圆券案子的话，伪造的金圆券明天就有可能被用于兑换人民币了，这样，新政权和人民的利益就要受到重大损害，新上海的经济金融秩序也将受到破坏。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5）

因此，不难想象，29日这天一早徐伯龙的心情就觉得十分紧张。上午8点多钟，他和杜奔去了“宏泰机修厂”。那里是一片喜气洋洋，原来老板范宏泰见上海解放后局势平静，加上当地区公所的接收小组领导又登门拜访，请“宏泰机修厂”照常营业。范宏泰于是就决定恢复生产，心里寻思应该讨个吉利，于是就说这高桥镇新生了，咱这机修厂也跟着新生了，就让买了许多鞭炮燃放。两个侦查员登门时，范宏泰正带着工人们放得起劲，砰砰啪啪之声震耳欲聋。

徐伯龙等了一会儿才候得仪式结束，于是赶紧上前去找范宏泰说话，亮出上海市军管会的公函，让找个清静点的地方说几句话。对方便把两人领到他那在一幢小楼上的厂长室，郑重其事地接待。

徐伯龙用高桥当地话跟对方交谈，把范宏泰弄得一愣一愣的不知碰到了何人，正仰脸回忆这高桥镇上何时有过这等人物时，徐伯龙自己道破了真相。这个小插曲使范宏泰迅速拉近了跟侦查员的情感交流距离，也大大调动了他的主观积极性。他听说侦查员是来了解他上次说过的那支上面用油漆写着“和元记”字号的木橹的，就说“和元记”肯定是某家商铺作坊之类的字号。侦查员说不错啊，可是我们找了两天也没有找到，调查的触角已经伸遍了整个浦东地区3个县呐！

范宏泰抽着杜奔递过去的“大前门”，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用上级对待下级的口气问道：“旧货行你们去调查过吗？”

徐伯龙有点懵住了的感觉：“旧货行？什么意思？”

范宏泰还没有开口，一旁的杜奔忽然叫声“哎哟”直拍自己的脑袋。这个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干了几年刑警的地下团员被机修厂老板这么一提醒，想起来了：“对啊！有可能这支橹是从旧货行淘来的呢！”

范宏泰说：“我以为你们已经去过旧货行了呢！那天前来装运印刷机的那只小船，新旧程度跟那支写着‘和元记’字号的橹根本是不配称

的，船旧，橹新。因此，估计那条小船上的原配橹已经丢失，船主人就去旧货行淘了一支。这样，你们去吴淞镇上的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我估计这支橹十有八九就是从那里卖出来的。”

徐伯龙和杜奔匆匆返回旅馆，对关志存说了一声，杜奔推出摩托车，载了徐伯龙马上出发前往吴淞。找到那家专门出售船舶用品的旧货行，一问，果然如范宏泰所估料的，他们不久前出售过一支“和元记”的橹。至于“和元记”是哪里的一家经营什么的商号，他们倒并不知晓，因为这支橹的来路有点放不上台面。那是一个农民说是在长江里捡到的，放在家里没有用，就扛到旧货行来卖掉，也好换几个酒钱。至于那农民说得诚实与否，这就不是旧货行需要知道的了，当时这个行业的规矩是：只要卖货人不是直接说是盗劫诈骗而得，通常都是没有二话地收购下来的。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6）

侦查员的思路很清晰，对旧货行老板说我们不想了解“和元记”是哪家字号位于何方，而只想知道是谁向贵号买下了那支橹的。那个胖墩墩的老板于是就让伙计拿来账册，翻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毛笔字让侦查员看，只见上面写着：高桥镇木路村李海王。

旧货行胖老板说：“就是这个人买去的，当时杀价太凶，我还有点舍不得呢，不过想想那天正好是我独生儿子的生日，也就算了。”

行了，不说罢，找他去！

木路村离高桥镇3里，不过摩托车是无法开过去的，都是尺把宽的小路，还有独木桥。徐伯龙和杜奔、关志存，乘了主动积极协助的老洪所借的一条小船前往，顺利找到了那个李海王，也看见了那台从“宏泰机修厂”买去的印刷机。这个李海王见到侦查员登门一点也不慌，不等侦查员开口询问，看了出示的公函后反而开口发问来者何意。那就索性开门见山地说印刷机之事吧，你一个庄户人家买这样一台机器来干吗?

李海王大笑，说您几位眼力显得不配，我此刻虽是住在这村上的庄户人家，但我本人并不是种田出身的人啊！我是干什么的？听口音你们二位是上海市区的？那一定知道虹口公平路上的“庄严印刷厂”了？以前那里是日租界，那厂是日本人开的，叫“武藤印刷株式会社”，后来抗战胜利前夕那日本老板要急着回国，就把那厂子低价抛售，由一个叫庄书志的先生和他的妹夫严稼夫合伙买了下来，改名为“庄严印刷厂”。兄弟不才，就是那家印刷厂的工人。我是抗战前两年就在日本老板手下做了，十几年做下来，印刷厂的每个工种都干过，而且都精通。

李海王说到这里，发现来人还站着，便招呼大家坐下，动手沏了一壶茶，给每人倒了一杯。然后继续说下去，刚才说到哪里了？哦，说到兄弟我的技术不赖。那印刷厂换了老板，第一个出面挽留的对象

就是我啊！本来我也不用回乡来吃闲饭了，可是局势如此，没有办法。去年12月，我那二位老板不知吃了哪门药，忽然说如今形势紧张，国军徐蚌会战失利，看来共产党要打到上海来了。听说在共产党手下日子难过至极，咱们去海外吧。人家老板这样决定了，咱们底下这些工人是没有说话的份的，是人家的产业嘛，开厂关厂还要来问你？这样，今年3月上旬，工厂的机器就都拆掉了，听说是运到新加坡还是马来亚去了。老板还邀请厂里的技术骨干跟他们一起去，第一个找的还是我，我的家小都在浦东，我怎么可能抛下家小单身走人呢？当然一口回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失业回家了。不过，人家老板倒还懂得江湖上的规矩，给我发了一笔疏散费。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四（7）

我回乡后，对于前途得有个考虑啊，反复想下来，觉得“做生不如做熟”，还是干我的印刷老本行为好，我可以在高桥镇上开一家印刷社啊。我就联络了两个也是失业了的工友，原先都是一个工厂的弟兄，他们很是赞同。这样，我就去“宏泰机修厂”淘了一台旧的印刷机，房子也已经看好付过定金了，就在高桥镇上娘娘庙旁边。如果没有意外，准备今年7月1日要开张的。

李海王这番话语说出来，听得侦查员真是“面面相觑，做声不得”，看对方那副从容的神情，凭经验就可以断定说的是真话了，眼前这人跟“伪造金圆券案”看来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还是需要调查一下的，于是马上分头对租房情况、另外两个工友合伙情况等进行了调查。当天傍晚，徐伯龙3人会合，交换了调查情况，证实李海王所言内容完全属实。不久，李海王和两个工友果然开出了一家印刷社。

这时，去奉贤调查的小马已经结束了对那里的调查，返回了上海市区。昨天留在南汇县调查的曹孝先也打来电话说没有任何收获。下一步工作怎么走？这需要专案组长徐伯龙作出决定了。

徐伯龙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全体返回市区，重新制定侦查方向。

重新制定的侦查方向是直接盯着银行收兑点了，因为按照案犯作案的正常速度估计，他们肯定已经完成了伪造金圆券犯罪活动，从次日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换到兑换上了。这样，侦查工作就只得借助于银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识别假金圆券，一旦查到，就可以顺藤摸瓜追查下去了。

当天晚上，专案组分头驱车前往全市各区的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下属中心营业所（当时还没有“支行”的说法）交代协助侦查的事项。当时上海市延续国民党执政时的行政区域划分，一共有30个区，受时

间和交通工具的限制，侦查员不可能一一跑到，那些远的区，就由上海市人民银行分行直接用电话下达指令了。

外滩海关的大钟敲响了12下。明天将要来临，不知运气如何?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1）

1949年5月30日，是新中国上海金融史上一个必须记入史册的日子。这天，成立于1948年12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在沪组建的上海市分行正式成立挂牌。同日，上海市民开始将即将退出市场流通的金圆券向人民银行收兑点以10万元兑1元的比值兑换人民币，人民币开始在上海市场大规模流通。

对于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专案组诸君而言，从这天开始，他们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侦查，第一阶段侦查工作的失利以及时间的紧迫，给专案组5位侦查员的心头增加了压力。但是，事到如今，压力再大也得迎头而上，而且有进无退。

根据分工，专案组长徐伯龙坐镇于即将成为几天后正式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本部机关的四马路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负责主持侦查，其余4名侦查员曹孝先、关志存、徐伯龙和小马则分别前往划定的4个区域，每人负责90个收兑点进行巡查。以专案组区区5人要想监控全市30区369个收兑点，那是很困难的，难免会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因此，这项工作主要还是借助于收兑点的工作人员。而收兑点的工作人员并非全是银行的资深职员，其中有的入行不过短短几个月，对于金圆券真伪的识别能力有限，因此专案组意识到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侦查步骤显然是困难重重。

在开始收兑金圆券的最初两天里，专案组获得了5条线索。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将其中3条线索的当事人根据他们出场的先后次序，以英文字母来表示：

A，这是一个20来岁的男青年，身架高大，5月底的上海还没有进入夏天，这位仁兄已经是一身夏装打扮，西装短裤，中袖运动衫，露出两条肌肉发达的臂膊，上面刺着两条盘旋在一起张嘴吐着红色信子的青蛇，骑着一辆英国名牌自行车，一看便知是一个富家青年，纨绔子弟。

如此一个主儿，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收兑日的第一天的上午10点，踩着一辆自行车一本正经地赶到老闸区的一个收兑点来，自行车前面的网兜里放着一个捆扎得方方整整的大纸包，后面书包架上还捆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兑换多少金圆券呢？

这人把网兜里的大纸包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是清一色的100万元面值的崭新金圆券，一共是10扎，每扎100张，合计10亿元。10亿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呢？按照军管会规定的100000比1的比值，可以兑换1万元人民币——这是旧币，相当于如今市面上使用的人民币的1元！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2）

崭新的100万元面值的大扎新票，引起了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那是两个20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个是年初刚进旧银行工作的练习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徒；还有一位则是由区政府推荐的协助收兑金圆券的追求进步的社会青年，现在的说法就是义工、志愿者。这二位工作积极性、革命警惕性都很高，但缺乏的是识别真假钞票的本领。现在对眼前这位纨绔子弟产生怀疑的原因，是因为这人竟然拿出10亿元崭新的100万元面值的金圆券来兑换，这种整齐划一的大票面新票是他们之前经手的那些兑换活儿中从未有过的。于是他们就要对这位主顾予以特别关照了，一个辨认钞票的真假，一个指着自行车后面书包架子上的旅行袋问：这也是金圆券？也兑换？

纨绔子弟说不是金圆券，是旧书，准备卖给旧书店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美国骆驼牌香烟请工作人员抽，遭到拒绝后，他自己往嘴上叼了一支抽了起来。

那位练习生点检金圆券，没有发现问题，只好把1张壹万元人民币递给他。他是这个收兑点的负责人，有处置事情的决定权，想起领导关于密切注意识别假钞的指示，当下就在那青年说声“告辞”上车欲离的一瞬间，对旁边一个女志愿者使了个眼色。

解放伊始，人民群众出于对共产党新政权的拥护之心，寻找一切机会义务协助政府工作人员做工作，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但凡逮到这种机会，往往是鞍前马后车轴般的转，常常比主持工作的本主儿还忙。这天上海的369个收兑点上，每个收兑点都聚集着一帮子男女青年，相帮插彩旗、贴标语和维持秩序。这个练习生此刻就差了一个有自行车的女青年志愿者跟踪那个可疑的纨绔子弟。

跟踪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主儿骑车去了附近一家南货店，用兑换得的那张新人民币购买了一包红糖、一包桂圆和一些石碱，然后返回了距这个收兑点4条横马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听看门人称呼是“少

爷”，那看来就是洋房的少主人了。看那花园洋房的规模，这户人家应该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资本家。这样一个资本家家庭出来的少爷，不差家里的佣人保镖之类兑换钞票，而竟是自己亲自出面来兑换区区1万元人民币？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另外，他不是说要把自行车书包架子上那个旅行袋里装的旧书卖给旧书店吗？怎么没去旧书店而是直接回家了？

练习生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怀疑对象，于是赶紧去附近找了个电话机向领导汇报了。银行领导随即给徐伯龙那边打电话通报情况，徐伯龙便指示分管那坨收兑点的侦查员曹孝先立即调查。

就在曹孝先闻警出动的时候，市区另一侧的徐汇区的一个收兑点也冒出了一个可疑对象B。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3）

主持这个收兑点的银行工作人员是一个业务经验丰富的中年职员，银行领导考虑到这个收兑点地处市民密集居住点，可能前来兑换的市民比较多，所以另外给他配备了助手，其中一个是银行的练习生，另外数位则是义工、志愿者了。

B甫一出场，就引起了一个复姓完颜的志愿者的注意，这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一是B是一彪形大汉，身穿黑色对襟国术练功服，未扣严实的衣襟间露出密集的胸毛，很容易使人觉得此人不是一个良善之辈；二是别人都是把要兑换的金圆券拿在手里、装在袋子里或者用自行车推着送来的，这人却是拉着一辆人力车，上面装满了一个个鼓鼓囊囊的麻袋。这样，当这人的人力车刚停下一边擦汗一边嘀咕着埋怨“怎么这么多人”的时候，就被完颜盯上了。

完颜上前招呼他不必排队，到这边来，又问：你车上装的都是金圆券吗？一共多少自己点过数吗？

大汉傲然回答：不多，也就1万亿元吧，我没有细数过。你们不必过于较真的，估摸着差不多兑换就行了，不过麻袋要还给我的。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个麻袋从车上往下卸。完颜解开扎住袋口的细绳，让旁边的同伴相帮着把金圆券倒出来堆在一旁，不禁暗吃一惊：都是面值50万元、100万元的大面值金圆券，有新有旧，新旧比例大约在8比2。

1万亿元金圆券按照比值可以兑换1000万元人民币，放在60年后的今天也就1000元钱钞，实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经实在是一笔足以使人非常注目的巨款了。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全国范围内凡是被查出贪污数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的，没有一个不被判处死刑的。

由于这大汉是个兑换大户。所以工作人员给予特别优待，没有等待，立刻着手点钞。由于大汉有疑点，所以点钞由那个被称为“老法

师”的中年职员主持，他本人当然不动手，而让一群热情高涨的青年义工、志愿者动手，自己则抽查检验金圆券中是否混有假钞。1万亿元的纸币，即使都是50万元、100万元面值的大票，也有100张一扎的1万多扎。试想，如果一一点数，那得耗费多少时间？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银行方面事先是有内部说法的：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抽检后称重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说法当然不会对外公布，所以这个大汉不知道。因此，当他看到这边一群人一人拿了一扎金圆券拆开后一张张点起来时，火就不打一处来，也不知这人是犯了哪门子邪，二话不说，飞起一脚把一张桌子踢翻，破口大骂起来，内容还夹带着对人民政府的不满。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4）

这个彪形大汉不知道，即使他没有表演“飞起一脚”的国术动作，人家也正动着“热情挽留”他的脑筋，此刻这一脚，正好省得寻找借口由头了。那些义工、志愿者当下就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指责的指责，对骂的对骂。这个收兑点离派出所没多远，步行几分钟就到，这边闹腾着的时候，那边早已得知消息，没等大汉脑子里理清楚应当作出怎样的反应时，警察已经出现在面前了。

巧的是，分管徐汇区收兑点的侦查员杜奔骑了他那辆摩托车在他的分管区域内巡查，这时正好到这个收兑点，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情，马上让把那些金圆券先就地封存，然后赶到派出所去跟B见面。

B这时才知道什么叫“新旧社会两重天”，他是青帮成员，以倒卖古玩为业，解放前倚仗帮会势力蛮横无理惯了，警察也没怎么他，常常还要看他的脸色训训对方。现在警察还是那几张脸，却好似不认识他了一样，说动手就动手，把他逮了进来。这时B才意识到不对头，想起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的世训，于是便低头认错。但这时认错也没用了，因为杜奔赶到了，要追查他的金圆券来路。

B说那是他倒卖古玩所得，上海解放前几天，有个朋友要逃海外去，找他买下一帧明代唐寅的真迹，因为大洋凑不齐，就以超值金圆券结算。当时物价飞涨，齐白石到上海来开画展，卖画所获的金圆券是动用了汽车装载的。老先生一时大意，没有当天兑成银洋或者买下一批什么货物，结果把金圆券运到北平后竟然只值两棵白菜的价钱了，气得齐老先生大骂国民党。B原想把金圆券赶紧出手的，可是这天解放军打进市区了，市面上的所有交易都已停止，于是只得存放于家中。现在听说人民政府允许以金圆券兑换人民币，赶紧来换。金圆券太多，一车拉不下，家里还有一部分。

杜奔于是就叫上几个警察一起去B家搜查，果然发现客堂里还堆着6麻袋金圆券。他向B的家人和邻居作了调查，得知B说的是实话。

他的几个邻居那天都是亲眼看见客户用汽车载着这些金圆券过来的，另一老学究也作证说B卖唐寅真迹之事，说他是中人，在买卖合约上签了姓名的。让B妻把那合约拿出来，果然如此。

这样，杜奔就放过了B。但派出所还是要追究B大闹收兑点的责任的，把他送到徐汇分局去吃了两天免费饭。不过，那些金圆券还是按照规定给他兑换了。B于是很感动，逢人就说共产党好。不过，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并不因为被B赞不绝口而放松警惕，后来镇压反革命运动时，B的历史问题还是受到了追究，判了7年刑，押解安徽劳改。后来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退休返沪。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5）

杜奔在对B家进行搜查的时候，老闸区那边曹孝先也已经开始了对A的秘密调查。

A的父亲是经营西药的资本家，在香港也有产业，生有子女各二，A是老三。上海解放前夕，A父带着老婆、两个女儿去香港避风头。留下老大、老三两个儿子看家，同时还担负着向香港方面通报上海最新消息的使命。老大是大学生，只知埋头读书，其他百事不管。而19岁的老三正好相反，除了读书不行之外，其他做什么都行，当然在吃喝玩乐方面没少下过功夫，年龄不大社会经验倒已经积累了若干。老爸交办的使命就落到了A的身上。

这天，A得知人民银行开始收兑金圆券，上海市场上正式流通人民币，寻思不知是真是假，共产党说的和做的究竟是不是一个样？于是就决定出去试一试。他从家里拿了10亿元金圆券，又装了一旅行袋的旧书，盘算先把金圆券兑换了人民币，然后再去旧书店把旧书卖掉，看人家给他的是不是人民币，这样就完成了检验共产党在这件事上说话真假的问题。

A顺利地换到了1万元人民币，原想去旧书店卖旧书的。经过一家南货店时，忽然想起用金圆券兑换到的人民币去买东西不就能检验那个问题了吗，何必大老远的跑到旧书店去折腾？于是就用那1万元去南货店买了红糖等商品。

等到曹孝先登门拜访时，A已经写好了一封向老爸报告情况的函件，正准备出门去邮局投寄。这倒也好，这封尚未寄出的信正好为其的行为动机作了合理的诠释。

这天，另外还发生过两条被疑为假金圆券的线索，侦查员随即调查，但都一一排除了。

次日，1949年5月31日中午，第五条线索出现了。

第五条线索的当事人C是一个外形矮小、猥琐的小老头，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竹布单长衫和陈旧黑色丝绸裤子，已经是江南的阳历5月底了，这人还不可思议地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瓜皮小帽。C是揣着双手走到长宁区的一个收兑点的，由于这身装束，身上还隐隐地透着一股鱼腥味。工作人员都以为这是一个经营得很不得法的鱼贩子，正想着他会从兜儿里掏出几张金圆券来兑换时，忽见他举手一招，只见一辆三轮车从拐弯角那边踩了过来，车上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如果不是用绳子紧紧捆扎着，一路上肯定会不时掉落一箱下来的。

工作人员觉得有点不敢小觑地望着小老头，目光里兜着一个问号：这里面都是金圆券?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6）

小老头小心翼翼地发问："政府的布告上写着采取'迅速的、全面的、无限制的、无差别'地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的收兑方针，此话当真？"

工作人员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你装来的这些纸箱里面全是金圆券吗？没关系，我们全部换给你。小老头以微笑代替感谢，随即作出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动作，他再次高高举手一招，方向却是朝着马路对面的。只见马路对面的弄堂里一前一后驶出了两辆三轮车，同样是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穿越马路在收兑点前停了下来。

小老头招呼三轮车夫把纸板箱卸下来，好家伙，三辆三轮车上一共装来了21箱金圆券，堆在一处就像是一座小山似的。小老头一边掏出香烟散给三轮车夫，一边对工作人员说："你们点数吧，这些金圆券总数估计在10万亿吧，按政府公布的10万圆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值，你们该兑换给我1亿元。"

1亿元！好家伙，即使折合后来的新币，也得整整1万元哩！这个其貌不扬、身上透着鱼腥味儿的小老头，人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翻身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时，你已经是万元户啦！这人是不是有点可疑？

待到打开纸板箱，疑点就更凸显了：那一箱箱金圆券，全是崭新的100万元、50万元的大票面，更奇怪的是，这些金圆券是100张一扎连号的，而通常新钞票上的封条却没有，而是以橡皮筋替代。工作人员互相使着眼色，一边稳住小老头说需要点检，一边已经暗暗派人去向侦查员打电话了。长宁区的收兑点，也归杜奔管，他那时正在长宁分局的食堂里吃饭，接到电话就扔下吃了一半的饭菜，出食堂骑了摩托车就奔收兑点。

杜奔到那里时，小老头还没走，正和工作人员一起点检金圆券。杜奔穿着便衣，所以尽管他跟工作人员打招呼出示证件什么的，那小

老头还只以为是人民银行系统的人员，神色不变地继续协助工作人员点检。

问题还真出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一张100万元面值的金圆券的流水号印得有一点点歪斜，于是就悄悄放在一旁。杜奔见了拿过来一看，心里窃喜，但表面上犹是声色不露。

接着，这种流水号码歪斜甚至连号、跳号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出现了。这种纸币，即使在弄堂口那种小烟纸店不识字的女掌柜的手里，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是真币假币了。如此，已经没有必要再清点下去了，工作人员随着杜奔的一个手势停了下来。小老头不解地望着众人："怎么啦？怎么不点了？"

杜奔问："这位先生贵姓？府上哪里？"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7）

小老头欠首道：“免贵姓胡，住法华镇路303号。”

“哦！请问胡先生，你这些金圆券一共多少自己有数吗？”

“对不起，我没有点过数，在家里过磅秤约了约，大概在10万亿元吧。”

“这样吧，这些金圆券暂时放在这里让他们点数，你呢，跟我走一趟。”

“走一趟？你先生是……”

“我是市军管会公安部的工作人员。”杜奔出示盖有军管会公章的公函让对方看了看。

小老头慌了，急扯白脸道：“不是说‘无限制的、无差别的’收兑金圆券吗？怎么说话又不算数了？”

杜奔告诉他，让他“走一趟”跟收兑这件事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另外的原因。话说到这份上，小老头不去也得去了，于是就跟着杜奔去了附近的派出所。

进得门去，杜奔把小老头交给一个小警察后，先去找了军代表，出示公函后，要求立刻派员前往法华镇路303号小老头家里去搜查。然后，杜奔就去讯问小老头。原以为必得费一番口舌才能对付得下来。哪知一踏进那间屋子，那小老头已经对他连连鞠躬，口称：“愿意说清楚情况，希望政府谅解。”

既然主动要求交代清楚，那你就说吧。于是，这个姓胡的小老头作了以下交代——

小老头在长宁区法华镇开着一家不大的鱼行，生有两个女儿，都已经出嫁。小女儿是抗战胜利前一年出嫁的，其丈夫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做五金器材生意的掮客，其实是国民党军统局派遣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不过当时隐蔽得很好，连老婆也不知道。结婚不到一年时间，抗战胜利了，这个特工从地下浮到了地上，摇身一变成了军统

局驻上海的一个什么机构的负责人。后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他又是保密局驻沪第三特别视察室少校副主任。

随着局势不断变化，国民党那班人开始布置败退后路。胡老头的特务女婿因为以前从事过一段时间的五金生意掮客，算是跟经济搭得上的，就被保密局任命为新组建的“经济特别督查室”第二组组长。这个组驻在上海，对上海特别市范围内的30个区的金融情况进行监管、督查，其中也包括对印制金圆券的位于市区曹杨路桥堍的中央印制厂。保密局长毛人凤亲口对胡老头那特务女婿交代：该组应直接对保密局长本人负责，所有情况应直接向他报告，接受指令。这时早已不是抗战时期的“地下工作”年代，因此特务女婿跟丈人喝酒时，常常口无遮拦，使胡老头得知了上述情况。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五（8）

上海解放前夕，胡老头那特务女婿奉命撤往广州。临走前，他用汽车载来了这些金圆券，说是从中央印制厂拉来的，送给老丈人。胡老头生性胆小，解放前夕市面上一片混乱，他哪敢把这些金圆券拿出去抢购东西？于是就搁在家里。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贴出布告说可以用金圆券兑换人民币，于是他就动了兑换的脑筋。没想到竟发生了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

讯问结束后，军代表亲自带队前往胡老头家搜查的结果也出来了，没有发现金圆券，只搜到了一些保密局内部印刷的特工方面的技术资料。

杜奔将情况向徐伯龙作了汇报，徐伯龙让把胡老头的那些金圆券送往“上海人民印制一厂”（即原“中央印制厂”）去作鉴定。当天晚上，鉴定结果就出来了：这些金圆券一共是10.35万亿元，全部是由“中央印制厂”印制的，其中一部分是错票，已经被剔除出来了，尚未来得及销毁。这些金圆券是由保密局“经济特别督查室”凭毛人凤的手谕直接从该厂仓库提取的，提取时间是1949年5月14日下午14点23分。

至此，这些金圆券的来龙去脉以及真伪问题就已经完全清楚了。专案组再次遭遇断线！

当天晚上，专案组成员在福州路市公安局开了个碰头会，对情况再次进行了分析，认为侦查方向没有错，照此方向进行下去，完全是有希望获得有价值的线索的。

这个观点产生后不到24小时，就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1）

1949年6月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挂牌的前一天，中午12点半，徐伯龙正在办公室啃着烧饼权充午餐的时候，接到了关志存从榆林区打来的电话，说该区榆林路收兑点发现假金圆券！徐伯龙不知怎么地凭着直觉感到确实是该有价值的线索露头时候了，当下马上前往。

这次的发现跟前几次不同，前几次都是当场连人带金圆券扣下，这次却是前来兑换的人离开之后，工作人员才发现收进的金圆券竟是假钞。徐伯龙赶去时，那个收兑点已经临时停止收兑，所有工作人员、义工、志愿者正在从银行赶来的两个资深职员的指导下清检收兑的金圆券。

关志存向徐伯龙报告了经过情况：中午前，一个35岁左右的女子乘着一辆三轮车来到收兑点，让车夫从车上卸下了两麻袋金圆券，要求兑换人民币。收兑点的两个银行职员、5个义工一齐动手检点，打开麻袋一看，都是清一色的50万元金圆券，有新票有旧票。于是就清点，一共是1200亿元金圆券，于是就兑换给那女子120万元人民币。那女子小心翼翼地把人民币放好后，招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后就离开了。

一会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收兑金圆券工作组”的两个“老法师”级资深职员巡查到了这个收兑点，对收兑的金圆券进行例行检查，结果令人大出意外：先是发现收进来的大约700亿元金圆券旧票是假币，随即又检查新票，也有疑问。

这下非同小可，这倒不单单是国家财产损失了120万元，而是放过了上级一日数次让严查的可能会出现的敌情。于是马上向榆林分局急报，当时分管这一坨的专案组侦查员关志存刚离开榆林分局前往杨树浦分局，于是马上电告杨树浦分局让转告。关志存得到消息后当即赶往收兑点，初步了解情况后便在附近找了家有电话的工厂向徐伯龙报告了。

关志存毕竟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刑警，他在向专案组长报告情况后，当即向工作人员了解当时那个女子在场时的种种细节，启发他们从各个方面进行回忆。结果，当徐伯龙赶到现场时，有人已经回忆起那个女子说话带着浦东口音，还有离开时乘坐的那辆黄包车的车牌号码以及那个车夫的特征。

徐伯龙听说后，说那好，关志存你马上去调查这辆黄包车的车主情况，找到车夫，了解那个女人是在哪里下车的。

关志存受命而去后，那两个“老法师”告诉徐伯龙：经初步鉴定，他们认为那500多亿元的金圆券新票也是伪造的假币。

徐伯龙听了心里一惊，但随即又是一喜，寻思看来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终于露头了，这比一直沉在水底下来得好，现在，有力气终于找到使的方向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2）

却说关志存受命前往追查那辆黄包车，因为有牌照号码，因此倒还不算犯难，他去行业公会一问就查到了这辆黄包车是属于黄浦区“大隆昌车行”的。再赶到“大隆昌车行”一了解，老板告知说那辆黄包车是租给车夫苏炳奎使用的。关志存问现在这个时段应当到哪里去找苏炳奎，老板看了看时间，说车夫的租金是一天分两次交，现在快到下午两点了，先生你等一会儿他就会来交租金了。关志存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苏炳奎，从他那里了解到那个用假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的女人乘坐他的黄包车是去了外滩那边的董家渡轮渡码头。

董家渡码头位于黄浦江边，对岸就是浦东。关志存听了马上想起这个案件的原始情报就是说伪造金圆券的地址是在浦东，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联想。当下二话不说马上直奔董家渡码头，向码头检票口的人了解是否有这样一个女人在中午左右上了轮渡。检票员听了连连摇头，不是说没有，而是说没有留意过这个情况，在眼前经过了那么多人，谁去留意这样一个可以说没有任何特点的女人呢?

关志存想想也对，但终究不死心，想了想又上了轮渡，向轮渡上的水手了解，也没有获得结果。

关志存在追踪那个以假金圆券骗兑人民币的神秘女人时，徐伯龙打电话调来一辆汽车，把那个女人拿来兑换的金圆券新票旧票都送到“上海人民第一印制厂”，请那几位掌握印刷金圆券核心技术的专家级技师进行了鉴定，确认全部是伪造的假票，其特点是：制版水平非常专业，几乎可以说是达到了无可挑剔的程度，所以，这些假票的图案、文字跟真票没有差别；之所以认定是假票，是印刷方面的问题，伪造者无法调试出与真票的色泽完全一致的油墨，致使假票的颜色不得不跟真票有些许只有专家才能发现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分两个部分，一部分色泽相对比较深，因此伪造者就把这些假票用水泡过，制造成旧票。

消息迅速上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分行领导当即下达指示：紧急通知全市所有收兑点，严密注意识别前来兑换人民币的金圆券！

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徐伯龙让关志存介绍了白天的情况，然后众人一起分析案情。从那个神秘女人前往浦东这一点看来，这与情报中所说的伪造金圆券的地点是相符的，因此这极有可能就是这一路案犯了。接下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侦查措施？徐伯龙综合众人的观点，提出了两个应该同时进行的步骤：

一是请求“上海人民印制一厂”派出若干名技师，前往浦东地区的高桥、杨思、洋泾3区，在严密监控现场收兑情况的同时，对前几天已经收兑的金圆券进行鉴定，看是否已经有假票收兑进来而没有被发现的。这样做是因为侦查员从那个神秘女人从浦东来到浦西进行骗兑这一点情况来看，认为很有可能案犯已经在浦东进行过骗兑，为防止频频骗兑引起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才转移到浦西来骗兑的。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3）

二是基于前述原因，估计案犯今天到浦西来进行骗兑可能是一种试探，试探成功了，她明天就会再度来浦西骗兑，当然不会再选择榆林路上的那个收兑点，而是会选择另一个，不过为了方便以及便于运输，她很有可能就在靠近黄浦江浦西沿岸的几个区的收兑点进行骗兑，因此，看来很有必要安排侦查员到那些收兑点去监控。

于是就对人员分工作了安排，包括徐伯龙在内一共有5名侦查员，分别前往黄浦江沿岸的几个收兑点去，各人抵达岗位后要在附近物色好联系电话，通知市公安局总机，以便发生紧急情况时便于联系和调度。

第二天，1949年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挂牌成立，由李士英、扬帆出任正副局长。上海的公安工作从此开始起步，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天，也是“伪造金圆券”侦查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取得关键性突破的一天。

这天整个上午，所有收兑点一切正常。中午，守候在黄浦区外滩收兑点的专案组长徐伯龙去了一趟市公安局，按照其他4位侦查员留给总机的联络电话，一一打电话过去询问，都说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再跟前往浦东3区鉴定的上海人民印制一厂的技师通了电话，得知在杨思、洋泾两区5月31日收兑的金圆券里，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假票。

徐伯龙听着觉得非常兴奋，看来昨晚的案情分析会上对于案情的方向分析和定下的新侦查思路都是对头的，今天那个神秘女人或者其他案犯很有可能会到浦西来以假票兑换人民币的。

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在提篮桥区公平路收兑点守候的侦查员小马也进入了高度昂奋：昨天那个在榆林区收兑点骗兑的女人竟然出现了！

那个女人这次出场可就厉害了，她是雇了一辆卡车来到收兑点的，车上装满了麻袋，麻袋里自然都是金圆券了。卸下来那就好看了，说是堆起了一座麻袋山也不为夸张。工作人员已经从小马的暗号知道出现了情况，不管是银行职员还是义工、志愿者，一个个都保持镇静，不使对方察觉到有任何不安，平和地对待这个特殊客户。而小马因为一会儿要跟踪，所以早在那个女人还没有跟他打照面的时候，就已经溜到马路对面去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4）

工作人员问那女人这一卡车金圆券一共有多少元，那女人以肯定的语气回答说大约在50万亿元。工作人员顿时面有难色，说这位太太啊这可有点犯难了，因为……那女人打断说没有关系的，你们如果懒得点数，那就用磅秤称了分量毛估估一下就可以了，谁还计较多少呢！工作人员说这不是点数的难度，而是我们这个收兑点没有估计到会有像你这样的大客户前来交兑，装来一卡车金圆券，50万亿，按照政府的规定得换给你5亿元人民币，我们哪来这么些钱呢？所以得去区行调领，这样，你现在拿不到兑换的人民币的。你看怎么办？

那女人显然没有想到还有这一招，想了想问："那几时可以拿到人民币呢？"

"两个小时以后。"

"行！那我过两小时再来。"

那辆卡车卸下了货已经离开了，这个女人是步行离开收兑点的。小马在马路对面跟踪，这小伙子很机灵，他尽管离得很远没有听见这边的对话，但从那女人是空手离开的这一点估计肯定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便料定她不可能走得很远，一会儿还得回来拿人民币呢。

果然，那个女人只走了一条横马路就在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门前驻步不走了，对着橱窗看了片刻，里面的侍者看见了连忙出来拉客，她于是就进去了，在临窗一个位置坐了下来，小马看见侍者给她端上了一杯咖啡。小马于是避开女人的视线穿过马路，想找个电话机跟徐伯龙联系，可是附近没有电话机。咖啡馆里面估计是有的，但他没法使用，生怕打草惊蛇。正犯难间，忽见刚才在收兑点忙碌着的一个不到20岁的志愿者小伙从马路一侧溜了过来，转眼就到了他的跟前，询问有什么事需要相帮的。原来这小伙子见小马一个人跟踪，担心他孤掌难鸣，于是就悄悄跟了过来。小马大喜，吩咐盯住咖啡馆门

口，自己去找电话机往市局总机打电话。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后来被公安局招收进去当了一名刑警。

小马打电话过去时，徐伯龙还没有离开市局，这样就直接接到了电话。徐伯龙闻讯自然喜不自胜，说马上调人来增援小马，同时又指示把真的人民币兑给那个女人，然后跟踪咬上，找到对方的老窝后，一锅端了。

小马返回监视点后，让那个协助监视的小伙子把“允许兑换人民币”的决定带回收兑点。那小伙子离开后不一会儿，徐伯龙和关志存就来到公平路监视点跟小马会合。小马直到这会儿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否则以其一人监视对方，还真怕突然冒出点什么意外来闹一个力不从心哩。不一会儿，杜奔也骑着他那辆摩托车奉命赶到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5）

4个侦查员在咖啡馆附近等候了一个多小时，那个女人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就结了账离开咖啡馆。事后想来，她在离开咖啡馆前肯定已经让侍者给她打了叫车电话，这会儿她一出门，一辆“祥生”汽车行的出租车就驶至门口停下让她上车后驶离了。这边幸亏徐伯龙事先考虑得周到，把杜奔连人带车调了过来，当下就发动过后跟了上去。

剩下的徐伯龙、关志存、小马3人商议了一下，认为既然那个女人待在咖啡馆喝着咖啡等候，那说明她始终认为是一切正常没有危险的，因此她叫了出租车是为了取了兑换的人民币后迅速离开收兑点，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做贼心虚”的心理在起作用。于是，3人就决定还是去收兑点。

却说杜奔驾着摩托车跟踪那辆“祥生”出租车，原以为也是去收兑点的，哪知车过收兑点却没有停下，而只是放慢了速度。杜奔最初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也放慢了车速，远远地盯着。出租车离开收兑点后，往前行驶了一段距离，忽然掉头。杜奔一惊，以为对方已经发现了他在跟踪，急忙拐进了路旁的一条小弄堂。只见出租车往回行驶，杜奔不管三七二十一，跟上去再说。那出租车经过收兑点时，又是放慢了速度缓缓行驶。这回杜奔算是弄懂了：那个女人是在观察是否已经被察觉了。

如此，杜奔心里就有了底，驾着摩托车跟着出租车兜了几个圈子。出租车最后果然还是在收兑点停了下来，那个女人假装若无其事地下了车，很沉得住气的样子询问兑换的人民币是否已经拿过来了。工作人员把50085亿元人民币交给她，请她点数。这女人毕竟心虚，说了句“你们做事我哪有信不过呢”，拎着装钱的箱子一头钻进了出租车就让司机离开了。

这时，徐伯龙等人已经拦下了一辆“云飞”车行的出租车，当下就和杜奔一起跟了上去。那辆出租车直驶外滩南侧的董家渡码头，那女

人下了车，走向轮渡码头的售票窗口，买了一个筹子，进了检票口。侦查员急忙买了筹子跟进，正好一班轮渡从对岸驶抵，却不料那女人已经雇了一个挑夫把箱子扛在肩上，跟着她混在抵达的乘客人群里往外走了。

侦查员这才领教到了对手的狡猾，当下紧紧盯着。那女人出了码头，叫了一辆黄包车走了。徐伯龙和关志存马上各叫了一辆三轮车跟了上去，杜奔则驾着摩托车载着曹孝先远远地跟着。

黄包车载着那个女人行至苏州河流向黄浦江的入口附近的北苏州路，在一幢平房前停了下来，车夫收了车钱就离开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6）

从这时起，这幢3间平房就受到了侦查员的严密监视。徐伯龙让曹孝先对这幢平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一小时后获得结果：这幢平房原是“鸣洋纺织品进出口商行”的仓库，该商行在两个月前已经停止营业。老板在上海解放前夕已经携家前往香港，将产业委托一位姓顾的亲戚代管。4天前，这位顾姓亲戚把房子租给了别人，房客情况不详。

专案组的思路是：这个女人不可能是伪造金圆券案的主犯，她的背后肯定还有操纵着她的幕后人，那才是大鱼，所以，宜采取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她的幕后人露面。

哪知，这一等，竟然就把这个女人的性命给等没了！

专案组对守株待兔的人员作了两人一班、每班4小时的安排，第一班是杜奔和关志存，第二班是曹孝先和小马。徐伯龙自己没有安排轮守，他向局里要了一辆小吉普待在附近一条马路上作为机动力量，又在旁边一家旅馆租了个房间，作为不轮值的侦查员的休息点。

第二班的曹孝先和小马是晚上8点20分接替第一班的两个侦查员杜奔和关志存的，换班时上班人对接班的自然要有几句情况交代，当曹孝先听说入夜后一直到现在那个女人还没有开灯，也不曾有过什么动静时，心里就有点嘀咕，暗忖那主儿骗兑人民币劳累歇着了还是怎么着，怎么没有一点儿动静呢？曹孝先和小马两人是化装成无业游民进入监视岗位的，两人钻在那幢平房附近空地上堆着的空水泥窨井管里，目光始终盯着平房，竟然一直没有什么反应。

海关大钟敲响11下后，两人觉得情况不对头，曹孝先于是就让小马去旅馆向徐伯龙报告并反映他们的怀疑：屋里那女人是否发生了意外？

小马去旅馆对徐伯龙一说，徐伯龙也觉得反常，当下就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市局通知对监视点有管辖权的黄浦分局派人用合法手段对那幢平房进行试探。

半小时后，一辆邮电局的绿色摩托车驶至现场，在那幢房子门口停下，骑车者轻叩大门，口称“有电报”。这显然是一个不得已间急中生智想出来的主意，因为那个女人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有电报？当然，如果屋里那个女人真的开门的话，“送报员”在提出一个陌生的姓名而发现对方并非是收报人时，肯定会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敲错门了。”这样做也许会给对方一个激灵，但估计还不至于打草惊蛇，并且至少可以证实屋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可是，遗憾的是即使“送报员”已经把门敲得“嘭嘭”响了，但屋里还是没有反应。这时，已经出现在现场的徐伯龙下达了命令：“破门而入！”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7）

屋里，右侧那间临时作为卧室使用的原仓库守夜人居住的小屋的床上，躺着那个数小时前还在跟侦查员玩“反跟踪”的女人，不过这时她已经无法再玩反跟踪了，因为她已经死了。这个女人是被击昏后，用绳子勒死的。

那么凶手呢？大门始终处于侦查员的两双眼睛的监视之下，难道会隐形遁身法，就在侦查员的眼皮底下凭空出入，还顺手带走了那骗兑的巨款？侦查员对屋里进行勘查后，发现屋后的砖墙上被由里向外挖开了一个洞。如此，可以判断：凶手原本就在这屋里待着的，他是在杀死那个同伙女人后，带上骗兑的那些人民币挖洞从后面逃遁的。

可是，凶手为何杀死这个女人呢？侦查员分析：从其不敢从大门逃走这一点看来，凶手是已经发现那个女人从外面回来时已经受到了跟踪，为了灭口，所以就杀死了那个女人。

侦查员未在屋里发现伪造金圆券的痕迹和其他跟伪造金圆券相关的证据，根据这幢平房的后墙离苏州河不过两米的情况，可以作出初步判断：这是案犯用于隐藏伪造的金圆券的一个点，他们在别处伪造金圆券后，用船将其载运到苏州河边的屋后，利用黑夜的掩护将假票藏匿于屋里，然后由这个女人出面骗兑人民币。从杨思区、洋泾区均发现案犯已经成功地用假金圆券骗兑了人民币这一点看来，案犯制造金圆券的窝点应该是在浦东，他们在浦东那两个区先抛出少量假票作为试探，观察人民政府对此的反应，然后就以浦西为主要骗兑目标开始作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很快就暴露了，于是就决定灭口而杀死了这个女人。

当然，如果案犯是知道刑事侦查是怎么一回事的，他们就会很遗憾地发现杀人灭口并不是一个如意算盘，因为只要循着这条线索往下追查，他们还是会暴露的。专案组的下一步侦查思路就是准备这样进行的。

要查明死者的身份，还是得从租借这幢平房的房客开始。侦查员在昨天通过派出所了解过出租该房产的情况，得知系房东代理人顾某出租给房客的，但派出所方面并不知道房客情况。这回，侦查员就直接找那个代理人顾某了解情况了。

顾某是一个中年失业教师，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好好先生。他对侦查员说，苏州河边上的那3间仓库房子，是一位姓厉的邻居向他询问是否没人租借后介绍了一个房客的，租借人是一个名叫“叶佩丽”的30多岁的女人，听说话口音好像是浦东人，她没有跟他多说什么，只是按照他的开价预付了1个月的房租后拿了钥匙就告辞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六（8）

顾某不清楚，那就找介绍人厉某去。这时，侦查员心里有点发憷，担心案犯具有丰富反侦查经验，一不做二不休玩一招斩草除根把厉某也灭口了。直到派出所把厉某传唤到他们面前时，这才算放下心来。一问，厉某是知道那个叶佩丽的情况的，因为他跟叶佩丽搭着点亲戚关系，按辈份尽管叶佩丽比他大两岁但是得称他一声“表舅”。这样，侦查员从厉某的陈述中对于叶佩丽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初步了解——

叶佩丽，34岁，南汇县惠南镇人氏，出身商人家庭，小学文化，16岁到上海当舞女，两年后嫁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法租界巡捕房捕探。抗战爆发那年，那个巡捕因得罪了青帮大亨张啸林而被暗杀。张啸林还放出风声要“斩草除根”，吓得叶佩丽慌忙逃回南汇老家躲避起来。

不久，上海失陷沦为敌占区，上海周边地区尤其是浦东一片混乱，出现了“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局面。土匪帮伙多如牛毛，不但有男性土匪，还有女性土匪，奉贤县还冒出了一个后来诨号“双枪黄八妹”的著名女匪首黄百器，她在奉贤乡间收集枪支，组织武装，结伙为匪，渐渐竟闹出点儿名堂来了。叶佩丽本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人，那时节便也冒了出来，投奔到黄八妹手下当差。黄八妹了解了叶佩丽的经历，认为适合搞收集情报之类的工作，便拨给一笔款子让叶佩丽去上海市区开了一家小酒馆作为情报站。

1938年，国军第62师派员前来沪浙交界地区收编地方武装，已盘踞金山、平湖一带活动的黄八妹受编后，成为“江南抗日挺进队”头目之一，其指挥下的队伍也确实曾有过杀敌行动。这样，潜伏在上海市区的叶佩丽便奉命开展收集日伪情报工作。但叶佩丽实在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工作还没有作出什么成就来时，就已经被汪伪“76号”特工机

关盯上了，很快就被捕，最后以答应嫁给一特务头目当小妾为代价换取了自由。

抗战胜利后，那个汪伪特务头目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处决。叶佩丽再次成了寡妇，就在上海滩胡乱混世界。因为没有房产可供其居住，她就在住房比较宽敞的表舅厉某家长期借住。厉某虽说在辈份上应是叶佩丽的表舅，但实际比叶佩丽小两岁，因此见多识广的叶佩丽在交往中是把他作为兄弟看待的，两人闲时经常一起喝酒，叶佩丽健谈，总是侃侃而言，似乎还有些健忘，有时喜欢炒冷饭，把说过的情况一而再再而三的陈述，时间一长，厉某对叶佩丽以往的历史、有些什么亲朋好友以及人家对她如何等等都已经听得烂熟于心。此刻侦查员需要了解，他正好照样一一道来。这些陈述中尽管没有与伪造、骗兑金圆券相关的内容，但是能使专案组了解叶佩丽的社会关系，显然肯定有助于破案的。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1）

侦查员根据厉某提供的情况在梳理线索时，我们应当让伪造金圆券的那几位登场了，他们正吵得不可开交，正急于登场亮相呢！

如今人们所说的上海浦东新区，在上海解放前的行政归属有点复杂，那里的高桥、杨思、洋泾3地区是3个以地名为名的独立区，是上海特别市30个区内的3个区；川沙、南汇、奉贤则是3个独立县，归国民党江苏省政府管辖，而中共又一度将其中的奉贤县作为执掌政权的县份，委任了县长，行政归属于“浙东行政公署”。这样，浦东这块地盘，行政上归属于两省一市。1949年5月中下旬，浦东各地相继获得解放，高桥、杨思、洋泾3区仍归上海市，其余川沙、南汇、奉贤行政归属于苏南行政公署松江专区。

我们所说的那几位急于登场亮相的主儿，其栖身地位于杨思区与川沙县交界处的一个地名唤做“顾家塘”的独家村内。

江南地区，江湖河塘密如蜘蛛网，在那个还没有经过兴修水利、筑路建桥的时代，漫步于农村，走不到数里地就可以看见某处有几间在小河拐弯处或者交汇点的一块陆地上建造的房屋，由于陆地面积不大，故往往只能建造容纳一户农家的房屋，这种地方，在当地被称为“独家村”。

独家村的地理位置，依据河流走向而定，有的形如半岛，有的前后有河，左右一侧或者两侧有与田野相连的道路，也有的因处于两三条河流的拐弯交汇处，所以就成了孤岛。顾家塘，就是这样一座小小孤岛。把伪造金圆券这样的作案地点设在顾家塘这个孤岛上，实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方圆数里地内的所有农民心目中，这个40岁的土生土长本地男子，形象猥琐，其貌不扬，遇事慌张，说话木讷，见了老婆就像见了阎王，只有瑟瑟作抖的份。如果要说这人的惟一优点，那就是两个字：勤劳。按照后来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时

划分农民成分的标准，蒋玉生家拥有的土地只能算下中农。周围村庄凡是认识蒋玉生的农民对于蒋玉生的好印象通常就是终日在农田里辛勤劳作，除了耕种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土地，大多数是在替地主、富农服务。

后来伪造金圆券案被侦破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不能不对蒋玉生在另一个身份上那出色的隐蔽功能叹为观止。蒋玉生的另一身份就是土匪，一年中的有一些日子总是悄然外出与同伙结伙作案，后来据其交代，从抗战那年开始到1948年12月底，他亲手杀害的被抢劫对象就有7人之多。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2）

蒋玉生在最后一次抢劫杀人后，已经知道共产党军队势不可当，国民党政权倒台只是时间问题了。他虽然居住于独家村，但对于政治形势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当年新四军淞沪支队在浦东活动时所进行的那些宣传，很有一些内容是传进了他的耳朵，留在了他的心里，知道共产党执政后绝对不会容忍像他这样的身负命案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的。于是就决定洗手上岸，凭其多年抢劫所获的财富，已经足够全家6口安度一生了。于是就把手枪、子弹全部埋到了屋后河边地里。那些赃物中的“黄白绿”（即：黄金、银洋、美钞）也是细细包扎后密封于陶瓷坛子里，深埋床下。他原本就伪装得很好，这回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料想能够做得天衣无缝。

哪知，只隔了短短4个多月，蒋玉生的想法就随着两个人的出现迎来了挑战。

这两个人，一叫金星根，一叫干盘荣。抗战初期，蒋玉生尚未来顾家塘开辟独家村居住地而在南汇那边刚开始进行杀人抢劫犯罪活动时，那二位中的金星根跟其是最佳的合作伙伴，两人还跟另外七八个狐朋狗党一起喝过鸡血酒行过对天八拜之礼。后来，金星根投奔了“浦东第一匪”，自称“奉（贤）南（汇）川（沙）三县总司令”的张阿六，两人来往少了。但这位小弟对于蒋玉生这个其貌不扬、猥琐不堪的大哥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尊重，逢年过节一份不菲的礼物总是少不了的，而且不管是亲自送来还是托人捎来，总是选在下半夜两三点钟时分悄然登门飘然而去，从来不必让蒋玉生担心会被外人看见而增加暴露另一身份的危险。

蒋玉生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他心中也总是给金星根留着一块位置，当解放军进攻上海的隆隆炮声隐约传到独家村时，他一连数日夜不成寐，为金星根担心，寻思不知对方是否跟着张阿六撤往舟山了。而金星根，就是在3天前他的义兄的这种夜不成寐的思念中悄然叩

响了独家村之门的。在他的身后，是蒋玉生还是第一次见面以前也没听说过的干盘荣。

如果以为说话木讷的人思维也必定一概是很迟钝的，那先得怀疑持这个概念的人自己的思维是否有问题了。据蒋玉生被捕后对侦查员徐伯龙说，他见到金星根后的第一个反应是：对方是来藏东西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独家村，他一身干衣服就能来到门前，那肯定是划船而来，而既然动用了船只，那船上就肯定有东西了。

因为蒋玉生自己已经埋藏了“黄白绿”，所以他以为金星根送来的也是“黄白绿”，哪知金星根一开口却令他大吃一惊：金星根动用船只载来的东西，竟是一套笨重的人工动力印刷设备以及大量专用印钞纸。

蒋玉生问：“这机器送来干吗？藏起来？”

金星根回答：“有这个意思。”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3）

“那就沉到水里去吧，这样保险。”

金星根还没开口，另一位开口了，说话语调有点冷：“浦东到处是河浜，如果沉到水里保险，那我们何必还深更半夜运到此地来？随便找个河浜一沉就行了呗！”

蒋玉生借着星光打量着对方：“这位弟兄是……”

金星根介绍道：“这是干盘荣先生，是我的上司。”

蒋玉生点头：“那进来说吧。”

那二位一说来意，蒋玉生顿时愣住了！原来，当时已经被国民党委任为“江苏省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纵队司令官”的张阿六，在撤离浦东前，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指令，留下一批特工人员潜伏于浦东和江苏与浦东地区毗邻的县份，伺机对即将新生的上海人民政权实施破坏活动。金星根和干盘荣就是张阿六亲自指定的潜伏特务，下达给他们的使命是：伪造金圆券，在共产党占领上海后抛出去兑换人民币，再以人民币抢购“黄白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一旦共产党政权控制了金融市场，颁布命令只允许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那就改为制造假人民币。

那个干盘荣，是保密局派给张阿六执行此项使命的特务，这人在抗战前期由军统局发起的“中日假币战”中从事过制造假币的工作，因此对于这方面算是一个行家。两人接受任务后，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机器、金圆券版子、印钞纸都是现成的，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何处开机印制。干盘荣是浙江丽水人氏，以前虽然来过上海，但从未建立过任何关系，因此这事只有问金星根。金星根提出了几个地点供干盘荣选择，两人经过反复商议，从地理位置一直到人员安全综合考虑，最后认为顾家塘独家村最为合适，于是就偷了一条木船，载上一应器材于夜深人静之时过来了。

蒋玉生一听对方的来意，心里顿生恐惧。因为他跟金星根不同，长期以来一直以老百姓的身份生活在社会底层，耳朵里听到过多桩新四军淞沪支队惩治不法奸徒事例，知道共产党的厉害，这也是他决定“金盆洗手”的主要原因。谁知刚刚歇手几个月，眼前这位结拜老弟却给他出了这样一道难题！于是，蒋玉生就面露怯色，缓缓摇头，口中讷讷而语：“这……这……事……我……不方便……”

金星根对他解释道：“你不一定直接参加干嘛，只要把你家作为场所就行了。大老倌（浦东话，意即“大哥”），这是一个发大财的机会，阿六司令有话交代过的：印出了假钞票调换到的‘黄白绿’，全归我们这几人所有啊，你想想，这不是等于自己在生产‘黄白绿’吗？你到哪里去觅这样的机会啊！”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4）

但蒋玉生还是摇头。

这一点，老奸巨猾的军统特务干盘荣事先已经估料到，因此在选择地点、人员时曾就蒋玉生的情况向金星根作过详尽了解，此刻他见蒋玉生这个态度，便意识到必须由他出面了，于是就对金星根使了个眼色示意其回避，然后悄声对蒋玉生说了一番话语，听得蒋玉生如梦初醒，周身打颤。

干盘荣说了什么内容呢？要言不烦，一共有两层意思，一是此事已经被你知晓了，这是党国的重大机密，如果你拒绝合作，那就只好帮助你和你的全家一并封口；二是即使考虑到你跟金星根的关系可以不直接下手，也可以借助于共产党之手借用你一样东西——颈上之物，老兄啊，你别忘记一共作过多少案子？欠过多少条人命！

蒋玉生说话木讷，心眼却是玲珑剔透的，当下一听就明白自己是无法逃避此事了，于是只好一口答应。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有老婆子女，要不要把他们打发到亲戚家里去？"

这个问题，干盘荣早已考虑过了，既然蒋玉生之前频频作案也没因为老婆孩子的原因而漏过风声，此刻干这事儿大可不必回避，否则反倒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于是，就对蒋玉生说，这事应该怎样保密，你比我清楚，你去安排吧。

这样，金星根、干盘荣就在顾家塘独家村待了下来。这时的上海战役态势，于国民党方面已经大大不利：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相继占领了宝山县的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地区的国军守军；第9兵团则已经占领了川沙县城城厢镇和南汇县重镇周浦，在白龙港地区全歼国军第51军，将国军第12军压缩于浦东高桥地区，切断了该军与原先的友邻部队国军第37军的联系，与第10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由干盘荣主持的假金圆券小作坊就在国共武装力量对决的隆隆炮声中悄然开张了。

干盘荣以前接受军统指令从事“对日假币战”时，曾专门去印刷厂学习过印刷技术。用后来解放后国家评定印刷行业的技术标准判定，其技术水平大约相当于6级技工，也算得上老师傅了。他所带来的那套人工动力小型印刷设备，是进口的美国货，应该说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台机器的安装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按照图纸安装倒很顺利，可是试机时动力系统跟机器的配合却不够融洽，时好时坏，这就无法投入生产了。干盘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憋着一股劲连日连夜地摆弄，最后总算解决了。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5）

不过仅仅是机器能够顺利运转还无济于事，钞票还没有印出来。干盘荣不敢休息，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精神，躺下稍稍打了个盹儿又开始干了，那股劲头与癫狂型病人堪有一比。如此折腾到了5月23日下午，中间自然还遇到过若干大中小的技术拦路虎，有时急得干盘荣双脚跳也没有用，无奈之下甚至让蒋玉生去杨思镇上买来香烛点燃了跪拜菩萨鬼神，最后总算调试完毕，开始印刷，竟然一举成功！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当伪金圆券印制了一部分时，他们发现印出来的金圆券的颜色比真钞票略微深了一点点。这一点点色泽差别，如若是把钱拿到市面上去花，大概还不会被人识穿。但是，他们印制的假金圆券是要整箱整袋送到银行收兑点去兑换人民币的，这虽然是微乎其微的色差哪里逃得银行职员那犀利的职业眼光？到时候就不是是否兑换得成的问题了，而是得折进局子吃牢饭上杀场掉脑袋的滔天大祸啦！因此，干盘荣暗忖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自然是先找出原因来。这一找倒是找到了，但却使这3个特殊造假师傅的头大痛起来！

原因是：油墨本身的色泽有问题。

5月初，干盘荣从当时兼任着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保密局大特务毛森那里接受伪造金圆券使命后，即由毛森派人送来了这套小型美国制钞设备、由保密局的技术专家伪造的面值50万元和100万元的金圆券版子以及与之配套的专用印钞纸、特地配制的专用油墨。来人对干盘荣交代，印钞纸是从造币厂弄出来的真货，版子和油墨是由保密局的技术专家仿制的，已经经过专门鉴定，跟造币厂的没有什么差别，你按照技术要求操作即可。干盘荣确是按照技术要求严格操作的，可是现在发现了问题。这怎么办？

3人中，只有蒋玉生内心有着一份隐藏得很深的幸灾乐祸，因为如果这件事泡汤，那他就可以太平了。当然，这种心情绝对不能表露出

纹丝，否则后果自知，所以他的脸上始终挂着一份焦急。而金星根和干盘荣则是真的着急，他们必须完成此事，否则以后就没法向上面交代。毛森才不会相信他们关于油墨问题的解释呢，也许是你们为了逃避执行使命而自己往油墨里掺了点色彩呢?

金星根和蒋玉生围着6级老师傅干盘荣，一个真一个假地询问着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是否可以自己往里掺点素色油墨使其变淡，就像小学生做水彩画作业一样。干盘荣被他们问得哭笑不得，说这是专门印制钞票的特殊油墨，我没有学过配制技术，哪敢瞎折腾?

那怎么办呢?干盘荣想了想，说我要么去市区走一趟，找人相帮解决这个问题。

干盘荣当即离开独家村，前往市区碰运气。这运气还真让他给撞到了，当天晚上，就解决了这技术问题，一张张50万元、100万元金圆券从印刷机里飞出来。干盘荣、金星根、蒋玉生3人看着，一个个眉开眼笑。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7）

这样，金星根就去上海市区走了一趟，找到了叶佩丽，说他手头有一批朋友的金圆券，可以兑换成人民币。不过，他本人由于以前欠下的人命债有好几条，最近不大适宜出头露面，所以想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她可以从中提取10%的辛苦费。叶佩丽听了当然愿意做，当下就一口答应。金星根又关照，那批钞票的来路可能有点问题，尽管那是国民党手里的事儿，但是也是不宜被人民政府知晓的，所以你得按照我交代的方式去兑换。于是就一五一十说了一番，就是后来专案组所侦查到的叶佩丽所进行的那些骗兑流程和反侦查措施。

金星根跟叶佩丽谈妥后，给了她若干枚大洋，让她先去租一处便于水运卸货的偏僻房屋作为活动据点。这样，叶佩丽就对厉某说要替朋友租借一处怎样怎样条件的房子，请其帮忙。厉某根据她的要求，从顾某那里替她租借了苏州河畔北苏州路上的那3间平房仓库。干盘荣于是就和金星根、蒋玉生一起搞了条船，偷偷从水路将伪造的金圆券运往北苏州路密点。那印刷得颜色有些偏深的金圆券，按说从安全的角度计议是应该烧掉的，可是干盘荣3人看着觉得实在舍不得，于是就想出了通过“水洗”之法弄成“旧票”，混于“新票”内去骗兑。

叶佩丽确实没有辜负金星根的重托，先后在杨思区、洋泾区、榆林区几次顺利骗兑到了人民币。坐镇于北苏州路密点从幕后指挥叶佩丽行动的金星根寻思既然连有疑点的“旧票”都骗兑成功了，大部分没有疑点的“真票”还怕骗兑不到吗？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让叶佩丽去租了一辆卡车，把密点内剩下的那些假钞全部运出去一次兑掉。

卡车装了假钞离开后，金星根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又有些后悔了，这种后悔又导致不安。他在这种不安中等待了将近半天时间，终于候得叶佩丽回来了。但是，狡猾成性的金星根从密点内往外观察时发现叶佩丽已被侦查员跟踪，情知不妙，于是就果断下手将叶佩丽灭

口，然后乘天黑的掩护在后墙挖了一个洞，携带着叶佩丽携回的那些人民币逃之夭夭，先去卢家湾区的一个朋友处过了一夜，次日返回浦东顾家塘。

金星根回到顾家塘后，向干盘荣说了上述情况，干盘荣对于叶佩丽的生死根本不当一回事，还夸赞金星根“行事果断，决策高明”。3人为骗兑了巨额人民币而深觉高兴，当晚，蒋玉生宰鸡杀鸭办了丰盛菜肴庆贺。

席间，干盘荣和金星根对于一件事的如何决断发生了分歧：原来，金星根在上海市区操纵叶佩丽骗兑人民币时，顾家塘这边干盘荣和蒋玉生也没闲着，他们继续运转机器伪造了一批金圆券。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叶佩丽已经暴露了骗兑之事，那么这些假钞应该怎样处理？干盘荣是特工，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认为这些假钞不能再留着，应当予以销毁；而金星根是土匪出身，贪婪是土匪的本性，面对着堆积如山的这些足能以假乱真的假钞，怎么也舍不得销毁，主张乘人民政府公布的收兑金圆券期限未到，还是应当去骗兑，至于怎么行动，还可以商议，当然是安全第一。

2.侦破伪造金圆券案 七（8）

两人先还你一句我一句表述各自的观点，渐渐就不能冷静讨论了，酒也喝得多了，就高嗓大调吵了起来。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都醉醺醺地回房躺下后就人事不省。

次日早上，金星根醒来时，干盘荣还在昏昏沉沉地大睡。蒋玉生喝得不多，早已起床了。见金星根醒了，就把他拉到外边去说话。别看蒋玉生貌似老实本分，其实却具备着惯匪的那种“狡猾、贪婪、残忍”的基本特点，他向金星根提出了一个解决与干盘荣两人之间纠纷的法子，这个法子只有一个字：杀！

金星根的脑子还觉得有点宿醉造成的头痛，但思维绝对清晰，当下一言不发，马上跷起了大拇指。这样，干盘荣就被惊醒了，他很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只端阳大粽，而嘴里则已被塞了一团破布。几分钟后，这只端阳大粽绑上石头后被沉入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

金星根、蒋玉生解决了干盘荣后，重新讨论了对于伪造的金圆券的处置方案。大多数人有一个习惯性嗜好：喜欢复制成功。当这种嗜好到了犯罪分子身上，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重复式的犯罪痕迹，据说现代侦查学中专门开辟了这样一门学科进行专门研究。金星根身上也有这样的嗜好，他的想法是再去上海市区找一个叶佩丽那样的主儿，把这些假钞运去骗兑。蒋玉生举双手赞同这位结拜老弟的主意，6月5日将至，事不宜迟，于是就决定马上行动。

金星根当天上午就去了市区，找到了一位住在曹家渡苏州河边的当年一起为非作歹过的朋友钱某，一说就成，而且不必另外租借房子，以船运到他家后窗下就能卸货。金星根理应为他的这次市区之行所付出的代价后悔：他忘记了他所找的这个钱某当初还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此刻，专案组已经根据厉某提供的叶佩丽生前交往过的那些关系在进行调查接触和作了相关布置了。那个钱某正急着寻觅立功机会折抵以前的罪行，待金星根一走，便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

于是，就发生了使金星根、蒋玉生最为心怵的一幕：当晚，金星根、蒋玉生去3里外的一个村庄去偷了一条木船，准备将假钞装运到市区曹家渡去。可是，当他们摇着木船抵达顾家塘时，发现已经落入了军警所组成的包围圈中了！

“伪造金圆券案”就这样被侦破了，金星根、蒋玉生于1950年2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1）

1949年初夏，中共中央决定于当年7月1日在北平市（今北京市，下同）先农坛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主席将亲自参加这次庆祝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一消息被业已败逃台湾省的国民党保密局获悉后，经蒋介石批准，由局长毛人凤主持制定了一个行刺中共五大书记的计划，秘派刺客潜赴北平实施行动。

国民党保密局的这一阴谋很快就被我情报人员侦知，我公安人员发挥大智大勇，几经曲折，终于在“七一集会”前夕将特务刺客抓获，彻底粉碎了敌特阴谋……

一

1949年6月16日，一个爽朗的初夏之夜，华灯初上时分，时任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都是那些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华民族精英”的人物——李济深、沈雁冰、郭沫若、张奚若、陈嘉庚、蔡畅、李立三、蔡廷锴、章伯钧、陈叔通、黄炎培、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等。

这次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的会议，后来被载入了史册，会议的全名是：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当周恩来宣布会议结束时，会议出席者之一、被当时舆论称为“海外华侨领袖”的陈嘉庚掏出他那块已经使用了20年的怀表看了看时间，时针已经指向了次日零点40分。

周恩来送走与会人员后，在勤政殿门口上了一辆美式小吉普，吩咐司机去丰泽园菊香书屋。那里，北平市长叶剑英、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等人正等着这位日理万机、即将出任政务院总理的“国家大管家”举行另一个重要会议。

汽车打着明亮的大光灯，沿着光洁的石板甬道来到了南海北岸西侧的一座楠木大门前停下。楠木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黑底色的大匾，

上面镌刻着3个圆浑清秀的金色欧体汉字：丰泽园，据说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这是一个很大的古建筑群，其内分割成若干个较小的建筑群，每个独立建筑群都备有名称，大门上方都挂有匾额。这里，后来成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胡乔木等人的住所，但在1949年7月之前，只居住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之前，毛泽东主席自当年3月24日来到北平后，一直居住在香山双清别墅。直到1949年7月由中共中央集体作出正式决定后，他才住进了中南海丰泽园。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2）

周恩来召集叶剑英、罗瑞卿、齐燕铭等人举行的这个特别会议，就在后来成为毛泽东住所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内的紫云轩举行的，被周恩来点名召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行政处处长周子建、统战部交际处第一处长申伯纯、第二处长金城。

周恩来进门后，一边落座，一边跟大家打着招呼连说“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然后马上把话题切入会议主题：请大家过来，是商量一件事情，这是一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再过半个月，就是7月1日了。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一个生日。为此，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举行党的生日集会。届时，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600多人出席集会，毛主席将在会上作重要讲话。毫无疑问，这将是一次颇具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大活动。同时，这也是自我们进入北平以来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的、有众多领导同志出席的群众性集会。因此，老实说，我们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们要好好计议，好好做一番准备。可是，从时间上来讲，只有半个月了，还是比较紧的，那就更需要我们考虑得周全再周全。剑英同志，你是北平市长，这个大型活动在你的地盘上举行，你得多担点儿分量了，是不是?

叶剑英点头称是。这位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已经担任北伐军师参谋长的著名将领，思维极其敏捷，周恩来刚才的那番话语还没说完时，他就已经从到会人员的职务上猜测到各人将承担什么任务了，此时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诸位在做各项准备工作时，需要我这个地方官提供什么帮助的，请尽管开口。

周恩来说：好啊，父母官已经表态了，那我就点将了：齐秘书长，负责总的会务工作；周处长，负责会议的后勤；申处长，负责联

络和接待国内会议代表；金处长，负责联络和接待海外代表。他停顿下来，两道炯炯目光望着罗瑞卿，缓缓地很有分量地点着头：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被点到名字的与会人员异口同声："明白！"

"具体进行工作时，遇到什么困难的，可以找叶市长解决。"

这时，罗瑞卿开口了："周副主席，会议在哪里举行决定了吗？"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一（3）

“已经决定了，在先农坛举行。届时中央领导同志将集中至中南海后齐往先农坛会场。”

罗瑞卿倒抽了一口冷气：从毛主席等领导人居住的香山到中南海再到先农坛，有相当一段距离，这将会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须知北平解放还不到半年时间，敌特势力尚未肃清，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对中共虎视眈眈，如果敌人派特务在香山至中南海和先农坛的途中搞暗杀、爆炸，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啊！

周恩来凝视着罗瑞卿：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就拜托你们公安部了！

公安部长点点头，接下了任务。

接着，周恩来又跟与会人员商讨了几个具体问题，看看已过两点了，便说时间不早了，那就散会吧，大家回去抓紧休息，明天还得工作呢，又请罗瑞卿留步。

周恩来让罗瑞卿留下，是告诉他一个决定：为切实保证“七一集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央已经通知中央社会部开通台湾方面的内线关系，收集相关情报，这些情报将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公安部。

由几年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大名鼎鼎的“红色特工”李克农执掌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是一个直属中央的独立机构，其重要职责之一是在敌人内部安插内线。现实生活中的内线跟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中所反映的有很大不同，国民党方面在败逃台湾后痛定思痛，深刻吸取教训，在反间谍工作方面很是下了一番工夫，其时已经做得很到位了，内线每被动用一次，就有一分被暴露的危险，因此，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作出规定，内线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如必须动用则必须经中央负责主管社会部的领导同志的亲自批准后，直接向李克农下达命令。因此，动用内线是一桩重要大事，这次为了

做好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中央显然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由此也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罗瑞卿深知这一点，在感到一阵轻松后马上又意识到他这个公安部长的责任之重，倦意顿消，决定返回部里后立即考虑如何安排具体工作。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1）

中共中央作出的动用内线关系的决定的英明性在3天后就得到了体现。那天深夜，正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办公室批阅文件的周恩来忽然接到李克农的电话，问周副主席这会儿是否有空，他想过来一下。周恩来知道李克农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来了必然有特急大事，立刻说“有空”，吩咐卫士给大门警卫室打电话，见李部长的车过来立即放行。

李克农夤夜求见周恩来，果然是有大事，他送来了一条刚刚收到的来自台北市的极其重要的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已经侦悉我“七一集会”的相关情报，有迹象表明特务头子毛人凤正奉蒋介石之命选派行动特工秘赴北平行刺中共领袖。

这条情报，是一位潜伏于国民党保密局内部的女情报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特工人员其实是很难谱写如影视作品中的那份曲折的，内线关系每被动用一次，这个内线的使命通常也就结束了。因为敌人绝对不像我们所观赏到的影视故事片、连续剧中那样的愚蠢，只要稍稍一查，肯定会发现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所以，那位女情报工作者在台湾派来的行动特工落网后的当天，就被有关方面通知火速撤离。盛怒之下的毛人凤亲自组织了对这个“中共匪谍”的追缉，但未能成功。这位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撤回大陆后，被安排在西南某省的公安部门工作。

周恩来一听李克农汇报这条情报，感慨毛人凤的情报工作真是迅速。

李克农点头：“是的，才3天时间，敌人就已经收集到了准确的信息，这是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特别要予以注意的。”

周恩来说：“对！必须得多加注意。敌人这次是如何获悉这个机密的，我们也需要了解清楚！”

不久，随着案情侦查工作的进展，公安部方面终于弄清楚了台湾保密局方面是怎样获取这个机密的。这，需要从当时居住于香港浅水湾的一位经历颇有些特殊的人物说起——

香港浅水湾，从内地角度看去，位于港岛的背面，面海负山，气势雄伟，为举世闻名的海滨浴场。这里细沙如银，碧海白浪，蜿蜒数里之长；远望岛山相衔，绿波荡漾，海国浮沉，向来被人们视为休养胜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有富豪巨贾看上了这块宝地，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别墅、旅舍，一幢幢透着东、西方多国风格的建筑物散布于海滩、山间，把浅水湾点缀得越发秀美。东北军前师长、港商黄震遐的公馆，就坐落于浅水湾畔。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2）

黄震遐，字翰文，1892年出生于辽宁省新民县大农屯单城子村，少年时即投身行伍，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晋升到东北军中东铁路哈满线护路军旅长，呼伦贝尔警备师少将师长。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名将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竖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黄震遐积极响应，率部投到苏炳文麾下。1932年12月4日，救国军在数倍于己的日军、伪蒙军的恶攻下，屡战不支，被迫退往苏联境内。

黄震遐在苏联住了半年，绕道欧洲回国，闲居南京。七七事变后，转赴重庆，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家迁往香港，下海经商，生意竟然做得甚是得法，数年间就成为一名小有名气的资本家。

黄震遐是一个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正直汉子，早在抗战前，他就和中共地下党有联系，提供过物资，收集过情报，营救过被捕党员。后来移居重庆后，经人介绍又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来往关系，成为重庆红岩周公馆的常客。抗战胜利去香港后，曾数次斥资购置大量西药、洋布、印刷器材等赠送中共方面，积极支持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后期，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迫害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向受迫害的同盟者及时伸出援救之手，中共中央指派钱之光秘密潜赴香港，同中共在香港的地下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一起，负责建立秘密通道，将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的对象转移至解放区。黄震遐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各种关系，协助潘汉年等进行工作，先后将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大律师沈钧儒、农工民主党负责人章伯钧、三民主义同志会联合会中央常委谭平山、大诗人郭沫若、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等安全送往解放区。

中共没有忘记黄震遐这位朋友，周恩来在审阅“七一集会”出席者名单时，发现没有这位军人出身的资本家，当即亲笔添上了黄震遐的名字，并在后面以小字注明：此公系中共挚友，曾数次给我党重要帮助，可邀其来平出席会议并安排参观游览。

这样，两天后，黄震遐就接到了中共通过特别渠道传递到香港的口头邀请。他先是觉得意外，继而大喜，仰脸大笑：“哈哈！共产党有情有义，没有忘记我黄某啊！”

这时，佣人进来请示：“先生，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您今天在哪个屋里用饭？”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3）

黄震遐可能受早年军旅生活的影响，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嗜好：一日3餐喜欢在不同的场合吃，上千平方米的一个公馆，屋里室外，餐厅、卧室、客厅、书房、花园、草坪甚至车库，几乎各处都被他用来作为餐厅使用过。家里人谁也受不了他这个怪习惯，只好基本上不跟他一起吃饭。

这天的午餐，黄震遐是安排在书房里吃的，为了庆贺被中共邀请赴北平出席重要会议，他让佣人特地上了一瓶茅台酒，还添了两个菜。当下，黄震遐喝着美酒，只觉得心里美滋滋的简直难以言表。渐渐就陷入了沉思：今年以来，天津、北平、南京、上海等众多大中城市相继被解放军攻占，到现在为止，整个大陆除了个别省份外，皆已为中共所掌握了。嗬嗬，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共产党坐拥天下已成铁定之局。7月1日是中共生日，这个时候在北平举行有各方杰出人士出席的庆祝集会，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最为重要辉煌的一次会议了，估计所有领袖都会到场。看来，我黄某人真是今生有福，此行赴内地多半还能亲眼一睹中共首脑毛泽东主席的风采呢！

黄震遐想到这里，头脑里忽地闪出一个念头：我此次去北平，应当向毛泽东主席，以及熟识的周恩来、叶剑英捎上一点礼物啊！

于是，黄震遐就按铃召来佣人："你叫黄理援来一下。"

黄理援是黄震遐的堂侄子，12岁时就跟着时任东北军师长的堂伯父黄震遐当勤务兵，后来一起退到了苏联。回国后被黄震遐送进学堂读书，但似乎不是一个文化方面的可造之才，于是就弃学学习修理汽车，这是当时的一门技术含金量甚高的职业。后来抗日战争爆发，黄理援就进了杜聿明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士官。杜聿明奉命组建机械化部队时，黄理援已经成为技术骨干了。抗战胜利后，黄理援退伍来香港投奔黄震遐。黄震遐有心培养他经商，但他对此并无兴趣。那么想干

什么呢？黄理援说伯父我会武术、精射击，又能开车修车，我就给您当保镖吧。

现在，黄震遐把这位贴身保镖召来，把一份礼品单和一本支票簿递过去："理援，你开车出去一趟，照这上面所开列的内容购买，得去最大的公司，选择最高的价格买，不要为我省钱。"

黄理援看了看礼品单内容，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缓缓点头："好的。"

黄理援刚要走，又被黄震遐叫住："买了这些东西后，你再去一趟凯利特洋行，直接找斯特威总裁，就说我后天要搭乘他们洋行所租的海轮去天津，让他给我留一个两人舱房。"

"是！"黄理援望着黄震遐，"伯父您要去天津？"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4）

“对！我要出一趟远门了，你跟我一起去。”

当时，广州解放，因此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来往，还按照国民政府和香港当局的协议，互相之间的来来去去无须办理护照签证通行证之类，任何人只要有路费都能来来往往。一些内地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之类，就是利用这条便利通道逃往海外的。

如果这二位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主仆关系，他们之间的对话肯定就到此为止，那保密局毛人凤那里大概还不至于这么快就获悉了这条机密情报。但是，黄理援面对的不仅仅是他所效力的主人东家，还是他的堂伯父，因此，他还可以打听下去：“伯父去内地做生意？”

“不是，我的目的地也不是天津，而是去北平。我是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的。”黄震遐借着那份被酒精烧热了的炫耀，把中共中央邀请他去北平参加“七一集会”的消息对黄理援说了。

黄理援一听就乐了：“好！恭喜伯父啦！您准备在内地待多长时间？”

“我想借此机会会会老朋友，因此可能会在内地逗留一些日子。”黄震遐说着又关照黄理援，去凯利特洋行跟斯特威总裁订轮船舱房时，不要透露赴内地的真正目的，就说是去看朋友即可。因为送这个消息来的人特地叮嘱，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黄理援于是便驾车外出，心里暗忖如此一趟走下来，看来没有一个月是不行的，那得跟女友打个招呼。

黄理援这年已经29岁了，但一直没有结婚，曾经有过对象，是一位昆明女子，当护士的，但几年前他到香港来投奔堂伯父时，对方拒绝同行，于是两人就分手了。到了香港后，因为一直跟着黄震遐忙碌，没有空闲过，找对象的事儿也就耽搁下来了。直到两个多月前，才由朋友介绍了一个对象。两人接触下来，互相感觉都觉得不错，关系进展得很是顺利。这次黄理援要去内地一段时间，自然要跟对方打

一个招呼的。于是，他在到达凯利特洋行后，先借用那里的电话给女友彭淑璎打了一个电话，约定当晚8点在“俏玛丽咖啡馆”见面。

当晚，黄理援准时抵达“俏玛丽咖啡馆”，彭淑璎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彭淑璎比黄理援小6岁，是从菲律宾来香港打工的华侨，目前在一家英国人开的公司做杂工。黄理援已经跟堂伯父说好，如果进展顺利最后跟这个姑娘结婚的话，婚后让彭淑璎到黄震遐开的公司或者工厂做一份体面些的工作。

由于晚上黄震遐还要出门访客，所以黄理援跟彭淑璎会面的时间不能很长，他便先把约见的本意向对方说了：要陪伯父出趟远门，可能要去一个月左右，由行程而定，估计难能通信，所以需要跟你打个招呼。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5）

彭淑璎是一个肤色稍黑、稍有几分姿色的“黑里俏”姑娘，说话清亮悦耳、娇声嗲气，很能使黄理援怦然心动：“阿援，你非去不可吗？”

“是的。”

“伯父去干什么呢？非要你陪着不可。”

黄理援能够按照黄震遐的吩咐将赴北平出席中共“七一集会”之事不向斯特威总裁透露，但却没想到应该对眼前的这位女友也保密，所以口无遮拦地说了黄震遐要去北平参加一个会议，临末了儿道：“护卫、照料伯父，这不但是我的工作，更是我作为一个小辈对长辈的照料，所以我必须去的。”

彭淑璎又问：“这个会议很重要吗？伯父必须亲自前往出席？”

“这是中共方面发出的邀请……”黄理援为了在女友面前显示堂伯父的影响，特地强调了这个会议的高规格，并说届时中共领袖将会全部到场以及黄震遐已经让他购买了准备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礼品。

彭淑璎听了沉默不语，好一阵才很难过似地说：“那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了，一个月，好长啊！”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其他内容的话后，黄理援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告辞而离。彭淑璎在咖啡馆门口目送黄理援离开后，一个转身去了马路拐角处，正好一辆的士空驶而来，她一伸手拦下后，上车绝尘而去。

黄理援如果知晓他这个可爱的女友的真实身份和使命的话，多半儿会用他那双孔武有力的大手把这个“黑里俏”活活掐死！

原来，彭淑璎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一名特务，3个月前接受上峰指令以菲律宾华侨的假身份来香港执行暗杀黄震遐的特别使命。去年中共地下党将沈钧儒等人秘送内地解放区后，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毛人凤

对此事进行调查。保密局方面经过一番秘密调查后，大体上弄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样，曾经参与此事并起到了一定协助作用的黄震遐就被列入了保密局的暗杀名单。彭淑璎奉命潜来香港，执行“密裁”黄震遐的使命。根据毛人凤亲自审定的方案，她首先跟黄震遐的贴身保镖黄理援谈起了“恋爱”，待时机成熟后能够出入黄震遐公馆时，再伺机下手。

保密局的外勤特工分为行动和情报两个大类，通常若无上峰的特别指令，是没有哪个特工因为工作积极性高涨而主动揽上不属于其本行的那一摊活儿，搞行动的去窃听几条情报，搞情报的顺带搞一次暗杀来练练胆子什么的，因为那是特工精英才能完成的使命，那叫全能特工，整个保密局都没有几个。彭淑璎在保密局特工训练班接受的是行动术训练，没有学过如何收集情报，这次赴港上峰也没有向她下达遇到合适的情报应当报告的指令。但是，彭淑璎却偏偏要“孔雀站在鸡堆里——露一鼻子”，此刻无意间从黄理援那里获得中共将在北平举行“七一集会”的消息后，马上决定去秘密联络点，请那里向台北保密局总部代为转发这条用只有她才掌握的专用密码写成的特别情报。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二（6）

彭淑瓔当时只想着如何争功邀赏，没有料到此举恰恰导致她厄运临头。此为后话，回头再提。

毛人凤获悉这条情报后，当即前往蒋介石官邸紧急求见，提议派特工密赴北平执行行刺中共五大书记的特别使命。这也正是蒋介石当时最想做的，因此几乎是不假思索就点头赞同，当场写了一纸手谕交由保密局去执行。

毛人凤返回保密局本部机关后，立即召来相关特工专家，开始密议这一罪恶计划。却不料，打入保密局本部机关的中共内线人员已在第一时间察知了这个特大机密，迅即通过秘密专用渠道向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直接报告了。

李克农深知这条情报的分量，当即夤夜求见周恩来。周恩来送走李克农后，随即跟正在外地出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通了保密电话，通报了中央社会部所获得的这条重要情报，指示务必在“七一集会”前抓获前来执行行刺使命的台湾特务，确保出席“七一集会”的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粉碎国民党保密局的罪恶阴谋。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1）

罗瑞卿其时正陪同时任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刘少奇在河北视察，深夜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后，当即动用刘少奇专列上的专线保密电话，跟在北平代替他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的杨奇清副部长交换了意见。两位部领导商量下来，决定罗瑞卿继续陪同刘少奇视察，由杨奇清负责对侦查该案的一应事宜进行安排布置。

罗瑞卿对杨奇清说："关于'七一集会'安全保卫工作，我可是当着叶市长等同志的面，在周副主席面前立下了军令状的，不能出现半点差错啊！这个案子，你打算咋搞？"

杨奇清的思维非常敏捷，就在通电话的时间里，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侦查思路："我考虑下来，想双管齐下同时进行：一是立即组建专案组，大力侦缉身负暗杀使命的台湾特务；二是严密做好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方方面面的准备。"

杨奇清的这一思路获得了罗瑞卿的认同，罗瑞卿指示侦缉台湾特务的具体工作交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负责实施。

杨奇清挂断电话后，马上召来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的几位领导，介绍了案情，传达了罗瑞卿的指示。

政治保卫局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杨奇清电话中交代的两个方面的事情都交由长期从事政治保卫工作的该局侦查处长李国祥负责。

李国祥是一个对待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而又特别细心的人，他接受命令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了一辆小吉普，让司机载着他在香山至中南海、中南海至先农坛之间来来回回转了两个圈子。最后把车停在先农坛，他在那里把里里外外都看了个遍。后来他回忆说，这一个多钟头察看的结果，已经把先农坛牢牢地印在脑子里了，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做梦，必定有一段先农坛的场景内容。

李国祥返回公安部自己的办公室后，对着墙上挂着的北平市地图一边抽烟一边沉思。李处长对于如何完成上级交办的这一重要使命反

复作了考虑，最后决定把这项任务下达给北平市公安局完成。

这里有必要对北平市公安局的组建作一个简述：1948年1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组织河北省建屏县（现平山县）西黄泥村保卫干部训练班108人及中社部机关干部若干人一起向北平进军。17日到达河北省保定市。在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成立之际，同时宣布：即日起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央社会部明确规定，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执行接管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的任务，下设组织机构如下：一处（秘书处）、二处（侦讯处）、三处（公安处）、四处（行政处）和公安大队。1949年2月10日，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改称北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对外简称“北平市公安局”。下设组织机构除了将公安大队改为公安总队外，其余不变。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2）

李国祥抽过5支烟后，让秘书给北平市公安局办公室打了电话：请你局二处受命协助公安部执行代号“七一集会”安保任务的侦查一队、侦查四队的负责同志立刻来部参加紧急会议！

不一会儿，北平市公安局第二处第一侦查队队长曹纯之、副队长成润之，第四侦查队正副队长牛贵荣、何汉华4人迅速赶到了公安部。紧急会议就在李国祥的办公室举行，李国祥向以行事干脆说话利索出名，从来没有拖泥带水那一套，当下开门见山介绍了任务内容后目光炯炯扫视着4人，问道：“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那我现在以公安部名义正式向你们下达命令：侦查四队负责中南海及中华门至前门一带的安全；侦查一队负责前门至先农坛一路的安全！”

“是！”

“负责安全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积极侦缉台湾特务刺客，二是严密做好大会安全保卫工作。先农坛会场内的事情不由你们负责，会另外作安排的。根据有关方面转来的情报，台湾保密局毛人凤指定的特务刺客此刻估计已经抵达内地甚至已经到北平了，所以现在就应当开始高速运转，越早抓获刺客越好。你们都听着，到时候如果刺客在你们负责的地段掏出手枪，那不是你们的罪过；但是，如果刺客枪里的子弹射出枪膛，那我可要你们的脑袋！”

曹纯之这一干人都是从事保卫、侦查工作多年的行家，打从延安开始这些年来不知接受过多少次重要警卫使命了，但交代任务的上级哪次也没这次这样严厉。他们从李国祥的话语里一致感觉到了这项任务的重要、紧迫和难度，心上顿时沉甸甸地像是悬上了一个铅砣，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只是神情严峻地缓缓地点头。

李国祥说：“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提出来。”

侦查一队队长曹纯之想了想，提出了一个要求：“李处长，我队需要架设电话专用线。”

“可以。我马上跟邮电局联系。哦，你们的指挥所打算设在哪里？”

“前门楼上。”

“好！有气魄！……唔，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吗？……没有了？那就散会吧。时间紧迫，你们马上回去投入工作吧。记住了，不管有事没事，每隔两小时得给我这里打电话汇报工作情况。有紧急情况，随时报告！”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3）

侦查一队正副队长曹纯之、成润之回到北平市公安局后，先对在前门楼上架设电话专线作了安排，然后两人合骑一辆摩托车去分管地段作实地勘查。

两人实地跑了一个来回，越看现场越觉得肩头上的分量之重：从前门到先农坛这段路，路线长不说，而且人口稠密，环境复杂，马路大街两侧的大小胡同简直数不胜数，高楼大厦、各种店铺星云密布，几乎每隔三五米就有一个适宜于向领袖车队实施狙击的隐蔽点。这样，届时安排警戒时，侦查一队几十号人全部开出来也不够布置整个地段的几百分之一的一截。如果要将这个路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布满警戒，就是把整个北平市公安局的全部警力出动了，恐怕还难以实现，那就只好动用华北军区的部队了。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中央领导再三说过警卫工作对群众的影响要小而又小，绝对不能为了警卫而扰民。

曹、成两人互相对视着，用目光递送着问号：怎么办？稍停，成润之缓缓摇头道："老曹，这事憷头啊！这么个地段，这么个环境，这警戒怎么做啊？看来，我们得换个角度考虑了。"

曹纯之点头赞同："对啊，即使地面上真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把警戒从前门安排到先农坛，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危险因素：如果刺客躲在马路旁边的楼房里实施行刺呢，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见得往沿途每幢楼房的每个临街屋里都布置上人员吧？这种措施在军事上叫消极防御，是会吃败仗的。我们应当采取主动态势，集中优势力量主动出击，把工作重点放在侦缉台湾特务刺客上，在大会举行前把特务逮住，这样才能确保领袖的安全。"

成润之点头："言之有理！以这为指导思想，就有把握将刺客在'七一集会'前抓获。"

两人仔细商议下来，决定了以下3条具体实施的措施——

第一，鉴于毛人凤派出的特务刺客可能物色留在北平的以前曾是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作为执行刺杀的助手甚至直接执行者，故有必要让前门外至先农坛沿途公安分局的侦查科警力全体出动，严格控制那些在北平解放后已经向公安局登记了历史身份中的那部分国民党军警特人员中具有行刺能力的危险分子，对其中难以控制的重点对象则采取临时强制措施，拘留了再说，过了‘七一集会’再让其恢复自由。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三（4）

第二，责成前门外至先农坛沿途公安分局组织治安警察，下到街道跟居民委员会方面联手发动群众密切注意外来流动人员的动向，严格做好在管段范围内外来人员的临时户口登记，凡是发现来历不明、证件手续不全的可疑人员，一律即报分局侦查科；对临时户口人员中被认为是可疑分子者而又无法采取控制措施的也可以采取特别措施，或令其七月一日前必须离开北平，或在“七一集会”当天限制人身自由至集会结束。凡拟采取特别措施的，必须统一报请各公安分局，由分局长亲自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三，动员所有“特情”人员和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重点注意从外地赴平的特嫌分子或失踪后又露面的在逃特务。

曹纯之、成润之相信，上述3条措施全部落实后，将形成一个外松内紧的格局，既便于发现并逮捕台湾派来的特务刺客，又能有效地保卫大会的安全。于是，两人当即去向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汇报请示。

谭政文听过汇报后，当场拍板同意照此实施。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1）

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一队着手开始落实上述3条措施时，侦查四队也在进行着跟侦查一队差不多内容的工作。

当时，中国大陆的北方以及江南地区虽然已经获得了解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尚未成立，公安战线的机构还没有健全，警力较为单薄，侦查手段落后、单调，通常即使是侦查大案也是很大程度上利用“特情”关系提供情报。因此，侦查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可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队各科甚至各小组都有自己掌握的“特情”关系。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四队从公安部李国祥处长那里接受任务后，副队长何汉华立刻根据分工分别悄然约见本队掌握的那些“特情”关系，如此这般一一交代，让他们利用各自的特殊关系去查摸情况。

之后一连几天都有“特情”关系报来线索，但一一查下来都没有什么价值。直到6月23日清晨，何汉华刚上班时，就接到“特情”关系张跃辉的电话，说有情况需要当面报告。何汉华顿时一阵兴奋，约定半小时后跟对方在铁狮子胡同“金梦汉茶馆”见面。

张跃辉原是清华大学学生，1945年抗战胜利他读完大二时，经一个以教师身份混在清华园内的特务分子介绍，糊里糊涂地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成为一名秘密特务。不久，张跃辉就接受中统指令，数次跟踪清华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并在寒假借赴解放区探亲的机会刺探过军事情报。

本来，张跃辉在这条歧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陷于泥坑难以自拔，幸亏在其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八九个月后，开始跟一个他当时还不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干部身份的亲戚接触，渐渐接受了一些真理，年轻人可塑性强，终于翻然醒悟，决定弃邪归正。他跟那位有着中共地下党一定职位的亲戚吐露了自己的中统特务身份和最新想法后，受到了鼓励，于是就接受地下党指令秘密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提供给地下党后被认为其中部分情报具有一定价值。

北平解放后，张跃辉跟地下党建立的那份关系被转到了北平市公安局。公安局特情科让张跃辉继续保持着解放前的土木工程师的身份，悄然从事“特情”工作，专门跟那些在解放前曾紧跟国民党而解放后见势不妙偃旗息鼓的家伙接触，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定期向公安局提供信息。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2）

这次，何汉华考虑向“特情”关系布置留意查摸跟“七一集会”相关的信息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张跃辉。因为张跃辉在之前曾向其报告说，他在天坛碰到过一个抗战胜利后至北平解放这段时间曾在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科干过的特务分子施德中，问明张跃辉家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后便说近日要去拜访叙旧。何汉华当时就去查了北平解放后向公安局登记过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伪职人员”名单，内中没有施德中其人，那说明这家伙显然是改名换姓隐藏起来了，这样，就有理由怀疑他很有可能是国民党保密局布置的潜伏特务。因此，此次何汉华向“特情”关系布置时，特地向张跃辉关照多多留意那个施德中的情况。现在，张跃辉打电话来说有情况当面报告，那看来可能是跟施德中有关，甚至再想得乐观些那就是跟此次台湾派遣特务刺客之事有关的了。

半小时后，何汉华和张跃辉在“金梦汉茶馆”见面。两人都是一副生意人打扮，在外人看来这是两个在茶馆里谈点业务的贸易伙伴，凑在一起嘀咕着是很正常的，也就不会特别予以关注。

张跃辉向何汉华报告的情况如下——

昨天傍晚，张跃辉接到施德中的电话，约他当晚7点去崇文门“通源旅社”见面，说有点事情相商。张跃辉从何汉华那里接受指令后，正等着施德中的消息，当下自是一口答应。本来，他当晚是要跟妹妹新谈的恋爱对象见面，想帮妹妹参谋参谋的，但接到电话后马上就改变了主意，也不便透露原因，弄得妹妹不大高兴，马上发了一通脾气，但张跃辉也顾不得了。

7点整，张跃辉准时到达通源旅社，施德中一问张跃辉来得匆忙还没吃晚饭，便邀他去旅社对面的一家小酒馆喝酒。酒过三巡，施德中道明了约张跃辉的本意：他现在没有工作，打算做点小本生意谋生，算了算缺少本钱，想向张跃辉告借100万元（按：此系旧版人民币的币

值，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元）。张跃辉本人是土木工程师，收入不错，其父是北平小有名气的资本家，家境殷实，100万元自然不在话下，他要想拉牢施德中以获取情报，当然不能拒绝，当下就一口答应了。

两人又喝了几杯酒，正聊得起劲时，施德中忽然住了口，一跃而起，直奔门外，一边奔一边嘴里还叫着什么，像是人名的发音。张跃辉暗吃一惊，循着对方的身影定睛望去，这才看见人行道一侧站着一个男子。施德中走过去，又是抱拳作揖，又是双手相握，状极亲热。两人站在人行道上谈了三五分钟，作揖而别。

施德中返回饭馆，坐下后重新吃喝。张跃辉用漫不经心的口气问道："朋友？"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3）

施德中点头："唔。"

"那为什么不请进来一起喝酒？"

"我开口相请了，他说有事要去办，再说已经吃过晚饭了，就不打扰了。人家还问你是谁呢，我说是一位朋友，以前也是干特字号活儿的。"

张跃辉马上意识到那人是有来头的，正盘算着如何开口发问，施德中已经往下说了："这位朋友，当年可不是一般人物啊，人家是军统局的行动术教官，我那时在特训班时就是跟他学的。那时他就已经佩戴上校军衔了！"

"哦！那他怎么没被共产党给逮进去？"

"刚才他告诉我，年初他离开北平去了南方。近日刚到北平，有点买卖上的事儿需要料理一下。"

张跃辉觉得那人颇为可疑，于是便想作进一步了解，可是，施德中像是意识到需要替对方保密还是什么的，已经把话题转移开去了，之后虽然喝了不少酒，但再也没有重新扯到那个军统教官身上去。张跃辉的酒量没有施德中好，陪着对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最后已经迷迷糊糊了。还是施德中替他叫了辆三轮车把他送回去的。

张跃辉回去后只觉得头痛欲裂，什么都没想，往床上一倒就睡着了。今天早上醒来后，方才想起昨晚那一幕，意识到那个军统行动术教官的出现似乎不寻常，于是就赶紧跟何汉华打电话要求当面报告。

当下，何汉华听了张跃辉如此这般一番陈述，顿时大感兴趣，四下一扫眼风，轻声问道："那人多大年纪？怎么副模样？"

"估计40来岁吧，个头不算高，一米七差不多，肩膀很宽，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很有膂力的人。"

"穿着打扮？"

“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和玄色真丝裤子，裤子脚管很大，走路有些晃荡晃荡的。”

何汉华眨着眼睛略一沉思，又问：“你再想一想，他另外还有什么比较醒目的特征？”

“另外特征？”张跃辉接受过特务训练，不管是行动还是情报特工，盯梢乃是必修科目，所以凡是被他认为值得注意的对象，他都会看得很仔细，记得也牢，当下又补充了一点，“那人的头发乌黑浓密，湿漉漉的，估计是刚洗过头吧。”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4）

何汉华返回市局后，立刻向侦查四队正队长牛贵荣汇报了情况。两人随即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那个施德中在军统局的时间是从1945年抗战胜利后开始的，通常被选入军统当行动特工的对象报到后会立刻前往特训班接受行动术训练，这样，施德中跟那个教官结识那就应该是抗战胜利后在特训班的事儿了。那时的军统教官，几乎全是抗战初期在军统当时在湖南办的那几期特训班毕业的学员。那几期的学员后来都成为军统局的特务骨干，是抗战时期执行军统各种使命的主要成员，抗战胜利后这部分人中有的就被派往特训班担任教官。看来，张跃辉看到的那个跟施德中见面的家伙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这就特别需要对其引起注意了，因为台湾保密局方面这次派来执行行刺中共领袖特别使命的特务，肯定是身手不凡的主儿，像这个行动术教官显然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其次，据施德中对张跃辉说，那个昔日的教官在年初去了南方，近日才来北平，这可以理解为北平解放前夕他奉命去了台湾，这次是从台湾返回北平来执行使命的。据以上两点，牛贵荣、何汉华就认为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台湾派来的刺客。

这样，就要考虑如何抓获此人了。两人继续进行分析：从那人的穿着上来看，白衬衫和玄色真丝裤子并不是出门时应该穿的正装，倒像是晚饭后到外面附近散步时的随便穿着；另外，张跃辉还留意到此人的头发是湿漉漉的，这说明这人刚刚洗过头。为什么洗头？一个可能是刚刚理过发，另一个可能是没有理发，而是刚刚洗过澡。

于是，牛贵荣、何汉华就决定马上派侦查员前往崇文门“通源旅社”周围去查看是否有理发铺子和澡堂。

一会儿，派去的侦查员从崇文门那边打来电话报告说，“通源旅社”附近没有澡堂，有两家理发店铺，不过晚上都是不营业的。

牛贵荣稍一沉思：“除了‘通源’，还有其他旅馆吗？”

“在离‘通源’大约300米处有一家‘好世界饭店’。”

牛贵荣对何汉华说：“如此看来，那个军统教官下榻于‘好世界饭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那湿漉漉的头发，是在房间里洗了澡后形成的，洗过澡后感觉到有点闷热，就出来散步了。”

何汉华说：“对！我马上带人去查看。”

“不！我们侦查队的人这当儿不宜公开露面执行这种使命。你给崇文分局打个电话，让他们派治安科同志以查治安为名前往‘好世界饭店’查看。如果发现那样一个人，二话不说先拿下再说。一旦抓到人，不要讯问，立刻押送到市局来！”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5）

牛贵荣的判断是准确的，崇文分局派去的治安警察果然在“好世界饭店”3楼的一个客房里发现了那个军统教官，出其不意将其拿下了，随即押解北平市公安局。随同被捕者一起带往市局的，还有一个旅行皮箱，内有人民币1000万元（旧币）、手枪两支、子弹60发、小型高性能带杀伤力的烟雾炸弹两颗、烈性定时炸弹两枚、伪造的假证件、空白介绍信3份。

牛贵荣、何汉华亲自主持了对被捕者的讯问，对方供称自己名叫余公图，确实是军统特工，上校军衔，1946年4月至1948年9月曾担任过军统局和改组后的保密局特工训练班行动术教官。说到这里，余公图说自己烟瘾大，是否能给他支香烟抽抽。侦查员满足了他的要求。

余公图抽完一支烟后，对自己的真实身份、经历和使命作了供述——

余公图，36岁，湖南岳阳人，出身一个中医家庭，祖上数代都精通中医伤科治疗，开堂问诊，在当地口碑不错。那时候的中医伤科郎中，都是习练武术的。余公图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自幼就跟着长辈练几手拳脚和吐纳之术。他的父亲原本是准备让他子承父业也当一名伤科郎中的，但他对此行却并无多大兴趣，19岁那年应当地一所初中之邀当了体育老师。

体育老师当了几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国民政府号召全体青年踊跃参军，上前线打日本人。余公图自认为也是一名热血青年，便放弃教师职业，报名参军。当时由戴笠执掌的“蓝衣社”，即正式名称叫做“复兴社特务处”的那个特务机构正改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正招兵买马大肆扩张。戴笠往各地招兵站都派出了人员，规定凡是报名者中具备适合培养成特工的，一律优先让给军统局。这样，驻守在岳阳这边招兵站的军统人员一看到余公图的简

历，顿时大感兴趣：初中毕业，自幼习武，中学体育老师，且出身中医伤科世家，自然也懂得些治伤，这可是一个优秀人才啊！

于是，就这样，余公图这个优秀人才就被军统局招收进去了，随即就去了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学的是行动术，即暗杀、绑架、爆炸、纵火那一套暴力技能。余公图有武术基础，脑子也还好使，所以学得很好，多次受到包括沈醉在内的特务教官的表扬。从特训班毕业后，余公图被分配到了军统局行动处，曾经参加过1938年12月赴越南河内暗杀汪精卫的特别行动。

戴笠当时对特训班首期毕业的特务学员很是关注，特地让人设立了这些特务的专门档案和工作业绩记录，他每月再忙也必亲自查阅，有机会时还会随机找这些特务聊聊。一次，余公图从前线返回重庆军统局本部准备接受新的使命时，戴笠正好有空，就把他召到办公室去谈话，中间还同他一起吃了顿工作餐。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6）

可能这次谈话给戴笠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正好次日戴笠的好友胡宗南从驻地发来电报请戴笠代为物色适宜于为军队培训侦察人员的人才。戴笠于是想到了余公图，寻思这人学的是行动术，又是教师出身，手上既拿得出行动方面的活儿，嘴上又说得出应当如何如何学习，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才。尽管这样的人才对于军统局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但凭着戴笠跟胡宗南的那份亲密关系，这回也就只得忍痛割爱了。于是，就这样，余公图被戴笠调往胡宗南手下，当了直接由军部领导的“侦察兵教导大队”少校教官。

余公图在胡宗南部队一直待到抗日战争胜利，才戴着陆军中校军衔离开，返回军统局。他去见戴笠时，戴笠很高兴，说胡宗南几次提到余公图说是一个不错的教官。戴笠见余公图是中校，便说军统首期特训班毕业的学员，只要没有犯过错误的，差不多都已经是上校了，我也给你提一下，于是，余公图就晋升为上校了。

本来，余公图是会受到重用的，因为他已经在戴笠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不巧的是，没多久戴笠就因飞机失事而殒命。戴笠死后，余公图就被打发到军统北平站去了。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正好在组建特训班，于是就让余公图去当了教官。余公图在特训班里干到1948年9月，因特训班解散而离开了北平，前往南京保密局本部机关向局长毛人凤报到。毛人凤的副官接待了他，说毛局长的意思是让余公图先休息一段时间再作安排。这样到了1948年12月中旬才让人通知他带上家眷前往台北，交给他的使命是：协助进行保密局撤往台湾的工作，也就是打前站。

余公图到了台湾后，跟着毛人凤指派的一位军统少将做了两个多月的打前站工作，直到毛人凤到达台北后才奉命卸任。那时，奉命和擅自撤往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大大小小的官员多如牛毛，街头转一圈可以碰到不少熟脸孔。国民党各机构已经没有能力全部安排这些

人员了，所以一部分人别说继续当官了，就是当差打杂也没有机会。所以，余公图的卸任等于失业。余公图正打算找几个朋友一起做点小生意谋生时，忽一日保密局派人来找他了，让他马上去见毛局长。

余公图随即被来人的那辆轿车带往台北市内的一个宾馆里，在那里，来人向他出示了毛人凤的手谕：着余公图同志速来局本部！手谕看过后当场就焚毁了，来人从随车带来的皮箱里拿出西服、皮鞋请余公图换上，最后又让他戴上了一个黑色头套，将整个头部一直到脖颈全都蒙了个严严实实，只留一双眼睛。然后，他被重新带上那辆轿车，离开宾馆直接驶往保密局本部机关。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四（7）

余公图根据以往晋见戴笠时的经验，以为到达之后必得等候一段时间，心里已经做了这样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所乘坐的轿车在毛人凤的那幢两层办公楼内的院子里停下后，直接被领进了一楼的一个会客室。他刚坐下，被告知可以自己动手取下头套时，毛人凤已经快步走进来了。

毛人凤接见余公图的时间只有5分钟，主要是简单询问了余公图的近况，然后就说要派他前往大陆执行一桩特别使命——行刺中共领袖毛泽东以及以下重要人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这中共五大书记中只要有一人被暗杀，那就算是完成了此次使命，保密局将发赏金80两黄金；被刺对象负伤未殒命的，也发给50两黄金；开枪但没有击中目标的，则发10两黄金。完成使命返回台湾后，余公图将被晋升少将军衔，并出任相应的实职，以后永远不必再往大陆执行任务。万一出事，如若牺牲，余公图在台湾的家眷都会领到优厚的抚恤金并永久享受阵亡烈士家属的法定待遇；如若被捕，台湾方面将通过各种途径积极予以营救，家眷照样能领取优厚的补偿金，前提是余公图必须严守机密。

临末了儿，毛人凤问余公图是否愿意接受此项特别使命。余公图马上回答：愿意！

毛人凤说，值此危难时刻，余公图同志你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慷慨出阵，我代表党国和蒋总裁向你表示感谢！那就这样吧，具体相关事宜将由我委派的其他人向你交代。

余公图随即又换了另一套服装，重新戴上头套，换乘一辆中吉普离开了保密局本部机关。这回去了台北草山畔的一个日本式别墅，那里，有3名特工专家等候着他。他们和他一起待了几个小时，听他们介绍了北平目前的社会形势以及中共领袖的活动规律、警卫情况等等，然后是在地图上指点了此次中共领袖从香山到中南海再到会场先农坛

的路线，选定了几个经过反复研究后确定了的最佳位置，让余公图抵达北平后到现场去实地察看，决定究竟在何处下手行刺。至于到时候具体如何下手，那余公图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特工专家离开后，余公图在草山别墅休息了一夜，就被唤起送往机场，由一架军用飞机载往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广州。一下飞机立刻被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送上了停泊于珠江大桥附近的一条汽艇。汽艇载着他到了外海，转移到一艘预先等候在那里的挂着苏联国旗的海轮上。3天后，这条海轮抵达天津，余公图的行程就算结束了。他上岸后，从天津坐火车到了北平。从抵达北平到被捕时间，正好是24小时。

审讯结束后，牛贵荣立刻往公安部打电话，向李国祥汇报了讯问情况。李国祥之前已经接到捕获余公图的报告了，此刻听了牛贵荣的汇报后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为保卫这次重要会议立下了大功，我考虑一下，看如何向部领导报告。

几分钟后，李国祥打来电话，说让侦查四队马上把余公图的口供笔录送到他那里去，他要看一看。

李国祥这一看，竟然从中发现了问题！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1）

牛贵荣这边接到李国祥的电话后，当即派人把讯问余公图的笔录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公安部李国祥的办公室。

李国祥很仔细地看了这份笔录，给牛贵荣打了第二个电话，问那个被捕的保密局特务现在关押在何处，牛贵荣说现在还暂时羁押在市局这边，准备一会儿移押市看守所。李国祥说暂时不必移押，我这就过去，需要当面问他几个问题，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牛贵荣于是便知道部里对于余公图的口供产生了怀疑，便马上通知正准备出去的副队长何汉华，让他留下和自己一起陪同李国祥处长再次讯问余公图。

不一会儿，李国祥赶到了北平市公安局，他带来了一位助手，就和牛贵荣、何汉华4人一起提审余公图。牛、何两个不知道李国祥要向余公图提什么问题，当然不便插嘴，做好了从头到尾陪坐的准备。李国祥的助手受命担任记录，所以也不吭声，这样，这次讯问就由李国祥一个人唱独角戏了。

李国祥一开始就掏出香烟，每人发了一支，也给了余公图一支，说我先作个自我介绍，我姓李，中共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处长，余公图，听说你烟瘾很大，可以考虑适当给你提供一点儿方便，不过你得老老实实交代问题，这与最后如何处置你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你要想清楚了。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需要你老实回答——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大陆去台湾的？”

“哦！是去年12月19日。”

“怎么过去的？”

“我于去年12月15日下午3时忽然接到保密局的通知，让携上家眷立即离开南京前往广州。之前保密局已经派人跟我谈过话，说根据局里的安排，我已经被列入前往台湾工作的名单，需要携带家眷一起过去的，让我们全家立即做好准备。因此，这时我们已经做好了迁移的

准备工作，行李什么的都已经打好了。所以，保密局的电话打来以后，我就让他们派车过来。半小时后，来了一辆卡车，把我们全家4口送往南京明故宫机场，我们上了一架由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运输机，飞到了广州。由保密局广州站派来的一位副官把我们接送宪兵营房，在那里住了3天，到第四天就把我们送到珠江边上了一艘汽船，开到沙面那里，上了一艘军舰，就这样离开广州去了台湾基隆。”

“你还记得你们所乘的那条军舰的舰名吗？”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2）

“记得，是‘黄埔’号，那是一条驱逐舰。我们在码头上还以那条军舰为背景拍了一张全家照片，照片的背景中就有‘黄埔’舰名大字。”

“舰长是谁？”

“邓光亚。”

“哦，我们换一个话题：这次你是几月几号离开台北市的？”

“6月21日。”

“什么时候离开的？”

“上午10点半左右吧，具体时间我没留心。”

“当时台北市的天气情况怎样？”

“哦，天气很好的，太阳很旺，上飞机时已经感觉到头顶被晒得火辣辣的。”

李国祥吁了一口气：“我的问题问完了，余公图，你对于你的回答还有什么补充或者纠正的吗？”

“没有。”

李国祥摇摇头：“第一次提审你的时候，我们的侦查员已经向你交代过中共政策了吧？你不老实坦白，看来等着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了。也许你接受这桩使命时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可是你死了以后，你的家眷怎么办？别说他们根本没有像你所说的那样早已跟着你去了台湾，就是你本人，也并没有去台湾，家眷就是真的去了台湾，毛人凤也不可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那点经费，供日常活动还捉襟见肘呢，这一阵蒋介石不是正忙着向美国乞求获得经济援助吗？”

这一说，余公图顿时愣住了，一双眼睛定定地瞅着李国祥，连牛贵荣、何汉华的神色里也透着惊奇，寻思不知李处长这个结论从何而来的。

李国祥凭什么说余公图并没有去台湾呢？原来，他先前看过余公图的口供笔录后，对毛人凤能把行刺中共领袖这样一桩特别重大的使

命交给余公图这样一个特工感到不可思议。行刺中共领袖，乃是国民党方面此刻最为重大的决策了，如此重大的决策在具体执行时，肯定必须委派具有与之匹配的重量级特工才能胜任。而看余公图，虽然在军统局、保密局也算得上资历有点深了，可是，从行动特工这个行当来说，他却并非优秀人才，甚至连个普通人才也算不上。因为特工讲究的是实践经验，只有充分的实践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而从余公图供述的简历来看，他虽然毕业于军统局的首期特训班，但是之前只参加过一次行动，就是赴河内行刺汪精卫，但那次军统一共出动了20多名特工，余公图不过是其中的一名类似跟班的角色，根本没有进入目标住所，当然也更没有开枪了。除此之外，余公图的特工生涯始终是特工教学。也就是说，余公图多年来所做的，不过是教练员，而并非是运动员。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3）

对于毛人凤来说，对余公图这个属下的了解当然远比此刻李国祥了解得深得多，而连李国祥这样的对其了解得不算透彻的人都认为余公图不是一个合适的执行此项特别使命的人选，经验老到精明过人的毛人凤又怎么会轻易把这桩使命下达给这样一个人呢？因此，李国祥觉得这里面似乎有问题，这个被捕的余公图不大可能是保密局物色的真正执行使命的人选。于是李国祥就决定亲自对其审讯，要让他用自己的口供来戳穿这一假象。

李国祥设计了两个问题：赴台湾的军舰和离开台北时的气象情况，他让秘书从部里的资料室里调取了国民党海军和轮船公司的全部舰船在余公图自称的去年12月份赴台期间的航行情报和6月21日离开台北时间的气象资料，作为对于余公图供述内容是否准确的验证码。如果余公图确实是去了台湾以及在6月21日离开台湾的，那这两个问题肯定回答得准确无误的。

现在，余公图第一个问题就回答错了，他说去年12月19日从广州去台湾时乘坐的是“黄埔”号驱逐舰。可是，据当时的情报资料表明，“黄埔”号驱逐舰在1948年10月就进了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修理，直到1949年1月中旬才检修完毕验收合格后离开。第二个问题余公图也回答错了，他说6月21日上午10点半左右离开台北时天气很好，但气象资料表明台北那天上午阴云密布，中午还下了雨，直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出了太阳。

如此，李国祥就有理由认定余公图的口供大有问题，而大有问题的背后显然是隐藏着毛人凤的阴谋，那阴谋肯定是跟保密局的此次行刺行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李国祥就决定对余公图实施穷追猛打战术，迫使其如实交代真情。

审讯暂时停止，把余公图押出去后，李国祥向牛贵荣、何汉华说明了情况，3人迅速议定了继续审讯的方案。把余公图押进来后重新审

讯时，李国祥就不开口了，由牛贵荣、何汉华两人轮流实施紧密的攻心战术。余公图接受特务训练的年代是抗战初期，那时候军统特训班的教学计划中并无“反审讯”内容，所以他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心理素质，没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老老实实交代了真相。

诚如李国祥所料，余公图根本没有去过台湾，像他这种对于保密局已经没有潜在价值更无背景的角色，保密局是不可能将其列入撤往台湾人员的名单的。但是，余公图确实到了广州，不过那是他自己过去的。他的家眷没有过去，至今还在湖南老家乡下待着。余公图到广州后，想找找熟人好介绍一份稳妥点的差使。没想到其时保密局正在整顿“团体纪律”，以稳定人心，余公图一露面就被保密局广州站发现了，立即把他扣押起来，说他“擅离职守，扰乱军心”，这个罪名处罚起来可大可小，大的可以就地处决。但保密局还没有杀余公图之心，所以只是把他软禁起来。不久，保密局广州站换了个头目，新来的站长恰是当年特训班时余公图的同寝室同学，于是就自作主张把他放了出来，留在保密局广州站工作，没有具体职务，但拿着副站长的薪水。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五（4）

本来，这件事也许就不会被毛人凤知道了，因为余公图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那位老同学过于热心了，想把他对余公图的关照用正规程序认定下来，于是就向毛人凤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把事实上已经在副站长职位上干得很称职了的余公图正式任命为副站长。毛人凤收到这份报告后，未置可否，那是上个月的事了。哪知，到了6月19日，忽然从台湾飞来了两个保密局高官，直接找余公图谈话，让他前往北平执行内容为行刺中共领袖的特别使命。

余公图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一下子愣住了，但他知道当年军统局的规矩，接受任务时如表示拒绝，是没有什么“做思想工作”之类的说法的，直接让你消失就是了，后来的保密局在这方面做得那就更加绝了，因此，他只有点头接受任务的选择。

这样，当天余公图在接受那两位不速之客两个小时的如何执行使命的谈话之后，就被送上了珠江口上的一条海轮，次日驶往天津。抵达后有人通知他下船，给了他那口装着武器的旅行皮箱，他的噩梦般的行程就开始了。

余公图抵达北平后，根据那两个保密局高官预先给他的指令，下榻于崇文门那边的“好世界饭店”，由于事情突然，他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因此也没有去察看过现场什么的。

审讯结束后，李国祥说余公图肯定隐藏着问题，我们得分析一下，于是就叫来了侦查一队正副队长曹纯之和成润之，5人聚在一起对余公图案作了以下分析——

以余公图的特工实践经历和实战技能，他并不具备执行如此重大行动使命的能力和资格；

余公图从接受任务到出发只有短短数小时，这不符合保密局对于执行重大使命的特务所一贯的规矩；

指定其抵达北平后下榻于“好世界饭店”这一点，疑点最大。因为如果指定下榻地点的话，应当向余公图交代清楚规定住宿点的原因，通常是会得到安全或者情报方面的帮助。但是，余公图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说明，也没有给他可以主动联络的潜伏于北平的保密局“内线”关系，这就只有一个解释了：为了随时掌握余公图的藏身之地。为什么要随时掌握这个藏身之地？很有可能是在适当的时候让我公安部门获得这一消息，好将余公图拿下。此举显然是保密局的特工专家设下的一个圈套，好借此蒙蔽我公安部门：台湾刺客已经落网，对于该案的侦查可以结束了。

李国祥等人经过以上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余公图，不过是台湾保密局的一张挡箭牌，是为了掩护真正的刺客。

真正的刺客在哪里？那就需要侦查员去查访了。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1）

此后，侦查一队、四队全部出动，除了落实“七一集会”的普通保卫措施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查访台湾刺客上。但是，两天下来却毫无收获。主持该项工作的公安部李国祥处长着急了，当天晚上9时许正给侦查一队队长曹纯之打电话说要去一队的指挥所——前门楼上看看时，副队长成润之接到了一个电话，从而获得了一条线索。

这条线索，还要从应邀前来北平出席“七一集会”的香港富商黄震遐说起。黄震遐于前天傍晚抵达北平后，大会秘书处接待组根据预先的安排，请他下榻于专供这次会议代表居住的前门饭店，他的堂侄子黄理援陪同入住。

黄理援离开香港也有数日了，一直思念着他那女友彭淑璎，他抵达天津作短暂停留时，曾匆匆给彭淑璎写过一封信。现在到了北平，就又想写信了。但他还没动笔时，却突然接到了彭淑璎的电话。黄理援一阵惊喜，以为彭淑璎是从香港打来的国际长途电话，那当儿通信设备落后，在北平能够接到一个来自香港的电话那可是一桩事儿了。出乎意料的更大惊喜紧接着就出现了，彭淑璎说她在北平！

这样，黄理援就坐不住了，马上邀请彭淑璎到前门饭店来坐坐。放下电话，黄理援马上去正在对面房间跟老友聚谈的黄震遐说，他的女友小彭正好也来北平了，他请她过来坐坐，请伯伯签一纸会客单子。根据大会秘书处规定，为保护入住客人的人身安全，如有访客，必须经被访者本人亲笔签署的会客单方可准许进入饭店。因此，黄理援得向伯父拿一张会客单。

不一会儿，彭淑璎来到了前门饭店，黄理援把她领到了饭店内的茶座，首先当然要问她怎么来北平了。彭淑璎说她因为思念黄理援，正好她帮佣的那户人家要派人前往北平亲戚家送一些东西，听她说男友黄理援也去了北平，就说那就派你去吧，这样她就过来了。到达北平后，下榻于东四区的一家旅馆，然后去送东西，顺便打听参加“七一

集会”的客人住在哪个饭店，她想去看看男友。那户人家是北平的名门望族，知道的事情很多，告诉她说北平高级饭店有什么什么几家，你说的从香港来的客人，那多半是被安排在前门饭店下榻了。于是她就往这边打电话了。

两人说了一会儿，彭淑璎提出要去拜见一下黄震遐，说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否则在香港的话她几时才能登门拜见？而在香港社会的其他场合，以她那佣人身份那肯定是不适合见面的，而且对于老人也是一种不尊重。黄理援觉得彭淑璎说得似有道理，于是就往房间打电话说了彭淑璎的这个心愿。黄震遐当然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反而很开心的，说这真是一个缘份了，那就带她上来吧。这样，彭淑璎就跟着黄理援上了黄震遐居住的那个房间，待了十几分钟就离开了，黄震遐对她的印象倒还不错。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2）

这是下午的事，到了晚上，彭淑璎又过来了，是因为发现黄震遐老先生的那副老花镜不慎打碎了，是用胶布粘住了勉强使用的，就按照度数去配了一副，特地送过来。这天晚上东道主没有什么活动安排，但黄震遐临时接受几位昔日老友之约，出去观赏北平夜景了，他的堂侄黄理援作为贴身保镖，自然一起出去了。这样，彭淑璎就扑了个空。她向饭店服务人员提出是否可以在饭店里等候黄老先生回来。这个要求倘在平时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此刻接待的是重要客人，服务员就不敢作主，悄悄问了北平市公安局安排在饭店的特卫组。特卫组的意思是请来访者留下送来的老花镜，写一纸条子，人就可以离开饭店了。

特卫组是由以北平市公安局公安总队的便衣警察为主组成的，这些人都是机警过人的角色。彭淑璎白天来访时，就已经纳入了他们的视线，此刻又来了一趟，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服务员把彭淑璎打发走后，两名特卫人员就把服务台领班叫去了解情况了。可能他们觉得有点异样，就决定向黄震遐的随侍黄理援了解一下彭淑璎的情况。

这样，当黄理援陪侍黄震遐游览过北平夜景返回前门饭店的时候，就接到总服务台的电话，说有人找他，请他去楼下大堂一趟。黄理援下去后才知道是便衣警察向他了解彭淑璎的情况，于是就说彭淑璎是他的女友，这次是怎么怎么到北平来的。便衣警察一听，就觉得这事儿似乎过于巧合了，怎么你黄理援前脚来北平，她一个替人帮佣的女子后脚也遇到了一个来北平的机会？于是，人家就要多问一句了：你俩是什么时候认识？是怎么认识的？黄理援回答后，便衣警察也没有再问下去，只是叮嘱他此事不要对彭淑璎说起。然后，那两位便衣警察就向特卫组长汇报了此事。特卫组长于是马上向设在前门楼上的市局侦查一队指挥所打电话报告此事。

当下，成润之接到电话后，跟正在接听李国祥电话的曹纯之一说，曹纯之就请李国祥暂缓过来，待这边先把这事处理后再说。曹纯之、成润之便对冷不防出现彭淑璎一事进行了分析，觉得似乎有疑点存在，那就需要马上查清楚了。因为前门饭店此刻不是一个什么人都能随便进进出出可以逗留的地方，那里云集着全国各地陆续来平准备出席“七一集会”的党政军负责人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社会名流，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另外，中央领导说不定会突然去饭店看望这些人士，所以，其安全保卫责任其实是跟7月1日那天的先农坛会场的分量是一样重的。这种场合，当然不容一个被认为是疑点的海外女子随意出入的。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3）

于是，成润之就带着侦查员小刘前往前门饭店，跟大会秘书处会务组联系让他们和黄震遐老先生说明一下要进行一次单独谈话。

黄震遐对于便衣警察找上门来有点奇怪，初时以为是对他本人的调查，就误以为是对他的不信任，马上就摆出了他当年东北军师长的那副派头，说你们要找我谈话？行啊！不过你们二位不过是小警察，跟我谈话可能还不够那个资格，叫你们局长来吧。成润之就耐心向他说明了情况，强调这是为了与会人员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消除对可能会来饭店看望大家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危险隐患。这一说，黄震遐才表示理解，于是就说到了那个彭淑璎。

成润之一听彭淑璎是两个多月前才跟黄理援相识并谈恋爱的，又是来自香港以外的菲律宾，疑心顿时大增。再问彭淑璎是怎么知道黄老先生您到北平来参加“七一集会”活动的，黄震遐说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你们可以找我那侄儿了解，我把他唤来。

黄理援来后，黄震遐让他把跟彭淑璎交往的情况以及这次怎么知道他们叔侄两人来北平参加“七一集会”活动的情况如实向成润之二位侦查员说一下。黄理援便一五一十把情况说了一遍，成润之还没听完就已经意识到那个彭淑璎十有八九是台湾方面的特务了。

成润之返回前门楼上的指挥所后，立刻把情况向曹纯之汇报了。曹纯之稍一考虑，便下令道：“马上采取措施，对那个彭淑璎实施秘密监视，先弄清她在北平的行踪活动情况，此事由你全权负责。”

成润之于是马上通过电信局查清了彭淑璎给黄理援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的主叫位置，那是西城那边的一家中等档次的旅馆，名唤“三鑫旅社”。于是，这家旅社连夜便被侦查员监控了。

侦查员通过派出所警察对旅社进行的例行检查，查明了彭淑璎下榻该旅社时的登记情况，她使用的是本名，但隐瞒了香港这一事实，使用的是江西省九江市一家私营食品工厂的介绍信，赴平事由是“采购

原料”。成润之闻之暗忖，光凭这一点，就是不打自招，够拘留的格了。

次日上午9时，彭淑璎离开旅社，叫了辆三轮车往建国门方向而去。化装成路人的侦查员骑着自行车、载货三轮车和摩托车轮番跟踪尾随。只见彭淑璎进了建国门外大街一条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

侦查员一边监视着，一边通过派出所查明了该四合院主人的情况：户主姓王，曾在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任过中级职务，可能还有着保密局特务的身份，北平解放前夕失踪，估计多半是去了南边国统区或者台湾；留下老婆子女住在这座四合院里，其妻满韵琴没有工作，22岁的大女儿是银行职员，以下3个子女还在读书，家里有一个长期雇佣的老妈子。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4）

大约过了一小时，彭淑璎离开了王家，返回旅社后，给黄理援那边打了电话，但黄理援这天上午陪同黄震遐出门访友去了，未能联系上。中午12点20分，彭淑璎再次从旅社往前门饭店打了电话，这回跟黄理援通上了话，两人约定下午两点彭淑璎去饭店跟黄理援见面。

这段时间，侦查一队已经对王家采取了行动。首先是通过派出所经由居委会出面把王家的女主人满韵琴悄然叫至居委会，由侦查员跟其谈话，了解不速之客彭淑璎的情况。

据满韵琴说，她并不认识这个名叫彭淑璎的姑娘，是她自己主动登门的，说她来自广州，带来了满韵琴的丈夫老王的一封信件。王函中说他年前去了广州跟人合伙经商，现在香港和广州之间来回倒腾紧俏货品，收益还不错。很是想念家人，只是由于以前的历史情况担心遭到共产党的清算所以不敢贸然回来探亲，现有老友之女彭淑璎小姐前来北平办事，托其捎上3件黄金首饰。希望妻子热情接待彭小姐。临末了儿是让满韵琴将该函阅后即毁。

彭淑璎随信一并交给了满韵琴3件金首饰，另有一些糕点糖果、衣料皮鞋之类的礼品是她送给王家子女的。

侦查员向满韵琴提问曰：彭淑璎是否有什么东西寄存在你家？她是否向你打听过关于北平最近会举行什么大会以及与会代表下榻何处等内容？

满韵琴说，彭淑璎有一个不大的皮箱寄放于她家，是上了锁的，不知里面放了什么东西。至于开什么会议以及代表下榻何处之类的内容她没有打听过。

于是，侦查员就断定彭淑璎对黄理援所说的满韵琴提供了黄震遐下榻于前门饭店的说法是伪造的，她看来是事先知道黄震遐会下榻于前门饭店了。

然后侦查员就到了王家，把彭淑璎寄存的那个皮箱拿走了。送到前门楼上指挥所后，曹纯之亲自检查了箱子外表，从各个角度拍摄了几张照片，然后让一名精通开锁技术的侦查员把箱子完好无损地打开了。一看，里面有勃朗宁手枪一支、子弹30发、钢笔手枪一支、烈性炸弹两枚、定时炸弹两枚以及粉状毒药一瓶。

这样，侦查一队当即决定立刻将彭淑璎逮捕。彭淑璎已经被侦查员监控了，那当儿副队长成润之已经驾着一辆中吉普在前门饭店门前的马路上坐等指挥所的消息了，当下接到曹纯之通过饭店内执勤的特卫组成员转达了指令后，当即下令将刚进饭店才几分钟的彭淑璎逮捕了。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5）

审讯随即进行，彭淑瓔的态度很配合，爽快地供认了以下情况：她是菲律宾华侨，1948年元月因生活贫困前往香港打工，不久被国民党保密局秘密招收为特务，送往台湾接受了9个月的特工训练，然后返回香港继续以帮佣为掩护隐蔽待命。今年3月间，她接受保密局的指令，安排其与黄震遐的堂侄子黄理援“谈恋爱”，最终使命是伺机暗杀黄震遐。不久前，她在跟黄理援的接触中意外得知黄震遐将赴北平参加将有中共中央领袖出席的“七一集会”，于是便向上峰密报。

两天后，彭淑瓔就接到上峰指令，派她化装前往北平，执行行刺中共领袖的特别使命。上峰给她的指令内容是：携带暗杀装备抵达北平后，先将装备寄放于满韵琴处，如能下榻前门饭店则最好，如不能下榻前门饭店，则可自选一家旅社住宿，但必须立刻跟黄理援取得联系，并应当跟黄震遐接触并取得信任，然后探听是否有中共领袖赴前门饭店探望与会代表的消息，如有则可伺机以投毒、定时爆炸、投掷炸弹和开枪射击的方式袭击目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消息，那就耐心等候，有人于“七一集会”举行前来跟其联络，届时对上暗号后只稍将行动装备交给对方，她的使命就算完成了，装备几时脱手，几时就可离开北平动身返回香港。

曹纯之、成润之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资格政治保卫工作行家了，加上又有余公图案之例，听了彭淑瓔的这番供述，稍稍分析就觉得这件事不大靠谱：如此重大的特别使命，保密局会放心交给一个只有20岁出头、仅仅接受过几个月的训练而且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小女子去执行？这看来又是保密局耍的一个花招，其用意是跟余公图案一致的，为的是转移侦查视线，掩护真正的刺客顺利下手。

曹纯之说这不过是我们的猜测，作为定论，还得有实据，我们得试那个女特务一下，于是就跟成润之商量了一个办法。

彭淑璎再次被带进了审讯室，曹纯之指着放在桌上的已经经过爆破专家处理过的但外表根本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定时炸弹：“彭淑璎，刚才听你供述说，如果你们的行刺目标出现在前门饭店的话，你就应当伺机用手枪、毒药、炸弹等方式实施暗杀，现在想让你试一试，假定目标在35分钟后进入行动现场，你应该把爆炸时间设在什么时间位置上？你动手设置一下。”

彭淑璎没有想到二审内容是这个，一下子愣住了，呆呆地望着曹纯之，许久没有反应。

成润之把那瓶毒药放在她面前：“劳驾你再说说，这毒药是怎么个性能，应该怎样使用？如果是投进开水里的，那么一杯开水里投入量多少才能确保无色无味不被发现？”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六（6）

彭淑璎不吭声，低下了脑袋。于是攻心战术就开始实施了，一番政策交代之后，她终于作了交代：之前所交代的都是事实，上峰向她下达指令时就是这么交代的。但是上峰特地强调过，万一你失风被捕，应当在第一时间把上述情况向审讯人员如实交代，以保住性命，我们会设法营救你出来的。至于其他内容，你就不必交代了，切记！切记！

所谓“其他内容”，那就是彭淑璎在接受上峰上述指令时，曾对自己没有学过如何使用这种型号的定时炸弹以及不知道如何准确控制毒药投放量提出过异议，说需要请教官教一下。上峰听了摇头说了两个字：不必！

这样，彭淑璎就知道了上峰的意图：她并非这次行刺的主力，她下不下手是无所谓的。

如此，侦查员也就证实了彭淑璎案其实跟之前的余公图案如出一辙，也是玩的障眼法，真正的刺客还没露脸呢！

侦查一队把彭淑璎案情况向李国祥处长汇报后，李国祥当即下令侦查一队、四队曹、成、牛、何4位领导集中后开一个案情分析会议，讨论如何侦缉真正的刺客。

此时，离“七一集会”举行还有3天时间。72小时里，能把刺客查清楚并缉拿归案吗?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七（1）

李国祥和侦查一队、四队4位队长分析案情时，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打来电话，询问侦缉台湾特务刺客的最新进展情况。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已经回到北平，就该案下达过指示。杨副部长此刻来电不但重新强调了罗瑞卿的指示，还提到周恩来副主席也打电话给罗部长关注此事。

这样一来，可想而知，李国祥等人肩头上的分量就更加感到沉重了。5人分析了情况，认为从军统局、保密局实施此类重大暗杀行动的惯例来看，肯定要派出精兵强将王牌特工承担具体执行任务。因此，此次毛人凤派出的特务刺客一定是行动特工中一等一的好手。这个好手在这样紧迫的时间里要想实施行刺，除了本身的行动术素质之外，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应当熟悉北平的种种情况；二是在北平应该有熟人朋友，以作为落脚或者随时获取帮助的依托；三是刺客不会入住北平大大小小任何一家宾馆饭店旅社，而是暂住于某个朋友处。具备这些综合条件的人，那只有以前北平的武术界人士了，所以，这个刺客很有可能是以前在北平武林中有相当名气的一个人物。

5人讨论到这里的时候，杨奇清忽然来了，送来了一条罗瑞卿刚刚从李克农那里获得的来自台湾的绝密情报：据可靠消息，毛人凤派往北平执行行刺使命的刺客名叫崔铎。

曹纯之马上想起他手头收集的那些北平江湖社会人物的资料中有这个名字，便说这人我知道，是一个平津地面有名的轻功高手，他的师父叫段云鹏，段云鹏的师父就是北方著名的江湖大盗“燕子李三”。段云鹏也是保密局特务，看来崔铎是跟着他师父加入了保密局特务组织的。

李国祥说那看来我们刚才的分析还是对头的，这就有了侦查方向，就从武林人士这条线上进行调查吧，不过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

多了，必须得抓紧，你们两个队马上分头派人行动，连夜查摸，尽快获取线索。

侦查员于是便连夜访问北平武术界人士，一说崔铎，几乎人人尽知，都说此人功夫了得：飞檐走壁，高来高去；徒手格斗，以一敌十；双手使枪，百发百中。崔铎武艺高强，凶狠毒辣，故江湖上人称“赛金豹”。有知情者进一步提供线索：崔铎大约在1947年秋经其师父段云鹏介绍，参加了保密局特务组织，曾跟着段云鹏执行过破坏中共地下党秘密电台、暗杀进步人士等行动。后来就调到保密局本部行动处，对那里的行动特工进行日常格斗训练和考核，所以一些小特务都称其为“教官”，北平解放前夕，此人忽然不知去向，听说是和段云鹏一起逃往台湾了。

在上述查访的基础上，次日上午两个侦查队就分别指派平时跟北平武术界有交往的几名侦查员拜访了各个武术门派的掌门人，谈下来，他们都表示愿意协助政府查摸崔铎的线索。武林人士一诺千金，他们随即都向各自的门徒、师弟兄、武友打了招呼。

3.前门大街的枪声 七（2）

侦查员上述布置可说是很周密细致了，凡是崔铎稍有可能沾边的方面他们都已经顾及到了，可是崔铎却如沉在汪洋大海中的一块小石头，明明知道他就在海底下，可就是不知道在哪个位置，既看不见，也摸不着。24小时转眼就过去了，侦查员们个个心急如焚。

6月29日中午，侦查一队副队长成润之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一报姓名，他便知道十有八九有戏了，一问，马上说我们派车过去接您老过来当面说。

半小时后，一个老头被接到了侦查一队在前门楼上的指挥所。真正有价值的线索，随着这个老头的到来，终于闪现在侦查员面前了！

这个老头，姓蓝，名沙麟，68岁，天津人氏。蓝沙麟出身于武术世家，自幼习武，少年时曾拜一位在清宫当过大内侍卫的武术名家为师，内外兼修，20岁已经练就一身惊人功夫，名震津门。40岁那年，蓝沙麟来到北平开设武馆，广收门徒，成为北平武林中的头面人物之一。

蓝沙麟教过的数以百计的徒弟中，有的后来参加了中共抗日武装。北平解放后，这几位已是中共党员的徒弟前来拜访蓝沙麟，自要讲述一番革命道理，而蓝沙麟原本就是正派之人，了解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后，自是热情拥护。这次，侦查一队的侦查员连夜登门拜访，他一听情况，马上说那段云鹏、崔铎师徒一向张狂，我早就看不惯，以前曾当面以武林前辈身份训斥过他们。此番崔铎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使命，甘与人民为敌，那我老头儿自当协助政府访查此败类线索，一有消息，马上禀报。侦查员对蓝沙麟寄予着很大希望，当下就把前门楼上侦查一队指挥所的电话留给了他。

蓝沙麟接受侦查员的委托后，不等天明就让人召来位于北平四方八面的7位弟子，让他们分头向其他徒弟传达他的话：崔铎近日已从台

湾潜来北平意欲搞破坏，政府正在缉拿，务必密切注意其踪迹，一旦发现，不拘日夜，火速禀报。

蓝沙麟有个徒弟名叫汪久龄的，29岁，在电灯厂（旧时对电力公司的俗称）做技工，还没结婚。他在旧社会沾染了一个恶习，喜欢逛窑子。其时北平解放不久，共产党、人民政府对嫖娼、吸毒等丑恶行为虽然反对，但还来不及腾出力量予以取缔，妓院便以半公开的形式继续存在着。汪久龄昨晚去西城一家妓院会相好，在那里住了一宿。今天早上，他因为惦记着要去厂里接班。便早早离开。出得门来，看见晨曦中有个人的背影很像他以往经常一起喝酒所以混得很熟的了崔铎，便叫了一声。那人一回头，果真是崔铎。汪久龄心里窃喜，却不敢露出半点，热情地邀请崔铎去馆子吃早点，崔铎客气地拒绝了。两人就站在妓院门外说了几句话后分手各奔东西。汪久龄担心上班迟到，所以还是先到电灯厂去上了班，直到1点钟才瞅了个空溜出来向师父报告了。蓝沙麟便火速跟侦查员联系了。

当下，曹纯之闻之大喜，问道：“您老是否知道崔铎那小子以前是否喜欢逛窑子？”

蓝沙麟说据他知道，段云鹏、崔铎师徒两个都有嫖娼嗜好，曹纯之于是断定崔铎昨晚就宿在汪久龄过夜的那家妓院。送走蓝沙麟后，曹纯之跟成润之一商量，就决定今晚去那家妓院门前设伏，来一个守株待兔，生擒活捉那小子。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1）

当天晚上，侦查一队出动了12名身强力壮、擅长格斗的侦查员，一律化装成平民百姓，由副队长成润之带领着悄然进入了西城那家妓院对面的一居民房设伏。但是，他们一直守候到6月30日清晨5点，崔铎也没有出现。

同样一夜不眠的曹纯之队长派人给成润之送信，说崔铎不会来了，让侦查员撤回去休息。

成润之回到指挥所，精神高度紧张使他毫无倦意，说：“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时间紧迫，我们必须查清崔铎的下落！”

曹纯之也是两眼通红：“ 让我们看看有什么行之有效的法子。”

成润之说：“ 去那家妓院调查，估计妓女不会不知道吧。”

曹纯之沉思了片刻：“这个法子可以用，但由谁出面倒要好好计议。”

“选一个合适的侦查员去？”

“不行！”曹纯之断然否定，然后说了理由，“ 崔铎去的那家妓院，无论从环境、设施、名气等等哪一个方面来说，在全北平都只能算是中等偏下的档次。以崔铎那小子的经济状况，他完全可以上北平最高级的妓院去消遣，但他偏偏却要舍好求次，这是为什么？这说明崔铎在那家妓院有老相好。这种老相好对于崔铎的底细，不说一定全部了解，但决不会一无所知。她可能不清楚这次崔铎是身负台湾保密局重大使命而来北平的大特务，但是肯定清楚崔铎在北平解放前的保密局特务身份，而且知道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在北平了。即使妓女整日缩在窑子里不出门吧，对于解放后日新月异的形势也不会一点儿也不知晓，加上她们那丰富的江湖经验，肯定能够猜到崔铎此刻不是正派人物。如果我们直接登门亮明警察身份去调查，对方肯定不肯透露真情，来一个一问三不知对付我们，你又能拿她怎么样？这还是好的，或许她们还会通风报信哩！所以，我们不能做打草惊蛇的事儿。

要做，就得做得稳妥到犹如瓮中捉鳖，让毛人凤看看我们共产党公安部门的能耐！”

两人反复商量下来，最后决定请蓝沙麟那个徒弟汪久龄帮忙，前往妓院了解崔铎的下落。鉴于时间实在太紧迫了，曹、成深感责任重大，所以当即给李国祥处长打电话，说了这个主意，李国祥考虑后说看来也只有这样了。除了这一着，还应当采取两步：一是立刻监听那家妓院的电话，看是否有对汪久龄的打听感到怀疑而向崔铎通风报信的，如果有的话，立马追查那个电话号码，顺藤摸瓜找到崔铎的落脚点；二是悄悄派些便衣化装守候在那家妓院附近，凡是发现该妓院有人外出的，不管是男是女，朝东朝西，统统跟踪。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2）

曹纯之于是亲自出马，当即驾车去见蓝沙麟。一说事由，蓝沙麟马上说没有问题，于是便亲自给电灯厂那里打电话找到刚刚返回不久的汪久龄，如此这般一说，汪久龄便立马照办。

汪久龄不负使命，两小时后，他从外面给指挥所打来电话，说已经从妓院那里打听到崔铎的下落，据说目前落脚于前门外大街69号乙院内。

曹纯之大为惊奇："哦！如此说来，这小子就躲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来到指挥所窗前，居高临下打量着下面的大街，尽管不知道69号具体是哪一座院子，但可以肯定就在目力所及之处。

侦查员当即前往前门派出所进行秘查，发现派出所的临时户口登记本上有如下记载：前门外大街户主胥基鑫于6月17日来报，其妹夫许厚福系保定市人力车修理社技工，36岁，前来北平考察市场并采购零件，要求借宿于该户主处获准。申报人许厚福由户主胥基鑫陪同，持保定市公安局西大街派出所证明前来申报，准予。预计在北平逗留时间大约15天。（事后查明，6月17日崔铎还未抵达北平，是户主、潜伏特务许厚福按照保密局的密令携一不知情的朋友冒充崔铎前往申报临时户口的，以混淆侦查视线。）

调查随即转向居委会，侦查员获知69号乙院的户主许厚福一家并不在此居住，那个小院平时是空着的，大约4天前才住进了一个身高约1.67米左右的壮实男子，30岁出头样子，国字脸，两道有点往下耷拉的浓眉，下巴颏左侧有一道一厘米左右的疤痕，一双眼睛看上去显得很有精神，他白天基本上不出门，傍晚才出来，也不知他去哪里。

侦查员大喜：这副模样，正是崔铎！

曹纯之接到报告后，当即下令：派足够的人手前往该窝点秘密监视，其余侦查员待命，检查武器，随时准备出动！

然后，曹纯之就化装成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亲自前往现场观察地形。20世纪40年代末的前门外大街，真是一幅典型的北方民俗风情画轴：各种商号、店铺鳞次栉比，街上人来车往络绎不绝，一片喧嚣；街道两侧，见缝插针地占据着变戏法、说书、卖膏药、拉洋片、卖小吃等等的小摊。曹纯之考虑到崔铎那不凡的身手，担心抓捕时发生枪战误伤了平民，于是决定把行动时间定在下午6点，那时天将黑未黑，街上行人大大减少，便于堵住两头实施暂时封锁，以确保行动顺利实施。

回到指挥所后，曹纯之叫来侦查队负责前卫行动的外线侦查组长王义庆，下令道："你们小组准备一下，6点钟前包围69号乙院，6点整行动，注意，一定要抓活的！"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3）

王义庆是个23岁的瘦高个，他听说让自己这个小组去执行逮捕崔铎的任务，心里就犯了嘀咕，面有难色，讷讷道："队长，这个任务我们恐怕完成不了……"

曹纯之大觉意外："为什么？"

"听说这个姓崔的非常厉害……"

曹纯之一听话头就明白了：这小伙子是被关于崔铎的那番传奇般的传说给震着了。他没有责怪王义庆，因为外线组的侦查员都很年轻，缺乏实战经验，倒不是怕自己负伤牺牲，而是担心让目标逃跑了发生重大后果，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于是，曹纯之就说："不要怕！我将和你们一起去现场，让你们乘这个难得的机会实践一下火力控制加政治攻势的捕人方法。呵！我就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公安人员对付不了国民党特务崔铎！"

然后，曹纯之就让王义庆把外线小组的全体侦查员都召集拢来，他亲自介绍了现场地形以及行动方案。

5点30分，执行逮捕行动的侦查员离开了指挥所。走到外面，曹纯之让一个名叫杨学成的侦查员带上两块石头，并向他耳语了几句。王义庆等人看着觉得莫明其妙，不知他们的队长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外线小组的20名侦查员悄然抵达现场，69号乙院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有着古色古香的门楼，两扇已经斑驳陆离的朱漆大门紧闭着。侦查员没有敲门，而是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墙头，朝里面一望，此时暮色初上，东、西两房窗户里一片黑暗，北房的窗户里露着灯光，窗子还透着一条缝，这说明崔铎住在北房。

曹纯之发出了暗号，侦查员便上了北房、西房，迅速找好了各自位置的火力控制点。曹纯之自己和侦查员小金攀上了门楼。

北房里，崔铎正靠着躺椅闭目养神，听见外面隐隐似有声响，一跃而起，侧耳谛听，却又没声音了。正犹疑间，门口传来"哗啦啦"一

阵声响。这是门楼上的曹纯之故意往下扔了一张瓦片。曹纯之想把崔铎引到院子里，好出其不意将其控制住。但崔铎却没有上当，他并未出门，而是用一根竹竿轻轻掀开窗帘一角，从预先设置好角度的一面镜子里观察院子里的动静。

曹纯之暗忖这家伙好狡猾，听见动静也不出来察看。于是，他干脆就走第二步了，抄起铁皮喇叭筒大声喊道："崔铎，你听着：我是北平市公安局二处侦查队长，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来抓你的。我知道你的枪法很准，百发百中，但告诉你，我也是弹不虚发的神枪手！因此，希望你丢掉任何幻想，因为你不但面对着我这样一个神枪手，而且还被几十名精干侦查员包围住了。崔铎啊，你走不了啦！如果你敢开枪，我们会把你当场击毙！"

3.前门大街的枪声 八（4）

崔铎缩在屋里，一声也不吭。

曹纯之又喊道：“崔铎，你要是主动投降，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共产党的政策对谁都一样，一视同仁！你要投降，就把枪给我扔出来！”

窗帘一动，两支崭新的手枪扔了出来。曹纯之正要命令崔铎高举双手走出屋子时，外线组长王义庆已经霍地跳到院里，想去抓捕。但他双脚刚落地，崔铎已经从屋里往外打了两枪，幸亏曹纯之一声“小心”提醒了小伙子，王义庆在枪响的同时已经扑倒在地，总算未被击中。原来，崔铎身上竟然带着3支手枪。

曹纯之顿时大怒：“好啊！崔铎，真有你的。我看你狠到几时？”说着，便重重地拍了两下手掌。

曹纯之先前跟侦查员杨学成约好的暗号，后者早就守定了北房顶上的烟囱位置，听见曹纯之发出暗号便把带来的那两块体积不算小的石头往烟囱里扔了进去。崔铎在屋里冷不防听见“咚咚”两声大响，冷不防一个激灵。高手对抗，间不容发，就在他这一分神的瞬间，几个身手利索的侦查员已经破门而入，死死地将他扑住，下了手枪，扣上了手铐。

被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寄予着厚望的行刺中共领袖计划，随着这一幕的发生，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消息逐级上报，迅速传进了中南海，正在用晚餐的周恩来大笑着让人拿酒来庆贺。

次日，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北平市先农坛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大型集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献《论人民民主专政》。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一（1）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侦查始末

1949年10月初，一名诨号“神枪大盗”的神秘刺客受命谋刺驻扎宁夏首府银川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在第一时间获得这一情报的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与第19兵团保卫部当即联手对该案进行重点侦查……

一

1949年8月26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彭德怀指挥的兰州战役胜利结束。当日，彭德怀即命令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向宁夏地区进军。第19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指挥下，兵分3路直扑宁夏。9月2日，解放战争后期的著名战役“宁夏战役”拉开了帷幕。解放军以破竹之势迅速歼灭国军宁夏兵团3个军，于9月19日逼近宁夏首府银川市。

面对着兵临城下之势，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及其部属卢忠良、马全良、马光宗、马光天等国军将领于1949年9月20日下午3时许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分别发出求和通电。21日下午，彭德怀司令员复电：“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员，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员接洽。”9月22日上午，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复电指示，召集国民党宁夏兵团诸将官及党政界人士紧急议事。当天下午，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3位代表乘车离银前往中宁。是日，马部贺兰军、第11军等数万军队开始溃散。23日上午，国民党宁夏军政界3位代表抵达中宁后，解放军第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等对他们归向人民表示欢迎。此时，溃散殆尽的数万名马部散兵游勇四处抢掠，黄河以西地区秩序大乱，马部已无力执行协议。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伯祥，到吴忠堡解放军处避难，请求尽快入银川安定秩序。马鸿宾致电彭德怀，报告军

队已溃，要求解放军早日入城。在宁夏各方的一再请求下，彭德怀批准第64军派1个师先入银川维持秩序。

当日，解放军第64军第19兵团191师受命由仁存渡渡河接管银川，银川人民迎来企盼已久的解放。解放军第19兵团进入银川城后，随即组成以杨得志司令员为首的市军管会，并任命马鸿宾为副主任，出榜安民。

银川解放一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日下午5时许，一封匿名信函寄到了第19兵团司令部，随后即被送到了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的案头。

这是一封举报函件，全文如下——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一（2）

敬启者：惊闻有不法之徒胆大妄为受某方指使图谋行刺解放军杨司令，该刺客年约30岁，身高约1公尺又70余公分，国字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操西北口音，据称枪法极准。

潘自力一看之下，马上意识到了这封函件的分量：谋刺杨得志司令员，这是一起特大案件！不过，这封举报信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呢？潘自力是一个具有丰富经历的老革命，1923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3年后转为中共党员。他在人生道路上，有着比一般革命者丰富的经历：先当兵，后读书，曾赴苏联、法国留学，1928年即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组织过武装起义，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参加了著名的长征，先后从事过组织、宣传、政治工作。凭着这些丰富的经历所形成的经验，潘自力在稍一考虑后，随即对手头的举报信作出了反应：其举报的内容不管是真是假，都必须当真的来对待。

于是，潘自力向他分管的兵团保卫部下达了紧急命令：联合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对举报信所言内容进行严密调查。

第19兵团保卫部股长兼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科长南鸣秋受命负责组建专案侦查组调查该案，他从兵团保卫部和军管会公安部各挑选了两名人员，5个人组成了一支专案组。这5人中，除了侦查员小许是银川当地人外，其他都不是银川人，甚至也不是宁夏省人。但他们并不缺乏侦查经验，因为组长南鸣秋和其余3个组员尽管年龄都未超过26岁，但之前都曾在延安的边区政府公安部、延安市公安局以及中央社会部历练过。而23岁的小许之前则曾受中共地下党指派打入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做过4年刑警，此次是奉命随第19兵团来银川参加警察系统的接管工作的。因此，当晚他们5人碰头研究案情时，都认为这个案子的侦查难度不是很大。

之所以有这个念头，除了上述的资历、经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银川当时的情况。今天的银川市区，跟其他省、自治区首府相

比，人口数量尽管可能还是显得不怎么起眼，但已经拥有了80多万人口，城区也像模像样，听说还修建了星级厕所。而旧社会时的银川，那是如今的人简直无法想象的。历史上的银川，是我国塞上一座名城和军事重镇，素有“塞上江南”果园城之称，但由于银川在历史上，饱经了数不清的战乱与灾荒，特别是国民党马鸿逵统治时期，残酷的压迫剥削，成年累月的抓兵抓夫，迫使老百姓逃离古城到外省谋生或流落沙漠荒原，使银川变成了一座“无风三尺尘，雨过泥没胫，臭坑随处是，蚊蝇集成群”的破烂城。当时有首民谣形容银川城越变越小：“一条马路两幢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只猴；衙门打屁股，全城都听着。”这首民谣虽有些夸张，但实际上也差不多，银川城短短的一条小街上，仅有少量店铺；而工业更少得可怜，全城除国军第15路军建的一个小修械所和一座小发电厂外，仅有几家陶瓷、毛毡、碾米磨面的小手工业作坊。1949年第一野战军解放银川时对人口作了一个统计，全市人口只剩下3.6万多人。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一（3）

3.6万人口，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发达省市的一个城镇的人口，所以，对于有过侦查实践经验的南鸣秋等人来说，他们有理由相信能迅速将谋刺杨得志阴谋查一个水落石出。

具体如何调查？专案侦查组决定同时分两步进行：一步是从国民党散兵游勇中去摸情况；另一步是查摸这封举报信的来源，找到写信人后顺藤摸瓜予以调查。

次日，1949年10月2日，专案组正式开始着手调查。

侦查员王必庭、党大旺、麻志清3人前往解放军第19兵团“国民党溃散军政人员集训大队”调查，这个集训大队当时集中了在宁夏战役中溃逃在银川地区的国民党军官兵和地方政权官大约1800多人。这些人员被集中起来，由解放军予以看管，给予和解放军相同的生活待遇，统一作息时间，接受政治教育，登记各自身份，交代个人历史，揭发他人问题。到10月2日时，这个集训大队才开张了5天，但已经完成了人员登记和分班，王必庭等3人登门，就能够按照花名册查看最基本的情况了。这些情况包括：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党派和曾经从事过的职业（含担任过什么职务）。

侦查员的思路是，举报信上说刺客有两个特点，一是“受某方指使”企图实施行刺；二是“枪法很准”。“某方”，显然指的是中共的敌对方，那就是国民党特务机构或者业已败逃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鸿逵，所以，从已经登记的集训人员中寻找跟国民党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有关系的，或许就能提供线索。此外，这些集训人员中显然也有“枪法很准”的官兵，也许他们对于同为“神枪手”的昔日同僚存有特别记忆，提供出来可能就是刺客。

王必庭等3人循着这个线索在花名册上找到了37名可能的知情人，这些人员都是曾在国民党保密局、中统局特务系统、或者马鸿逵手下供过职而又具有一手好枪法的角色。侦查员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话，要

求他们回忆以前的熟人中是否有符合上述两条件的。如此折腾了大半天，获得了50多个姓名。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的调查情况，那是组长南鸣秋和侦查员小许，他们去了银川邮局。

这里需要说一下那封举报信的信纸、信封情况：信纸有点怪，是用只有两指宽的毛边纸代替的，拿在手里就像展开了一根软软的薄布条；信封是旧牛皮纸糊制的，没有贴邮票，奇怪的是邮局就在空白处盖了一枚邮戳后免费送达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一（4）

邮局当时属于军管对象，进驻了两位军代表，南鸣秋和小许过去后就去找了他们。军代表不管业务，于是就请来了一位负责人。在这位负责人的协助下，侦查员弄清了举报信的邮寄情况：这封信是在邮局门口的邮箱里开出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没有落款无法退回的未贴邮票信函，是应该投递的，但必须向收信人收取同等邮资。但邮局工作人员见这封信的收信人是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就没有按照惯例办事，盖上邮戳后放在其他寄往第19兵团司令部的信函里一起送了过去。

那么，邮局是否可以判断寄信人是哪个范围的？邮局方面介绍情况的人报以无奈的苦笑。

这样，当两路侦查员返回临时办公点会合调查情况后一核计，就发现侦查的难度了：第一路虽然获得了50多个符合刺客条件的名单，可是提供者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目前身处何处？死了还是活着？少数说得出下落的，也是缺乏可操作性，不是已经逃离宁夏，就是早已去了台湾。而第二路对于邮局的调查，那简直就是等同于没有调查一样了。

专案组长南鸣秋这时才算意识到这件事似乎是有些难度的，于是就说让我们从这封信件的内容来分析，从中判断写信者的情况。

举报信件是用铅笔写的，从笔迹看，写信人的文化程度大约在小学五六年级左右，而从行文语气判断，这个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写信人是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的，所以估计年龄可能在30岁上下。再看信纸、信封，用的是狭长的毛边纸和旧的牛皮纸，这说明写信者的手头平时没有现成的信纸信封，这会儿写举报信了就临时就地取材解决了信纸信封问题。

侦查员党大旺一边听其他人作着分析，一边把信封捏成椭圆形往里察看，发现另一头底部重叠处的封口粘合处似乎有字迹，南鸣秋一

听就让把信封拆开。小许以前在国民党兰州市警察局时曾经干过邮检员，这件事非他莫属了。当下小心翼翼地拆开，一看，显露出来的是3个被裁去了一半的红色铅印字体：一二八。当时的文字，书写和印刷习惯都是竖排的，所以这3个数字虽然已经被裁去了一半，但还是能够辨认出来。

一二八？这是什么意思？专案组长稍一凝神就想出来了："看来这是国民党第128军司令部或者下辖哪个师、团司令部的信封了，这个写举报信的人把收到的第128军方面的信封废物利用了一下。"

侦查员顿时兴奋起来：那就是说，写信者是具有曾经收到过国军第128军方面信函的条件的人，循着这条线索进行调查，或许就有收获哇！

于是，南鸣秋就叫上小许和王必庭两人，再次拜访邮局。

这一拜访，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对象冒出来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1）

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国军第128军的情况，该军属于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是所谓“马家军”的主力。从1947年3月开始，该军就积极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先是对陕北解放区的三边地区发动进攻，后又支援榆林、绥远受到解放军攻击的国军，直到西安被解放军攻占后，方才撤到甘肃平凉。1949年7月30日，解放军解放平凉，国军第128军奉命退往瓦亭、三关口扼守，但随即被解放军迅速突破。宁夏兵团企图凭借青铜峡天险进行顽抗，第128军又至金积县踞守，最后除部分官兵投诚外被解放军全歼。

国军第128军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在银川地区之外积极打内战，按说跟银川方面的公私函件应该是比较多的。可是，据邮局方面介绍，在他们的记忆中，经他们之手处理过的国民党第128军寄往银川的信函并不多。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个军的官兵几乎都不是银川当地人，他们即使要跟家属通信，也不会寄到银川来转，这是私函方面的。还有公函方面的，该军通常也不往银川寄发，因为马鸿逵虽然长期待在银川，但第128军跟他没有直接联系，在该军和马鸿逵之间还有着宁夏兵团司令长官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公事不可能绕过马敦静而直接向马鸿逵请示的。鉴于上述原因，经邮局的邮件分拣人员之手进入银川市的来自国军第128军的信函就寥寥无几了。

因为寥寥无几，所以当侦查员一问到这点时，邮局的一位分拣员就说出了一个基本上每月都会收到一二封来自国军第128军司令部信函的用户——马清臻。

侦查员于是马上设法了解马清臻的情况：这是一个50多岁的商人，回族，其子马一成是国军第128军司令部的少校参谋，不久前参加了由该军副军长组织的“金积投诚”，毅然放下武器，投向人民解放军的营垒，目前正在参加集中学习，准备接受解放军的整编。马清臻本人世代居住银川，从其祖父开始就以经营中药材谋生，生意做得不算

大，其经济状况在银川属于中产阶级。其性格豪爽，正直仗义，乐善好施，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不错。

专案组分析下来，觉得马清臻基本符合写举报信的条件：由于有着其子马一成的身份关系，他有获得内部机密的便利；他手头有国军第128军旧信封；他是商人，手头自然不缺特殊信纸——狭条毛边纸，那显然是从用于制作账本的毛边纸上裁下来的。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2）

如此，那就去拜访马清臻吧。马清臻住在南门外双城门，那是一位体形敦实、满脸红光的健壮老者，南鸣秋与其交谈之下，得知对方长期习练查拳。正好一同去的侦查员麻志清是世代习练查拳的，南鸣秋于是示意麻志清跟马清臻以此为话题聊了起来。马清臻果然豪爽，跟麻志清聊了一会儿，就起身打了一套拳。麻志清见了知道这是切磋的意思了，于是也就表演了一下。马清臻见之大喜，就让其妻准备酒菜，他要好好款待解放军朋友。侦查员都是军人身份，入城纪律一条条都是倒背如流的，自然不能就地吃喝，于是赶紧先谢后阻，说马老爷子您可不能让咱们违反纪律受到军法处罚，您老的情咱们领了，喝酒的事儿就留待以后吧，我们在银川住下就不走了，往后大家交往的日子还长哩。

马清臻这时才想起问侦查员找他想办什么事？南鸣秋于是就拿出了那个已经拆开了的信封，说老爷子不知这个信封是不是您这边寄出去的？马清臻一看，马上摇头，从抽斗里拿出一沓崭新的信封，也是牛皮纸的，左侧印有竖排的绿色铅字：至诚药材行 宁夏省银川市南门外双城门。老爷子说：“我写信自有敝号专用信封，哪里寒碜到使用旧信封哩？”

侦查员不能向马清臻透露举报信的内容，只好在信封上绕圈子。拐弯抹角说了一阵，终于使马清臻明白了一层意思：话题是从国军第128军的旧信封上引起的，所以最好还是以此否认为好。于是，马清臻就微笑着起身入内，去后面住室拿出了一个红漆木盒，打开，里面是用细绳扎着的几十封信。

这些信件都是马清臻的儿子马一成近3年里写给父亲的，信封一角上都写着号码，马清臻解释说这是因为生怕有信寄丢了才关照儿子这样做的。侦查员查看编号，从1946年11月2日第一封到1949年9月12日最后一封，编号一个也没少。马清臻又拿出了一封信，编号是按照顺

序往下的，但信封左侧已经没了第128军司令部的字样，而只有一个“缄”字，那是邮局出售的统一民用信封了。估计这封信是马一成投诚后写的，一看邮戳，果然是9月20日寄自金积县。

这样，就可以认定眼前的这位老爷子并非写信人，侦查员于是告辞。一路上南鸣秋等人心里觉得好不郁闷，暗忖这事往下应该怎么调查。

南鸣秋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再次去邮局。没想到运气来了，他刚进门，邮局的军代表小李就说正要找你呐，我们这边的邮差老黄想起了一个有时也有国民党部队寄去信件的地方。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3）

邮差老黄据说是邮局最老的职工了，他在邮局已经干了将近30年。他家住在宁夏永宁县，前一阵解放军打宁夏战役时，老黄担心家里出事，就向邮局请了假回乡了。现在，永宁县也已经解放，家里没事，他就回来上班了。老黄回来后，听说了军管会来人查问国民党第128军信件之事，他说银川除了南门外双城门马老爷子外，还有一个地方偶尔也有第128军的信件寄去的，那就是也在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老黄把这事对军代表小李一说，小李就想向南鸣秋那里通报了，这当儿正好南鸣秋登门了。

北方地区的大车店，是一种能供用牲口拉的大车连同赶车的车夫一并下榻的客栈，如果将所有下榻处放在一起按档次分级别的话，大车店应该是属于最低一个档次。通常，那里是运输物资的大车夜晚下榻的最佳选择，收费既低，还有专人代为照料牲口，如果车夫自己带着粮食的，还能在店里加工膳食。这些大车一般都只在大车店投宿一个夜晚，傍晚投宿，次日早晨即走。但是，也有一些不赶大车的旅行者，由于需要在某地逗留较长时间，而又因为经济原因而想节省旅费的，也会到大车店投宿。这类投宿者，通常会在大车店住上一段时间，甚至有三五个月的。这样，大车店就成了他们的临时居住处，所以他们就会让别地的亲友把信函或者汇款寄到大车店。邮差老黄所说的他所记得的曾经往“双阳大车店”投递过国军第128军信封的函件，应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据老黄回忆，他在今年4月上旬曾把一封挂号信投递到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

既然是挂号信，那就应该有人签收的，当初的签收单子还保存着吗？老黄说他记得确实是签收了，不过按照邮局的规定，当天他就已经把签收单子交到局里了。侦查员于是请军代表立马查收这份签收单。由于银川市是和平解放的，未经战乱，所以邮局的一切设施档案都保存完整，这份签收单很快就被找了出来，送到了侦查员的面前。

从签收单上可以看出，这封挂号信函是一个名叫林梦冲的人于3月24日从陕西定边使用国军第128军司令部的函件寄出的，收信人是宁夏省银川市南门外“双阳大车店”的旅客杨尔国，银川市邮局所盖的邮戳表明该信函是4月4日寄抵银川，次日投递。但签收单上“杨尔国”的签名后面都有一个小括号，内写着一个“代”字。侦查员看着觉得有些许糊涂：既然是杨尔国本人的签名，那又为何又有一个“代”字呢?

于是就向投递员老黄请教，老黄解释说，那天他把这封挂号信送往“双阳大车店”时，伙计说这个客人不在，大概出门访客去了，于是就让大车店女老板代为签收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4）

南鸣秋等人向邮局借走了这张签收单，返回办公室商议。这时天色已黑，便亮了灯吃晚饭。南鸣秋一边吃着馒头，一边盯着签收单看着。这其实是一个完全无意的举动，但运气就是在这种无意中显现出来的。要说专案组长南鸣秋的文化程度，不过是小学毕业，但他从小跟着一位当过私塾教师的本家长辈习练过数年书法，因此写得一手好字，也形成了一种看字体时喜欢琢磨笔画的习惯。这会儿就是这样，一边吃一边下意识地看着，忽然就觉得“杨尔国”3个字似乎有点眼熟，竟似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样。一个馒头吃完，南鸣秋突然推开了面前盛汤的搪瓷碗，从皮挎包里拿出了那封举报信，和签收单上的字迹对照着一看，喜出望外地笑了。

众人一齐吃惊，纷纷停止进食，不错眼珠地看着专案组长。南鸣秋示意众人靠近，指着举报信和签收单：“这是同一个人写的！”

王必庭等4名侦查员围着察看，看了良久都是不得要领。于是，南鸣秋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下3个词组：“杨司令、国字脸、据称”，又在“杨”、“国”、“称”3字下面画了道粗杠，指着举报信说：“你们看，这3个字的书写笔迹跟‘杨尔国’的签名三字不是一模一样吗？”

其他几位仔细分辨，觉得果然如此。又想到了用来作为信纸的狭长条毛边纸，都认为这与大车店的情况也相符。于是，就喜滋滋地议论说原来就是“双阳大车店”的女老板写的举报信，那好，咱们去找她当面了解不就得了？可是南鸣秋却不这样认为，他的观点是：一个经营大车店的女子写这种内容的举报信件，我基本上已经相信这封信所说的情况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她实在没有必要跟我们开这样一个玩笑；而这位女老板能够写这种内容的一封举报信，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她既然匿名，那就是心存顾虑，如果我们冒冒失失登门了解情况，如果她来一个矢口否认呢？那不是把事情弄僵了吗？而且，也许

还会惊动了刺客，给人家形成不安全因素。所以，我们先得把确实是这位女老板写信之事砸实了，然后才能跟她悄悄地接触。

众人听了觉得南鸣秋言之有理，于是就议了一个方案付诸实施。

先了解了“双阳大车店”女老板的情况：这是一个30岁的青年女子，名叫陈侃凤，未婚，河南省孟县人氏，她是在1944年夏天来银川投靠在马鸿逵的国军第17集团军当国术教官的叔叔陈子灵的。陈子灵当时正好从一个回族人手里盘下了银川市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准备请人经营，陈侃凤向叔叔提出让她经营，陈子灵就把大车店交给了侄女。据说陈侃凤家以前在孟县是3代经营大车店的，她对此也是熟门熟路了，所以经营起来倒也顺手。陈子灵是太极名家，其武艺在宁夏省乃至西北地区是排得上名次的，据说跟马鸿逵父子的私交也不错，凭着这点，陈侃凤经营的大车店自然没有军警地痞之流敢来捣乱，数年下来创出了品牌。至于陈侃凤本人，许多人见她未婚，纷纷向其本人或者叔叔说媒，其中有的还是国军的高级军官，但不知什么原因无论是陈子灵还是陈侃凤本人，不管开口的人是什么身份，都是一概摇头。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二（5）

专案组请军管会公安部治安科派人去对“双阳大车店”进行了例行访查，其中加了个侦查员党大旺。一行人登门，无非是问问最近是否有可疑对象前来下榻，旅客是否携带了军管会明令禁止的武器、凶器、毒品等物，顺便当然还要翻翻旅客登记簿。其实这翻阅登记簿才是真正的目的，党大旺留心到，确实有一个名叫杨尔国的旅客在今年2月26日登记下榻，根据登记簿资料显示，这人至今尚未离开大车店。

于是，党大旺就指着杨尔国的名字问伙计：这个客人住到现在还没有走吗？怎么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伙计说，哎，别提了，这个姓杨的是一个滑头，他在4月4日这天就已经离开了，在敞号吃住了一个多月，竟然一文钱也没有付，他是偷偷溜走的。

党大旺心里一个激灵：邮差老黄不是说4月5日去投的信吗？既然这人已经在上一天离开了，怎么还收了他的信呢？

专案组就是凭借这一点在当天下午悄然传唤了陈侃凤。传唤的理由是：有人举报你私扣了旅客信件，请你对此作出解释。

陈侃凤起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装糊涂，说在她的记忆中没有这种事情。于是，侦查员就点出了杨尔国的那封挂号信。陈侃凤这才点头，轻松地说有这人的一封挂号信，是我替他代收的，这人欠了敞号一个多月的费用没有支付，是悄悄溜走的，我正要找他呢。住店不付钱，天底下还有这个道理？

好的，那么这封信呢？

陈侃凤直到这时候才觉得似乎“来者不善”，一双明眸定定地看着侦查员，片刻，微微一笑，出乎意外道：“如此，看来诸位不是为这封挂号信而找我，而是为其他事情了？”

南鸣秋送上一杯茶，也是微笑着说：“陈老板你是个聪明人啊！”

陈侃凤冲侦查员双手作揖拱了数下：“哈哈，看来聪明人是诸位先生了，竟然很快就查到了‘双阳大车店’。佩服！佩服！”

接下来的话题，很容易地就转到了举报信上——

银川解放后的第八天，“双阳大车店”来了两个男子，自称是从中宁那边过来的，在登记簿上写的是“经商”职业，要求住一个干净而又安静的房间，多付点钱没有关系。陈侃凤于是就把两人安排到了后院她的账房兼卧室隔壁的那个收费最高的房间，两人看了觉得满意，拿出3枚大洋说要住两天，顺便请店里的伙房替他们准备一些酒菜，说晚上要招待一位贵客。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6）

陈侃凤当时就觉得这二位似乎有点蹊跷：订房时看似出手大方，看他们的谈吐举止似也是熟悉江湖规矩的主儿，可是如果确实要招待贵客的话，那就应当去外面上馆子，哪有就在这种上不得档次的大车店里请贵客喝酒的？这样，陈侃凤就多生了一份心，暗忖要留意一下才是。开大车店的因为接待的旅客鱼龙混杂，最担心的就是在店里作案，只要一发生刑事案子，哪怕不是命案，这店的招牌也就打了折扣，不出一周，生意上马上给人颜色看。因此，开大车店的第一要紧的就是不能让旅客在店里作案。

由于觉得蹊跷，陈侃凤就决定留上一份心。她吩咐伙房师傅待会儿给这个房间的客人准备酒菜时得特别小心侍候，不要考虑成本。陈侃凤的用意是要让客人专心喝酒议事，她则在自己房间里偷听他们跟那个还未露面的客人究竟密议些什么机密大事。为防止对方生疑，陈侃凤不敢待在外面等着那个客人登门，而是提前等候在自己房间里。

当晚6点钟左右，那个客人来了，陈侃凤在隔壁房里听着，那是一个说话声音很轻的男子。接待他的两个主人对其很是敬重似的，一见面就口称“郭先生”反复寒暄问候，他只不过是不痛不痒地应付着。直到伙房师傅送上酒菜，3人喝过3杯后，这位郭先生话才多起来。陈侃凤听他称呼对方二位为“老白”、“老连”，问请他过来有何事需要帮忙的。那白、连两人说不急不急，咱们喝着酒慢慢地说。那姓郭的便不高兴了，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道如若不说，那他就告辞了。于是姓白的才说，这事比较大，兄弟生怕您郭先生听着过于吃惊，所以想先请您喝几杯酒了才交代。那姓郭的没有吭声，只是冷笑。于是姓连的就开口了，说出来的内容倒使偷听的陈侃凤着实吃了一惊：竟然是要求姓郭的行刺解放军杨司令员！

牌一摊，再往下谈就直白得多了：那白、连两人是马鸿逵指派潜伏在宁夏省的特务，愿以30两黄金的代价收买这位枪法极为了得的郭

先生行刺杨得志。姓郭的表示对这桩活儿有点兴趣，但价格得增加一倍，还要求提供美制手枪两支，子弹100发。白、连两人对于提供手枪、子弹没有异议，说要4支和更多子弹也可以给，但黄金是一两也不能增加了。姓郭的于是大怒，说我郭某不跟你们掺和日子也过得蛮滋润的，何必为这30两黄金而放弃这种滋润日子呢，如此，郭某就告辞了。二位请放心，郭某虽然是江湖之人，但对官场那一套还是略知一二的，对此事肯定守口如瓶，决不泄露。说着，连酒也不喝了，起身便要离开，被那二位死死拖住。双方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白、连只得同意了姓郭的要求，当场拿出了20两黄金作为定金，手枪、子弹是早已准备了的，也当场交给了刺客。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二（7）

陈侃凤偷听到这里，纵然已经有了若干心理准备，也是惊得连气都似出得粗了。她寻思此事得向解放军举报，否则日后只怕这大车店就得被封了，自己或许还得被卷进去吃一趟冤枉官司。于是，她就离开房间去了前面的店堂，她得看清楚姓郭的长得如何一副模样才能让解放军去逮人啊。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白、连两人客客气气地把姓郭的送了出来。

当晚，陈侃凤就写了举报信，当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她不能透露“双阳大车店”这边的信息，就没有留落款。陈侃凤从来不写信，手头没有信纸信封，想用整张毛边纸写吧，又怕露馅，于是就裁了一条写了。写好后发现没有信封，想起抽斗里还有一封春天时那个欠账而逃的杨尔国的挂号信（她当初代为签收和保存着是心存侥幸，寻思最好那姓杨的会因这是一封重要信件而来取的，那就可以向他讨住店费用了），就不管三七三十一，撕开了使用了那个信封，信仍留着。

次日一早，陈侃凤出门去城里买菜时，把这封信邮票也没贴就投进了邮局门口的邮箱。她倒不是舍不得买邮票，而是担心去买邮票时被邮局营业员记住了外形，回头解放军想到向邮局调查时提供了找上门来的麻烦。

陈侃凤作了上述陈述后，向南鸣秋提出要求：替她保密，否则她会遭受报复的。南鸣秋说这个自然，你不提出来我们也要替你保密的。我们向你表示感谢，可能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还有事情需要你协助，如果你发现新的情况也请向我们及时通报。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1）

陈侃凤离开后，专案组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首先确认了举报信内容的真实性，到这一步，这显然是已经无可置疑的了。正因为这样，大家这才真切地感受到肩头分量的沉重感。南鸣秋想到10月1日那天杨得志司令员参加了银川市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银川市解放大会并登台讲话，事后又到群众中握手谈话的场景，心里不禁涌起阵阵后怕。

然后，对刺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陈侃凤听见他所说的“江湖之人”这句话来判断，这家伙以前没有当过特务，也没有当过兵，可能是土匪。这就好办了：一个土匪能够有那种连马鸿逵方面都知道并且要花60两黄金请其出马的地步，那他的名气肯定非同小可，相信既然马鸿逵的特务能找得到他，那共产党的专案组也就能够找得到他。怎样找法？众侦查员核计下来，决定采用两个办法：一是从银川当地的那些历史上做过强盗、土匪的在押和已经向军管会登记后在家等候处理的对象访查；二是去集训大队从那些正在学习和交代问题的马鸿逵手下的军官了解白、连两人的情况。

主意打定后，已是傍晚时分，但南鸣秋还是把专案组成员一分为二，让匆匆吃点晚饭后分头去进行调查，午夜前回到原地开个碰头会。

当晚12点，专案组再次碰头，去集训大队调查的侦查员尽管分别找了34名对象进行调查，但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马鸿逵的特务系统有姓白、姓连的主儿，如此，估计那两个特务是化名找刺客郭某谈这笔交易的。一路人马扑了空，但另一路人马倒是有了收获。这一路是南鸣秋和小许两人，他们分了工，南鸣秋去了军管会公安部管辖下的看守所，找了几个同志说了调查内容，要求他们相帮讯问在押的那些土匪强盗；小许则通过军管会公安部治安科约了七八个已经登记过的对象来开座谈会，直接打听是否有郭某这样一个主儿。双管齐下一番调查

下来，南鸣秋和小许竟然有了相同的收获：两方面的被调查对象都提供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神枪大盗郭天唯。

这个江湖上诨号“神枪大盗”的主儿，在宁夏地面冒出已有七八年了。郭天唯的枪法极为了得，通常百发百中已经是神枪手了，双手左右开弓能够使枪的双枪手那就更是技高一筹了。但这种人物若是跟郭天唯相比，那就只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郭天唯竟然有一手能使4枪而且百发百中的超人绝技！据几个见识过郭天唯绝技的调查对象说，郭天唯双手持枪，腰间左右各插着一支手枪，手中双枪对准靶子射击后，把双枪抛向空中，然后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拔出腰间的双枪射击，打出一发子弹后将双枪抛向空中，那先被抛出的两支枪刚好落下来，双手接住了继续射击，如此反复，直到4支手枪的子弹打光为止，所有射出的子弹，没有一发打空的。这种类似杂技的手法，虽然在实战中没有什么用处，但足可说明郭天唯的枪法和射击时的心理素质是何等了得。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2）

这郭天唯是一个行为举止有些奇特的人物，平时行踪飘忽，没有人知道他居住在何地何处。当年马鸿逵听说了郭天唯的枪法后，想让其担任贴身卫士，但却始终无法找到他——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他是不愿意侍候马鸿逵而故意回避的可能性。郭天唯有如此了得的枪法，吃过他亏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其民愤却倒并不很大，一般老百姓甚至还不一定知晓其人。因为郭天唯尽管靠抢劫作案谋生，但他对于抢劫对象和作案次数具有严格的计划，每年除夕，他会像商家制订来年贸易计划那样制订下一年的作案计划，原则上是一年作两个案子，宁夏全省各个县轮流进行，抢劫对象通常都是当地的豪富殷实大户。白天黑夜下手没有定规，但登门必不落空，只取金银、现钞，只要被劫对象配合，他连手指头也不会碰人家一下。

专案组分析，行刺杨得志的命令显然是马鸿逵直接下达的，可能这也是马鸿逵对蒋介石的一个交代，以弥补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被解放军攻下宁夏全省的“不战之罪”，所以，才肯出60两黄金的巨赏。而马鸿逵的特务系统找不到能够完成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万一行刺不成反倒惊动了解放军方面给再次行动形成障碍，他们必须派出一名一击即成的顶级杀手，于是就想到了“神枪大盗”郭天唯。

接下来的侦查工作如何开展？专案组反复讨论后，决定还是兵分两路，一路调查白某、连某，一路直接调查郭天唯。

次日上午，侦查员还没有出动的时候，南鸣秋就接到了门口警卫战士打进来的电话，说有一位姓陈的妇女点名要见他。南鸣秋顿时一个激灵：这显然是“双阳大车店”的女老板陈侃凤了，她一大早登门，看来是有新的情况要反映了。

陈侃凤确实是来提供新的情况的：昨天晚上，9月30日住过“双阳大车店”的那个马鸿逵手下的白某，忽然悄然前来找她，要求买一些治

疗扭伤脚踝骨的药。

陈侃凤出身武术世家，其祖上数代皆是武术名家，兼具治疗跌打损伤的祖传医术。到其父那一代，兄弟4人继承了祖父的武艺和医术，后来陈侃凤的大伯上五台山当了道士，二伯漂洋过海去了南洋，下面的两个都当了国军的武术教官，陈侃凤的父亲陈子仙在范汉杰的国军第15军，叔父陈子灵在马鸿逵这边的国军第17路军。陈子灵一到宁夏，就以祖传的精湛医术治好了马家军数名高级将领的积年内伤，立时便成了塞上名医。陈侃凤从小跟着长辈也学过拳术，练过内功，对治疗跌打损伤也稍稍知晓一些。在“双阳大车店”投宿的旅客，有时遇上腰腿扭伤之类的，就请陈侃凤治疗，倒也颇见效果。银川解放前夕，陈侃凤的叔父陈子灵随同马鸿逵去了台湾，陈侃凤在无意间就成了陈氏伤科在银川的传人。这在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白某的登门起到了一个提醒作用。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3）

白某对陈侃凤说，他住店那天请客的那位朋友可能喝得多了些，回家时不慎扭伤了脚踝骨。初时以为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但哪知反而严重了，连走路都有点困难。听说陈老板有祖传的治疗跌打损伤绝技，所以便来买些伤药，价钱随便开就是。陈侃凤听了寻思看来这是天意了，作恶是要受报应的，解放军的杨司令是天上的星宿下凡，哪里容得你们来打主意？想冲人家下手，刚动了念头不就遭报应了？既然如此，那我何不助解放军一臂之力，送佛送到西天，暗暗地就让你们给逮住了。于是，她就心生一计，说她不是做郎中的，尽管能帮人治治不严重的跌打损伤，但手头是不备药的。你如果一定要，那我得明天给你特地配制，劳你明天下午来一趟取了去。白某有点失望，但也是无可奈何，只好点头告辞而去。

陈侃凤原本是想当时就奔军管会来报告的，但因为城门已关闭，所以只好等到今天一大早才进城报告。南鸣秋听了谢过陈侃凤，要求她替白某准备好伤药，如果来取就交给他，钱照算，免得引起怀疑，其他事情就不必担心了，专案组这边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这条情报使众侦查员极为兴奋：如此看来，郭天唯是扭伤了脚才没有在10月1日那天庆祝大会上下手的。从白某此举判断，他跟郭天唯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这样就好了，只要盯住了白某，就能找到郭天唯的藏身点了。于是，南鸣秋当即安排侦查员小许、王必庭和麻志清3人前往南门外“双阳大车店”附近蹲守，只要白某出现，就轮番跟踪，悄悄盯着，看他往何处去。没有命令，不准惊动对象。

3个侦查员遵命去了南门外，在“双阳大车店”附近蹲守。此举陈侃凤并不知晓，不想这样一来就发生了一个问题：那个姓白的昨晚跟陈侃凤说好是他过来取伤药的，哪知这是虚晃一枪，这天下午3时许过来的却是另一个特务连某。而外边蹲守着的侦查员却只是留心着长得跟

白某相似的人，根本没有留心有连某已经混在几个闲人里走进了“双阳大车店”的大院。

幸亏陈侃凤给郭天唯准备下的伤药分为两种，一种外敷，一种内服。外敷的是药粉，体积不大，可以就在口袋里；内服的却是一包包的中药，鼓鼓囊囊的提在手里很是显眼。侦查员小许待在大车店对面的路边正跟一个鞋匠聊着修鞋的事儿，忽见一个男子手里提着一大扎鼓鼓囊囊的纸包大摇大摆地从大车店里出来，心里一愣，寻思别是姓白的那主儿哇？仔细看看却又不像。看着对方穿过马路，在距他不远的一个香烟摊子上买了一包烟，拎着纸包包往南而去，忽然醒悟：这人多半是另一个对象连某吧？于是二话不说，马上悄悄跟了上去。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三（4）

另外两个侦查员王必庭、麻志清一看小许拔步，也从蹲守点出来跟了过来。小许发出了预定的暗号，示意王必庭留在原地继续监视，麻志清则在马路对面盯着。两人跟着目标走出数十米，来到了一所简陋的小学堂门前。这时，发生了令侦查员始料不及的一幕：连某忽然走向小学门前操场上的一棵大树，那里拴着一匹黑马，他把中药包包放进了马袋，解下拴在树身上的缰绳，翻身上马，一抖缰绳，吆喝着马匹扬长而去！

许、麻两人看得目瞪口呆，转眼四扫，视界里根本没有马车、牲口，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目标消失在视野里。

这个结果，令专案组长南鸣秋大为沮丧。面对着3个一脸内疚的侦查员，他一时说不出什么，眨了一会儿眼睛说你们先休息着吧，我和党大旺去“双阳大车店”看看。

大车店女老板看到南鸣秋两人，一脸的惊奇，眼光里兜着一个问号：你们怎么来了？没等侦查员开口，她就问二位是来住店的还是找人的？南鸣秋会意，马上说我们是受人之托前来看看贵号店舍情况，合适的话想订下两间房。陈侃凤把他们引领到了后院她那个屋子，南鸣秋知道这种情况下不便逗留稍长时间，于是马上急煎煎地说了监视失利的情况，说想向你了解一下那个连某来买药时跟你是否透露过新的情况。

陈侃凤听了竟然并不意外似的浅浅一笑，说你二位不必急得火燎眉毛似的，我这边已经在药里做下手脚，那个姓郭的一时是好不了，还得来找我。原来，陈侃凤不想让郭天唯很快就治好扭伤的脚，她就在药里做了手脚，外敷的中药粉末倒是一切正常，却在内服的中药配方上弄了点儿小名堂，使用的中药会降低外敷伤药的药效，这样，郭天唯就不可能在最近几天里治好受伤的脚踝骨。而她，已经给买药的

连某留过话了，让伤家如果3天后还好不了的，那就得过来当面诊疗了。所以，她估计对方会在这两三天里登门。

这样，总算使专案组有了一个得以弥补的机会。南鸣秋决定专案组5人全部出动，化装住进了“双阳大车店”，一俟目标出现，视情而定，适合逮的就下手逮，不适合逮的就跟踪。为防止重新出现目标骑马而遁的情况，经领导同意，专案组还请军管会公安部派出了两名便衣同志，分别配备汽车、坐骑各一，待在“双阳大车店”附近，日夜待命配合。

如此，等于是摆下了一张罗网，就等着目标往里钻了。

3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目标再次出现了没有？竟然没有！嗯？这是怎么的？难道是陈侃凤的伤药有问题了？那个扭伤了脚踝骨的神枪大盗郭天唯的伤已经好了？看来，需要跟业余伤科大夫陈侃凤再次沟通了。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陈侃凤竟然失踪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1）

陈侃凤是在第三天晚上或者第四天凌晨失踪的，这天早晨，白白等候了3天的南鸣秋寻思这件事咋整的，目标怎么没有作出反应，于是就想去找陈侃凤探讨一下：对方是否会只用了外敷的伤药而未曾用内服的那些中药，凑巧让郭天唯把扭伤的脚踝骨给治好了？可是，南鸣秋在大车店前前后后转了一圈，没有看见陈侃凤，便以为她进城去买菜了，于是就坐在前面院子里抽着烟等候。

这时，有两个住店的农民汉子到柜上结账准备上路。没想到为了饲料钱跟伙计发生了争执，那两个农民认为牲口在大车店里待着，由店里的伙计统一喂食，这费用是已经包括在人的住店费用里面了；而伙计告诉对方，这银川地面的大车店规矩是人归人算，牲口饲料费归饲料费算，你们可以去打听一下，如果有一家大车店不是这样而是如你们所说的已经包括在人的住店费用里面的，那本店不但分文不收免去二位的所有费用，还情愿包一份礼物当众奉送，而且今后你二位只要来住店，一律免费！

尽管伙计已经把话说得这样硬扎了，但那两个农民汉子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样，接待他们的伙计就对付不了了，只好去请老板出马。哪知，陈侃凤却不在自己的屋子里。于是，伙计就觉得有点蹊跷了，因为陈侃凤平时这个时候如果不在大车店里的惟一原因就是她去城里采购副食品了，而这天她并没有去采购，上一天她已经把这事托给因为有事而去城里亲戚家过夜的店里的另一个伙计了。那么，女老板到哪里去了呢？几个伙计店里店外前前后后找了一阵，最后进了她的屋子，发现里间床上的被褥一片凌乱，这不合女老板以往的生活习惯，她是一起来就喜欢把被褥叠齐整并且要将屋子打扫清爽的，于是，终于意识到陈侃凤可能发生了什么不测。

顿时，众伙计都是一阵惊慌，当下也顾不得那两个农民汉子了，而那二位见势不妙也不啰唆了，乖乖赶着大车出门而去。伙计们七嘴

八舌判断着老板发生了什么情况，讨论应该怎么办，有人提出应当赶紧报案。南鸣秋自始至终一直在旁边冷眼观察着，这会儿听说要报案，心里觉得可能不妥，因为若是陈侃凤的失踪并非遭遇不测，而是另外原因一会儿会自己回来的话，这么一报案，事情肯定闹得沸沸扬扬，消息真真假假传遍小小一个银川城，如此结果，可能是会惊动有希望还会跟大车店这边联系的郭天唯等人的。可是，他目前以一个住店旅客的身份，贸然提出不要报案，那也显然不妥，人家也不会接受这种提法。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侦查员党大旺悄悄贴了上来，对专案组长轻声提了个建议。南鸣秋听之大喜，当下便挤进人群对众伙计说："这事该报告官府，听说这位先生正好要去城里，那你们就请他代为报告一下就是了嘛。"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2）

众伙计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于是就都冲党大旺拱手拜托。党大旺于是匆匆骑了他住店时带来的那匹红马匆匆出门而去，当然，进城是进城了，但根本没去报案，而是进了一家茶馆喝茶了。

这边大车店众伙计正等着报案的下文时，店里资格最老的那个将近六十岁的伙计兼账房高老头来上班了，他听说此事后，镇定地作出了分析：从后院陈侃凤住的屋子情况看来，老板不会发生什么不测的，因为如果她是遭人绑架的话，凭她那手太极功夫，肯定会作一番反抗，但屋里没有打斗痕迹，所以，她可能是有急事匆匆离店了。什么急事？多半是出急诊了。

急诊？众伙计不理解了，老板又不是大夫，只不过有时替跌打损伤来大车店求治的人推推捏捏，写几味中药让人家去熬汤喝，据说效果还不错，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人请她出诊的呢？

高老头是大车店前任老板留下来的人，也是陈侃凤当老板后最早的一名伙计，当下他显出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说老板刚开始执掌“双阳大车店”的时候，遇到伤家紧急状况登门相请时，她是出过诊的。后来，银川人知道她的叔父是第17路军的国术教官，连马鸿逵马大帅也向其请教过国术后，就没有人敢开这个口了，宁愿雇人把伤家几十里地抬过来。现在，马大帅已经被解放军打败逃走了，是共产党执掌天下，讲究人人平等，所以可能有紧急受伤不能动弹的伤家来请老板出诊了。大家不要着急，可以去老板屋里仔细看看，以老板平时的习惯，如果是出急诊的话，她是会留下字条的。

于是就重新去后院陈侃凤屋里查看，还真的在桌上发现了一张匆匆写就的条子，上面写着：我去出诊。

这时，陈侃凤回来了。南鸣秋一看她的神色，就知道这趟诊肯定是为“神枪大盗”郭天唯而出的。

陈侃凤这是怎么回事呢？她跟专案组一样，也以为郭天唯3天之内肯定会来跟她联系继续治疗之事的，哪知3天过去了，却是消息全无，不禁就觉得奇怪了，寻思难道那主儿竟然真是胡乱瞎撞了一下只用外敷药没服汤药而把扭伤的脚踝骨给治好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只好看作是天意了。昨天前半夜，陈侃凤就是被这些念头搅得难以入睡，直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总算睡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她被一下极细微的声音惊醒了。习武之人都是极为警觉的，陈侃凤马上一个翻身从床上悄然滚落地下。定睛一看，房门已经被拨开，一条黑影轻悄悄地溜了进来。陈侃凤没等对方的眼睛适应室内的黑暗，已经一跃而起卡住了对方的脖颈。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3）

这个悄然潜入女老板卧室的家伙正是9月30日前来“双阳大车店”投宿的两个特务之一连某，陈侃凤看清后心里一喜，暗忖看来是有戏唱了。果然，她一松手，连某在喘匀了气嘀咕了一句“陈老板你真了得”后，就说明了来意：请其出诊替郭天唯治伤。陈侃凤说治什么伤，不是已经给你们配过药了吗？连某说药已经用了，听说推拿效果更好，所以想请陈老板出诊。陈侃凤说哪有像你这样请人出诊的，撬溜门锁，贼不贼强盗不强盗的？连某马上连连拱手，反复表示歉意。然后从怀里拿出10枚大洋，说这是出诊费，请陈老板无论如何赏脸帮个忙。

陈侃凤其实当然是肯出诊的，郭天唯究竟藏身何处她应当对专案组有个交代。于是在连某反复央求下终于松了口，但她担心专案组不知她去了哪里而着急，于是就写了张条子放在桌上，当然不能写是怎么回事，反正侦查员看见了自然清楚了。连某看着她写下了那几个字，催着她出门。

连某先前是从后院墙上攀越进来的，此刻他坚持仍旧这样出去，说实在不想惊动任何人。陈侃凤于是和其一起越墙而出，外面路上停着一辆马车，一个压低了帽檐看不清脸面的车夫坐在路边等候着。连某请陈侃凤上了车，自己坐在旁边，掏出一条黑布：“陈老板，非常非常不好意思，这个请你……”

陈侃凤理解对方的心思，但她不能乖乖就范，否则可能会引起对方的怀疑，于是便怒道：“真是岂有此理！世上哪里有这种请出诊的路子的？”说着，佯装欲下车。连某连忙扯住，一番好话后，陈侃凤这才接受，把黑布条扎住了眼睛。

其实，即使不蒙住眼睛，天地间此刻也是一片黑暗，再说还有车篷，哪里看得见经过些什么了？不过，陈侃凤已经打定了主意，寻思

得记住马车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打了几个弯？银川城郊她还是有点熟悉的，只要大致上记住了方向，回头就能说得出究竟去了哪里。

但是，对方既然想到了蒙眼，那就会想到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这辆马车一路上不知转了多少弯，陈侃凤先还“左—右—右—左”地暗暗记着，渐渐就记不准了，只好无奈地暗自叹了一口气。幸亏她同时还按着自己的脉搏测算着时间，所以最后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她知道马车一共行了大约1小时10分左右。马车停下的地方显然是一个不算很小的村庄，因为她听见了接二连三的狗叫声。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4）

陈侃凤下车后才被摘去了蒙眼的黑布，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四周都有围墙的院子里。随后，她就被连某请进了一间亮着煤油灯的屋子。屋子分内外两间，收拾得很是整洁，外间墙上还挂着一幅国画。她刚在茶几旁的椅子上落座，门帘一掀，白某打着哈哈从里间走出来。他冲陈侃凤不住地拱手，连称“抱歉”，叫着“翠枝，沏茶”。从外面进来一个下人模样的年轻姑娘，给陈侃凤送上了一杯香茶，陈侃凤没有喝，但闻出那是茉莉花茶。

陈侃凤主动询问：“伤家情况怎么样？”

这时，郭天唯拄着拐杖从里屋一瘸一瘸的出来了。陈侃凤定睛一看，正是9月30日到“双阳大车店”来赴筵席的那个男子。陈侃凤询问了其用药情况后，感觉到对方对于她在药上所做的手脚并未产生怀疑，心里就定了下来，说看来你们今晚像搞绑架似的把我弄过来还是做对了，我得对这位先生用推拿手法进行活血过宫治疗了，不过可能有点疼痛的，希望先生得忍一忍。郭天唯大笑，说疼痛算得了什么，只要好得快，即使像关云长那样刮骨疗毒也尽管来吧。

陈侃凤于是就动手了，心里已经确定了治疗方案：要让对方感觉到有效，但不能一下子就治好了，否则这主儿如果性子急，我前脚一走，他后脚就进银川城行刺解放军杨司令，一旦真的让他得逞了，那我岂不等同于害了人家杨司令吗？心里想着，手上已经如此进行着推拿，一会儿，郭天唯脸露喜色，说陈老板的医术果然了得，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好多了。陈侃凤又治疗了一会儿，住了手，让郭天唯不用拐杖，直接走走看。郭天唯试着走了走，大笑：“哦！行了行了！”

陈侃凤暗忖如果真的行了那还能显出我的本领吗？于是便说还得巩固，那药也还得用着。

白某、连某也是一脸的高兴，连连称谢，让翠枝端水进来给陈侃凤净手，然后又吩咐上夜宵。陈侃凤也不客气，由3人陪着不慌不忙地

吃过后，这才开口告辞。白某说陈老板不如你就在这边住下吧，多给他推拿几次，好起来就快了，你说是不是?

陈侃凤微微一笑，说这可不行，“双阳大车店”少我一天也不行，我在银川地面上给人治疗跌打损伤，还没有这种宿于伤家的先例，况且我是像被绑架似的悄悄离开大车店的，只留了一纸不明不白的条子，如果不回去，那肯定会引起店里众伙计的怀疑，必然会张扬出去，那这动静就大了，你说呢? 白某马上领会了陈侃凤话里的意思，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就点头道，那就送陈老板回去吧，不过请陈老板理解，还得委屈你一下，要把眼睛蒙上。陈侃凤说这个我知道，就按你们的规矩办吧。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5）

陈侃凤如此不慌不忙地折腾了一番，这时已经是拂晓时分。她和白某、连某站在院子里等着大车进来时，无意间发现院墙外有一个高高的建筑物似的轮廓，寻思这是一个标志，便暗暗记在心里。一会儿，大车进了院子，连某给陈侃凤蒙上眼睛，还是由他陪着上了路。大车七拐八弯地行了个把小时，陈侃凤也不清楚是否是来的那条路，反正当大车在“双阳大车店”附近的小学门口停下取下蒙眼布时，天已经亮了。

当下，陈侃凤把上述情况向南鸣秋一一作了陈述。南鸣秋听了又惊又喜，寻思若对方执意把陈侃凤留下的话，那往下的事儿就不好办了，现在有了这些线索，看来就能找出刺客的藏身之地了，赶得好今晚就能把他们一锅端了。当下就悄悄通知几个侦查员分头进城，找个地方开案情分析会。

眼下的分析就简单了：方案是先找到郭天唯的藏身之地，然后根据情况决定几时采取行动、如何下手。怎样找陈侃凤去过的那个庄子？南鸣秋回忆了陈侃凤的陈述内容，总结了几个特点：大车故意是绕道而行，速度也不算快，行了个把小时，估计离“双阳大车店”的距离不会超过20里；藏身之处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门外附近有一高高的建筑物；这个大户家有个丫头或者小妾之类的名叫“翠枝”，主人喜欢附庸风雅，在墙上挂了国画之类。

行了，就按照这几个特点寻找吧。银川这地面虽说有“塞上江南”之称，但被马鸿逵折腾了那么多年早就弄得一穷二白了，银川城外方圆二三十里之内具备这种特点的大户恐怕属于凤毛麟角了，大伙儿骑马分头一溜只怕就能找到的，不过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请当地同志协助为好，让军管会公安部布置下去就行了。

果然，下午两点，专案组就获得了消息：那个地方是距银川城八里地的永贤庄的牛大户宅院。牛大户，名叫牛得水，回族，是银川地

面有点名气的一个财主，其两个儿子均系国民党军官，一个在马家军当团长，已在前不久被解放军第19兵团打死，另一个是国民党保密局少校，据说随同保密局总部逃往台湾了。

南鸣秋立即将情况报告上级，请示立即行动，自然得部队配合，出动一个排就行了。领导的意见是：同意立即行动，但必须保证万无一失，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四（6）

南鸣秋受命全权负责，他是军人出身，自然知道什么叫“军令如山”，寻思这事儿只要一个考虑不周，只怕就要坏事，于是就把行动方案摊到桌面上，和几个侦查员逐点逐点商讨。事后证明，这种慎重是很有必要的。他们考虑到万一在这段时间里目标可能已经转移，一旦扑空势必会受惊动而隐藏起来，所以还是先派人前往侦查一下为好。

专案组惟一的银川当地人小许和市军管会指派的另一本地同志化装成走村串乡的货郎前往永贤庄侦查，南鸣秋指挥一个排的解放军在距永贤庄3里地的野地里佯装训练，一旦确认目标未动，立刻行动。

小许两人打听下来，牛大户家的3位客人已经于当天上午离开了，不知去向。

南鸣秋闻讯大惊：难道已经打草惊蛇啦?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五（1）

小许两人被请到专案组临时征用的一所小学校长室里，详细介绍情况。归纳起来是：郭天唯3人上午已经离开永贤庄了，去了哪里无法侦知。牛得水一家仍在庄子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动静。

专案组经过分析，认为照这情况看来，目标的离开可能不是因为已经对陈侃凤产生了什么怀疑，而是原本就在其计划中的一种出于安全谨慎方面的考虑。很有可能陈侃凤如果答应留下继续给郭天唯治疗的话，上午也会让她跟着一起转移了。至于转移到何处去了？估计离永贤庄不会远，可能也是另外一个什么什么大户之类。这样，看来目前应当采取的方案是继续侦查，查摸到目标的新落脚点后按照原计划采取行动。

如何查摸？有人提出秘密逮捕牛得水，估计这主儿肯定知道目标去了哪里，可能他们还约定了联系方式之类。但经过反复探讨，还是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目前还不清楚牛得水在永贤庄的势力范围，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安排了万一出事后与目标方面的报警手段，如果已经安排了，那这边一动手，目标那边马上就知晓了，还不赶紧滑脚开溜？况且，如果牛得水被捕后坚称没有这回事，那不但保全了白某方面的机密，还替自己排除了罪行，你又能拿他怎样？

那么，应该采用什么有效方式去查摸呢？反复商讨下来，最后决定还是请“双阳大车店”女老板陈侃凤出面。

南鸣秋去了大车店，把情况对陈侃凤一说，陈侃凤点头说没有问题。那么以什么借口前往？又以什么借口对她怎么知道昨晚去过的地方就是永贤庄而此刻能够摸过去作出合理的解释呢？陈侃凤说后一点没有问题，因为她在银川待的年头已经有点久了，方圆数里的地盘哪有弄不明白的？还可以骗对方说自己曾学过辨认方位的秘术。前一个借口，那倒需要考虑一下的。陈侃凤想了一会儿，说要不就说昨天收了10元大洋，只推拿了一次，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笔出诊费已经超

过平时一般伤家的10倍了。正好她到附近办事，就顺便过来一趟，想再替伤家治疗一次，顺便带点祖传的只有自己在练功时受了伤才使用的珍贵特效伤药让郭天唯试试。估计如此一说，牛得水是能够接受的。只要牛得水不产生怀疑，陈侃凤相信自己是有法子打听得到目标下落的。

南鸣秋考虑后，想想目前也只有这样做了，于是就点了头。

事后想来，南鸣秋对于自己的这个决定颇有些后悔，因为他绝对没有想到此事已经到了这一步了竟然还会发生绝对意想不到的意外。

这个意外是：陈侃凤竟然一去不返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五（2）

陈侃凤出发时是下午5点，去永贤庄来回不过八公里地，骑马往返加上跟牛得水打交道，再怎么着两个小时已经足够了。可是，到了晚上8点陈侃凤还没有回来。专案组分析，可能是目标的新落脚点离永贤庄并不远，陈侃凤在取得牛得水的信任后牛直接把她领去给郭天唯治疗了。于是又耐着性子等候，又等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南鸣秋着急了，后悔先前过于谨慎没敢派人跟着陈侃凤悄然去永贤庄。他决定让“双阳大车店”派人前往牛得水那边去打听老板的下落，调两个侦查员跟去，在牛得水宅院附近监视着，如果发生意外，一个留下继续监视，另一个立马回来报告。

一小时后，派去打探陈侃凤消息的大车店伙计回来了，说他见到了牛得水，看神情牛得水没有任何惊慌。据牛得水说，陈老板确实是去了他那里，但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那么去了哪里？牛得水一脸神秘的说他不知道，但那诡秘的笑容使伙计觉得他显然是故意隐瞒。牛得水又说，让伙计不必着急，陈老板今晚肯定要回来的。伙计见再也打听不出什么新的情况了，于是只得告辞而返。

这下，专案组诸君心里总算定了，这还有什么猜疑的，肯定是陈侃凤被牛得水送到附近什么地方去给转移到了那里的郭天唯继续治疗了。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那就等着女老板回来吧。

这一等，一直等到了午夜时分。众侦查员已经等得差不多几乎又重新觉得要起怀疑时，陈侃凤忽然回来了。她朝等候在大车店院子内的南鸣秋等人笑了笑，说：“我去屋里一下，回头咱们再聊。”

南鸣秋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起疑的地方，寻思陈侃凤大概是去后院她那屋里擦把脸换身衣服什么的，一会儿就会唤他们进去作一番详细陈述的，当下就客气地点头：“哦！陈老板辛苦了，一会儿咱们再见面。”

哪知，陈侃凤这一去一直过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消息。南鸣秋觉得似乎有点蹊跷了，于是就唤那个先前奉命去永贤庄打探消息的伙计："老二，麻烦你去后院看看你家老板在干什么，问她这会儿是否有空，就说我要去拜访她一下。"

伙计去了后院，只见陈侃凤的那个屋子窗口里映着灯光，于是就轻叩窗户唤着："老板！老板！"但屋里没有声音，伙计感到有点奇怪，于是就到门口去，举手敲门，但那门并没拴，一敲就开了，他一边叫着"老板"一边探身进去张望，外间没有人影。于是索性入内，里间的门也没有拴，一推就开了，同样亮着灯的里面却仍是不见人影。

伙计这下傻了，愣了愣，回头出了屋子，到前面来向南鸣秋等人报告。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五（3）

南鸣秋听了这消息，也是一个激灵，最初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不可能！于是一边让老二和另一伙计在全大车店寻找陈侃凤，一边叫上两个侦查员前往后院察看。进得屋去，外间没有什么异样，里间却发现了问题：箱子柜子都已经打开了，里面一片混乱，像是遭受过洗劫的样子。侦查员粗粗一检查，发现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衣服了，更别说金银首饰贵重细软了。

南鸣秋心里一凛，马上出了屋子赶到后院墙那里去查看，手电筒光下，只见一架梯子翻倒在墙脚下。再看墙头，有着明显的越墙痕迹。

咦！难道陈侃凤带着贵重细软弃店而跑了？这可能吗？或者，是被人绑架了？又是谁绑架了陈侃凤，要说是白某那伙子，那她先前就是从他们那边过来的，既然要绑架她，那就不必放她回来就是了嘛。而如果说陈侃凤是从白某一伙那里逃出来的，那她进门看见南鸣秋时，又为何没有说明这点而要匆匆进屋里去了呢？眼下的情况不单单是人不见了，连贵重细软也不见了，如果是出了事，那副样子显然是连人带财一并打劫了，下手的人有必要对一个大车店老板这样做吗？他们要犯事，一样冒一个风险背一个罪名，银川地面比陈侃凤更有打劫价值的对象有的是，又何必盯着陈侃凤下手呢？

如此看来，只有一个结论了：是陈侃凤自己主动收拾了贵重细软出走的。

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冒了出来：陈侃凤为何要扔下大车店选择出走之路？

这，需要专案组作出回答。也许，回答了这个问题，就能破获这起案件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1）

紧急案情分析会议随即举行，众人首先企图试着分析陈侃凤出走的原因，但这不是写小说，可以让人任意编造，所以分析着就无法进行下去了。

专案组长南鸣秋说如果我们把精力耗费在这上面，只怕折腾到天亮也没有一个结果，也许还会把人的脑子越弄越糊涂，还是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吧。于是大家开始议论下一步的侦查应当从哪里着手进行下去，最后一致得出结论：看来只有去动一动永贤庄的牛大户牛得水那主儿了。

白天调来准备协助行动的那一个排的解放军还在专案组手里，这天晚上就驻扎在“双阳大车店”附近的那所小学里，于是就通知他们配合行动。半个多小时后，永贤庄已经被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包围，南鸣秋带着几个侦查员越墙潜入了牛得水的宅院，很快就控制了牛得水以及全家。

南鸣秋代表银川市军管会向牛得水宣布：因涉嫌勾结国民党特务搞破坏活动，立即逮捕！其家人暂时圈禁，不准自由行动，宅院进行搜查。

搜查时，对牛得水的讯问也在同时进行。原以为要费一番周折方能获取牛得水的口供，哪知这主儿一上来就乖乖道出了情况——

牛得水的大儿子牛福明，是马家军第11军的一个团长，宁夏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牛得水最初并不知晓这个消息，直到9月23日银川解放的次日，才从匆匆逃来请求避难的白某白如彪、连某连寻彰口中得知。白如彪以前曾是牛福明的下属，牛福明当营长时白如彪是其手下的一个连长，后来白如彪被调往马鸿逵的直属情报队当了一名组长。马鸿逵的直属情报队在马家军中很有影响，因为其职能中的很大一个方面就是监督马家军各部队的情况，一直可以监视到各部队的正官，因此被人称为“马氏军统”。牛福明本与白如彪关系不错，在得知白如

彪被调任情报队担任组长的消息后，为了拉拢白如彪，就提议跟他结为异姓兄弟。当时，牛福明的部队正好驻扎在银川郊区，于是结拜仪式就在永贤庄家里举行。白如彪小牛福明七岁，就成了牛福明的小弟，当时也拜见了牛得水夫妇。因此，牛得水对于白如彪自有一份特殊感情。此刻，当白如彪送来牛福明阵亡的消息，并且要求和同伴连寻彰暂时在牛家宅院避避风头时，牛得水自无二话，一口答应。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2）

最初几天，白、连两人待在牛家足不出户，闷得慌了也不过就在院子里散步。到了大约9月28日，两人才开始外出活动，牛得水不知他们去了哪里，反正都是早出晚归。只有9月30日那天两人没有回来，次日牛得水正担心他们是否出了什么事时，两人平安无事地回来了。但当晚就又出去了，次日白如彪返回永贤庄，对牛得水说要一辆马车，牛得水满足了他的要求。当晚，白如彪和连寻彰一起回来了，马车还载回了一位被称为“郭先生”的男子。这位郭先生的脚扭伤了，难以行走，是让车夫背进屋里的。白如彪对牛得水说，郭先生是他的好友，不慎扭伤了脚踝骨，需要暂时在牛家养伤。牛得水自然点头，让人殷勤款待，还向白如彪介绍说可以请南门外“双阳大车店”老板陈侃凤疗伤，肯定有效。这样，白如彪夜访大车店求医，次日让连寻彰从陈侃凤那里取来了伤药。由于药效似不特别明显，又悄然请来陈侃凤推拿了一次。

陈侃凤离开后不久，天色已明，白如彪在连寻彰送陈侃凤回大车店返回后，不知怎么的忽然说要离开永贤庄两三天，去附近哪个隐蔽地方避避风头。他征求牛得水的意见说您老看去哪里比较合适。牛得水想了想，说要么去3里地外的他家那个已被废弃的砖窑，那里还有他家的十几亩瓜地，每年夏天派去看瓜的人就住在废窑里，所以还放着一些简单的炊具什么的，只要带上被褥、粮食等吃食就行。白如彪说行，于是就让牛得水派了辆马车把他们3人载了过去。

昨天傍晚，前天晚上那个秘密接来推拿的大车店女老板忽然登门。牛得水是知道她是被蒙着眼睛接来的，当下见了便有些奇怪，问陈老板你怎么知道昨晚你到了我家呢。陈侃凤说我自小习练辨认方位奇术，这点方位还不能识别的话，我还能在这地面上混这么些年头吗？牛得水也听说过陈侃凤的叔父是马家军的国术教头，还精通周易什么的，深受马鸿逵信任，当下便信以为真，并不生疑心。陈侃凤说

明了她的来意：还需要给郭先生治疗一次，免得在江湖上落个“唯利是图，半途而废”的坏名声。牛得水信以为真，于是就派人把她送往废窑去了。

送去的人返回后对牛得水说，那边白如彪他们对于陈侃凤的到来像是很欢迎的样子，牛得水寻思这就没事了，反正即使有事白如彪他们也会处理的。所以，当“双阳大车店”伙计前来询问陈侃凤的下落时，他就很肯定地打了保票。至于陈侃凤去了废窑那边后发生了什么事，他就一点也不清楚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3）

南鸣秋听了牛得水的这番口供，寻思看来得马上采取行动了，否则一旦牛得水被捕的消息泄漏出去，那边躲在废窑里的那3个家伙还不是立马就开溜。反正上级已经授权他指挥那一个排的兵力了，他也不必另外请示，说行动就行动吧。于是，南鸣秋就请来带队的张排长，说了行动意图，让布置下去。他特别指出了需要加以注意的一点：举报人陈侃凤可能也在废窑里，必须绝对保证此人的安全。

兵贵神速，于是立刻行动。部队由牛得水带路，悄然扑向3里外的废窑，四下里团团包围，没有发出一丁点儿的声响。南鸣秋和侦查员王必庭、党大旺、麻志清以及张排长指派的两个战斗骨干，押着牛得水来到废窑门前，各自隐蔽后，示意牛得水上前叫门。

牛得水战战兢兢地来到窑门口，轻轻叩着木门：“ 开门！开门！”

里面传出郭天唯的声音：“ 哪个？”

“郭先生，是我——老牛啊！”

“老牛，你不是已经‘老掉’了吗？”

“呵呵，郭先生您开玩笑哩，我……”

一声枪响，牛得水倒地而亡。废窑里传出郭天唯的冷笑：“嘿嘿！外面的主儿听着，老子有‘千里听’神功，早就知道你们往这边来了，还听出你们一共来了40来号人马。嘿嘿，不瞒你们说，若是老子有兴，这点人马还不够填我的牙缝哩！‘神枪大盗’的威名你们总听说过吧？”

“嚣张！”南鸣秋嘀咕了一声，随即提高了嗓音，“ 郭天唯你听着，你先把双阳大车店老板陈侃凤交出来！”

哪知里面马上传出了陈侃凤清脆的嗓音：“是南先生吧？你不必为我担心，我是自愿前来投奔郭先生的。你们若是为我而动兵，那就请退兵吧。这边我已经跟郭先生谈妥了，他放弃行刺杨司令的那笔买卖，我们马上离开银川，离开宁夏。白先生、连先生你们说是吗？”

那二位马上附和：“对！对！对！请南先生网开一面，我们退出宁夏。”

南鸣秋说：“好啊，那你们出来吧。”

话音未落，枪声又响了，幸好南鸣秋经验丰富兼身手敏捷，早已隐蔽，饶是如此，子弹还是掠去了一束头发——神枪大盗的枪法果然厉害！

南鸣秋顾不上吃惊，倒是为陈侃凤怎么会投到郭天唯那边去而感到不解。这时，张排长贴近过来，轻声道：“那家伙的枪法十分了得，看来现在外面的人必须非常非常小心，我已经传令不准开口说话，南科长你也不要再说话了。我们开始进攻吧？就这么两扇破门，还挡得了咱们？一阵机枪子弹扫上去就打烂了。”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4）

“可是，那个陈侃凤可不能伤害啊，她是举报人，尽管现在这么叫喊，但也许是被迫的呢？”

张排长为难地晃了晃脑袋，对着已被晨光映得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得清轮廓的废窑眨巴着眼睛，片刻，点头道：“好的，我想办法吧。”

张排长的办法是用烟攻，他让人取来一些柴禾，堆得远远的点着了火，往上面泼了些水，正好风向是朝废窑那边的，于是浓烟扑向窑门，足可掩住了对方的视线。两个战士手持长叉推动柴禾朝废窟门前拨拉，哪知郭天唯听声辨位，两下枪响将两名战士击倒！

“外面听着，别指望救了，老子开枪打中的，向来没有救的！谁救，谁死！”

张排长撩手就是一枪，但郭天唯隐蔽得很好，没有击中，废窑里传出一阵冷笑声。

张排长气得以手击头，几乎难以自制。这时，侦查员麻志清爬过来，轻声说了一个主意。张排长一边听一边点头，马上传令执行。

几个战士爬上了废窟顶部，用绳子吊着点燃后又浇了水的柴禾从上而下悬吊下来，堆放在窑门口。然后，又从上面往下抛了大量柴禾。如此折腾了一会儿，废窑前面，张排长让人从隐蔽处往窑门前扔石头，里面不再开枪，也没有声音。麻志清的计谋实施成功了，废窑内的4人全部被浓烟熏得昏了过去，一个个像死猪似的被战士们拖了出来。

就地实施抢救，卫生员指挥众战士把4人抬到通风处，以冷水泼浇脸面，片刻，郭天唯第一个苏醒，马上用绳子绑住。接着，白如彪和连寻彰也醒了过来，也上了绑。陈侃凤是最后醒来的，睁开眼睛就叫着“苏大远”。众人不知“苏大远”是何人，都不作声。陈侃凤撑着坐起来，转眼一看被绑成一个端阳粽的郭天唯，马上扑过去，抱着神枪大盗伤心地哭泣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大远”。

南鸣秋等侦查员看得简直懵了，寻思这神枪大盗不是叫郭天唯吗，怎么又有了一个“苏大远”的名字？这大车店女老板又怎么会把神枪大盗当亲人似的又抱又哭的如此折腾？还没想明白时，陈侃凤忽然眼泪滂沱地看着四周围住他们的战士，用下命令的口气道：“绳子呢？把我也绑起来！和他绑在一道！”

侦查员麻志清上前：“陈老板，这是怎么回事？”

陈侃凤说：“怎么回事会告诉你们的，现在，你们先把我绑上，和他绑在一起！”

“这……”

“如果不打算绑我，那要么把他松绑。”

“这不可能，此人是杀人凶手，重大犯罪分子。”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5）

“不绑我，那我就撞死！”话音未落，陈侃凤忽地一跃而起，4个战士迅即拦她，被她以太极拳借力打力的功夫闪电似地掀翻。幸亏南鸣秋和张排长眼疾手快，跟着出手，才算终于将其揪住。

南鸣秋摇了摇头，仍是一脸的不解，但还是下令：“绳子呢？给陈老板上绑。”

陈侃凤听了马上停止反抗，坐在地上，乖乖地把双手反背于后面，让战士给她上绑。

一旁的神枪大盗郭天唯大声道：“好！好样的！没丢老陈家的脸！”

张排长大怒：“他妈的！没你开口的份，给我闭嘴！”

一个大个子战士叫着先前死于郭天唯枪下的烈士的名字，撩手打了郭天唯一个耳光，哪知，他的手还没有完全收缩回来时，陈侃凤闪电似地飞出了一脚将其绊倒。懂武术的南鸣秋看出这一脚还算是留了情的，否则冲裆部来一下当场要了他的命也难说。这下，南鸣秋就更加弄不懂了：陈侃凤跟郭天唯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直到把被捕者押送到银川市军管会公安部经过一番讯问后，方才弄清楚——

神枪大盗郭天唯，原名苏大远，山西闻喜人，出身一个开中药铺子的商人家庭。大约20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其父苏希仙从邻县收账后徒步返回时迷了路，夜宿一荒庙时与正好也在庙里燃火取暖的一个河南汉子相识，两人在火堆旁饮酒畅谈，竟然一见如故，聊得极为投机。半夜，有几个外出打劫没有收获的强盗路过荒庙，见这两个夜宿者带着简单的行李，看衣着却不是贫穷之人，料想有些油水的，便企图作案。哪知，这个河南汉子的功夫了得，只身一人以徒手对付4条手执兵器的彪形大汉，眨眼间就把他们悉数击翻，狼狈而逃。

这个河南汉子，就是陈侃凤的父亲陈子仙，他是外出访友途经闻喜的。当下，苏希仙拜谢了陈子仙，两人互道姓名，发现各自的名字里都有一个“仙”字，便认为这次雪夜荒庙相遇乃是天意，于是便决定结拜兄弟。苏希仙为兄，陈子仙为弟。两人又聊到各自家庭情况，因为有了一层相见恨晚的情感，便决定把苏希仙的儿子苏大远和陈子仙的女儿陈侃凤撮合一起，日后结为夫妻。

之后，陈子仙和苏希仙常有书信来往，也曾见过数次面，但苏大远和陈侃凤却从未碰过面，不过双方家里包括两人本人都知道已有这个婚妁之约。这种情况在当时算不上稀罕，每个地方都能找到一大把相同的例子。苏、陈两家原本约定在1937年底给苏大远和陈侃凤成亲的，但婚事尚未准备时，抗日战争就爆发了，陈子仙应国军第15军之约，前往担任国术教官，而苏大远作为热血青年，也毅然参加了国军，效力战场，于是此事只好暂时搁下。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6）

如果不是中条山的原因，这对青年的人生道路也许不会是后来的这个样子。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向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3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日本侵略军在1938年至1941年间，先后13次对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苏家所处的闻喜和陈家所在的孟县正是属于中条山地区，所遭受的战火损失可想而知。苏、陈两家还因此而中断了信息联系，甚至互相还不知生死。1941年之夏，侵华日军华北部队10万人出动，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中条山发起进攻，此役历时一个多月，最后以中国方面败北而结束，这就是现代战争史上著名的“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战役使陈侃凤损失了在国军第15军担任国术教官的父亲陈子仙，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家人也都死于战火之中。等到战役结束，陈侃凤已经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女。无奈之下，陈侃凤一路讨饭前往山西闻喜，想去寻找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苏大远。但是，闻喜已

经没了苏家的中药铺子，陈侃凤反复打听，最后得知苏家跟她家差不多，也是多人死于战火，只有苏大远因从军在外幸免于难。那么苏大远在哪里呢？据说他在兰州，好像已经不在军队干了，在做买卖吧。

于是，陈侃凤二话不说，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马上作出决定：前往兰州寻找苏大远！

陈侃凤辗转到了兰州，她在兰州待了两年，足迹遍布整个兰州地区，可谓历尽艰辛，可是始终没有打听到苏大远的消息。在银川城当马鸿逵部队国术教官的叔父陈子灵几次捎信让侄女前往银川，陈侃凤遂于1944年从兰州去了银川。这段情节，陈侃凤从未向外人透露过，所以人们都不知道，只说她是从豫北老家孟县过来投奔叔父的。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7）

陈侃凤到银川后，仍不死心，还是想着留心打听苏大远的消息。她知道大车店是过往客商的必经之处，于是就动起了经营大车店的脑筋，正好这时银川南门外的“双阳大车店”要盘出去，陈侃凤于是说服叔父盘下了该店，由其经营。叔父知道侄女的心思，自然支持。

但是，陈侃凤经营着大车店数年打听下来，却始终没有打听到苏大远的消息。其实，陈侃凤不知道，苏大远早就待在宁夏了，他在胡宗南部队从军。苏大远对射击具有先天的特殊感觉，只跟枪支打了一年交道，就已经到了指哪打哪的程度，遂被抽调到了胡宗南的卫队。苏大远还有一个天生的特点，喜欢挑战强势，专跟长官抬杠。当然，胡宗南这样的高级将领他是不敢抬的，但司令部的什么处长、主任之类得罪了不知多少。终于，长官们忍无可忍了，决定惩治这个不知高低的主儿。他们联合起来收集了苏大远的种种劣行，整理成材料，送到军法处要求军法惩治。胡宗南对于苏大远的枪法是非常欣赏的，这也是之前那些处长主任之类整不倒苏大远的主要原因。但这回军法处出面要玩真的了，而胡宗南又正好去了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重要会议了，看来没等他回来苏大远的人头就要落地了。不过苏大远在和他一样身份的士兵中颇有人缘，因为他平时重义气，肯为朋友两肋插刀，所以在各个部门都有哥们儿。很快就有人偷偷向他透露了消息，于是，他就赶在人家下手之前来了个不辞而别。当他的对头们发现这主儿已经失踪后，往回一想，不禁一阵后怕：凭苏大远的那手枪法，如果他要在离开前干他们一家伙，那军营里可就热闹了。幸亏苏大远没有这种打算，仅仅是带走了他平时寸身不离的两支手枪和100发子弹。

从此，苏大远改名为郭天唯，宁夏省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神枪大盗”。由于他一年只作一次案，而且每年调换作案地点，所

以“神枪大盗”名气虽响，但民愤却有限，反而使他颇具传奇色彩，有的地方甚至将其说成是一个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

对于大车店老板陈侃凤来说，其实早在数年前就已经耳闻过“神枪大盗”之名了，但她怎么也不曾想到这人就是她苦苦寻找了8年的未婚夫。一直到这次9月30日当面见到了郭天唯其人，还是一无所知。她的叔父跟着马鸿逵去台湾时，曾想动员她一起去的，但她对于寻找未婚夫还抱有一分幻想，寻思说不定哪天苏大远就会冷不丁冒了出来。但是，当9月30日苏大远真的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却一点也不知道。这也难怪，因为两人从未见过面。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8）

这次陈侃凤按照专案组的安排前往永贤庄打探郭天唯等人下落时，跟着牛大户的下人去了郭天唯3人藏身的废窑。那3位对于她的出现是又惊又喜，自有一番盘问，被她应付过去了。白如彪说，我们出于谨慎，已经转移了地方，现在新地方让你知道了，为保证安全，陈老板你暂时不能离开，一直到两三天后我们撤离此处时方可允你返回大车店。陈侃凤寻思先答应下来再说吧，于是就点了头，然后就给郭天唯推拿治疗。

郭天唯生性高傲，平时不大愿意跟等闲之辈搭话。对于陈侃凤也是这样，但他经陈侃凤治了几次觉得已经基本痊愈，便对陈侃凤开始另眼看待，觉得这个女子有点本领。当下在废窑里待着也是待着，闲着无事就和陈侃凤拉呱起来。双方像是盘底样的先打听对方的籍贯，陈侃凤说是河南孟县，郭天唯没有在意，说自己是山西闻喜人氏，不过已经离家多年，到西北也已经将近10年了，所以连说话也是西北口音了。

陈侃凤一听“闻喜”两字，立马来了精神，多年来她一直这样，只要碰到闻喜人，肯定要打听老苏家的情况。当下就打听开中药铺子的老苏家。这样一来，双方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什么人，对于各自意味着什么。

要说这陈侃凤，实在算得上一奇女子。一方面，她对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是如此痴情，另一方面，她对于给自己以信任的专案组也觉得不能对不起。于是，她没有透露专案组正在侦缉郭天唯和白如彪、连寻彰的机密，只是动员郭天唯退出江湖，跟她一起离开宁夏，返回老家山西去开家大车店之类的，两口子好好过日子。郭天唯在陈侃凤的劝说下，同意这样做。于是，陈侃凤就决定马上返回大车店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悄然出走。

这个结果，当然是白如彪和连寻彰所不愿意看见的。白如彪就提出为了安全，让连寻彰和陈侃凤一起去，还可相帮拿拿东西。郭天唯和陈侃凤对此没有异议。所以，陈侃凤返回大车店时，外面其实还有一个连寻彰，只是侦查员没有想到这一点而未去查看罢了。

陈侃凤离开的这段时间，白如彪对郭天唯展开了思想攻势，他抓住一点：你郭天唯是江湖上著名的“神枪大盗”，一向义薄云天，一诺千金，此番怎么碰到一个女人就变卦了，你已经收下了我们的定金，怎么不干活儿就要离开呢?

郭天唯当然自有他的一番道理，但是，像他这样的江湖客，还真的是凡事抬不过一个“义”字，当下让白如彪给说得有点想改变主意了。这时，陈侃凤回来了，两人就不往下说了。白如彪问了连寻彰知道此行并未被人跟踪，心里也就大意了，寻思到天明时再说吧，反正这会儿郭天唯、陈侃凤也不走。

4.“神枪大盗谋刺杨得志将军案” 六（9）

过不多久，正和陈侃凤说着话的郭天唯忽然一跃而起，说外面有动静，还是大动静呢。白如彪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连寻彰已经从门缝里张望到了解放军包围了废窑的一幕！

郭天唯马上断定是牛得水出卖了他们，正好这时牛得水前来叫门，被他一枪击毙。既然开了杀戒，那他干脆下起了杀手。还幸亏解放军采取了烟熏战术，否则这场血腥对决看来还得多伤几条人命呢。

对白如彪和连寻彰的审讯也在同时进行着，两人供出了谋刺杨得志司令员的阴谋：这是由马鸿逵亲自决定并交办的，因为他知道并非嫡系的马家军失守宁夏省可能会被蒋介石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为了减轻追究，就想到了以暗杀杨得志作为弥补，也算是对蒋介石的一个交代。

一个月后，这起谋刺案的3名主要角色郭天唯、白如彪和连寻彰，被银川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侃凤没有受到处罚，在关押3个月后被释放。这个身怀武功的奇女子，之后又上演了若干人生戏剧，这是另一文章的内容了，就此打住。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1）

1950年冬春之交，南京市破获了一起解放以来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一个号称“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将近300名成员悉数落网。本文是首次向读者朋友披露侦查该案的内幕秘闻……

一

南京名胜夫子庙，坐落于城内偏南侧的秦淮河畔，系东南第一文化古建筑群，也是著名的“秦淮文化”的精华之地和闻名遐迩的小吃美食世界。历史上，夫子庙曾在南宋建炎年间、元末明初、清咸丰年间、抗战初期累遭兵火焚劫。至1949年南京解放时，夫子庙作为历史文化古建筑群的功能已经丧失过半，但仍保持着大江南北数百种小吃的东南饮食文化特点，故在当时依旧为这座著名古城的一个繁华处所。

本文所记述的这起建国初期的江南名案的帷幕最初就是在夫子庙拉开的——

1949年1月13日中午11时许，一个身穿藏青色夹西装、外罩黑色花呢大衣、头戴鸭舌帽的30多岁的国字脸男子，来到了夫子庙秦淮河畔的“集大成酒楼”。跑堂客气地把他引进店门，按照客人的意思将其引领至临窗的一副座位，一边用抹布擦拭着其实已经一尘不沾的桌子，一边口齿伶俐地介绍着本店菜肴特色：以淮扬菜为主，兼理苏锡、徽甬、京粤、川湘诸帮，故名谓“集大成”。

“国字脸”漫不经心，一副似听非听的样子，接过另一位跑堂端上来的茶水，微呷了一小口，缓缓开口道：“你替我选4样清淡的菜就可以了，中盆的。酒？……来半斤白干就行了。几位？哦，放两副筷碟吧。”

跑堂马上报出了4样菜肴和酒的名称，得到客人的认可后，一边扬声吆喝着通知厨房，一边快速取来两副餐具。“国字脸”扫视了一下四周，把手中黑色牛皮公文包放在桌子靠窗口的那一侧。

如果用一架高级摄像机把“国字脸”放公文包时的那一瞬间的神情拍摄下来，进行慢速度播放的话，就会发现他的神情似乎有点异样，那是一种紧张和诡谲相交织的神色，由此可以想象这个公文包内多半装着具有重大机密或者极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予以特别防范。

“国字脸”事后回想起来，他对于自己的疏忽一定会深感后悔。因为他竟然没有留意到，已经有人在跟踪他了。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2）

跟踪“国字脸”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二十五六岁的大个子男青年，身高超过1米80，一张凶悍的脸上长着特别容易引人注目的两条扫帚浓眉，大冷天竟然只穿着一件球衣，外罩一件草绿色美国军用夹克衫，没有扯上拉链。此人一定长期坚持某项体育锻炼，练就了一身发达的肌肉，即使隔着一层球衣，也能看得见那两块发达的胸肌。这“扫帚眉”是在“国字脸”跟跑堂说话时上楼的，没有看“国字脸”一眼，背对着“国字脸”看着楼梯口一侧墙上的价目表，所以没有引起“国字脸”的注意。

另一位跟踪者倒是使“国字脸”的目光在其身上稍稍停留过瞬间，那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身体看上去很瘦弱，苍白的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穿着一件质地考究、制作精良的丝棉袄，看上去是一个出身富家的高中学生。“眼镜”不是跟“扫帚眉”一起上楼的，他是在“扫帚眉”上楼后片刻才慢慢腾腾地一步步捱上来的，一条腿有点微瘸，似是扭伤了的样子。别看“眼镜”年岁轻，却是一副老食客的架势，上楼后冲跑堂打了一个手势把跑堂招到跟前，询问有什么时鲜菜肴，然后在“国字脸”座位侧后面的一副单人座位前落座。“眼镜”的举止使“国字脸”觉得异样，但这种异样当时给他的感觉仅仅是“与众不同”，而没有与其防范意识联系起来。他只以为这个富家子弟是来花钱买醉以图一乐的，这也是历代文人追求的“秦淮文化”的一种形式。

接下来，“国字脸”就发现情况不对头了，那个“扫帚眉”看了片刻价目表后，竟然径直来到他的座位前，用屈起的手指关节叩着桌面，凶声凶气道：“让开！”

“国字脸”暗吃一惊：“什么？”

“叫你让开！老子要坐这里呐！”

“为什么？”

“我算了一命，瞎子说我面临灾难，今日午时必须在这家酒楼的这个位置待上一个时辰，方可得以解脱。”

“国字脸”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钻进一个套套，顿时火往上涌：“如果我不让呢？”

“扫帚眉”仰面大笑：“哈哈……敢跟老子吹胡子瞪眼睛，你也配？”笑声未落，他的手里已经像耍魔术似的亮出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跑堂一看苗头不好，马上奔过来两面求告，有几个食客也开口相劝。跑堂已经看出“扫帚眉”显然不是善类，是很难对付得了的，就把重心放在“国字脸”身上，劝说他换座位，言语中还用上了“惹不起躲得起”的老话。哪知这话竟激恼了“国字脸”，冷笑道：“惹不起？就这主儿我还惹不起？我就只好躲着他了？”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3）

“扫帚眉”马上扬起了匕首：“小子，你是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国字脸”看也没看他一眼，一边起身一边脱下了外面的风衣。“扫帚眉”见状，一把推开隔在中间的跑堂，二话不说举刀就捅，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预计“血溅当堂”，悲惨一幕已经无法避免了。这时，奇迹出现了：只听见“国字脸”大喝一声，双手疾如闪电似地挥出，没有人来得及看清他的手是怎样接触对方的，只听见“扫帚眉”一声惊呼，人就软软地就地瘫倒了。那柄匕首，被弹飞到两米开外，撞在一根柱子上，落于地上。

“怎样？”

“扫帚眉”双手捂住腹部，一脸的痛楚，语不连贯道：“佩服！佩服！小辈有眼无珠，冒犯了前辈，向您老人家赔罪！”说着，便挣扎着想撑起身子，可惜力不从心，跑堂儿便去搀扶。

就在这时，“国字脸”忽然想起了他的那个公文包，转脸一看，果真已经不翼而飞！他的脸色顿时煞白，却不失镇定。原地站立着转眼四下一扫，暴喝一声：“站住！”不假思索地伸手抓起桌上的茶杯，劈手朝已经窃取了公文包正往楼梯口撤退的“眼镜”投去。杯子砸在“眼镜”的后脑勺上，“眼镜”趔趄着朝前冲出一步，歪斜着身子跌倒在楼梯口。“国字脸”飞步上前，抢起了公文包。

这时候，在场所有人都已经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纷纷把目光投向“扫帚眉”和“眼镜”。“扫帚眉”看来是腹部挨了一记重击，爬起来后还是手捂着肚子直不起身子的样子；“眼镜”那下挨得更惨，后脑勺已经渗出鲜血，而且躺在地板上连坐也坐不起来。

到这一步，酒楼的老板不出场也得出场了。老板一声招呼，全店的跑堂儿、厨师、杂役就都出动，拦住了双方的去路。连戴着瓜皮帽，鼻梁上架着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镜的账房先生，也捧着白铜水烟筒

站在楼梯中间的平台上助势：“请大家都稍稍留步，等警察先生来处理。”

而在这之前，楼上的武打戏一开始，这账房先生就已经打电话向夫子庙派出所报了警。派出所就在咫尺之距，说话间就来了3个警察。这时，“眼镜”已经爬起来了，一个跑堂儿替他包扎了伤口。警察稍稍问了问情况，就让3个当事人去派出所处理。

直到这时，无论是双方当事人还是警察，都不曾料想到这件事将会朝着一条异常的轨迹发展着。这条轨迹是到了派出所后，由于一个警察的一句话引起的，这个警察姓刘，所里同志都称他“老刘”，其实年龄也不过30来岁，他是3名出警警察的负责者，当时称为“小组长”，相当于后来的探长。老刘先查看了“眼镜”的后脑勺是否还有鲜血渗出来，又问头晕不晕，确认没有什么危险后，这才下令：分别询问情况，确认身份和住址，然后再请示所长看怎样处理。一转脸看见“国字脸”手里拿着的那个黑色牛皮公文包，随口道：“把双方当事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也登记一下。”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4）

就是这句话，引起了“国字脸”的惊慌。不过那是在眼神中一掠而过的一丝慌张，老刘没有留意到。“扫帚眉”、“眼镜”被两个警察分别带到另外的屋里去接受询问，“国字脸”留在原处，由老刘询问。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警处理此类情况时没有固定的程序，也不讲究方式方法。所以，当“国字脸”掏出一包香烟递给老刘一支时，老刘也就很自然地接了过来，还顺手划燃火柴给“国字脸”点上了。

两人抽着香烟刚要进行谈话时，隔壁屋里有人叫着让老刘去接听分局打来的电话。老刘一离开，“国字脸”的脸上就掠过一道如释重负的轻松，然后，他马上起身往外走，当然没忘记拿上他那宝贝皮包。可是，“国字脸”刚出门就被走廊里正在擦拭窗子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唤住了：“喂！你怎么走了？”

“国字脸”微笑着解释：“哦，我把钱包忘记在饭店里了，取了马上过来。”

这个擦窗的青年不是民警，而是一名积极要求进步而又出身无产阶级的社会青年，主动向人民政府要求为革命工作义务出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陆从省会大城市到地处偏僻的小城镇，各地都涌现出一批这样的积极分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就成为政府各部门的正式干部。但是，当时这种积极分子大多还没长全胡子，经验当然无从谈起。因此，这个小青年竟然相信了“国字脸”的话，没有向老刘报告一声就同意让这人离开，但他还保留着一份心眼，便对“国字脸”说：“那你把皮包留在这里。”

“国字脸”稍稍一怔，两道目光飞快地在院门口那几个站着说话的警察扫视了一下，只好无奈地把公文包放在走廊的长条椅上，让脸上浮现着那份安然的微笑，从容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

“国字脸”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老刘接听完电话，听那小青年说了“国字脸”去饭店取钱包之事，因为他要按照分局的布置赶紧整理出一份材料报送上去，所以也没有多想此事，说了一句“回头他来了让他在走廊里坐着等一会”，就进了办公室。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一（5）

半个多小时后，另外两个民警已经问毕了“扫帚眉”和“眼镜”。两人自然假装不认识，坚决不承认是“连档模子”作案，这样，“扫帚眉”的过错就不过是跟“国字脸”打架，而“眼镜”虽然乘乱偷窃了那个皮包，但没有得逞，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挨了教训。而类似这种案子，在当时并不算得上什么的。因此，那两个民警商量下来的处理结论是：将两人教育释放。

他们去请示老刘，老刘刚把那份分局急着要的材料处理完毕，这才想起“国字脸”还没有回来，但还是没有引起警觉，说这事基本上就这样处理吧，不过还得弄清楚那个皮包里有多少钱，如果价值大，恐怕就不能这样处理了。于是就打开皮包查看，包里没有钱钞以及任何值钱的东西，装着的只是一些“工程计划书”、“合约”之类的手写文件，还附着几份图纸。探长也没有细看，就把东西重新装入皮包，说看来那戴眼镜的小子还是这一行里的雏儿，没有轧准对象就下手了，白干了一回活，还失手导致受了伤。算了，教育他们几句，放他们走吧。

“扫帚眉”、“眼镜”两人欢天喜地地出了派出所大门，他们不知道，马上就有厄运临头，他们其中的一位停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只能以小时来计算了！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1）

在为这位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送行时，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不幸者的简历——

“扫帚眉”，男，25岁，姓名：印有富，籍贯：江苏省南通县，职业：无业流民。他的那个连档模子“眼镜”，19岁，名叫邱承发，江苏省丹阳县人，富家出身，其父原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后来又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的中级官员，邱承发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自然充分享受到了荣华富贵。可惜好景不长，抗战胜利不久就因其父被国民政府枪决家产抄没而家道败落，成为一名流浪少年。

印有富抗战时参加过汉奸政府的“和平军”，据说还担任某汉奸师长的卫士长。抗战胜利后，他曾被国军抓捕过，很快就逃跑了。因为不是什么必须要惩办的要犯之类，所以之后也没有人再想起他。但印有富自己却不清楚，只道人家已经把他的姓名上了通缉榜，于是不敢出头露面。但吃饭穿衣这样的基本谋生问题却是需要解决的，于是他就去了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凭着在军队练就的格斗本领混入了当地的一个地痞团伙“十三大义帮”，不到半年就当上了帮内的小头目。

“十三大义帮”并不是一个大帮，也没有青帮、洪帮那样的历史根底，又缺乏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后台，所以在江湖上的地位始终处于中下等位置。而每次镇江市警察局要向省政府或者南京中央政府表示他们的存在价值，或者为了应付上面检查社会治安时，就会把“十三大义帮”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毫不留情地给予扫荡式打击。这样，“十三大义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时，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镇江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所有反动帮会、流氓团伙一律严厉打击，“十三大义帮”遂彻底粉碎，侥幸逃避了法网的团伙成员纷纷作鸟兽散逃离镇江。

印有富和邱承发两人作为一对结拜弟兄结伴逃到了南京，邱承发意外遇到了一个亲戚，获得了若干资助，两人便得以在秦淮河畔的石狮巷口搭建了一间小屋，购置了几件工具，摆了一个修车小摊，专修

自行车、黄包车和童车。几个月下来，生意倒还不错，手头积蓄了一点活钱。这对难兄难弟都不是甘于信奉靠劳动吃饭的主儿，不久就动起了歹念，偶尔悄然干起了偷窃、抢夺的勾当。在跟“国字脸”遭遇之前，他们已经干成了三桩活儿，弄得了一些赃款赃物。

这天，两人盘算着去夫子庙物色一个合适的目标，好好整上一票，准备去上海过一个开开心心的春节。他们在夫子庙那里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物色到了“国字脸”，对他那个黑色皮包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于是就搞了那么一出戏。哪知运气不佳，不但失了手，邱承发还受了伤，两人差点就陷进了局子。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2）

印有富、邱承发两人被放出来后，回到了石狮巷他们的修车摊子兼住处，换下了那身作案时使用的行头，穿上了修车的工作服，一边沮叹命运不济，出师不利，一边给邱承发的后脑勺伤口上涂了些红汞，然后只好重新干起了修车活儿。

两人正把一辆上午一个客户送来修理的三轮车拆开时，忽然从巷子里冒出两条汉子来，其中一个推着一辆自行车，另一人跟在后面。邱承发瞥了他们一眼，只觉得这对主儿是一脸的阴沉，可能因为先前在“大集成”吃了败仗的原因，他的心里便本能似的产生了一种畏惧感。事后想来，正是这种感觉，使他逃过了一劫。

那两条汉子来到摊头前，把自行车停下，其中一个开口道：“修车的，给咱检查一下这车是怎么回事，怎么刚打的气只骑了几分钟就没了？”

印有富在修车时当然不像先前在“大集成”时那么横，当下就陪笑说多半是车胎漏气了，咱给你二位看看。说着，蹲下身子伸手去捏后车胎。几乎是同时，寒光一闪，一把刀子从上向下疾速刺进了他的后背！

邱承发因为已经生出了畏惧感，便有了一份本能的防范意识，那人刚把手伸向怀里，刀子还没亮出时，他已经拔腿朝马路对面狂奔。奔出半条马路听见背后传来印有富的那声临死前的惨呼时，便马上狂叫：“杀人啦！救命啊！”

这叫声使凶手产生了胆怯之意，两人当即合骑了那辆其实没坏的自行车从巷子的另一头逃离了现场。

派出所出警的是老刘带着的3名警察，其中两人正是先前跟印有富、邱承发打过交道的，见死者是印有富，那份惊奇自不待言。老刘在询问幸存者邱承发后得知印有富被杀的情况后，头脑里马上产生了两个感觉：一是这两个修车者可能是有什么积案背景的主儿；二是这

件凶杀案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隐秘。于是，在勘察过现场，做好一应程序性的手续后，他就决定把邱承发带走。

因为是命案，所以必须上报。这样，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很快就派来了几名刑警。刑警先去现场察看一番后，留下两人跟派出所的民警一起在现场访问线索，那位为首的姓汤的中年领队向老刘询问相关情况。当他听说死者印有富之前曾为“大集成”那事儿进过一趟派出所，放出去后没多长时间就遭受了杀身之祸，就断定此事除非正好是跟“大集成事件”没有关系的以前的仇家寻仇，否则那一定是另有隐情了。

是否属于仇家报复，那先得了解死者生前的情况。于是，老汤、老刘决定马上讯问邱承发。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3）

邱承发到这当儿了哪里还敢隐瞒，就把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后来如何辍学流浪加入了“十三大义帮”等等事宜一五一十作了一番交代。前面说过，“十三大义帮”在镇江不过是一个中等偏下档次的地痞流氓团伙，又没有反动政治背景，所以邱承发此刻的交代对汤、刘两人来说并不吃惊，也不大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死者印有富的情况。于是就问邱承发是否知道印有富犯过人命案子欠下过血债，或者结下了大仇家之类的情况。邱承发说据他所知，别看印有富身高架大一脸凶相，但胆子其实并不大，所以打架斗殴虽频，但从未杀过人，也没有致人残废。

这样，那看来就得从另有隐情方面去考虑了。

于是，老刘就想起了之前发生的“大集成酒楼事件”，一说，老汤顿时来了兴趣，说那个“国字脸”离开派出所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连他那皮包也不要了，这不是奇怪了吗？那个皮包里装着什么你们看过吗？老刘说里面没有什么钱钞之类，只有几份合同、图纸。如果那人来拿也就还给他了，可是奇怪的就是那主儿一走就不过来了，而放出去的印有富莫明其妙丢了性命，这不得不让人把这两桩事儿连起来考虑了。说着，就从橱里拿出了那个皮包：“要不，我们再检查检查？”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老汤的情况，老汤参加革命有些年头了，早在抗战前他在老家无锡当小学老师时，就已经在从事地下党工作了。国共合作组建新四军时，他被组织上调往新四军军部跟着后来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干保卫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老汤调往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从事刑事侦查工作。南京解放后不久，老汤的老领导曾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的龙潜，奉命从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任上调任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正好得知老汤在南京治病，就把他留了下来。以老汤的资格，到这会儿他应当有个一官半职了，可是由于他在无锡从事地下工作时，据说有一段历史一

直无法调查清楚，所以就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走到哪里都得耽搁下来。尽管龙潜局长点名把他留下，安排在市局搞刑侦工作，但却没有任何职务。前不久龙潜被陈毅点名调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离开了南京市公安局，由陈龙接任局长。老汤便请求离开市局到基层工作，陈龙局长挽留无效，就让老汤自己选择去向，他去了秦淮分局。当然还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可能担任什么职务，干的是属于刑事侦查那一块的机动力量指挥员的工作。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4）

老汤这样的省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已经算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了，加上他多年的地下工作和保卫工作的经验，可以想象得到，当他一看“国字脸”遗下的皮包里的那几件东西后，顿觉疑窦重重：首先是那3份手写的建筑工程合约，不但别字连篇、语法错误，而且有几页还是重复的；其次，后面所附着的那几份图纸，不像合约中所说的建筑工程式样。因此，老汤断定：此事大有蹊跷！

这时，跟老汤来的那几个分局刑警从现场回来了。老汤指着其中一个皮肤白净、模样斯文的青年刑警说，小王听说你老爹是建筑营造商，你自己也上过建筑学校，料想看得懂图纸，你过来看看，这几份是什么图纸?

小王果然是内行，他过来只一看，就认出这3份图纸的底细。原来，这3份不是什么建筑图纸，而是在普通平面图上面加画了一些建筑图纸上常用的线条，以粗细分辨，故意让人以为这是建筑图纸。那么平面图上画的是什么呢？小王说从图纸下面的英文简标来看，一张是飞机场，一张是邮电局，一张是广播电台。

这下，不但老汤、老刘，所有在场的警察都惊得或睁大眼睛，或张开了嘴巴：飞机场、邮电局、广播电台这3处都是重要所在，什么人用得着这三张平面图？这不是稍稍一猜就能想得到的吗？况且，这些平面图是借用建筑图纸和合约来予以伪装的，而且，那个持有这些图纸的家伙在面临着可能会被派出所盘问图纸的情况下，扔下皮包惶惶开溜了，这些加起来，如果还没有想到跟“破坏”之类的词汇联系起来，那肯定是脑子进水了。

这时，老汤当即让老刘把正接待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的派出所所长请来，略说了一下情况，说此事得马上向分局、市局报告。从以前我在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工作时破获过的特务案件来看，同时对这飞

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3个重要单位发生兴趣的，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破坏阴谋了，很有可能是跟“反革命暴动”这样的特大案件有关了，所以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

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人选，新中国成立初期调动频频，从1949年5月市公安局成立到同年12月，一共有3人出任局长一职，5月至8月是周兴，从周兴手里接过局印的是龙潜，到了12月，一个名叫陈龙的东北汉子从龙潜手里接过了局印。这是一位非同小可的政治保卫战线的大将，何以见得？单凭从不向党内同志赠送礼品的毛泽东主席亲自赠送陈龙一块“英纳格”手表就可见一斑！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5）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10月出生于辽宁抚顺。早年投奔东北军21旅659团当兵，多年的征战生涯使他练就了双手持枪百发百中的神枪绝技。1931年投入抗日救国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经新疆到延安。原想返回白山黑水的东北工作，组织上却分配他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先后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二室副主任、主任。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任命陈龙担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卫士长。在重庆的43个日日夜夜里，白天他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毛主席身旁，毛主席参加酒宴，他接杯代饮；各国记者蜂拥到毛主席身边，他贴身保护；毛主席出门专访，他探路开道。晚上，毛主席休息后，他汇集各方情报，布置第二天的警卫路线，不清楚的必定亲自前往现场勘察。蒋介石的招数，都是刚刚孕育出笼，就被我情报人员掌握，转告陈龙，陈龙再向周恩来汇报，一起及时制定方案，各个击破，最终安全地将毛主席送回延安。正是有了这43天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从心底喜欢上这个智勇双全的卫士长。为表达他的心愿，毛主席一改往日不送礼的习惯，特送给陈龙一块手表和“忠心耿耿”四个大字，还提出将陈龙调到身边工作。但陈龙一直想回东北和那些同他生死与共的战友一起解放和保卫故土，便求见毛泽东当面谈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支持了陈龙，亲自挑选了自己的3张照片，题词后赠送陈龙留念。

陈龙带领30多名干部去了东北，先后任北满分局社会部部长，沈阳市公安局长等职。他狠狠打击了日本特务机关、国民党特务队、各种伪装的间谍特务组织，平定了多起反革命暴动，将所辖地区治理得秩序井然。陈龙创建的这套反间谍经验，后来作为城市公安反谍工作的经验，在全国予以推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进驻北京，党和国家的内务、外事活动日趋频繁。解放不久的北京城敌人还不断制造破坏颠覆事件。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调陈龙到北京中南海工作。陈龙反复斟酌，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即将崩溃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和海外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派遣特务间谍进行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他经过十几年与敌人的反复较量，已掌握了对付这些形形色色敌人的办法，能直接和这些暗藏在国内的敌人作斗争，比他做其他工作更合适，会对党和国家领袖的安全起到更大的保障作用。想到这些，他立即写了一封长信，托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转达，坦率地谈了对中央领导人安全保卫工作的看法，希望毛主席能谅解。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6）

陈龙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请求面见毛主席，毛泽东当即说“有请”。陈龙见到毛泽东后，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想法，说起国内外敌人正在施展的种种阴谋，及对中央首长安全保卫工作重点和侦察工作的担忧。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快就理解了陈龙的心愿。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陈龙就接到通知调任南京市公安局长。他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接到了秦淮分局的这样一个案情报告。经验老到的陈龙一听那个丢弃的皮包里有飞机场、邮电局和广播电台的平面图，马上断定：这是敌人要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当即下令：立刻组建专案侦查组，查清该案情况，悉数逮捕所有参与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

当晚，专案侦查组就成立了。专案组13名成员大部分来自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小部分从秦淮区等几个分局抽调，老汤、老刘也在其中。老汤被任命为副组长。

随即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议，公布了3份材料：一份是那个“国字脸”丢弃的皮包里的那些合约、图纸，一份是法医对于印有富死因的鉴定报告，还有一份是讯问邱承发的笔录。众人正讨论着时，陈龙忽然进来了，摆摆手让大家继续发言，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专注地听着。

在场这些侦查员既然被点名抽调来参加这样一个大案的专案侦查，自然各有一份本领，大家七嘴八舌谈了一通，都是谈到了点子上，最后形成共识：以追查黑色公文包的主人“国字脸”为中心，争取迅速取得突破。这时，办公室同志来请陈龙去接听北京电话，陈龙便朝众人拱拱手，说同志们这样讨论很好，大家辛苦了，我等着听好消息，从口袋里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匆匆离开了。

众人于是抽着香烟继续讨论如何进行具体侦查工作，决定分3路同时进行：一是向夫子庙“大集成酒楼”方面进行查访，争取获得跟“国字脸”相关的线索；一是从印有富命案现场石狮巷着手调查，看能否获取

凶手的线索；还有一路则是从杀死印有富的伤口推断出凶器是一把三角刮刀这一点上进行调查，找到凶手的线索。这三条路的走法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查获“国字脸”的下落。尽管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印有富的被杀跟“大集成酒楼事件”有关联，但是，专案组诸君都认为，凶手是受“国字脸”方面的指使而冲印有富下的手。

长话短说，次日上午，3组侦查员当即开始进行调查工作，去大集成酒楼和石狮巷现场查访的那两个组都没有收获，只有调查三角刮刀的那一路侦查员访得一条线索。昨晚专案组对3路人马进行分工时，考虑到访查三角刮刀的这一路工作量大，所以配备了6名侦查员，分为3个小组同时进行。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将这3个小组称为“ABC组”，这3组都由出身南京熟悉本地社会风情的侦查员组成，其中B组的两名侦查员都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警，都在1947年就参加了地下党，因此解放后就作为政治可靠分子充实到了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7）

旧时有若干年工作经验的刑警，为了侦查案子的需要，基本上各自都有只有自己掌握的“耳目”，以便需要时能够随时使用。这些对象，通常由叫花子、地痞流氓、帮会小卒和头脑活络的守夜人、清道夫、黄包车三轮车夫、小商贩等组成。当然，江湖上有投桃报李的规矩，你要他们给你提供情报线索，就得给他们报酬，或者提供方便。有的刑警手头掌握的对象较多，有时拿不出活动经费支付给他们，就只好动用自己的薪水打发人家。B组的这两位侦查员既是旧刑警出身，自然也掌握着一些“耳目”。但解放后这些对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所以基本上已经没有联系了。此刻手头这起案件非常重要，所以两人商议：看来得需要动用以前的“耳目”关系了。于是，他们就去拜访了一个名叫李阿得的无业人员。

李阿得30多岁，靠混混谋生。所谓“混混”，就是介乎于乞丐、地痞之间的一种角色。旧时的乞丐、地痞之流，都是有各自的帮伙的，势力大的还有名号，比如印有富参加的镇江“十三大义帮”之类。而“混混”，则不参加任何一个帮伙，但帮伙有活动时如果需要“混混”到场，或者“混混”自己想参加，也可以前往。这种身份比较自由，不受约束，但是却享受不到在帮伙的待遇，比如受人欺负了，遇到困难了，帮伙就没有义务替你出头，帮你解困。

李阿得如此一混就混了十几年，从抗战前一直混到南京解放，没有干过一天正经的活儿，却过着相当于城市平民的生活，甚至还混到了一个老婆。解放后，人民政府清算帮伙罪行，有材料表明李阿得曾参与过数次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的帮伙行动，甚至有一次还起过重要作用，而且引起了严重后果。本来，凭这点就可以把李阿得逮捕法办。公安机关也已经有了这个打算，据说鼓楼分局已经开出了逮捕证。但是，就在行动前，却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情：一天下午，一辆美制军用小吉普开到了李阿得的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位带着两个

警卫员的解放军团长，跟李阿得热情握手，还让警卫员从车上搬下了大米、食油、衣服等物品往屋里放。

一家伙顿时引起了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解放军团长在抗战时期当新四军侦察队长时，曾奉命到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市内采购西药、电池、五金工具等军需用品，行踪被敌人侦悉，在其下榻的饭店里将其逮捕。敌人认为肯定会有同伴前来接头，于是决定守株待兔。侦察队长乘机打死了看守他的两个汉奸后逃了出来，很快就被敌人发现，日伪方面当即进行全城大搜捕。侦察队长在混乱中乘黑夜的掩护躲进了李阿得的破屋，受到了素不相识的李阿得的掩护，得以脱身。现在，这位侦察队长当上了团长，参加了解放南京的渡江战役，进城后经过反复打听，终于找到了已经搬家的李阿得。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8）

这件事马上通过居委会传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知道分局当晚要抓李阿得，因为有了此事，就马上向分局汇报。鼓楼分局领导认为李阿得当年此举是一桩立功行为，于是决定撤销逮捕令，改为传讯教育。李阿得还经派出所方面介绍，有了一份正当工作——当上了驻军军需品仓库的清洁工。

李阿得从此倒还真有了脱胎换骨的念头，把自己当作“公家人”，一举一动都努力模仿公家干部，整天把团长送给他的旧军服穿在身上，甚至还主动学习识字，每天一空下来就捧着份报纸假装阅读。

B组的两个侦查员找上门去时，李阿得正在家里“看”报。见来了两个警察，马上热情招呼，张罗着要沏茶。侦查员说我们不喝茶，是来向你打听一桩事情的，说着就把印有富的尸体照片拿出来，问是否知道这种三角刮刀伤口是何人所为。侦查员这一步算是走对了，李阿得一看伤口马上就说，这肯定是“赤练帮”的“快刀夏二”所为。

“赤练帮”是南京地区丐帮的一个分支帮伙，以“蛇叫花”为主。所谓“蛇叫花”，就是随身带着蛇要饭的叫花子。这种乞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身怀治疗蛇毒绝技的，以替人疗伤、入宅捕蛇谋生；另一类没有治毒绝技，抓了无毒蛇带在身上，靠吓唬人进行要挟性质的乞讨。“赤练帮”就是由后一类人员组成的。他们捕捉无毒的赤链蛇，或盘于手臂、脖颈，或藏于口袋、帽子、怀间，出没在店铺、民居门口，藉此行乞。

“赤练帮”的这套行乞手法同丐帮的其他派别构成了生存威胁，于是，矛盾由此而产生。最先他们肯定是丐帮内部协商解决，但利益当头显然是无法解决得了的。谈不成，那就动手吧。一动手，“赤练帮”的无毒蛇就对付不了同为丐帮成员的其他叫花子了，于是就抄家伙。一次次的械斗，使“赤练帮”造就了几位出手不凡的高手，其中最狠的那位姓夏，自称“夏二”。夏二的常规武器是赤链蛇，那是对付平

民百姓的谋生工具；另一种特殊武器则是三角刮刀，专门对付江湖上跟其过不去的人，出手奇快，刀刀见血。久而久之，江湖上就呼其为“快刀夏二”。

李阿得这样一说，B组这二位侦查员也隐约想起以前确实听说过“赤练帮”有这么一个人，于是就作为一条线索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专案组长江恒大跟副组长老汤一商量，决定再次讯问邱承发，了解凶手外形。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二（9）

老汤、老刘和B组两个侦查员前往看守所讯问邱承发。邱承发已经被印有富的血溅当街命归黄泉一幕惊得魂不守舍，第一天陈述那一幕时有点模糊，这回经过侦查员的耐心启发，总算镇定了些，边回忆边叙述，断断续续把凶手的外形勉强说了一番。

经分析，侦查员认为邱承发所说的凶手外形跟“快刀夏二”基本相符，便下达了拘传令。

但是，要想在偌大一个南京城查寻一个居无定所的乞丐，那不是一桩很容易的事情。这事还多亏了李阿得，他听说专案组要拘传夏二后，便自告奋勇愿意打听夏二的下落。20小时后，果然打听得夏二近日栖身于中山陵附近的一座土地庙里。

当晚，夏二落网。从他家里，搜出了那把行凶的三角刮刀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血衣。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1）

专案组立刻提审夏二，原还担心这家伙来个“一言不发，拒不交代”之类，给侦查员出一个难题。但这份担心倒是多余的，夏二的三角刮刀出手快，交代的速度也快，稍稍一问，便马上交代了行凶杀死印有富的幕后指使者，一个名叫鲁大石的人让他下的手，报酬是50万元人民币（旧币，相当于现在的50元）。他自己留了40万元，另外10万元给了那个也出现在现场，但没有下手，而只是骑了自行车载着他逃离现场的同伙封四宝。（封四宝在获悉夏二被捕后，逃离南京前往老家苏北宝应藏匿，不久被当地公安局逮捕。）

于是，话题便转到了鲁大石身上。鲁大石是什么人？跟你夏二是什么关系？他是怎么让你杀人的？等等。

据夏二说，他跟鲁大石已经相识两年了。1948年元月，那时他还是南京黑道上的一名声名显赫分子，一把三角刮刀奠定了其在“赤练帮”内不可动摇的核心骨干地位。那段时间，夏二住在德胜门草鞋巷口的一所被火烧去了大半而被房主暂时废弃了的住宅内，对于丐帮来说，那已经算是一座豪宅了。一天，夏二看到巷口围着一群人正在观看一份告示，他不识字，挤进去也看不懂那上面写了些什么内容。于是他向别人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丢失了一辆摩托车，悬赏20枚大洋寻找，找到者可拨打一个电话号码通知失主，失主一手交赏银一手取车。

夏二被20块大洋的悬赏所吸引，于是就决定寻找那辆摩托车。其时他在“赤练帮”内已经收有徒弟若干人，分布于全城各处行乞兼带偷抢骗捞。夏二便向众徒传下命令，让按照《告示》上所说的留意寻找怎样怎样特征什么牌照的一辆摩托车。叫花子打听消息自有一番别样本领，结果不到两天就有徒弟前来向夏二报告，说那辆摩托车在尧化门街的一个修车摊的角落里放着，不过牌照看不真切，因为被人故意涂上了泥巴。

夏二生怕情报有误，亲自前往尧化门街以行乞为掩护察看过，确认就是失主所说的那辆摩托车，遂按照头脑里记下的电话号码联系到了失主。他跟失主在约定地点见面，一见之下却暗吃一惊。原来那个自称“鲁先生”的失主竟是一身便衣侦缉队的打扮，身穿皮夹克衫，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宽框墨镜，腰间鼓鼓囊囊显然揣着家伙。对方见夏二一脸惊色，便说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干的活儿有点特殊，不过跟你这种人肯定没有关系的。说着，递上一支香烟，说兄弟咱言归正传，你说吧，我那辆摩托车在哪里？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2）

夏二估摸这位“鲁先生”不是警察局的便衣，就是军统（那时已改为“国防部保密局”，但社会上还是以此称呼）、中统，或者是宪兵团侦缉队。于是他担心对方食言不付赏银，所以说话有些吞吞吐吐。对方马上明白了他的担心所在，从手上摘下戒指，想了想，又把腕上的手表也捋了下来，递给夏二，说兄弟这两件东西作为押金放在你那里，拿到了摩托车你跟我去取20枚袁大头，如果我不给你，你就把这两件东西拿走便是。夏二这时也起了狠心，暗忖你若赖账，那老子就一刀插了你，“快刀夏二”的名头可不是凭空乱喊出来的！

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夏二领着这位鲁先生去了修车摊，不但收回了摩托车，还把送去改装的那个临时车主给抓走了，鲁先生答应给的赏银一分不少地付给了夏二。

从此，夏二和这位鲁先生交上了朋友。对方大约每月一两次请夏二上馆子吃饭，顺便托其打听一些消息，每次听回音时不管是否打听着实，都会送给他一些东西或者钱钞。交往了一段时间，夏二终于知道了这位鲁先生的真实身份，他名叫鲁大石，是国防部保密局的少尉。

两人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南京解放前大约两个月，鲁大石就没了消息。夏二这种人，对于政治当然没有那份敏感，他每天最紧要的是填饱自己和手下那十来个徒弟的肚子，所以也没有把鲁大石的失去联系跟当时的时势联系起来。直到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张贴布告通缉国民党反动分子时，他才隐约意识到鲁大石早已远走高飞，再也见不着了。

哪知，大约过了两三个月，夏二就碰到了怪事。解放后，“赤练帮”成员的日子就难过了，原先那套靠亮出赤链蛇乞讨的模式受到了人们的抵制，一个不对人家就报告派出所，警察一来就对不起，抓你没商量，抓住后就送往收容队。收容队到了一定人数，就把收容下的人

送到苏北去开荒。至于亮刀子，那更是属于已经不敢想的事儿了。刀子属于凶器，亮刀子比亮赤链蛇的性质要严重得多，有可能直接折进局子。如此，夏二的谋生就受到了威胁，一个月里总有几天觉得肚里空空，天冷了还要担心如何御寒。不过，一连数月，只要夏二和两三个还跟着他的徒弟面临饥寒时，总会有人偷偷把食物、衣服和少量钱钞放在破庙里，给他们解决燃眉之急。

夏二不知何方人士伸以援手，反复回忆，也没有想起自己曾经对谁有过哪怕些许的恩施，所以肯定没有人偷偷报恩。这个疑题，直到事发前的下午才得到破解。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3）

事发前下午两时许，夏二照例在秦淮河畔的关帝庙门前晒太阳，关帝庙那块地盘一向属于“赤练帮”的领地，丐帮的其他帮伙成员是不能到这地盘来乞讨的，否则就犯了江湖规矩。夏二被暖洋洋的太阳侍候得浑身舒服正待昏昏欲睡时，被人唤醒了。定睛一看，“哎呀”一声便跳了起来——站在面前的竟是已有将近一年没有见过面的鲁大石！

鲁大石打个手势阻止了夏二开口说话的企图，扯着他就走。走到附近的一家旅馆，进了一个房间，鲁大石看样子遇到了很着急的事情，递上一支香烟后开口便说：“夏二啊，这一阵还混得过去吧？再怎么困难总还不至于挨饿受冻什么的吧？”

夏二心里一动，马上反应过来：“哦！鲁先生是您不断在救济兄弟啊？”

“小意思。这段日子我自己过得也不大顺畅，所以只能略表心意了。不过，你的情况我倒是一直让人注意着。”

夏二这才想起对方的军统少尉身份，心里只觉得一阵后怕：曾经有公家人向他了解鲁先生的情况，幸亏他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否则人家要解决他还不是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鲁大石说：“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小忙……”

夏二欠身：“请先生吩咐，夏二保证马到成功！”

“这里不远处有条石狮巷你总知道的吧？巷口最近出现了一个修车小摊，那两个家伙很讨人厌，我不想看见他们，你去把他们打发掉。”

“遵命！”夏二寻思撵走一个修车摊还不是小事一桩？

鲁大石拿出一沓钞票放在桌上：“这是50万元辛苦费。”又在钞票上放上一把钥匙，“门口停着一辆自行车，你去找个帮手协助，完事后骑车撤离现场，车不必还我了，就算是给你的封口钱。你那把三角刮刀使着还顺手吧？要不要拿把匕首给你？”

夏二这才知道不是撵走修车摊的小事，而是杀人的大事，顿时愣了。别看他“快刀夏二”的名头在江湖上喊得很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活儿没少干过，但事实上之前从来没有犯过命案。鲁大石看他神色有异，微笑道：“夏二，你如果不想干，也可以，我另请高就……哈哈！”

夏二知道这“哈哈”是什么意思，马上点头：“没问题！鲁先生您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鲁大石拿出一个包袱扔在床上，说这个房间就留给你了，回头你把同伴约来了，先把衣服换一下，然后去把活儿干了。这件事办妥了，我会记着你的，不久以后还有重赏。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4）

交易就这样谈成了。仅仅过了半个多小时，血案就发生了。

如此，石狮巷命案的幕后指使者就是那个保密局少尉鲁大石了。鲁大石为何要让夏二杀人？是为了灭口还是报复？抑或其他动机？这，夏二一概不清楚。看来只有让鲁大石到案交代了。

鲁大石在哪里？夏二说他不知道，因为鲁大石从来没有跟他说起过住所之类的话题。

换一个角度，那么鲁大石有些什么爱好？平时喜欢跟什么人交往？他的亲戚朋友之类你是否知道？

这一说，夏二提供了一条线索：以前曾经听鲁大石说过，他有一个相好名叫阿瑛，长得很漂亮，是“日日春舞厅”的舞女。

行了！就循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专案组查下来，南京确实有一家招牌名为“日日春舞厅”，位于建邺区石榴园路上，是抗战胜利后第二年由一个上海老板到南京开的，舞女全部是他从上海带来的，该舞厅属于中等规模，没有发现有什么背景。解放后已经将舞厅列为特种行业，必须向公安机关治安部门进行登记，侦查员查了“日日春”的舞女，确实有一个艺名阿瑛的上海籍舞女，真名叫宋雯瑛，23岁，未婚。

专案组长江恒大下令对宋雯瑛进行外围调查，侦查员于是开始跟踪这个漂亮舞女。发现她住在离“日日春舞厅”仅隔两条横马路的一所公寓内，独自租了一个房间，自己不烧饭，一日三餐是在舞厅和公寓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包饭的。从公寓看门人那里了解到，宋雯瑛平日生活很有规律，舞厅、下榻处两点一线踩得很准，除了伴舞外没有其他活动内容。那么她是否有男朋友？看门人说他没有听说过，他自南京解放后被人介绍到这个公寓来当看门人到现在，没有发现有男性朋友来公寓找过宋雯瑛，也没有男人给她打电话。（公寓使用传呼电话，由看门人先接听后传呼。）

这是公寓看门人的说法，那么舞厅方面是怎么说的呢？侦查员打听到鼓楼分局有一个刑警和“日日春舞厅”某个舞女有些亲戚关系，于是就通过他约那舞女谈话，了解到宋雯瑛在南京解放前大约一年开始谈了一个男朋友，约30岁左右，据说是当便衣警察的，那个男的经常驾着一辆美国军用摩托车来舞厅接宋雯瑛下班。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南京解放前夕，那个男朋友就不来了，之后一直到现在也没有露过面。

那么，平时是否有电话打到舞厅来找宋雯瑛呢？这个，不好意思，干舞女这一行的肯定每天都会接到一些电话，而且都是男的，哪天哪个舞女没有电话找她了，她大概也得改行了。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5）

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对“日日春舞厅”的电话进行24小时的秘密监听。

监听到第三天，下午4时10分，一个自称“阿石”的男子打电话找宋雯瑛。侦查员从监听到的内容判断，这个“阿石”应该就是目标鲁大石，而他并不是在跟宋中断联系后第一次通话了。不过，宋雯瑛的态度似乎很冷淡。使侦查员欣喜的是，“阿石”向宋雯瑛提出了见面一叙的请求，宋勉强同意了，两人约定次日中午11点半在鼓楼“大新华饭店”见面。

专案组马上研究，决定在“大新华饭店”设下埋伏抓捕那个“阿石”。

第二天，那个“阿石”就被捕了。

经讯问，被捕者“阿石”果然就是夏二所说的命案幕后指使者鲁大石。这个人的落网，对于专案组理清案情，部署下一步的侦查工作，以及最后破获这起大案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

鲁大石，29岁，浙江省绍兴人，1939年在上海初中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统局在上海的外围组织，从事秘密地下活动，曾在军统组织行刺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陈篆的行动中立过功而受到戴笠的点名嘉奖。1945年抗战胜利后，鲁大石正式参加军统，成为一名情报特工。接受了一年训练后，鲁大石以少尉军衔担任军统江苏站情报员。1947年，军统局改称保密局后，他又调到南京本部从事情报内勤。

鲁大石在军统被视为“戴老板”的人，原本可以青云直上，但戴笠死后保密局成了毛人凤的天下，他就属于失势派。几年下来一直待在少尉情报员的位置上原地踏步，到南京解放前夕还把他作为潜伏人员留了下来。根据上峰命令，鲁大石仍干他的老本行，当情报特工，具体分工是：联络社会闲散人员，了解民众思想动态。因为没有发展组织和搞破坏活动的内容，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差使。鲁大石手

里原本就掌握着一批社会底层人员的关系，如“赤练帮”之类，于是他还保持着跟这些人或明或暗的联络。对于“赤练帮”，他采取的是暗的方式，不时派人悄悄留意夏二等人的动静，看到遇上困难了，就让人暗暗送些东西或是零钱去，作为笼络人心的手段。至于情报，因为不过是一些抽象的思想言论内容，以鲁大石这样一个聪明人，根本不必真的去打听，而只要自己稍稍留意一下街头人们的议论，再看看报纸，基本上就能不时针对当前形势编造出一批又一批了，报上去上峰还总是说“不错”。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6）

鲁大石原想就这样混下去算了，等到美国人协助老蒋打回大陆，他就有出头之日了。哪知，这天他正在秦淮河鱼行桥畔租住的临时住处翻阅当天报纸研究形势动态时，忽然来了一个男子——“国字脸”邹谷。鲁大石认识邹谷，那还是以前在军统局戴笠手下时，知道这老兄是从军统特训班出来的情报特工，属于正牌特务，因为凡是特训班出来的，都是接受过各种收集情报的训练，还擅长擒拿格斗、射击爆破之类的行动术技能。像鲁大石这样半路出家的野路子情报员，通常见到他们就只有恭敬的份了。

这份恭敬一直保留到眼下，鲁大石马上向邹谷热情问候，同时心里很是纳闷：这老兄怎么也留在大陆了？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正这样想着时，邹谷掏出香烟盒，抽出一支递给鲁大石。鲁大石便知道香烟里有上峰指令了，撕开取出一圈薄纸，用放大镜照着一看，果然是上峰用暗语下达的指令，让他按照来人的指令去办一桩事情。

什么事情？自然就是找夏二之类的角色去杀那两个修车人了。

邹谷一脸的愤怒，问鲁大石：马上解决，有什么困难吗？

鲁大石回答：没有困难。如果没有意外，今天一定解决。

很好！事情解决后，你给我打个电话。邹谷说着随口报出了一个电话号码，鲁大石便记在心里。情报特工的记性自然都是出类拔萃的。

鲁大石的交代到此结束。这边专案组马上通过电讯部门查问邹谷的那个电话，得知是一个资本家住宅的私人电话。随即进行外围调查，查得那个资本家在解放前夕已经去了香港，留下几个子女。因为房子宽敞，就把其中一间租给了一个商人。

这个商人，就是在“大集成酒楼”跟印有富打架后，又把皮包丢弃于派出所逃跑的“国字脸”邹谷。

当天深夜，邹谷就落网了。陈龙局长闻讯，把专案组正副组长江恒大和老汤召去，亲自过问审讯方案，根据他在东北反间谍的经验，当场作出了几点事后证明行之有效的指示。专案组于是慎细制订了审讯方案，直到次日黎明时分方才对邹谷进行讯问。

用根据陈龙局长的指示制订的审讯方案对付邹谷，这个科班出身的情报特工很快就败下阵来，乖乖作了交代。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7）

邹谷跟鲁大石一样，也是在南京解放前夕受命作为潜伏人员留在了南京。他是科班出身，搞情报工作有专业经验，被任命为“国防部保密局大陆东南地区第五情报组少校组长”，公开身份是西药和医疗器械中介商。从南京解放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上峰没有向邹谷下达什么指令，他倒也确实做成了几笔生意。1949年10月中旬，邹谷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去镇江开会。在镇江，他见到了几位以前在军统局和保密局曾经熟悉的同事，当然也有几个是陌生脸孔。会议召集者名叫蒋云龙，邹谷不认识，据其自我介绍，原是国军第六兵团的少校营长。蒋云龙在会上宣布，由他发起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自即日起正式成立，此事已经得到台湾方面的批准和支持，在座各位同志的关系就是根据蒋先生的指令向我这边提供的。然后谈了一些打算，大意是准备首先在南京发动武装暴动，制造轰动全世界的特大事件，然后将武装力量拉到大别山去打游击，与此同时还可以在浙江和安徽的几个城市策划发动武装暴动，配合国军光复大陆。

这次会议意味着邹谷以往的轻松生活的结束。会后没几天，蒋云龙就在南京万腾茶馆约见邹谷，说“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设之“南京行动总队”已经成立，目前正在着手发展下属大队的力量；又说邹谷是军统特训班科班出身的情报特工，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最佳的情报人才，因此决定委以重任，让他收集南京的飞机场、广播电台和邮电局的地形情报，绘制成地图，以便发起暴动时使用。蒋云龙还通知邹谷说，从现在起，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到“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由我亲自掌握，活动经费也由我下拨。说着就拿出台湾密令给邹谷看，又把200万元人民币（旧币）发给了邹谷。

邹谷于是就开始布置手下特务着手收集这方面的情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努力，终于将情报收集齐全了。于是，他便运用以前在军统特训班学到的技能，绘制了三份详尽的地图，出于保密考虑，又以普

通建筑图纸的式样加以伪装。到1950年元旦，邹谷算是圆满完成了使命。这段时间，蒋云龙一直没有露过面，只是有两次派人给他送来经费和收集情报用的照相机、胶卷和冲印设备。元旦后大约一周，蒋云龙给邹谷打来电话，询问活儿完成否，让邹谷在1月13日中午去夫子庙大集成酒楼，届时会有人前来，对上暗语后就可以把图纸交给对方。蒋云龙很谨慎，再三叮嘱邹谷必须对图纸妥加伪装。邹谷于是又炮制了几张虚假合约，跟图纸放在一起。此举使他后来得以从夫子庙派出所侥幸脱逃成功。

邹谷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科班出身的老牌特工竟然一时大意阴沟里翻船，在两个小偷手里栽了个跟斗，而且导致图纸失陷在派出所。邹谷逃离派出所后，越想越恼火，竟然以以前军统对付此类事情的思维作出了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把印有富和邱承发解决了！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三（8）

当时，邹谷并不知道印有富、邱承发是何许人、居住何处，但能够确认这两个主儿肯定是没有什么后台背景的，杀了也就杀了。他也真是胆大，竟然就在派出所斜对面的茶馆楼上坐着喝茶，候得印有富、邱承发两人被放出来，就下楼去跟踪。待到弄清那两人是何许人、位居何处后，就炮制了一份密令，亲自去鱼行桥畔找鲁大石，让其找人下手。鲁大石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关系其实已经由保密局转到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云龙手里，而蒋云龙又把他作为机动力量临时调配给了邹谷，而邹谷之前因为没有用得着鲁大石的地方，所以一直没有露面，此刻有使命需要下达，就直接去找了鲁大石。

解决了印有富出了口气后，邹谷开始担心如何向蒋云龙那边有个交代了。他不笨，知道自己把皮包丢弃于派出所的后果多半会是怎样，不敢抱侥幸念头。但是，此事真相不能被蒋云龙知晓，否则肯定会被密裁。刚想到这里时，蒋云龙打来了电话，询问中午失约的原因。邹谷谎称他在赴约时似乎发现有可疑对象跟踪，所以当机立断离开了“大集成”。蒋云龙竟然对此不疑，说那另外约个时间吧，明天下午3点，你到鼓楼那边的葛老大茶坊，我派人去取图纸。

于是，邹谷就把留下的图纸底稿作了一番伪装，又炮制了数页合约，拼凑成一份情报，次日按时前往约定地点，交给了蒋云龙派来的那个特务。

如此一招，竟然混了过去。当天晚上，蒋云龙打来电话，对邹谷大加赞赏，说已经上报台湾给他记了一大功。惊魂甫定的邹谷这时除了祈祷夫子庙派出所没有识破皮包的秘密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对付此事了，寻思如果蒋云龙那里要一如既往的将暴动计划进行下去，到那时候他只有临时溜号的选择了。不料，还没有到那时候，公安局已经找上门来了。

邹谷的供词立刻上报，陈龙局长看了之后点头笑道，果然不出所料，敌特动的正是这个脑筋。于是下达命令：继续侦查，将包括蒋云龙在内的全部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1）

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时，陈龙再次亲临参加，和侦查员一样畅所欲言发表意见，还鼓励侦查员一起探讨不同观点的问题。如此一直分析了几个小时，终于达成了一致共识。

众人分析：蒋云龙发起的“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就其名称看来，在目前不过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说法，敌特肯定没有力量能在三省范围内组织起一支反革命武装。而从蒋云龙不过是一个国军少校这一点来看，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也并非是受台湾国民党特务机构方面的指使而组建的，否则，不可能指派一个少校军官来主持这样一桩大事。估计是台湾方面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在大陆发起武装反共行动，那当然是求之不得，估计不久还会有将蒋云龙升衔封官的命令下达。

但是，并不是说上述原因警方就可以掉以轻心不予重视。蒋云龙既然已经成立了辖属于“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之下的“南京行动总队”，那估计“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计划可能是先在南京发起反革命暴动，因此，不管怎么说，敌人的力量还不容小觑。因为暴动不是普通案犯做一起什么刑事案件，而是一场有可能大规模流血的武装行动，那敌人方面肯定必须做好人员和武器这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如此，这个“南京行动总队”的人数至少得有上百人，因为蒋云龙准备攻打和控制的目标有飞机场、广播电台、邮电局，没有上百名武装人员别想动这个脑筋。

这样，问题由此产生：怎样侦查才能达到把所有敌特分子一网打尽的目的？以陈龙局长在东北打击敌特分子武装暴动阴谋的经验，敌人通常是先搭建一个领导班子，然后发展下面的组织，如果是军事组织结构的，那就从“纵队（兵团或军）—总队（师或者旅）—联队（团）—大队（营）……”这样逐级往下发展。发展组织是先从单个骨干分子着手进行，比如，“纵队”级头目看中了某个可靠对象，就将此事向其交底，对方自然同意参与，那你就去发展成员，秘密招兵买

马，招得多少人多少武器就根据数量让你当什么官，然后把你招到的人马编成一支跟封你的官职相符级别的队伍，随意给你一个番号就是。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2）

之所以要说上面这些话，是为了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逐级发展而组成的组织，上一级的头目是不知道下一级头目手里掌握的成员的详细情况的。如果有一个叫张三的人，哪天走在路上跟以前在军统时的某个上级不期而遇，被上级看中，于是就跟他说我们准备发动暴动，迎接蒋介石光复大陆，你也参加吧，以后可是有功之臣，当个将军不成问题。张三觉得这笔买卖值得做，就点了头。好！从这时起，你张三就是“本军”骨干了，你去物色对象拉队伍吧，到时候拉到多少人就封你当哪一级的军官！张三胡乱折腾一阵，向上级报告说我已经发展到多少多少对象，都是跟共产党有血海深仇且精通单兵作战的可靠勇士。上级大喜，说你把名单拿来给我备案，然后领取委任状。张三送来的名单上面自然只有不知是真是假的姓名，没有地址。上级也不可能问他要这些“勇士”的地址，因为上级不可能直接使用这些人，真到发动的时候，是张三通知他的这些下属，也是张三指挥这些下属。

说了这些，就应当明白了一点：像“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这样的组织，应当也是“军”级头目发展“总队”级头目，“总队”级头目再去发展“大队”级头目，“大队”级头目再去发展“中队”或者“分队”。因此，如果想破获“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全“军”，那就应当先控制“军”级头目，比如蒋云龙。蒋云龙被捕后，供出他手下的“南京行动总队”头目，警方便去抓捕“总队”头目。“总队”头目到案后交代他下面的“大队”级头目，如此一级一级往下捋，就能达到破获全“军”，一网打尽的目的了。

所以，专案组的侦查方案是：先对付“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发起人、总头目蒋云龙！为防止蒋云龙落网后拒不交代，故所以得秘密监视蒋云龙的行踪，看他跟外界有些什么联系，最好能据此顺藤摸瓜找到另外线索，这样即使一时还不能把另外线索调查清楚，但也足

以作为审讯时对付蒋云龙的武器了。因此，决定在发现蒋云龙的下落之后，暂时先不下手抓捕，而是实施跟踪，弄清楚他跟什么地方什么人员有过接触联系。

如何查摸蒋云龙的线索？这是一个难题。因为蒋云龙原先在国军里的官做得太小，不过区区一个少校，即使去问国军第六兵团的司令长官，也不可能听说过他的手下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这种角色，到了解放后，在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就好比一滴水掉进了长江，哪里还分辨得出？而专案组此刻要做的，恰恰正是要把这滴掉落进长江的水，予以鉴别出来。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3）

专案组分析，目前掌握的线索中惟一认识蒋云龙的人，就是邹谷。而邹谷跟蒋云龙没有主动联系的方式，他甚至连蒋云龙是否住在南京这一点也不清楚。这样，看来只有靠邹谷解决这个问题了。专案组经请示陈龙局长获准，决定把邹谷放出去对蒋云龙进行“钓鱼”。

专案组长江恒大亲自跟邹谷谈话，交代政策，鼓励邹谷争取立功赎罪。邹谷知道自己的历史和现行罪行之大，已经做好了判死刑的心理准备，此刻听说人民政府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自是感激涕零，跪地磕头。江恒大又提出警告，告诉邹谷警方已经作了严密的布置，让他不要试图有其他任何方面的非分之想。

然后，就是制订一个如何“钓鱼”的详尽方案。邹谷租借的房子比较隐蔽，还是让其住到原先的地方去。那天他是在晚上回来的路上被捕的，没有惊动任何人。不过，此事得取得房东方面的配合，因为要派两名侦查员跟邹谷同住以便监控，另外还得临时安装一部电话机，用于在蒋云龙给邹谷来电时迅速通知电信部门查获蒋云龙所使用的那架电话机的号码、位置。

这一切，在次日中午前就都已经办妥，邹谷被秘密释放，回到了那个资本家的住宅，从此开始了软禁生活。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阶段，邹谷立功心切，生死在此一断，真有度日如年之感。而专案组方面，更是忧心忡忡，这是惟一的方案，一旦实施失利，那就简直一败涂地。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蒋云龙始终没给邹谷打来电话。转眼元月过去，进入二月。又是一周过去了，蒋云龙还是没有消息。专案组诸君都沉不住气了，一次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反复分析检验这一方案是否正确。陈龙参加了专案组2月8日的案情分析会，说以邹谷这样的老牌情报特工的资历，蒋云龙如有所动作时不可能将其排斥在外，之所以没有跟他联系，估计蒋云龙最近没有用得着邹谷的事儿。有人提出，

那就这样一直等下去吗？陈龙说不着急，我估计蒋云龙这几天里应该对邹谷有所反应的，因为2月17日是春节，以邹谷这样的情报特工资历，蒋云龙这个少校应当有些重视。他会在过年前对邹谷有所慰问，哪怕是来一个电话，但多半是会在金钱物质上有所表示。除非蒋云龙的手头很紧，那“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最近根本就无法发动反革命暴动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蒋云龙已经发现邹谷出了问题。因此，关键就在从现在起到春节这段不长的日子里，如果到春节蒋云龙还没有打电话给邹谷，那我们就得另外考虑制订侦查方案了。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4）

陈龙不愧为老资格的反谍大师，所以后来他出任公安部副部长时，负责主管的是全国的反谍工作。他的这个估断竟是那么准确，这个观点亮出不到一天，蒋云龙就给邹谷打来了电话。

蒋云龙的电话令原本几乎已经失望的邹谷因喜出望外而出现了语塞，“唔唔”着一时说不出话来，急得在一旁监控着的侦查员差点一巴掌抡上去。幸亏邹谷及时回过神来，恢复了正常，按照侦查员事先布置的开始拖延时间。另一侦查员赶紧用那架一直没有使用过的临时电话机通知电信部门保卫干部。

果然不出陈龙的所料，蒋云龙对邹谷是很器重的，他给邹谷打电话，一是因春节将届，他向邹谷表示慰问，并要发一笔慰问金给邹谷；二是准备因“买卖”之需，要制作一批袖章，这事想请邹谷负责，问是否有问题。邹谷已经浑身颤抖了，强作镇静连连说“行，没问题”。蒋云龙于是约定后天下午6点在成贤街沸腾火锅店见面。

这个电话由于邹谷的拖延，通话大约有5分钟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算是勉强能让电信部门查清了跟邹谷通话的那架电话机的位置——白下区太平巷的一家咖啡馆。侦查员当即赶去，但蒋云龙已经离开那里了。出于谨慎，生怕惊动了蒋云龙而取消次日跟邹谷的约会，侦查员没敢向咖啡馆方面打听情况。

次日傍晚，邹谷在数名侦查员的秘密监控下，前往成贤街赴约。侦查员终于见到企盼了许久的蒋云龙，当然按照事先的计划，没有下手抓捕，而是采取跟踪的方法摸清了其下榻处。从这时开始，专案组安排的另一套班子开始日夜秘密监视蒋云龙。

蒋云龙跟邹谷的这次见面，一是给了邹谷100万元人民币（旧币，合新币100元）的慰问金，二是让邹谷设计“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袖章。邹谷昨天通电话时的失常已经受到了侦查员的提

醒，所以这次表现得很正常，没有引起对方的疑心。两人一起吃了顿火锅，喝了两瓶酒后握手分别。

蒋云龙的露面使专案组松了一口气："钓鱼计划"总算没砸锅，开始显出效果了，而暴动那事儿还没有准备定当，不至于立马就发动，这给从容侦查这个案件留下了时间和空间。

邹谷也非常高兴，暗忖蒋云龙总算上钩了，使他终于看见了立功的曙光。可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由于这份急于立功赎罪的心理，导致接下来出现了失误。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四（5）

邹谷的失误是在完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倏然发生的：春节过后大约五六天，晚上8时左右，蒋云龙忽然打来电话，问上次见面时所说的设计袖章一事进行得怎么样了。其实，邹谷只要告诉对方目前进行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但邹谷出于想打听到更多情报以便立功的心理，竟然饶舌地向蒋云龙提出了几个问题：需要制作多少袖章？最晚大约几时交货？鉴于上次提交的图纸有飞机场、广播电台、邮电局三个目标，所以袖章是否需要制作不同颜色的？各需要制作多少？

蒋云龙对于邹谷的这些问题没有作回答，只是说回头决定了再通知邹谷，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在场的侦查员以及在电信局机房监听着的侦查员当时没有反应过来。那时还没有磁带录音机，只有那种笨重的钢丝录音机，数量也是极其有限，通常只是在审讯重要犯人时才使用。像蒋云龙的这种通话，虽然也很重要，但不可能把钢丝录音机搬到电信部门的机房去进行现场录音，所以采用的是去电信机房进行现场监听并速记内容的方式。现场记录需要整理一份，侦查员在整理时觉得这次通话内容似乎有问题，主要是邹谷显得过于饶舌了，这是否会起到打草惊蛇的作用？

通话记录当即送到专案组领导面前，正副组长江恒大、老汤两人一看一研究，颇有同感：邹谷说了不应当说的内容，这可能会使蒋云龙产生怀疑。

于是，专案组决定加强对蒋云龙的监视，立马增派了侦查员。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1）

蒋云龙是否对邹谷产生了怀疑？此刻谁也说不清楚，只好走一步看一步，鉴别的标准是看蒋云龙是否还跟邹谷联系。当然，同时还得注意如果蒋云龙已经受到惊动，干脆直接逃之夭夭了。所以，江恒大特别叮嘱监视蒋云龙的侦查员一定得密切注意。

哪知，蒋云龙还是逃了！

蒋云龙返回其住处后，一连三天只出过一趟门，那是返回后的次日上午，叫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离其住所不算远的一家医院，挂了内科的号，配了些治感冒风寒的药。之后，他竟然一连三天都没有出过门。监视他的侦查员认为他是在生病，不出门是在床上躺着养病，所以并没有向上级报告。

那边，专案组两位领导等得不耐烦了，到了第四天上午，老汤说我去那里看看。到了蒋云龙住处附近找个地方把两个侦查员中的一个叫到一边一了解，老汤的脸色顿时异样：三天没出门了？那他吃饭咋办呢？平时你们不是说他一天三顿都到对面那小饭馆吃的吗？

侦查员说人家生病了，饭吃不下，就不去馆子吃了，饿了可能弄点饼干蛋糕的打发就是了。

那么晚上呢？你们看到他屋子里透出过灯光吗？

这一说，侦查员紧张起来：这个……上两天晚上亮过灯的，昨晚……昨晚好像没有亮过灯啊！

老汤马上知道情况坏了，立马让派出所协助找电灯公司借来了抄电表员工的服装，冒充抄表员，以抄表为名去敲蒋云龙所租那房间的门。没有反应。叫来房东打开房门，里面没有人。

蒋云龙已经逃了。据分析，他是乘黑夜的掩护从楼上房间坠楼而下得以逃脱的。

江恒大一听就炸了：这是怎么搞的？竟然如此麻痹大意！人呐？先停职隔离，听候审查！

然后就赶紧向陈龙局长报告，当然还得检查。陈龙这样的反谍专家，什么事情没碰上过？他说检查先放一放，咱先分析一下情况，蒋云龙会往哪里逃？把同志们都叫过来，一起议议。

于是马上举行了一次案情分析会议，专案组所有的人全都集中过来了。都以为陈龙要发一通火，哪知局长不但没有发火，还每人给了一包香烟，说同志们辛苦了，犒劳一下，等侦破了案子，我请大家喝酒。开个会议议情况，由你们江组长主持，我在这里是与会人员，跟大家一样发言和听别人发言。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2）

众人分析：现在对于邹谷是否露了馅儿可以有定论了，否则那蒋云龙不会逃跑。从他逃跑的手段来看，这是一个很有心计的角色，我们得认真对待。蒋云龙自2月9日跟邹谷见过面后，就受到了专案组的秘密监视，那时他是不知道自己已被盯上，所以从2月9日开始一直到那天被邹谷的电话内容惊动之后的这些日子来的外出情况，应该是真实而不加任何掩饰的。蒋云龙这些日子都跑了些什么地方呢？受命跟踪的侦查员都有记录，他基本上是深居简出，一共只跑了七八处地方，而且都是百货公司、商店、电影院、戏院、医院、饭店等公共场所，没有发现他跟别人有什么接触。

这样，就使人不得不觉得奇怪了，蒋云龙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发起人、主持者，此刻正处于非常紧要的策划、筹备在南京发动反革命暴动这样的“大计”阶段，难道他这些日子就没有跟外界联系？那他所需要的外界相关信息是怎样传递给他的，而他要向手下人下达的指令又是怎样传递出去的？他的住所没有电话，也没有发现他投递过信函邮件。因此，他惟一的沟通手段就是在外出期间直接在去过的某处或者某几处偷偷用约定的方式秘密传递了情报以及指令。

这样，专案组又有了信心，暗忖总算看到了一丝曙光：如此，蒋云龙对外联络的渠道无疑就是在他这一阵去过的那七八处地方中的一处或者几处，只要对那些地方进行监控，很有可能会把业已断了的线头重新给续上。

于是，专案组当即进行人员分工，算下来人手不够的，陈龙局长当场指令调派，每个监控点都配置了足够的人员，进行全天候的监控。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仅仅过了三天，蒋云龙就露头了。那天下午，奉命监控新都大戏院的侦查员忽然发现蒋云龙出现在视线中。他是乘一辆马车过来的，在戏院门前的空场上下了车，掏钱打发

了车夫，然后就反背着双手佯装悠闲似的在空场上信步走了一圈，在海报栏前驻步，专注地看着《火烧红莲寺》的海报。

当时在场的侦查员有两个，一个伪装成卖零食的流动小贩，另一个佯装路人。发现蒋云龙的是“小贩”，他马上向“路人”发出了暗号，于是那个侦查员就开始进入了监视位置。可是，令人出乎意外的是，这次跟踪竟然失利了！

应该说，这位侦查员是一位富有跟踪经验的老警员了，他是抗战时期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当时是汪伪警察厅的刑警，后来国民党接管警察厅后，留用下来当了首都警察厅的刑警探长，参加过几起当时比较有名的刑事大案的侦查，而且分管的就是指挥跟踪。布置或者亲自跟踪数名著名案犯，从未失手过。可是，这次却竟然被蒋云龙给耍了一把。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3）

蒋云龙看了片刻海报后，点了一支香烟，随手把空烟盒扔进一旁的废物箱。然后，进了售票厅，转了一圈就离开了。侦查员便开始跟踪。蒋云龙步行片刻后，招来一辆三轮车上去。侦查员在马路对面看着，正好有一辆空出租车开过，便招停后上去，慢慢地跟在后面。

蒋云龙坐着三轮车去了原总统府附近的一家茶馆，入内上楼。这位侦查员作为一名老刑警，对于南京城内的各类公共场所诸如饭馆、茶楼、影剧院、浴室、旅馆、咖啡馆等的地形都了如指掌，知道哪家有前后左右几个通道进出。当下一看蒋云龙进去的那家茶馆，知道共有两道门进出，一是前面的大门，另一则是在右侧那条只有一个出口的断头小巷子里的边门，那是专供运送煤炭、木柴使用的通道，通常是不让茶客进出的。侦查员为防万一，还是决定同时监视这两个进出通道。于是便在进门靠右侧小巷窗口的一个座位上落座，要了一壶茶，慢慢地喝着。不敢喝多了，生怕蒋云龙在他正好上厕所的当儿溜了号。这个位置既可看住大门，又可盯着右侧的小巷，不愁蒋云龙会从眼皮底下溜走。

哪知，蒋云龙竟然还是钻了个空子脱了梢。蒋云龙被捕后交代，他是在离开新都大戏院后发现已被人跟踪的，就想摆脱。无奈那出租车盯得很紧，过了十几个红绿灯道口也没甩得脱，于是只好进了这家茶馆，想先缓一口气再说。他在楼上占的也是一个好位置，能把楼下情况一览无遗。他看到侦查员所占的那个位置，心里暗暗叫苦，寻思这回撞上老手了。只好喝一会茶离开，考虑如何再设法脱梢。一会儿，蒋云龙下楼上厕所，进得门去，不禁大喜：厕所正在扩建，原来的墙壁砸掉了，跨过墙脚就是邻家的一个业已荒芜了的大院子。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来了一个不辞而别。

那个侦查员见蒋云龙进了厕所一直没有出来，不禁起了疑心，待到忍无可忍了进去一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懊恼得真想砸自己的脑

袋！

专案组马上举行案情分析会，那个老侦查员自然要进行一番检查，还要求组织上给予处分，这就不是当场决定的事了，放在一边。先研究当务之急吧，分析案情，对于蒋云龙大老远的雇了辆三轮车前往新都大戏院看海报一事觉得不解：如果说是想了解该戏院这几天的演出剧目，那就买份报纸一看就清楚了，所以，估计蒋云龙是有事而去该戏院的。什么事？联想到之前蒋云龙曾两次来过新都大戏院，就怀疑这家戏院里有人可能跟蒋云龙是有关系的。

老汤马上想到了侦查员看到过蒋云龙往废物箱里扔过一个空烟盒的举动，便提出那可能是蒋云龙传送情报或者指令的一种方式。众人深以为然，于是便决定将此作为一条线索，围绕那个废物箱进行调查。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4）

这是一个措施，另一个措施是：考虑到蒋云龙已被惊动，估计凭其那份警觉多半不会再去那七八处曾经去过的场所，所以得用另外办法查找其行踪。什么办法？蒋云龙曾让邹谷设计袖章，现在当然不可能再跟邹谷联系了，但袖章还是需要的，不管他是怎样解决设计问题的，最终还得找地方印制（或者是购买了印制材料后自己印制）。所以，只要控制袖章印制，大约就能查摸到蒋云龙的线索了。

这时已经进入1950年3月份了，专案组双管齐下同时进行调查，稍有收获。一路侦查员悄然对新都大戏院方面进行调查，先从跟那个废物箱会有接触的人员查起，那是一个姓王的杂务工所负责清理的，查此人历史上曾当过国民党宪兵，因负伤后为讨索赏金组织伤兵向蒋介石请愿而被捕过。释放后不敢再张狂，但饭总要吃的，就去新都大戏院当了一名杂务工。最近，王某跟管他的总务主任钱惟周关系很热乎。因此，专案组决定下一步调查钱惟周的历史。

另一路侦查员对全市的印染店家安排布控，当时人民群众经济拮据，衣服穿着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一件衣服要穿九年，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跟印染行业打交道，这种小作坊式的店家为数不少。侦查员一家家寻访着跑下来，费时三天。跑到最后一家时，老板说昨天已经有人买去印制材料了，选择了红色、黄色、黑色、绿色4种颜色，还买了版子、纱网和喷筒。想印什么没有说，不过从购买材料的数量来看，是准备印很多东西的。

哦？有人买过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买的？

是个女人，30多岁，打扮得有点时髦，说一口南京本地话。

前往调查的侦查员是夫子庙派出所警员老刘和另一市局侦讯处的同志，两人闻听之下，很是失望，暗忖怎么这样巧，跑了三天最后跑到这家店铺了打听到了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老刘两人稍一商量，心存侥幸，寻思最好是对方材料买得少了些，还来增添什么的，那就

可以跟踪了。于是，两人决定守候监视。跟专案组领导打电话一说，认为可以一试，两人就对店家关照一番保密事宜后，在对面摆了一个香烟摊，由老刘守着。另一侦查员化装成清道夫，穿了套破旧衣衫，头上扣了一顶破毡帽，佝着身子拖着一把大扫帚扫街。

这一招还真让他们使对了。两天后的下午，3时许，那个购买材料的女人竟然重新出现在印染店铺前，她是来调换上几天买去的喷筒的，说想使用了，先加了些水试了试，发现喷得不爽，就来要求换一个。印染店老板出面接待，满足了她的要求。那女人离开时，没有留意到背后已经跟上脱去了清道夫衣衫还原为普通市民样的侦查员。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5）

这一跟踪，跟到了那个女人的住处。专案组当即秘密控制了那个点，经调查，那个女人名叫彭彩娟，是个寡妇，其夫是国军连长，前年死于国共内战的战场上，彭彩娟靠丈夫遗下的家产带着一个女儿生活。解放后她响应人民政府“劳动光荣，自食其力”的号召，置办了一台缝纫机，做起了裁缝。居委会说最近因刚过了年，所以生意清淡，没有发现有陌生人去过她家，不过她近日一反常态，经常去小巷口的那家织袜工厂门房借用电话机。

袜厂的电话是那种最老式的人工拨号座机，去电信部门一问，由于内部技术原因，不能监听。这样，袜厂门房老邵就被专案组找去谈话，请他协助警方留意彭彩娟的通话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翻身感特别强烈，老邵自然积极协助。可是，那些日子彭彩娟却不去打电话了。老邵有些着急，可也没有办法，又不能去催人家过来打电话。

到了3月13日那天，终于盼得彭彩娟来了。她给老邵带来一盒子糯米团子，说是自家做的，请老邵品尝品尝，然后就提出要借打电话，老邵当然是求之不得。

不过，这事进行得似乎不是很顺，因为彭彩娟拨通电话时，正好有人要进厂找人，老邵只好接待，让他们填了单子什么的。这样一折腾，就只隐约听见彭彩娟说“那我明天就送到那里去吧，你们几时过去取啊？上午10点？好的”，然后又说了一个店名，好像叫“富大祥”。

消息迅速传到专案组，于是马上调查“富大祥”是什么地方。最后查明“富大祥”是一家绸布商店，距南京市公安局洪公祠1号不远。专案组寻思不管明天蒋云龙指派谁去跟彭彩娟见面，反正先监控起来再说。当然，由于彭彩娟电话里说的是“你们”，所以不知对方会来几个人，会从哪个方向前往“富大祥”，所以得安排足够的人手监视各个路

口。为防止打草惊蛇，跟踪时也得采取轮流替换、人车结合的方式进行。江恒大还特地从市局要了几位女同志准备予以协助。

一切都准备停当，就等着好戏开场了。哪知，情况变生不测，次日上午9时许，彭彩娟叫了一辆三轮车，到她家装了一包软乎乎看上去像是纺织品的东西，自己也坐了上去离开了家。哪知三轮车在经过那家袜厂时，被一辆从里面驶出来的装货的卡车碰撞了一下，三轮车夫受了重伤，彭彩娟也伤了一条腿。彭彩娟顾不得流血的伤口，马上抱住了一旁的那个包包，最后连包带人被厂方送去了医院。秘密监视她的两个侦查员，一个跟着去了医院，另一个赶紧找了台电话机向专案组长报告情况。

5.“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覆灭记 五（6）

这样，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今天这场戏的主角是彭彩娟，只有她到场，跟她接头的敌特分子才会得以暴露。现在彭彩娟去不了接头地点，对方即使到场，在侦查员面前出现了，侦查员也不知道就是目标啊。江恒大和副组长老汤一商量，认为有必要将这个情况向现场侦查员作紧急通报，让他们务必注意不能使自己暴露，在这个前提下再密切观察是否有可疑分子出现，考虑跟踪与否。

江恒大让老汤去现场走一趟。老汤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刚刚出了市公安局大门，忽然眼睛一亮！怎么呐？还真应了“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他竟跟蒋云龙劈面相遇！

蒋云龙是去“富大祥”门口准备跟彭彩娟碰头取请对方制作好的袖章的，这家伙胆子还真是大，竟然就敢大摇大摆地从市公安局大门口经过，一边走一边还朝大门里作好奇观望。这一望，就正好撞见了老汤。这只好埋怨自己的胆子太大，好奇心过强，运气太差了。老汤脸上一片平静，看都不看他，自顾踩车往前。直到和蒋云龙平行时，这才飞身下车，乘机把自行车朝蒋云龙身上推去。蒋云龙猝不及防被撞翻在地，连车带人给老汤按住。市局门口的警卫马上过来将蒋云龙抓获。

这样，就要动那边彭彩娟的那包东西了。打开一看，果然是“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袖章，一共有500个。可能考虑到应在夜间发动暴动，所以选择的是白布，以红、黄、黑、绿四种颜色印着“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的字样，正中下方有一括号，内中以上述四种颜色区分，分别印着“东”、“南”、“西”、“北”，后据蒋云龙交代，那是“南京行动总队”下辖的四个大队。

蒋云龙被捕后，最初拒不吐口。直到专案组获取彭彩娟的口供，称其奉亡夫原在国军时的上司蒋云龙的拉拢参加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奉命制作反革命组织的袖章云云后，向蒋予以点明，竟仍只是

摇头。专案组经过研究，结合对新都大戏院总务主任钱惟周的调查所发现的疑点，大胆推断钱系蒋云龙的同伙，故意在再次审讯时将此节敲山震虎，这才使蒋云龙误以为其阴谋已经全部败露，被迫作了交代。专案组从蒋云龙的住处搜得“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已经印制好的“郊区大队”的胸章和布告，布告内容是宣告“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已经“接管”了飞机场、邮电局、广播电台。

这样，终于获知了“苏浙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情况：蒋云龙发起组织的这支反革命武装已经组建了“南京行动总队”，下辖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郊区五个行动大队。总队长名叫朱光，住在南京市糖坊桥，副总队长是钱惟周。据下面大队报上来的数字，整个“南京行动总队”已有大约300名成员。诚如专案组分析案情时所料，蒋云龙本人并不知道下面那些成员的姓名地址。好在两位正副总队长随即被抓，交代出了下面大队级成员的情况，于是顺藤摸瓜一一抓捕，最后一清点，一共逮捕了287名成员。

这起特大反革命案终于顺利侦破，反革命分子依法受到了严惩。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一（1）

抗美援朝时期，当时的新型抗生素盘尼西林奇缺。一封神秘的举报信出现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长的案头，举报一起走私3000盒盘尼西林的大案。警方经过侦查，破获了该案。查扣的珍稀药品能否运往朝鲜前线拯救伤员？对药品的检测从案发地上海延伸至北京、莫斯科。机警的公安人员终于识破了隐藏在这起走私案后面的阴谋，由毛人凤拍板的台湾“保密局”“901计划”终于真相大白……

一

1951年9月13日下午，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市郊南侧隐藏于重重绿荫中的一幢带着浓厚神秘色彩的日本式花园洋房内，“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正在审阅一份由“保密局”的特工专家策划的一个代号为“901”的绝密级行动计划，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案如果实施成功，能够起到相当于大约一个兵团的国军对于中共投入于朝鲜战场的志愿军的一次取得全胜的小型战役中歼灭敌人数量的巨大作用。当时，在“保密局”，凡是由毛人凤亲自拍板的行动计划，都是被下属认为有绝对把握的，这种计划一旦批准，通常就会上报给蒋经国，最后出现在蒋介石办公室的案头。

20天后，“保密局”特务许骧璋受命主持执行“901计划”，从台北飞赴香港。稍事停顿后，许骧璋又在一个雨夜偷偷上了日本的一条名唤“九富丸”的渔轮，3天后抵达当时还被国军控制着的一江山岛。1951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化装成渔民的许骧璋搭乘一条浙江渔船抵达上海定海桥。至此，许骧璋完成了他从台湾潜赴大陆目的地的行程，摇身一变，以西药掮客的身份混进了大上海的茫茫人群之中。

而此刻大陆警方对此还一无所知。

许骧璋，江苏无锡人氏，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抗日战争爆发那年他正在上海读大学二年级。当时跟中国许许多多热血青年一样，游行集会、募捐献血，只觉得满腔的爱国热情无处迸发。这当儿，刚从

复兴社特务处改为军统局的特工专家为这些青年设计了一条“救国之路”，从这些青年中百里挑一地遴选符合从事特工工作的优秀分子，把他们招收进了军统局，送到了首期特工训练班接受特工训练。戴笠对这件事特别重视，三分之二的学员都是他亲自面试之后拍板的。许骧璋就是戴笠亲自选中的一位学员。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一（2）

许骧璋从军统特训班毕业后，就被派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特训班他学的是情报，但到了上海之后有时还客串着搞搞暗杀、悄悄设置一颗定时炸弹什么的属于行动特工的活儿，对付的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所以立了几次功。当然也被日本人和汉奸列入了需要重点对付的那部分特别危险分子的秘密名单。不过许骧璋算得上是一员福将，他在上海潜伏多年，竟然从来没有暴露过。抗战结束后，许骧璋本来估计是可以到军统局总部当个什么官员的，因为戴笠接见他时曾经表示过这层意思。但他的官运有问题，戴笠这话说了不到一个月就死了，这样许骧璋就被郑介民、毛人凤扔在一旁。后来不知怎么的总算想起这位当年的地下工作有功之臣来了，给了他一个中校军衔，仍打发去了上海，专搞经济情报。

用许骧璋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来说，叫做“金子总是要发光的”，他在上海竟然又干出了一番名堂，弄到了几份很有价值的国际经济情报，据说其中有一条被蒋介石提供给美国，换得了一个师的美援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后来都被林彪、罗荣桓的第四野战军缴获过去了。但是，许骧璋的名字因此而被蒋介石记了下来。这次毛人凤准备实施“901计划”，蒋介石亲自点名说让“那个姓许的无锡人”去上海走一趟。

现在，许骧璋终于重新踏上了上海这块他所熟悉的土地，根据预先考虑的，他去找了住在黄浦区浙江中路上的一个名叫孔爱芳的28岁的女子。

这里要对孔爱芳作一介绍，因为她是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孔爱芳是上海本地人，出身于一个西医家庭，其父早殁，所以家境不佳。孔爱芳在18岁时离家出走，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一个姓姚的汉奸头目作为外妾养着，身边有佣人、保镖、车夫，日子过得很

是滋润。养她的那个姚某，在“76号”分管着对于上海郊区诸县的情报工作，这自然就被列入了军统派遣上海的地下工作者的视线，于是，孔爱芳就被内定为“工作对象”，军统上海特区头头命许骧璋采取“一对一”的手段把孔爱芳拿下后控制在手里。

许骧璋先收买了孔爱芳的佣人，通过佣人又软硬兼施控制了车夫和保镖。那3位并不知道许骧璋的军统特工身份，只道是一个花花公子，看上了颇有几分姿色的孔爱芳，也就乐呵呵地接受了贿赂。哪知，许骧璋干的活儿是从孔爱芳那里获取“76号”的情报，所以，当后来事情终于败露，日本宪兵队的警车呼啸而至时，这3位甚至还以为人家东洋先生找错了地方。3人被捕，孔爱芳却因为不在家而逃过了一劫。她那位“先生”因此也颇吃了些苦头，后来还是汪精卫发了话才留了一条性命，逃往香港去做生意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一（3）

孔爱芳脱险后，走投无路，找许骧璋求助。但许骧璋没有上峰发话是不能收留她的，于是就给了一笔钱让她自找生路。女人若是记起仇来那是很要命的事儿，孔爱芳从此就一直记着这件事。尽管她感恩于许骧璋当时给过她一笔钱钞，但不能原谅许骧璋是此事肇源，所以，后来她给沪上一个有点名气的资本家做了小老婆恢复了元气后，可以对许骧璋客客气气，仗义疏财也肯，但坚决拒绝许骧璋有时想逢场作戏的念头。这样，许骧璋和孔爱芳之间就属于那种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互相又很可以说说私话的关系。

这次，许骧璋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设计了一个方案，让孔爱芳稀里糊涂地协助“保密局”执行“901计划”的。

根据潜伏在上海的特务的调查，孔爱芳在解放后的生活情况处于每况愈下的状况：上海解放前夕，她那资本家老公瞒着她变卖了产业，携着大老婆和子女悄然逃往海外，没有给孔爱芳留下一文钱，只有她住的一套小洋房因为当初是她的产权而算是她的财产了。尽管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倡妇女解放，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股妇女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妇女求职比较容易，但孔爱芳从来没有靠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打算。但何以谋生呢？这倒难不倒这小女子，孔爱芳灵机一动把小洋房出租，用一部分租金在浙江中路租了一个住处，剩下的就作为生活费打发了。孔爱芳是一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很喜欢跳舞，差不多天天去“百乐门”，不久就搭识了一个比她小两岁的名叫甘祖强的小白脸。两人这时已经同居了半年。

许骧璋的登门使孔爱芳深感意外，这倒不是他的特务身份。许骧璋从来没有在孔爱芳面前暴露过自己的特务身份，多年前的那桩“76号”案子，事后对孔爱芳的解释也是“受朋友之托”，他对外的身份是生意场上的掮客或者洋行的买办。问题是，自1949年春天江南地区行将解放时开始，许骧璋就跟孔爱芳中断了联系，孔爱芳一直以为他已经

失踪了，现在冷不防突然冒了出来，她肯定是一个激灵。许骧璋对她的解释是，自己去广州那边发展了，现在混得还可以，这次来沪考察商机，打算住一段时间，因为惦记着她，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她已经搬到这边来住了，马上过来探望。说着，许骧璋就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礼品：高级化妆品、时尚服装、皮鞋，还有几筒香烟，都是舶来品。香烟是送给甘祖强的，因为这个小白脸也是“保密局”的“901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当时，上海滩能够享用舶来品的人已经不多，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经济封锁，中断了贸易。所以，海外商品成了罕见之物，谁拥有那就不但具有一种享用之优，还代表着一份心理上的虚荣。因此，许骧璋的这些礼品极受孔爱芳、甘祖强这对同居者的欢迎，也就很容易地赢得了两人的信任。

于是，许骧璋就开始行动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1）

之后，许骧璋就跟甘祖强套起了近乎，对孔爱芳倒反而冷淡了。

甘祖强的出身并不高贵，他的老爸是给一位英国在沪经商的老板当听差的。正是由于这一点，甘祖强从小就从老爸那里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渐渐还知道了外国贵族的一些做派。这样，当他成年后，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具有高贵门第背景、自小就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子弟，就不是一桩很犯难的事情了。他那副白脸小生的脸容和经常从事“勃克新”（英语BOXING：拳击）活动而形成的体魄，要想吃软饭那就是上天特赐给他的福分了，对付孔爱芳那样的女人，自然就是小菜一碟了。但是，他跟孔爱芳的交往却是看走了眼，他以为对方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妇或者离了婚的小老婆之类，寻思靠在孔爱芳身上挥霍一番料想不成问题。哪知同居了方才知道孔爱芳只有一套小洋房，暗叹自己眼力不济之余动起了另一脑筋。这个脑筋后来在他落网后交代出来，是想把孔爱芳的那套洋房骗卖后卷款玩消失。

不过，这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计划，火候到了方才能把洋房的产权凭证骗到手，所以，甘祖强眼下就得耐着性子讨好孔爱芳。他是吃软饭的老手了，讨好女人倒是很从容，但就是缺乏实力，他没有装扮如他对孔爱芳所说的自己是华侨子弟的金钱基础。为此，他已经悄然背了若干债务。甘祖强以前吃软饭时曾经跟在人家后面接触过生意方面的事儿，他自己空闲时偶尔也做做掮客，所以，他盘算着最好先弄点掮客生意来做做，以解决眼前的经济拮据问题。

就在这当儿，许骧璋出现了，许骧璋对甘祖强说的一番话使甘祖强很感兴趣。许骧璋跟甘祖强喝了几次老酒后，基本上已经摸清了对方的路数，这跟潜伏在上海的特务奉命调查到的情况差不多。这就好办了，他就拿出了台湾“保密局”的特工专家给他制定的方案，对甘祖强说他在上海有一个好友，听说在经营西药方面很有路子，如果老弟你有兴趣的话，我倒是可以介绍你们两人认识一下的，看是否有合作

的可能。甘祖强一听寻思这真是正想着瞌睡就有人送枕头来了，于是马上连声说好，谢声不迭。

这样，“保密局”潜伏在上海的特务仇学武就出场了。仇学武年岁比许骧璋大几岁，但参加军统却是抗战结束后的事儿了。这人原是国军的中尉政工人员，抗战结束后裁减部队政工人员，戴笠正好从中择优录取挑选了一批，进行特务技能训练。当时，给仇学武当教官的那批人已经属于许骧璋当年在军统特训班当学员时的学弟了，所以若按武林规矩来论的话，许骧璋应该是仇学武的师叔了。这次，根据台湾方面的指令，让仇学武担任许骧璋在沪执行“901计划”的助手，这对仇学武而言自然不得不生发出一份受宠若惊之感，寻思一定得好好表现一番，努力完成使命，给自己创造一条升官发财之道。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2）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让“901计划”的内容曝光了。要说这个计划内容，先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为风靡的一种西药盘尼西林说起。盘尼西林是英文的音译，中文的准确表述是“青霉素”。如今，青霉素虽然还在广泛使用，但已经退出抗生素风靡名单了。但是，它却是抗生素家族的最先诞生者，可以说，如果没有青霉素，那也就没有之后一代一代不断胜出的其他多如牛毛的什么什么霉素。

20世纪40年代以前，人类一直未能掌握一种能高效治疗细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药物。当时若有人受了严重的外伤或者患了肺结核之类的毛病，即使他的老爸是世上第一名医，那也只好用磺胺进行治疗，治得好治不好那就要看造化了，通常肺结核多半是无法对付的，病人就先写好遗嘱吧。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难题，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全世界的科研人员进行了长期探索，然而到1928年夏天之前，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1928年夏天，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外出度假，临走时忘记处理实验室里的一个培养皿，3个星期后等他回来时，发现培养皿中的葡萄球菌培养基由于暴露于空气之中而受到了一种霉的污染，他注意到恰好在培养基中霉周围区域里的细菌消失了，他正确地断定这种霉在生产某种对葡萄球菌有害的物质。不久他就证明了这种物质能抑制许多其他有害细菌的生长，而对人类几无毒副作用。弗莱明根据其生产者霉的名称青霉素而将其命名为“青霉素”。

弗莱明的研究结果发表于1929年，但是起初并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弗莱明指出青霉素将会有重要的用途，但是他自己无法发明一种提取纯青霉素的技术，致使这种灵丹妙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一直未能得以进入临床使用。

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澳大利亚医学研究人员霍德华·瓦尔特·弗洛里和英国的医学研究人员厄恩斯特·鲍里斯·钱恩偶然读到了弗莱明

的文章，两人重复了弗莱明的工作，证实了他的发现结果。然后，弗洛里、钱恩用一种新方法成功地提取到了纯青霉素，经对实验室动物试验，杀菌效果极佳。1941年，又将青霉素给病人试用，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新药具有惊人的效力且几无毒副作用。

青霉素的发现开创了人类征服病菌的一条崭新的道路，之后科学家又据此生产了其他抗生素，一直到目前还在走着这一路子不断研制着这个霉素那个霉素。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3）

在英美政府的鼓励下，药品制造商进入了这个领域，很快就解决了批量生产青霉素的方法。这种珍贵的新药一出现，马上就被公众认为是“神奇救命药”。由于产量低且成本高，最初两三年间青霉素只是留给战争伤员使用。到了1944年底，英美公民在医疗中也能够使用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青霉素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接着，英国、美国政府相继宣布解除青霉素出口的禁令，青霉素才以缓慢的速度和极少的数量流入英美以外的国家的黑市。对于全世界的需求量而言，这些流出的青霉素的数量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价格仍然高不可攀，令人咋舌，1946年上海西药黑市场上“黄牛”推出的盘尼西林的等重价格甚至超过了黄金。

大约从1949年开始，随着中国大陆诸多城市相继获得解放，从事黑市走私盘尼西林的主儿们都闻风而遁。而走私盘尼西林的主要渠道香港、澳门那边的口子也已被封闭，因此，盘尼西林在黑市场上基本消失了。而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人民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则由于西方国家的禁运而无法从海外采购到盘尼西林，所以医院、医药商店也是无此药可卖。当时，苏联已经能够自己生产青霉素，根据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协议，苏联能向中国出口一些盘尼西林，但是，这些进口的盘尼西林同中国的人口比例需求量而言，简直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当时中国大陆还在进行追击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剿匪战争，军队对于盘尼西林的需求量很大。因此，盘尼西林是当时中国最为缺乏的西药。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对苏联进行访问时，与斯大林谈到了请苏联政府援建制造包括盘尼西林在内的一些西药的药厂。苏联政府将该项目列入了对新中国首批援建的项目，3年后，中国终于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了，上市时的药名改为正规的名称——青霉素。

此为后话，到此打住。让我们回到前面所说的1951年，当时的情况是中国尚未能够自己生产盘尼西林，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跟美国等联合国军队、李承晚伪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大批官兵在战场上负伤，不难想象，盘尼西林对于当时的志愿军是多么缺乏。台湾“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就是基于这种形势背景，策划了“901计划”：将一种由美国间谍机构研制的无色无味通常药检手段无法检测出的毒药混入盘尼西林针剂药粉内，将这些盘尼西林作为走私货偷偷运往上海，物色一名蒙在鼓里的局外人作为货主接收货物；安排另一名局外人对此事进行举报，从而使中共方面安排力量截获这批走私药品；中共方面获得这批中国大陆特别急需的药品后，肯定会检验，但凭大陆药检部门目前的检测水平是不可能发现这些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了毒药的，所以会作出这是正常的盘尼西林针剂的检测结论，这样，这批药品就不会被销毁，根据大陆目前对于盘尼西林的缺货状况，自然也不可能送往医院或者西药房作为商品出售，而会将其放到最需要的方面去——那就是提供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了。那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在使用这种特殊的盘尼西林之后，初时跟使用正宗产品没有什么两样，伤口也能痊愈，身体也没有什么反应。但是，过了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专家研制的慢性毒药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它能够使人的内脏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渐渐地腐烂，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死亡了。更为可怕的是，即使死亡之后对尸体进行解剖，也无法查出这是毒药在起作用。这，就是美国的最新特工科技产品。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4）

许骧璋物色的接收这批特殊走私货的“蒙在鼓里”的人，就是“花花公子”甘祖强，那是让助手仇学武去做具体工作。他本人要做的是把孔爱芳“培养”成一个举报者，让她去举报甘祖强。鉴于孔爱芳与甘祖强的同居关系，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必须得由许骧璋这个老牌情报特工亲自策划了。

之后几天，仇学武和甘祖强打得火热，已经具体谈到了关于走私这批盘尼西林的问题。甘祖强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示非常愿意跟仇学武合作，不过，资金倒是一个问题。据仇学武说，这批盘尼西林的数量大约在3000盒，那得需要一笔巨款才能买到手。而走私货物的规矩甘祖强也是知道的，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拖欠之说的。因此，甘祖强就对仇学武说了这个问题，表示自己拿不出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资金的。

仇学武怎么说？他当然不能大包大揽说你拿不出不要紧，由我来拿就是。如果这样说了，那就容易露馅，因为能够拿出这笔巨款的人，是不可能看得中甘祖强这样的角色将其选为合作对象的。仇学武的说法是由许骧璋事先传授过的，他说，老弟你拿不出百分之一，不瞒你说，老兄我连百分之零点五也拿不出。不过没有关系，这笔资金是由别人出的，我不过是他的代理人罢了，我一个人可能忙不过来，再说也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活儿，听说老弟你以前曾经走私过五金产品，那就对了，所以想请你跟我合作一把，反正有好处大家平分就是了。什么叫哥们儿？这就叫哥们儿，还是铁的！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就该暂且打住告一段落了，一下子谈得太深了，容易吓着人家，甘祖强不过才26岁一个青年哩。又过了一两天，仇学武再次跟甘祖强见面，这回就谈深的了：老弟啊，我跟人家投资方说了，投资方的意思是这种事儿在旧社会就属于犯法的，现在新社会那就更加不用说了，咱跟甘祖强初次结识，凭什么这样相信人家？

甘祖强一听就急了，这不是不带我了吗？于是就急扯白脸地打断仇学武的话要求一定带上他一起做，并说他眼下是如何如何需要获得发财的机会，说到动情处，甚至掉落了眼泪。这，完全在许骧璋事先的预料之中，这就是专业特工的水平了，他事先已有话对仇学武作过交代了。当下，仇学武照搬就是：老弟啊，我没想到你对这件事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份积极性真是令人感动。这样吧，我给你向人家投资方再说说看，尽量替你争取到这个机会吧。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二（5）

当天晚上，仇学武到甘祖强下榻的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来了，“正好”许骧璋也来看孔爱芳。甘祖强自然要避着那二位，于是就把仇学武扯到房间里去说话了。仇学武对甘祖强说，人家投资方的意思是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老弟交纳一笔保证金表示诚意吧。你可以放心，这笔保证金不是投资，不会拿去作为本钱的，不管这次买卖做得成做不成，结束后都会一文不少的还给你的。甘祖强一听就来了劲儿，问保证金需要交多少？仇学武说不能少于1000万元吧（此处指的是旧版人民币，相当于新版人民币1000元）。当时物价低廉，1000元不是一个小数额，甘祖强听了顿时脸有难色。仇学武说你如果觉得为难，那也有一个办法，可以用同等价值的东西作抵押的。甘祖强先是一喜，然后就苦着脸只是摇头，暗忖我的所谓华侨身份那是编造的，我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老爸那台十七灯旧收音机，拿到电器行去恐怕也卖不了1000万元保证金的百分之一哩，我有什么东西抵押？

仇学武对于甘祖强的神色不读也懂，因为事先“保密局”早已调查得清清楚楚，如果眼前这小子真拿得出1000万元保证金的话，大概特工专家也不会将其作为工作对象了呢。他没有对甘祖强说拿什么东西抵押，只是微笑着，用那种像是很和蔼、客气的眼光看着对方。甘祖强当然不笨，他既然一心要往这个套套里钻，那自会想出主意来的。片刻，他就打定主意了，对仇学武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现在跟我同居的阿姐的这套洋房的房契悄悄借用一下。

用犯罪心理学来分析，甘祖强的这个选择属于偶然中的必然。之前他就有过把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偷偷卖掉后卷款玩消失的念头，只是要做成此事得请孔爱芳本人亲自出场。当时上海滩的房屋产权凭证还延续居民解放前获得的旧凭证，如果房子是自己出资建造的，那就凭出资人与营造商的合约在房子造好后向工部局申领房契；如果房子是通过买卖所得，那就由房屋转让人约请两名中人作证当场立下房屋

出让契约。解放后，市民如果要买卖房屋，还是按照旧规矩办。这对于甘祖强想把孔爱芳的洋房骗卖是一个难题，你即使拿到了孔爱芳当初买进房子时的房契也没用，因为必须让孔爱芳这个本主儿亲自到场签名画押才行，这需要他耗费时间对孔爱芳下水磨工夫，火候不到别撒网，否则准会把鸟儿惊飞了。而眼下的抵押就不同了，甘祖强只要把孔爱芳的房契偷偷拿到手，交给仇学武，就算完成抵押了，完事后再拿回来悄然放回原处就是。

甘祖强得意洋洋地对仇学武说了说，仇学武说这事我不表态，你自个儿看着办吧。甘祖强说那就这样定了，你等我的消息就是！

这番密议，自然落到了外屋在许骧璋暗示下对甘祖强和仇学武的鬼鬼祟祟之举产生了好奇加怀疑之心从而进行偷听的孔爱芳的耳朵里，真个是又惊又恼，自然要作出一番反应。

可是，孔爱芳作出的反应却让许骧璋大失所望！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1）

孔爱芳跟比她小两岁的同居者甘祖强的关系，属于情人关系。她是一个喜欢享受奉承的女人，也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吃”“花”的女人，这里的“吃”是沪语“喜欢”的意思，“花”用于此间作沪语“甜言蜜语”理解。而甘祖强恰恰就是这类男人中的佼佼者，加上他还吹嘘自己的“华侨”身份，长相也顺眼，又有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总之，种种特点综合起来不是寻常女人所能追求得到的。因此，孔爱芳很喜欢甘祖强，她为自己设定的终极目标是要和甘祖强结为夫妻。

孔爱芳偷听到了甘祖强跟仇学武的密议后，最初当然是恼火，寻思自己对他这样好了，而他竟然还要瞒着自己偷拿房契去做非法生意。但恼过之后没几分钟就产生了另外的念头，真所谓“转念一想”，想的是：甘祖强对我还是不错的，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挣钱，平时他一直说的要挣大钱供我享受，看来这就是为了实现他的诺言啊。如此一想，孔爱芳的火气就消失了。本来，她是准备要对许骧璋诉说一番的，就是这一转念，就打消了诉说的念头，若无其事地把话题扯到了其他方面。

许骧璋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观察人的心理自有一套独特功夫，当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思，便很是有些失望。不过，他也并不沮丧，一个合格的特工，当然得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否则这活儿还怎么干？当晚，许骧璋没有作出什么反应，甚至想也没想过，一直到仇学武和甘祖强结束谈话开口告辞，他脸上也没有什么异样神情显露出来。

为防止给甘祖强留下一个这是一起“连档模子”之局，许骧璋没有和仇学武一起离开，他是在仇学武告辞后一个多小时了才离开的。离开后就去了外白渡桥畔的一家咖啡馆，那里，仇学武已经等着他了。许骧璋对仇学武说了孔爱芳的反应，仇学武说如此看来这件事有问题了，要么我干脆另外叫人举报这桩案子算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2）

干特务工作也是讲究资历的，而且似乎比其他行档还要讲究，因此，对于仇学武这样的行业后辈，许骧璋其实是看不上眼的。于是，他就对仇学武说，如何执行计划，上峰是有一套具体方案的，方案是“最高组织”（指“保密局”）的专家制定的，通常，必须按照专家制定的方案执行计划，这样，即使失败了，回去述职时也有个说法，不至于受到处分。他见仇学武的脸上露出似乎怀疑的神情，便又说，我知道你是想说难道专家能够预料到一切，包括眼下孔爱芳对此的态度？是吗？我告诉你，专家不是神仙，他们不可能预料一切情况，但是，专家是会考虑到意外情况，所以通常在交代行动方案时会给你总的思路，如果发生意外，只要按照他们的思路轨迹考虑解决方法，一般来说也是很有效果的。这件事，接下来怎么做？让我考虑后再作决定。你那里，就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仍旧和甘祖强那小子谈下去。注意，甘祖强其人比孔爱芳要重要得多，你可得牢牢抓住，千万不能放手。

许骧璋按照“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制定的思路考虑下来，想到了另外一个措施：那甘祖强是一个喜好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那何不就在这上面做做文章，弄一个漂亮女人去勾引他，然后让孔爱芳知晓此事。女人的吃醋心大起来甚至恨不得遮天，这种事情她绝不会听之任之，何愁她不上钩？

主意打定，许骧璋就约见仇学武，如此这般说了说，让仇学武去执行。

仇学武作为“保密局”的潜伏特务，还担负着发展新特务的使命，他的工作积极性还是蛮高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已经发展了11名新特务，有的已经接受过实战考验，比如散发反动传单、散布扰乱人心的谣言之类。出于可靠方面着想，他决定从发展的新特务中挑选一名女性去执行勾引甘祖强的使命。

这个女特务名叫柳传丽，22岁，未婚，初中毕业，在一家私立医院当护士。这个姑娘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反应敏捷，口齿伶俐，据仇学武向许骧璋介绍，乃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柳传丽的头脑在于懂得记住仇恨，她的父亲是上海滩的一个恶霸，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了。柳传丽把这件事作为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的人生头等大事对待，从此就一心一意留意着如何报仇。还真让她给撞上了，仇学武的老婆患了阑尾炎住院开刀，正好柳传丽是床位护士。仇学武在许骧璋面前是后学小辈，但在社会上寻常人等面前毕竟是接受过特工训练的正式特务，而且正处于留意周围所有人群注意发展对象的当儿，结果一下子就看准了这个小护士。于是，在老婆痊愈出院后，仇学武也生了毛病，私立医院好说话，只要付钱，想住院就住院，还能指定病房、床位，仇学武当然躺在他老婆躺过的那张床上。等到他出院时，柳传丽已经宣过誓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3）

这次，仇学武让柳传丽去勾引甘祖强，当然没说事由，生怕吓着了对方，就说这是来自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指令，如果照着实施了，就算是立下了功劳，日后……柳传丽打断说功劳不功劳我无所谓，我要的是报仇！仇学武便改口说你要为你老爹报仇？那这一步棋子真是再好不过了，你这步棋子一走通，下面的全盘计划就都能畅通了，对于共产党的破坏作用那是大得没法说的，以后看报纸吧。

柳传丽于是接受了指派，经仇学武的介绍认识了甘祖强。这个漂亮女护士的出现，无论是他的寻花问柳史还是人生道路史，都意味着翻开了新的一页。

仇学武故意安排了一个在舞厅“偶然”遇到柳传丽的机会，当时甘祖强自然也在场。柳传丽是有备而来，刻意打扮了一番，又施展出了在旧社会私立医院受过特殊训练的护士小姐的妩媚，马上使甘祖强产生了非分之想。甘祖强对于女人，一是图色，二是图财，能够“双图”当然最好，不行的就单图其一也行，比如他对于孔爱芳图的就是那套洋房。此刻，对于眼前这个护士小姐，他就图色了。

甘祖强跟柳传丽结识之后，次日就给她打了电话，约她到国际饭店吃饭。柳传丽应约而至，不但吃了饭，还去舞厅跳了一场舞，还都是她抢着买单。

接下去，甘祖强就想把柳传丽弄到床上去了。这是仇学武预先对柳传丽关照过的，让她不要坚持拒绝，因为那桩使命的时间有点紧迫，一摆架子就要耽搁了。不过也不能主动，一主动可能会引起甘祖强的怀疑。柳传丽都一一做到了，她跟甘祖强在公平路上一家私营旅馆里开了房间。开房间时，特地还跟旅馆的服务员闹了一点儿小纠纷，好让接下来的事情好做一点。

所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许骧璋悄然对孔爱芳所说的：他听仇学武说，甘祖强好像交了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是个22岁的护士小姐。

他故意说得漫不经心，但对于孔爱芳而言，几乎等同于在耳畔爆了一个“二踢脚”。她马上盯着追问，一副打碎沙锅问到底的架势。许骧璋吞吞吐吐了好一阵，才答应向仇学武打听后再告知。

打听的结果就涉及了公平路上的那家私营旅馆，孔爱芳当即前往询问。旅馆服务员对柳传丽的恼火还没有消，正好添油加醋说了一番，把孔爱芳气了个“发昏”。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4）

女人在感情问题上有时很容易走极端，孔爱芳也不能免俗，回到住所，正好许骧璋也来了。她便哭哭啼啼地把情况诉说了一番，说要给甘祖强颜色看。许骧璋假装劝说，但说出的话语却不乏火上浇油。孔爱芳在男女方面毕竟是老手了，她这时的头脑显得出奇的冷静，得出的结论也就有些冷。就像当初她认为许骧璋有负于她而从此不能发生上床之类的事情一样，她同样也认为甘祖强既然跟那小护士私通了，那她姓孔的也就别指望能够跟他结婚，这场交往也就不过是一场游戏，此刻差不多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不过，她毕竟对甘祖强倾注了一份难得的真心，所以，就这样分手似乎过于便宜那主儿了。于是，孔爱芳的心里就产生了报复的念头。

怎样报复？孔爱芳反复考虑下来，觉得只有抓住前几天偷听到的那桩准备走私盘尼西林事儿做文章，反正做不成夫妻了，那就干脆得罪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写一封举报函件把甘祖强弄到监牢里去算了。至于人民政府会判处甘祖强什么刑罚，那就看他小子的造化了，以孔爱芳此刻的心态，当然最好是枪毙。

别看孔爱芳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式的俗女人，她倒还是有心机的，决定之后，她没有对许骧璋透露，因为她考虑到走私盘尼西林之事跟仇学武也有关系，到时候人民政府少不了也要请仇学武进去吃免费饭，而仇学武是许骧璋的朋友，让许骧璋知道了别透露了风声使这事儿黄了那就不好了。

孔爱芳另外还考虑到了一个问题，她得先让甘祖强有机会把这件事进行下去，那就要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偷拿到她的房契。于是，她就对甘祖强谎称要和几位小姐妹一起去普陀山烧香，问甘祖强是否有兴趣一起去。甘祖强正为没有机会下手偷拿房契而犯愁，此刻孔爱芳把机会主动送上来了，哪有推出去的道理？自然找了一个理由婉拒了。

孔爱芳去徐家汇的一个小姐妹那里住了五天，回来后一检查，房契已经不在了，便知道甘祖强已经开始行动了。后来知道，甘祖强是在孔爱芳离开的当天下午就从街头请了一位锁匠来开了锁，偷拿了房契交给了仇学武。

孔爱芳于是就写了一封举报信，生怕寄丢了，决定亲自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去。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5）

孔爱芳不知应当向哪位领导同志举报此事，就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市华东军政委员会领导同志收”。解放初期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每个领导每天都不知要收到多少人民来信，如果每一封都要领导亲自阅读，那恐怕领导同志就是整天不干其他任何事情，就坐在那里处理信函大概也来不及，所以，通常就交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分管信访的人员去处理。本来，孔爱芳把信函交给接待人员就行了。但是，她出于谨慎，担心这封函件没有受到重视，于是就对接待人员说她要把信函直接交到哪位领导的手中。这一要求当然是无法满足的，孔爱芳一见人家摇头，就摆出了一副不见到领导决不罢休的架势，声称要在接待室一直待下去。这样，工作人员就要问一下究竟是为何事而要直接向领导投递该函。孔爱芳说是为举报走私药品事，那个接待人员一听“药品”两字，立马就说那你把这信函送到上海市卫生局去吧，卫生局的局长崔义田同志还兼着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卫生处处长，交给崔局长没错。

孔爱芳于是就去了上海市卫生局，她未能见到局长崔义田，但是，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答应一定把信函交给崔义田局长。工作人员没有蒙人，确实是把孔爱芳的这封信函交给了崔义田局长。

崔义田看了举报信函，认为这件事应当由公安部门去处理的，于是就把该函件直接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扬帆收到崔义田转去的信函后，批转到了刑事侦查处（当时叫“刑事侦查处”）。当时，这种不着边际内容的举报信函几乎每天都会飞往公安局，有时一天几十封甚至上百封也是有的，大部分查着查着就没法查下去了，工作量之大警力之紧是可想而知的。刑侦处的领导看了孔爱芳的这封未具举报人姓名和住址的匿名信函，暗忖别又是一个查不下去的线索啊，但工作是要做一下的，于是就唤来一个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名叫罗清山的刑警，让他先去初步查摸一下这封举报信函内容的真伪。

罗清山是一个解放战争前期入伍的山东籍小伙子，24岁，上海战役时他在宋时轮的第3野战军第9兵团政治部保卫部当保卫干事。中共方面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宣告成立上海市公安局后不久，为充实公安力量，他奉命和其他一批部队同志就地转业，当了人民警察。罗清山没有什么突出的聪明才智，但是小伙子非常踏实，寻思既然到了这个岗位上，那就得把工作做好，而要在大上海做好公安工作，看来先得把上海滩的道路摸熟，还要把上海话学好。这两桩事情说说容易，真要做成功那还是蛮犯难的。但是，罗清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接受这一使命的时候，小伙子已经把上海滩的每条大街小巷都查摸得了如指掌，一口上海话也说得几可乱真，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哩。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6）

罗清山接受任务后，想了一阵，寻思要了解举报信内容的真假，有两个途径：一是去找信中所说的那两个有名有姓但是不知住址的被举报走私药品的主儿甘祖强和仇学武，二是找到那个匿名的举报者。这两条途径的相同之处是对方都没有住址，不同之处是一个有姓名，一个连姓名也没有。那么走哪条途径呢？罗清山想先去找那个匿名举报人，这样做尽管难些，但是找到后接触时没有“打草惊蛇”之虞，而且找到了举报人也等于是找到了被举报人甘祖强和仇学武。

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匿名举报人呢？罗清山想举报信是从上海市卫生局转过来的，那就先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这封信的信封上没有贴邮票，也没有盖邮戳，说明不是通过邮局邮寄的，那就很有可能是写信人直接上市卫生局递交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运气就来了。

运气倒还真让罗清山撞着了，他去上海市卫生局一打听。信访接待的工作人员根据信封上的编号查到了收下这封信函的登记，那上面竟然有孔爱芳当时自报的姓名和地址。罗清山真是喜从天降，抄下后就去访问。不过还好小伙子多生了一分心眼，他没有直接上孔爱芳的住处，而是先去了管段派出所，向分管的户籍警了解是否有孔爱芳这样一个住户。户籍警查了一下，说有孔爱芳这么一个住户，不过报的是临时户口，她的固定户口是在闸北区那里的，她那临时户口本上还挂着一个人，是个男子，名叫甘祖强。

罗清山这下乐了，别说天上掉下馅饼只是童话故事中的情节，看来现实生活中也有啊，我眼下不是碰到了吗？还好没有冒冒失失找上门去，否则如果正好撞在那个甘祖强手里那不是坏了事吗？如此看来，这封信的内容十有八九倒是属实的，因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是住在一个门口里的，那事儿通常就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了。出于慎重，还是先请示领导再说吧，看这活儿怎样往下顺。

刑侦处领导听了罗清山的汇报，说小罗你这样做很好，是得先研究一下看怎么往下查，这事儿估计是确凿的呢，那就得立案了。活儿还是你干，给你增派一个助手，让小袁和你一起查吧。

小袁名叫袁蒙一，比罗清山小两岁，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其父是中共地下党的情报人员，抗战胜利前一年在苏州被捕，拒绝吐露机密出卖同志，英勇不屈，光荣牺牲。上海解放时，袁蒙一正由其经商的伯父供养着读高中，其父当年的上级随军进沪后在市公安局当部门领导，前往他家慰问，袁蒙一坚决要求辍学参加工作，于是就进了公安局当了一名刑警。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7）

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通过派出所安排悄然跟举报人孔爱芳接触。当天下午，派出所户籍警请居委会干部打探得甘祖强不在时，就把孔爱芳请到了居委会干部的家里接受刑警的调查。

孔爱芳对于刑警找上门来感到吃惊，甚至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平静下来，承认是她写的举报信，然后又把情况陈述了一遍。可能出于谨慎，也可能根本是一种无意识，她只字未提许骧璋。这样，当时的陈述笔录里就没有许骧璋的记录，警方根本不知道还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其实值得怀疑一下的人物。

事先，领导已经把策略向罗清山两人作过交代了：如果举报情况属实，那就要求孔爱芳严格保密，稳住甘祖强，对走私药品情况予以密切监视，让他们把药品偷运进来，到时候来一个人赃俱获。

当下，袁蒙一就把要求对孔爱芳说了，希望她能配合政府做好这件事，孔爱芳说没有问题，但她也有一个要求希望政府满足。孔爱芳的要求是：她的房契已经被甘祖强作为信用担保抵押在人家手里了，希望到时候政府能够发还。袁蒙一说这事没有问题，肯定会还给你的。孔爱芳于是很高兴地点头，表示绝对没有问题，一定配合警察同志把这件事做好。

其实，孔爱芳的举动没有逃出许骧璋的视线，说老实话，他最担心的就是孔爱芳不举报，再有就是举报后不被警方重视，现在事情发展的轨迹是沿着“保密局”特工专家事先制定的方向走的，所以他就放心了。为防止发生意外，许骧璋就不再去孔爱芳那里，还关照仇学武也用不露面的隐秘的方式跟甘祖强联系。

为防止夜长梦多，许骧璋要求仇学武立刻执行“走私”行动。货是现成的，那是3000盒盘尼西林针剂粉末，每盒12瓶，可供救治二三千名伤病员之用。这批货，在许骧璋离开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就运

到了当时还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的大陈岛，然后通过“保密局”的秘密地下运输渠道伪装成海货运至上海附近的海域，乘夜晚黑幕的掩护避开解放军海军巡逻艇的巡查，就在海上和前来接货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办理了交接手续，由潜伏特务运至浦东高桥镇一位不是特务身份的百姓朋友家里存放着。保管这批特殊货物的潜伏特务得到的指令是，根据指定的暗号发放这批货物。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8）

罗清山、袁蒙一对孔爱芳调查后的第三天，许骧璋决定开始行动，他先让仇学武给甘祖强写了一封信，说货物已经运到，目前藏于浦东高桥镇某处，这两天准备提货。写这封信的用意其实是要使警方知道这批货密藏于何处，好让警方采取行动。因为警方肯定已经通过邮局控制了甘祖强的通信，写给他的信函他本人还没阅读到时，警方已经拍照取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刑警看了这封信函的内容后，当即前往高桥镇秘密查摸，在川沙警方的协助下对存放货物之处布置了秘密监控。

许骧璋下达指令后，就通知仇学武赶紧躲避，连甘祖强也得躲起来，免得他被捕后乱咬乱攀使警方产生了怀疑而影响卫生管理部门对这批盘尼西林也产生怀疑，从而坏了毛人凤的大计。

又过了一天，仇学武按照许骧璋的安排，去十六铺码头临时雇了一辆卡车，写了一纸条子，用暗号通知高桥方面发货。这时，罗清山和袁蒙一两人在高桥镇已经守候一天一夜了，此刻见有人前来提货，自然发作，在川沙县公安局的几位便衣民警的协助下将来人连车带货给查扣了。

保管货物的那人也给逮进了局子，他当然就咬出了那位利用他的不知是潜伏特务身份的朋友，警方马上行动，那个名叫丁根宝的特务已经接到仇学武的通知躲避出去了，但因为想着家里还有点事情没有交代，晚上返回来处理，结果就落网了。不过，丁根宝的被捕跟许骧璋执行的案子没有更多的关系了，所以，警方对于敌特的阴谋还不可能知情，只是将其作为走私刑事犯罪涉嫌人来看待。由于案值巨大，所以将其押解到了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关押着。

而罗清山、袁蒙一回过头来想捉拿甘祖强时，孔爱芳说甘祖强已经3天没有回来过了，也没有留下过什么话，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这样，这个案子就办得有点像夹生饭了。不过，案子是破获了，两个年轻的刑警还是受到了表扬。因为活儿还没有干完，所以一边准备写结案报告，一边对甘祖强和仇学武作了布控安排，保证在布控点只要露面就能抓获。然后，就跟市卫生局联系鉴定查获的走私药品的鉴定。卫生局药检部门对于药品的鉴定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结案报告中要写清楚，查获的是什么药品，真货还是假货，抑或是有毒假药，等等，都要有一个权威说法，以便对走私案犯的定罪量刑。

前面说过，这批“盘尼西林”针剂中混入的毒药是中国大陆当时所使用的检测手段无法检测出其中的有毒成分的。这样，这批药品在经过抽检后就被认为是正宗的盘尼西林。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三（9）

消息上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那边的专家正为筹措有效安全的消炎药品支援抗美援朝而大伤脑筋，听说警方查获了3000盒盘尼西林，就有人把脑筋动到了这上面。一个专家写了一份建议书，送到了主持工作的卫生部长崔义田那里。

崔义田是科班出身，他早年就读于辽宁医学院，1938年参加新四军，先后担任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苏北指挥部军医处处长、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并兼任山东军区卫生部部长、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卫生部部长、第三野战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官至国家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崔义田对于那3000盒求之不得的盘尼西林自然也有心动之意，如果运往朝鲜前线，那是可以拯救数以千计的志愿军伤员的生命的。这样，他在收到专家的建议函件后，就召集相关人员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经过讨论后，决定从这批查获的盘尼西林中随机抽取样品，送往北京国家卫生部去作了检测后看结果再作决定。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的决定跟警方已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警方这时要做的是结案了。

但这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1）

许骧璋在警方查扣藏于浦东高桥镇上的那3000盒盘尼西林之后，暗暗长吁了一口气，寻思这桩活儿总算干完了。至此，他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药品已经到了共产党手里，是否会运送朝鲜前线去给志愿军野战医院使用，那就不是他能起什么作用的了，于是，他就想按照事先上峰所交代的，返回台北去向“保密局”交差。是否立得上功劳那要看造化，但此行总算没有出事，得以平安返回台湾，那可算是喜事一桩了。

但是，就在许骧璋准备动身的时候，“保密局”本部通过地下电台向他下达了一条指令，让他“暂缓回返，留沪代行视察潜伏组织情况，物色优秀分子上报局部作备选全能特工之用”。许骧璋这下就差点要破口大骂，这不是他妈的要老子涉险吗？潜伏的主儿中哪个作兴已经变节了的话，正等着台湾来人登门好作为向共产党邀功求赏的资本，他姓许的岂不正是自投罗网吗？不过也没有回绝的理由，只好先留下了再作计议了。

许骧璋的留下，仇学武是不知道的。仇学武与许骧璋的助手关系，从完成“901计划”开始已经结束了，根据特务工作的纪律，他和许骧璋就不能再见面或者联系了。仇学武这时想到了一个问题：许骧璋完事后回台湾了，我还在大陆待着，“走私盘尼西林”这桩活儿虽已干完，但共产党公安局的活儿还没有完哩，他们还在侦缉甘祖强，再通过甘祖强找到我，在人家的地盘上生活着，就只好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着了。要想摆脱这个风险，看来只有切断线索。眼下跟甘祖强和孔爱芳的脱离还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切断，要真正切断，看来只有杀人灭口了。杀谁？最好是把甘祖强和孔爱芳一起解决掉，但甘祖强目前在哪里他不清楚，孔爱芳倒是清楚的，还在浙江中路那里住着，那就先解决这个女人吧。至于甘祖强，有了他的下落再下手。

仇学武手下其时已经发展了十余名小特务了，派谁下手？想来想去还是那个小护士柳传丽似乎最为合适了。于是，仇学武就指派另一个特务名叫裘富贵的去浙江中路那里打听孔爱芳的下落。打听的结果是孔爱芳上一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连夜叫来救护车送到第一人民医院去了。仇学武寻思在医院那就更容易下手了，柳传丽又是做护士的，熟悉医院情况，让她下手再好不过。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2）

可是，柳传丽却不肯执行这个使命，因为她之前奉命勾引了甘祖强，仇学武对她说过会发生登上报纸的破坏事件，但她一直等到现在也没见报上刊登什么事件，所以，她那大小姐脾气就发作了，无论仇学武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她一口咬定不干了，除非仇学武马上做一桩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件出来，让她看着共产党受损害出出气，那倒还可以考虑考虑。柳传丽把话说到这一步，仇学武也就拿她没有办法。毕竟这个使命并非台湾的指令，而是他为了保全自己而自作主张决定的，他不可能因此而对柳传丽采取纪律制裁。况且，一制裁柳传丽，那他就多了一分暴露的可能性。

这样，仇学武就只好另外选择执行对象，寻思一事不烦二主，干脆就叫裘富贵去执行算了。

裘富贵，33岁，苏北人，出身地主，当过还乡团小头目，亲手杀过七八名民兵和解放军家属，用“血债累累”来评判算不上冤枉他。淮海战役结束前，他见国军败局已定，便逃来上海，改名换姓开了一家水果店铺。正好他跟仇学武的老婆是大同乡，买卖时间稍长就跟仇学武夫妇认识了。仇学武在跟其接触中也就渐渐觉察到裘富贵对共产党似有刻骨仇恨，寻思多半不是一个善主儿，悄悄让老婆以探亲为名回乡打听得到，公安局门口的墙上贴着裘富贵的照片正张榜通缉着呢。仇学武马上就把裘富贵拉到了手下，成为一个死心塌地的骨干分子。

裘富贵没有柳传丽那样的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仇学武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求有一天老蒋反攻大陆成功，或者念他忠心耿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他去台湾过安稳日子。当下，听了仇学武一番话语，就马上点头说愿意去第一人民医院谋杀孔爱芳。

但是，裘富贵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杀手，尽管他亲手制造了七八条人命债。仇学武给了他一件白大褂，让他冒充医生晚上潜进病房，往正熟睡着的孔爱芳的心窝插上一把尖刀，当场了结就是。但裘富贵寻

思万一孔爱芳挨了刀还不死，当场叫嚷，或者他刚挨到病床前她就叫起来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自作主张修改了行动方案。他向街头兜售老鼠药的小贩买了老鼠药，煮了一锅鸡汤掺了进去。然后，把鸡汤拿到了医院，却又不敢直接送进病房。于是就“假装”在楼下碰到了一个病人家属，说他有急事不上去了，烦请人家帮个忙把鸡汤送到几病区几病床那里。解放初期，社会人际关系很是融洽，助人为乐比本分事还本分，那个家属很是热心，马上乐呵呵地办了。

可是，令裘富贵出乎意外的是，他事先打听准了的孔爱芳的病床已经发生了变化，医院已经给孔爱芳换了一个病床。这样，这锅掺老鼠药的鸡汤就送到了原先她那个床位的病人面前。这是一个50来岁的老先生，也是患了阑尾炎来动手术的。上一天有个邻居来看他，说过要熬汤给他加强营养的，所以就以为这是邻居送来的营养汤。当下也不生疑，正好赶上开饭的当儿，就趁热喝了些肉汤，还吃了点鸡肉。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3）

不到两小时，老鼠药就发作了。好在是在医院里，医生马上抢救，老先生喝得也不算多，所以倒是没有丧生。医院方面当然马上报警，上海市公安局北四川路公安分局派员前来调查，因为涉及人命，所以很是重视，不过，侦查员是盯着老先生的社会关系查找线索的，所以不可能查出什么来。而孔爱芳对此根本就没有想过那是怎么一回事，只将其当做一件病房新闻告诉前来探望她的亲朋好友。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三天，两个穿便衣的小伙子走进了病房。那是市公安局刑警罗清山和袁蒙一，他们是来向孔爱芳打听是否有甘祖强的消息的。孔爱芳跟两个刑警打过好几次交道了，觉得很熟了，所以就也把那桩病房新闻告诉罗清山、袁蒙一了。

罗清山、袁蒙一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按照警察内部的规矩，凡是已经有其他同事在调查的案子，别人是不宜议论和去猜测什么的。但是，两人回到市局后作访查记录时，不约而同想到了这一节，就议论起来。因为之前两人曾去过一次医院，那是听户籍警说孔爱芳住院的消息后，他们是去慰问这个协助破案有功的举报人的，当时孔爱芳还躺在另一张病床上，而另一张病床正好是这次中毒的老先生现在躺的病床。于是，他们就考虑到投毒事件是否是针对孔爱芳的?

罗清山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这一想法，认为有必要去北四川路分局走一趟，了解一下他们对投毒案件的侦查情况。刑侦处领导赞同罗清山的想法，出具了介绍信让马上去调查。

向北四川路分局调查的结果使罗清山、袁蒙一对投毒案件产生了更深的怀疑，他们决定跟孔爱芳再次接触，看是否能够了解到与那起走私案件更多相关的情况。

这时，孔爱芳正好出院了。她的一位亲戚把她接到家里去休养，于是，刑警就去了孔爱芳的亲戚家对孔爱芳进行调查。

这回，两位刑警是打定主意要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所以跟孔爱芳聊家常似的非常随意地不温不火地聊着。这就像记者采访当事人准备写一个长篇通讯一样，事先也是立好了提纲的，顺着隐藏在心里的提纲一五一十地提出问题，听对方细细陈述。这样，终于提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提及过的、事实上刑警也从未想到过的问题：甘祖强和仇学武是如何认识的?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4）

孔爱芳对于警方怀疑“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她的这点是认同的，于是就颇有些惊慌，她同时也就意识到当初的举报似乎不似自己所想象的那么轻松，看来不仅仅是一个让甘祖强吃点苦头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了其他人，人家心痛那些巨额资金，所以对她恨之入骨，想来要她性命了。这样，孔爱芳就想努力把事情原原本本都对警方说清楚，好让刑警尽快查明情况，抓获所有涉案人员，这样她就能太平了。于是，她在陈述甘祖强与仇学武的相识时就说到了许骧璋其人。刑警对于突然新冒出的这个男子很感兴趣，反复询问了许骧璋历史上和此次忽然露面的种种细节。

刑警返回市局向刑侦处领导汇报了调查情况后，领导想了一下，拿出了一本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内部印刷的小册子，上面有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上海解放这段时间里目前警方能够收集到的所有曾在上海滩活动过的国民党军统、中统、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国防部保密局、上海市警察局等各部门大大小小的特务分子的名单，让袁蒙一、罗清山翻翻看上面是否有许骧璋这样一个名字。

翻查的结果，上面果然有许骧璋其人，还有他的简历，最后注明是：“目前下落不明，有特务被捕后供称已逃台”。

刑侦处方面没有想到查查刑事案子竟然查出了一个有点资历的军统特务来，不禁愕然，于是当即同政治保卫处联系。政保处已经接到国家公安部转来的情报，说据内线密报，有一名许骧璋者于1951年10月离开台北前往浙江省被蒋方占领的岛屿，疑拟潜赴大陆从事破坏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在接到这份情报后已经布置了密查，但一直没有查到许骧璋的消息。此刻竟然被刑侦处查了出来，自是兴奋不已。

刑警罗清山、袁蒙一被请至政保处介绍“盘尼西林走私案”侦查情况，几位经验丰富的老侦查员听着听着就觉得似乎不对头。罗、袁两人介绍完毕退出后，政保处方面随即分析情况。他们这些人善于从政

治破坏角度来考虑案情，因为这事涉及军统资深特务许骧璋，所以就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怀疑，因为孔爱芳说得很明白：她是因为吃醋而决定举报甘祖强要让他吃官司的。而使孔爱芳吃醋的关键一节——前往公平路旅馆捉奸一举，是由许骧璋提供的消息，这就有理由认为此事可能是由许骧璋策划的。不过许骧璋一手介绍仇学武跟甘祖强搞什么“盘尼西林走私”，一手又使孔爱芳去捉奸，最后导致孔爱芳愤而举报走私案，这情节就很是值得怀疑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四（5）

案情直接汇报到了扬帆局长那里，扬帆听说查获的盘尼西林抽检样品送往北京复检，如果未发现问题那就有可能支援抗美援朝战场医院去了，便马上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询问送京检测情况。那边回答说北京的检测结果刚到，说送检盘尼西林没有发现问题，明天崔义田部长准备在例行部务会上提出讨论将该批药品支援朝鲜前线问题。扬帆暗吁一口气，当下便直接挂通了崔义田的电话，说了情况。崔义田听得暗自心惊，说那我们这边马上封存这批药品。扬帆说不管我们是否侦破该案，对这批药品的检测还是要求有一个确凿的定论的，崔部长你看有什么更权威的检测方法吗？崔义田说要么就请苏联方面协助检测呀，我们马上给国家卫生部打报告送检吧。

上海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当即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侦查，当晚即成立了专案侦查组。鉴于刑侦处方面的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对案件进行了先期侦查，熟悉案情，故将两人临时调来参加专案工作。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刑警先前怀疑医院发生的“毒鸡汤事件”可能是针对孔爱芳的杀人灭口行动是有道理的，按照这个思路往下顺，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方案：让孔爱芳返回其浙江中路的住处居住，敌特方面见她返回了，可能还会继续采取谋杀行动，警方来一个昼夜守候，严密保护，届时对敌特分子现场捉拿，再顺藤摸瓜追查包括许骧璋在内的其他敌特。

这个方案马上得到了实施，孔爱芳乐意配合警方，很平静地返回了浙江中路住处。警方安排了若干名便衣警察分班轮流秘密蹲守。

可是，蹲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敌特分子竟然没有任何行动。专案组深觉纳闷，难道这事儿哪个环节没有考虑周到，在某处弄拙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1）

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再三研究如何进行下一步侦查工作，最后决定浙江中路孔爱芳住所这边继续秘密蹲守，那是针对甘祖强的。而另外也需要伸出一个侦查触角，那是针对把甘祖强拉下水的仇学武的。

专案人员分析，从孔爱芳的陈述来看，那个仇学武是许骧璋介绍给甘祖强认识的，而甘祖强和那个她不知名姓的小女人（即小护士柳传丽）在公平路那家旅馆通奸的消息据许骧璋对孔爱芳说也是那个仇学武提供的。这样看来，仇学武在这个案子中承担着重要环节作用。因此，这个家伙一定是受许骧璋指挥的一个得力干将。现在有必要寻找此人的线索，如果能将其拿下，其意义远比甘祖强落网来得大。

那么怎样了解仇学武的线索呢？专案人员想到了在“走私案”中落网的浦东高桥镇的那个名叫丁根宝的案犯，寻思这厮或许正是受了仇学武甚至许骧璋的直接指使参与该案的，那就去提审他试试，看能否获得意外收获。

专案组特地约了市局预审处的一位精于讯问的高手前往第二看守所提审丁根宝。丁根宝在被捕后已经由罗清山、袁蒙一讯问过两次，几天后被批捕前又由预审承办员提审了一次，这时已经逮捕了。他三供不离一辞：他只是接受了“朋友”仇学武之托，把对方的一票货物介绍给高桥镇上的一位好友处去存放，他没有收受任何好处，也不知道那是一票什么货物。至于仇学武是什么角色，他只知道是做生意的，他跟仇学武是在两三年前一次去苏州的火车上相识的，以后有时有来往，但没有做过任何不法之事。总之，丁宝根反复需要向承办员表明的是一个意思：他绝对是一个守法良民！

现在，这个“守法良民”重新出现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提审室里，又一次接受讯问。这回，承办员不问他其他情况了，单是盯着仇学武的情况反复追问。应该说，这种讯问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的

内容。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前三次讯问丁宝根的是年轻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和预审处的两位普通警员，这次讯问的却是有着“政保行家”之称的专案组长以及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很有名气的一名预审高手，两人没有施出那套凶声恶气、拍桌摔凳的敲山震虎架势，只是跟丁宝根和颜悦色地交谈。但说也奇怪，谈着谈着，不知怎么就触动了丁宝根的神经，竟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潜伏特务身份，还交代了仇学武是发展他的上家，又是他的上司。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2）

丁宝根交代的内容其实是预料之中的，并不特别地引起审讯者的兴趣，他们的兴趣是在仇学武的下落或者活动情况。但是，丁宝根对此都是一无所知，尽管他想迷途知返，立功赎罪，可是真的是力不从心。因为仇学武在将其发展为特务后，除了这次要让他藏匿货物之外的一次接触后，从未跟他有过联系。

专案组在丁宝根身上的主意落空了，于是只好另想办法。又是一次数小时的案情分析会议的研究，最后还是将获取线索的希望寄托于寻找甘祖强上。这回扩大了搜寻范围，不但继续在孔爱芳家附近蹲守，还决定抽调警力分别对甘祖强父母的住宅、他的亲戚朋友等进行广泛的寻找。

专案组一共抽调了30余名警员进行搜寻工作，连续忙碌了一周，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线索。

这时，北京传来了国家卫生部的消息：将上海方面送检的查获所得之盘尼西林注射针剂粉末请苏联权威医学机构进行检测，发现其中含有一种不明成分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如果进入人体后，将会导致死亡；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消除该有毒化学物质的药品。

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于是马上作出决定，将警方查获的那批盘尼西林针剂药品全部销毁。

至此，尽管警方还不知道台湾“保密局”的“901计划”，但对于敌特分子制造该案的用意已经非常明了，警方于是将此案划定为必须侦查的重要政治性案件。扬帆局长下令给专案组增派人手，尽快侦破案件，捕获敌特分子。

阵容扩大了的专案组举行了案情分析会，出于慎重，会议将案情重新分析梳理了一遍，寻找是否有线索遗漏点，或者侦查方向选择上出现过偏差，最后肯定了之前包括罗清山和袁蒙一两名年轻刑警所做过的全部工作。这样，问题似乎就应当朝甘祖强究竟是否还在上海或

者是否还活着这方面去考虑了。专案人员根据已经掌握的甘祖强的社会关系、社会综合交际能力、生活习惯喜好和性格等分析下来，认为甘祖强如果是为了避风头，那就不会离开上海前往外地，因为他在外地没有任何可以落脚的社会关系；那就还剩一个可能，他也许已经被仇学武为灭口而杀害了。

因此，侦查工作还得从寻找仇学武的下落去调查。之前，专案组早已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所有分局、派出所对“仇学武”其人发出了协查通知，反馈情况都是“本辖区查无此人”。这样，看来仇学武是使用了化名或者别名在上海进行的户籍登记，也有可能“仇学武”这个姓名是其特务身份的化名。看来从正规户籍登记渠道是无法查到此人的，那就只有考虑从其他方面获取线索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3）

讨论进行到这里，一位复姓完颜新充实到专案组的侦查员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从孔爱芳那次去公平路旅馆捉奸这方面去找找线索？毕竟那件事中是新楔入了一个人的，尽管刑警已经去过旅馆，没有查摸到那个跟甘祖强通奸的女人的姓名、住址之类的任何线索，但还没有跟捉奸人孔爱芳通过气，现在是否可以跟孔爱芳通气，看是否能够获得意外线索？

这个建议获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专案组领导指派刑警罗清山、袁蒙一和提建议的完颜同志负责向孔爱芳进行新的调查。

罗清山3人跟孔爱芳聊下来，获得了一个之前没有掌握的细节：孔爱芳听许骧璋说到那个跟甘祖强通奸的小女人时，曾提及过对方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好像是个护士小姐。

行了！医务工作？那个小女人据孔爱芳说只不过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这种年龄从事医务工作只能是护士，抑或是哪家小医院的药剂员，就往这方面去查，十有八九能够查出点名堂来的。

专案组于是马上作了分工，分头前往各区查找具有孔爱芳所说年龄、容貌、体形特征的护士或者药剂员。当时，上海各区根据1950年7月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区人民政府试行组织规程(草案)》，规定区人民政府按主管业务，分设秘书室及民政、工商、文教、卫生各科，区政府卫生科已经完成了对本区内的各公私医院、诊所、药房从业人员的登记，能够拿出完整的附有近照的简历。侦查员就在各区卫生科仔细翻阅这些资料，当天就在嵩山区、北站区、徐汇区、静安区查到了5名符合查寻对象特征的女性。

这5份档案材料被侦查员借走，拿到市局集中后，罗清山、袁蒙一和完颜又拿着悄然前往孔爱芳住处所在的派出所，请户籍警把孔爱芳请来辨认，结果孔爱芳一下子就认出了嵩山区“博爱私立医院”的外科护士柳传丽就是那个她不知姓名的情敌。

出于慎重，侦查员又请公平路旅馆的服务员对这5张照片予以辨认，3个服务员在单独辨认的条件下不约而同地确认了柳传丽。

专案组长终于吁了一口气：找到柳传丽了，离找到仇学武也不远了吧?

十几名侦查员化装后轮流在柳传丽家周围和博爱私立医院内外进行秘密监控，密切注意着柳传丽的动态，还通过电信部门实施电话监听。最初两天，没有什么发现，柳传丽上班下班医院家里两点一线踩得很准，回家后也没有往外面跑，也没有跟外界通什么电话。到了第三天，专案组的运气来了——甘祖强竟然前往博爱私立医院找柳传丽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4）

那是下午3时许，一位化装成病人在医院里面等候就诊的侦查员发现从外面来了一个脸孔似熟的男子，凝神一想：喝！这不是在照片上见识过多次的正在追捕的那个甘祖强吗？他不露声色，冷静地注视着甘祖强，只见那主儿进了外科护士室，跟柳传丽说话。说些什么当然无法知晓，甚至因为生怕打草惊蛇连两人的神情也是通过玻璃窗户的反射才勉强看见的。

几分钟后，甘祖强离开了。那个侦查员马上跟踪，一直到了医院外面远远地给另一个侦查员打了交接暗号，将甘祖强交给了对方。另一侦查员继续跟踪，但遗憾的是最后竟然跟丢了。当时，甘祖强去了附近一家咖啡馆。侦查员见他上了2楼，寻思只要守住门口，你就走不了。于是就在咖啡馆紧邻的一家烟纸店打电话想报告情况，要求增派人手——他担心自己一个人跟得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对方的警觉。电话打后十几分钟，专案组长派来的两名增援侦查员就赶到了。可是，当其中一位上楼去查看时，上面已经没有甘祖强了。

原来，这家咖啡馆有一道后门，是跟一家百货公司直通的。甘祖强上楼后可能忽然改变主意不想喝咖啡了，于是就下楼去了百货公司。而他在百货公司也没待久，转了转就离开了，所以当侦查员发现咖啡馆有门通百货公司马上赶过去查看时，已经不见甘祖强的人影了。

那个脱梢的侦查员自然挨了领导批评，但此事毕竟是给了众人一个鼓舞，因为甘祖强诚如之前分析的，没有离开上海，而且还在跟柳传丽来往，那就有希望查摸仇学武和许骧璋的下落了。

接下来，好事果然出现了——当天晚上，柳传丽竟然跟久未露面的仇学武见面了！

柳传丽当天下班后跟前两天一样，乘坐电车回家。在她家周围执行监视任务的那3个侦查员以为她跟前两天一样，不会出门了。哪知，

9时05分，柳传丽忽然出门了。侦查员马上或自行车或步行的分开跟了上去。这天是阴历初五，后来知道，阴历逢五是柳传丽和仇学武约定的见面日，时间和地点在上次见面时会约定的。这天柳传丽就是去跟仇学武见面的，她尽管拒绝执行谋杀孔爱芳的使命，但仇学武还是觉得这是一块好料，所以没有另眼看待，还是将其作为最忠诚可靠的部下来对待的。确实，在某些方面，比如色相，柳传丽是能够起到目前仇学武这边所有特务中谁也无法替代的作用的。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五（5）

这天，仇学武和柳传丽的见面地点是在外白渡桥畔黄浦路上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仅咫尺之距的原“利查饭店”（这时已经改为“浦江饭店”）底楼的咖啡厅。受过正规特工训练的仇学武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进行了化装，因此，出现在侦查员眼里的是一个年过六旬须发皆白了的老头，还戴了一副眼镜，佝着腰背，拄着拐杖。这样，侦查员就没有认出这就是在照片上见到过的仇学武。

不过，不管是谁，只要跟柳传丽见过面的，那就得跟踪。这回，侦查员跟踪成功了，一小时后，当两个目标分手时，有人盯上了仇学武，一直盯到其下榻的地方——北四川路上的一家旅社。

可是，当天深夜警方对该旅社进行突击检查时，仇学武已经不翼而飞了！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1）

事后得知，仇学武这是施出了其在特工训练班学到的反侦查手段。他在执行完“901计划”后，知道警方肯定在对其实施侦缉，于是就玩了消失，躲到了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的一个位于长宁区的只有他知道的隐秘住处，那是他以化名租居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平时，他基本上不出门，埋头看书，房东还以为这个房客是一个搞学问的知识分子哩。在需要跟柳传丽等定期会面的下属见面时，仇学武就提前出门，在见面处附近找家旅馆，用假证件住进去，当场付清房费。到了约定的时间，从旅馆出去，见面后再返回旅馆。不管是否有人跟踪，都必须在几分钟内立刻离开旅馆。反正他已经预付了房费，所以不必办理结账什么的。

这天，那个跟踪的侦查员跟踪到旅馆后，仇学武倒是没有发现已经被人盯上，但是他还得立马离开。当然，他离开前还得化下装，就是这一伎俩，使守候在旅馆对面的侦查员竟然观察失误，使目标得以顺利脱梢。

深夜突击检查失利后。专案组当即举行新的案情分析会。当时还不能确认仇学武的突然离开旅馆是否是发现了被跟踪，所以需要着重进行分析。最后，大多数人认为从仇学武事先向旅馆付清了房费并对服务台说过“随时可能有事离店，不办理退房手续了”这一点来判断，多半这是他玩弄的一个反侦查手段。既然如此认为，那就继续对柳传丽进行监视，这个女人身上系着甘祖强和仇学武两条线，盯着她没错的。

于是，专案组继续布置对柳传丽进行监视，接受前面脱梢的教训，这回安排了足够的警力，还配备了挂民用牌照的摩托车。

而这时柳传丽对此还蒙在鼓里，她还在等着甘祖强的再次出现。甘祖强找柳传丽，倒并不是为了续之前产生过的一夜情，而是另有企图。这个浪荡子式的主儿，听了仇学武的话游荡在外避风头，对于这

种日子他倒还算过得惯，因为打从十五六岁开始，他就不大在家食宿了，家里人对于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习以为常了，如果有段时间甘祖强不大外出而老是待在家里的话，他们反倒会感到不习惯了。甘祖强在外面有不少以前勾搭的女人，凭着他那张脸蛋，此刻主动登门重温旧情，她们还真是喜出望外。这些天，他就是在那些女人家里混日子的。

那么，甘祖强为何又想到了柳传丽呢？那是为了孔爱芳的那套小洋房。甘祖强把孔爱芳的小洋房房契偷出去交给仇学武作抵押后，不久仇学武就还给他了。他却没有放回孔爱芳的原处。现在他游荡在外，手头很紧，就想起了这份房契，盘算要把那套洋房卖了。甘祖强把房契给房屋买卖经纪人看过，谎称是其表妹的，咨询如何由他代理转让。经纪人看了房契后说，根据最近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私房买卖的相关规定，为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精神，房契注明系妇女产权的，办理转让手续时必须由其本人到场签字。你手头的这份房契上面注明着产权人为“女性”，所以必须把她本人请到现场亲自签名的。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2）

甘祖强仔细察看了房契，发现上面确实写着“孔爱芳，女性”的表明身份的字样，那说明由他代理是不可能的事了，只有把主意打在“符合政府规定”的上面。于是就动起了作假的脑筋：房契上只写了姓名、性别，没有写明年龄，也没有照片，那我只要办一个假户口本，请一个女人出面去卖房，不就行了嘛！

请谁出面？甘祖强想了几个跟他比较投机的女人，觉得都不妥，不是富婆不稀罕金钱的，就是一直拮据而过于贪婪的，而且是否能够把戏演得天衣无缝还难说。想来想去，脑子里就转到了柳传丽，这个小女人倒是颇有些胆识的，那天去公平路旅馆开房间，明明是轧姘头，放在别的女人身上只怕胆战心惊了，只有她不但若无其事，还敢跟人家服务员吵架。而且，甘祖强觉得跟柳传丽交往下来，这个小女人并不贪婪，经济上是不穷不富。行了，就她吧！

这样，甘祖强就去柳传丽供职的医院找她了。那天柳传丽正在忙，他把这事儿稍稍说了两句，自然不可能说是孔爱芳的，只是佯称是其表妹的，但人家已经去了香港，现在来信要求把房子卖了，他去找过经纪人了，经纪人说必须产权人本人到场，当然，实在到不了场的也可以叫个人来替代一下，不就亮亮相签个名嘛，简单得很的。他给表妹去函告知此事，表妹回信说她同意这样做，愿意花相当于房价1%的价格请人代替到场做这笔买卖。他于是想到了柳传丽，觉得她是肯也有能力帮这个忙的，现在特地过来问她是否愿意。

柳传丽没有接到过仇学武让她不要跟甘祖强接触的通知，大概仇学武也不会想到甘祖强在拥有一个逃犯身份的时候竟然还动着骗卖别人房产的脑筋，所以疏忽了。这样，柳传丽就很爽快地点了头。

要命的是，初五那天晚上柳传丽去跟仇学武例行见面时，竟然没有提及甘祖强曾经去医院找过她这一节，这样，灭顶之灾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了。

柳传丽其实还是喜欢金钱的，只不过之前跟甘祖强厮混时，为了让甘祖强迅速上钩，所以都是她掏钱的时候多，而她掏的则是仇学武给的活动经费。活动没了，经费也没了，现在她靠的是当护士的那点薪水，对于一个爱打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点钱当然是捉襟见肘的。所以，柳传丽很想挣甘祖强所说的那笔出场费，这几天一直在等着甘祖强来约她。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3）

甘祖强这几天没有出现，是因为他正在地下市场偷偷找人伪造户口本和刻孔爱芳的印章。这活儿在解放前可以公开做，如今在人民政府手下就只好隐瞒再隐瞒了，一旦发现那是要吃官司的。因此，甘祖强折腾了四五天时间方才完成此事。可是，当他往医院打电话想跟柳传丽联系时，接听电话的其他护士却说柳传丽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已经两天没有上班了。

柳传丽遭遇什么情况了呢？原来，仇学武发现情况似乎不对头。那天，仇学武去“保密局”规定的最新联系密点察看是否有什么指示。所谓“联系密点”，是人民公园内的一株大树，这株大树伸展出的众多根枝中有一个特别粗大的，距主干大约一尺处的南侧株干如果有一道逆向刀痕，那就说明海外有新的指示了，仇学武得在次日每天上午10时至11时在人民公园后门口手持一张当天的《解放日报》等候有人前来联系，一直等到哪天联系人出现为止。

这天下午4点时许，仇学武去人民公园密点察看时发现了联络暗号，便知道海外有指示了。人处于劣势的状态时，往往容易朝好的方面去考虑，仇学武此刻就是这样的，他寻思可能是那批盘尼西林被共产党查获后已经通过了检测，运往朝鲜前线去救治伤员了。如此，大功就算已经告成，根据许骧璋最初交代执行“901计划”时的许诺，多半是要把他调往台湾“保密局”本部机关去了。

仇学武于是便很高兴，心境大顺。离开人民公园后往回返时，忽然心血来潮，想跟柳传丽见个面，一起吃顿饭，聊聊天，也算是放松放松。于是，仇学武就拦了辆出租车前往博爱私立医院。这天上海有重要外宾来，封锁了部分道路，当出租车赶到医院时，柳传丽正好下班。这当儿，就显出仇学武的特工水平来了，他坐在行驶着的轿车里，远远正好看见柳传丽从医院大门出来，所作出的反应就像是没看见，或者虽然看见一个美女出现但跟其没有任何关系似的，没对司机

下达停车指令什么的。医院斜对面有一所小学，这时候也正好是放学的时候，一群小学生从校门内涌出来，出租车就稍稍停了停。就是这么一个停顿，仇学武发现有两个原本站在医院隔壁小店铺柜台前买香烟什么的路人忽然停止交易，一个步行一个推起一旁的自行车，马上尾随柳传丽而去！

啊！盯梢！！仇学武冷不防暗吃一惊。不过他还想验证一下，他是知道柳传丽下班回家时所乘电车的站点的，于是就让司机绕道前往电车站。正好跟柳传丽迎面而遇，照例不作反应，交会而过后，发现先前那两个“路人”果然在后面跟踪。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4）

仇学武确认柳传丽确实已经受到了共产党公安人员的监视，心里暗吁了一口气，寻思还好自己沉得住气，否则还不是马上暴露了？人家盯着柳传丽显然是为了钓他这条鱼，而发现他之后，恐怕就不钓了，立马下手逮捕就是。呵，好险啊！看来得让柳传丽注意提防，可是怎样通知她呢?

前面是红灯，出租车停下时，一个发广告的少年从车窗缝里塞进来一纸推销旧书的广告，仇学武一看之后，心里便有了主意，他让司机把车开往四川路桥邮电局。在邮局，仇学武买了个信封，写上柳传丽的地址姓名，把广告塞进去，封了口贴上邮票后投进了邮箱。这是一封报警信，根据他将柳传丽发展为特务时的交代，如果需要报警，他会在给她寄送的邮件或者东西的包装上落款“包金金”的伪名。她看到这3个字，那就需要特别引起注意了。

次日柳传丽下班后，收到了这封已经经过警方秘密检查的信件，仇学武的伎俩当然未能逃过侦查员的判断。只是，使专案组领导感到奇怪的是，这封不知寄自何人的报警信是依据什么而发现情势不对而要向柳传丽报警的?

柳传丽收到报警信后，大吃一惊。她毕竟不过是一个22岁的姑娘，又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特工训练，让她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什么主观能动性作出什么妥善的反应当然是不大可能的。她采取的对付方式是：装病不出门，以不变应万变，看对她怎么样?

这样，柳传丽就不再上班。警方则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密切予以监视。甘祖强打往医院找柳传丽的电话内容当时就被警方监听到了，听甘祖强自称是“柳传丽的朋友，上几天去医院找过她的”，就马上知道那是甘祖强了。专案组一分析，料定甘祖强可能会去柳传丽家，于是决定在甘祖强去柳传丽家时，采取行动，将两人一并抓捕。

专案组的估断是准确的，当天晚上，甘祖强叫了一辆三轮车，鬼鬼祟祟地前往柳传丽家。他当然还是为了把孔爱芳那套小洋房骗卖之事，但柳传丽这时已经决定闭门不出实施蠢人避险了，所以没有答应，说过些日子再说。甘祖强说了一会儿没有效果，便开口告辞。柳传丽送他出门，结果被警方悄然逮个正着。

对付这样两个小角色，专案组就不必动用什么预审高手了。柳传丽、甘祖强一进局子就痛哭流涕作了交代，没有任何隐瞒。这样，第一人民医院的那起投毒案件的情况大致上也就清楚了，果然是针对孔爱芳的。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5）

这下，专案组诸君可就忙了，当即马上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连夜作出了一个决定：把柳传丽放回家去，让她还是装病闭门不出，警方布置力量监视着等候仇学武的出现。

仇学武会上柳传丽家来找柳传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个特务没有这么嫩，这种特工行业的低级错误他是不可能犯的。但是，专案组从柳传丽和甘祖强供称的内容发现，仇学武精于化装，据说曾在特工训练班的化装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这样，从特工心理学来说，这种角色往往就容易使用自己的特长，尤其是在非常阶段。因此，专案组认为仇学武很有可能会化装后悄然来到柳传丽家附近前来察看动静，看警方是否解除了对柳传丽的监视。警方就是要在仇学武不管化装成什么角色出现在柳传丽家周围时，采取行动将其拿获。

基于这个考虑，专案组就把柳传丽放回家，指示她闭门不出，但是每天必须不定时地在窗口露露面，也可以到门口坐坐，以向外界展示她的存在——不要让仇学武怀疑她已经被秘密逮捕了。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证明专案组的考虑是准确的，仇学武果然化装出现了。这回，他化装成一个银发飘飘的老太太，雇了一辆黄包车拉着慢慢地从柳传丽家门前经过。专案组已经在柳传丽家周围布置了十几人，附近的路口连汽车、摩托车也已经准备好了，只要目标出现志在必得。因此，这辆黄包车就未能逃过监视者的视线，侦查员放其过了这段马路后，突然将黄包车拦进了旁边一条小弄堂，仇学武就这样落网了。

仇学武虽然接受过反审讯的特工训练，但是他知道这是无用的，这时是保命要紧，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倒是有过研究的，于是一进审讯室就大叫要立功赎罪。问他可以立什么功，他说愿意配合政府把台北派来的高级特务许骧璋抓获。

原来，仇学武这时已经跟许骧璋重新恢复了联系。那天，他在人民公园接到暗号形式的密令让其接头后，次日他就顺利地跟“海外来客”见了面。这个海外来客不是别人，就是许骧璋。许骧璋受命视察上海潜伏特务组织、考察优秀分子后，纵有千般不愿，也是无可奈何，只好乖乖执行。其实，所谓的“视察上海潜伏组织”，不过是通过地下电台给了他几个特务的姓名和联络方式，让他跟这几个潜伏特务分别见面，了解他们潜伏期间的活动情况，包括发展了多少新特务，其中如果有潜在特工素质的，那可以上报总部，让上层考虑作为全能特工培养的候选人才。许骧璋获得的名单中，有仇学武，所以，许骧璋就重新跟仇学武见面了。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根本没有离开过上海，就骗称已经返台述职，此番接受新的使命前来上海。

6.抗美援朝期间的走私案中案 六（6）

仇学武听说许骧璋已经回过台湾了，当然要问一下对于他作为助手执行“901计划”后上峰的评价，打听是否有希望调往台湾。许骧璋是搞情报出身，瞎编一套谎话不成问题，当下说得仇学武看到的只是一片辉煌，伸手就可摘取似的。这样，当许骧璋让他推荐优秀分子时，仇学武就推荐了柳传丽。但他没有透露柳传丽已经被警方监视了，以防许骧璋怪他无能。

许骧璋联络的那几个潜伏特务，一个已经被捕，两个无法联系，估计不是被捕就是已经洗手不干了，另外3个联系上的，只有仇学武算是干出点儿名堂了。这样，他就想跟仇学武推荐的“优秀分子”柳传丽见见面，当面考察一番，返回台湾也好有一个交代。他把意思一说，仇学武就只有硬着头皮跟柳传丽联系了。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他仗着自己精于化装术，寻思先去柳传丽家附近察看一下是否受到了监视，再看如何跟柳传丽联系。不想，这一出动，就落进了警方的罗网。

现在，仇学武要立功，就把跟许骧璋约定的次日晚上在淮海路一家饭馆见面的秘密交代了。专案组当即查看地形，制订方案，全组出动，还增派警力把守外围，这样，许骧璋是插翅难飞，只有落网的份了。

许骧璋落网后，交代了奉命执行“901计划”的情况和上海那几个潜伏特务的联络方式。这样，警方在圆满侦破“901计划”案件之际，还顺带破获了几起潜伏特务案件。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一（1）

7.共和国主席即将出访——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1963年春，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国家主席刘少奇即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后，制订一个旨在谋杀刘少奇的“水沟计划”。我方侦悉敌特阴谋后，指派反特专家前往异国开展反谋刺行动，终于粉碎了敌特的罪恶阴谋……

一

1962年10月，地处印度洋东北侧的世界最大岛国印度尼西亚进入了每年必遇、长达半年的雨季。绵绵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首都雅加达的街头，温暖的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气息，使人难受。这情形，有点像中国江南地区五六月份的黄梅天。

对于阿里·达瓦纳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难忘”的涵义有两层，一是当时就感受到了的：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二是时隔半年后才姗姗而来的结果：他被雅加达市警察局逮捕，随即又被法院判刑一年。

阿里·达瓦纳是一个23岁的青年，4年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达英诺大学。当他从离雅加达700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抵达首都时，胸抱远大理想。他想通过读书获得知识，通过知识成为一名政府官员，最好是当一名外交官。为此，他拼命学习外语，大学毕业时，已经能顺利地使用3国语言，还能结结巴巴但不乏准确表达意思地说一些较为简单的日语和汉话。然而，幸运之神抛弃了他，当他大学毕业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陷入困难阶段，国家大量削减经费，政府机构捉襟见肘，只好解雇部分人员。这样，纵使阿里·达瓦纳能在外交部门口用外语和外国人作流利的对话，也挤不进外交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

离开了大学，阿里·达瓦纳的生计成了问题，只好给外国游客当导游，或者给人打工。可雨季来临，没有外国游客雇他时，他只好靠捡垃圾度日。他喜欢到外交部后门的垃圾箱来捡垃圾，这里常有些外交

知识的旧书和打印的材料，他可以在临睡前读得津津有味，忘记了自己身处的困境。

这天上午，阿里·达瓦纳和往常一样，又来到外交部后门。时间还早，外交部的垃圾还没倒出来，他便坐在旁边等着。一会儿，那个体态肥胖的女杂役推着一车废纸过来了。胖女人认出了他，善意地把废纸倒在阿里·达瓦纳面前的一块干燥的地上，这些废纸可以使他带来的那个装得进一个人的大帆布口袋装满。按当时的市价，这样一口袋废纸所换得的钱，可以开销一顿不错的午餐。一天捡上3口袋废纸，肚子问题可以勉强解决了。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一（2）

外交部倒出来的废纸一般都是过期的文件、资料或者一些文件、文稿的草稿，当然，这都不是属于保密范围的，凡是保密的，都烧成灰烬倒出来。阿里·达瓦纳把帆布口袋装满三分之二时，眼睛无意间往地下一瞥，目光突然被脚边一张纸所吸引。这是一张质地一般的打印纸，天头上印有“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字样，下面用铅笔写着几行草字：

“10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特使与我国政府外交部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将于1963年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事后知道，这几行字出自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之手。昨天下午，中国、印尼政府外交部拟定了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有关事宜，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根据惯例起草一个报告准备呈送苏加诺总统。刚写了这么几行字，电话铃响了，他起身去接听电话，不意窗外一阵风吹来，把纸吹离桌子，正好掉在屋角的字纸篓里。他听完电话，看看纸已吹掉，便另取了一张纸重新写起来。今天早上，杂务工打扫办公室时，将字篓里的纸倒进了垃圾车。

应该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外交部的保密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阿里·达瓦纳已经捡了3个月垃圾，从未在废纸里发现过这种秘密。正因为如此，阿里·达瓦纳那敏捷的思维萌生出这样一个念头：这是一个秘密消息，也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我何不据此写一条消息投给哪家报纸？

阿里·达瓦纳这种年龄，还不曾养成瞻前顾后的习惯，一旦决定，当即实施。当下，他把这张纸一折四放进衣袋，匆匆忙忙捡了一口袋废纸，装上折叠式小车，推往废品收购商那里去卖了。

一路上，阿里·达瓦纳不住地考虑着：这桩新闻卖给谁？他想卖给发行量最大的《印尼日报》，但又担心这家报纸是政府办的，不会刊

登这种内容的外来新闻稿。那么，卖给《雅加达日报》，恐怕也不妥，听说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女婿，这个消息一登，外交部势必有点尴尬，女婿总不会使岳丈的脸面过不去。对！最好是卖给外国人办的报纸，他们没有顾虑，况且又有钱，还可以卖个好价钱。这样，阿里·达瓦纳便走进了附近的《太平洋新报》。

《太平洋新报》对外宣称是香港某财团出资办的。1956年创刊时，那个财团的董事长，一个年逾古稀走路都需人搀扶的老太爷还曾飞赴雅加达出席仪式、发表讲话。但是，当时印度尼西亚上层社会都晓得，这家报馆其实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情报机关。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一（3）

这个内幕，阿里·达瓦纳当然是毫不知晓的。因此，当他走进《太平洋新报》报馆的接待室，把赶写的只有短短百余字的新闻稿递给接待自己的一位编辑时，只指望能够得到相当于10帆布口袋废纸的稿酬。那位身兼“编辑”、“特工”二职的接待者的目光在稿纸上只一扫溜，那双眼睛便如灯泡那样亮了。他望着这个穿着脏兮兮旧西装的年轻小伙说：“这个稿件很好，我们要了。只是，有一个问题需要问一下，你写的这个新闻材料是从何方获得的？”

阿里·达瓦纳说：“是从垃圾箱里获得的。”

对方眼里露出吃惊和怀疑相混杂的神色：“这是怎么回事？”

阿里·达瓦纳便把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遭遇说了一遍，然后拿出了那张纸。“编辑”拿在手里，如获至宝，说：“这样吧，这纸我们也要了，作为这则新闻真实性的依据。当然，我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是你向我们提供的。至于稿酬，一定从优。你等一下，我这就取给你。”

“编辑”走出了接待室。几分钟后，他重新进来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这是300美元，你拿去。”

阿里·达瓦纳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愣怔了一下才接过来。百余字的新闻稿，竟得了300美元稿酬，真是闻所未闻。他把信封放进衣袋，谢过对方，兴冲冲地走了。

此时，那张纸正在“总编辑”——台湾特工部门雅加达情报机关负责人林方达手里，他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喜上眉梢，对秘书下令道：“记录——绝密情报：刘少奇、陈毅将于1963年4月访问印度尼西亚。马上拍发！”

次日，《太平洋新报》并未刊登那则新闻，但阿里·达瓦纳并不知晓，他没买份报纸来看。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二（1）

设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太平洋新报》特务机关隶属于台湾的“海外工作委员会”。雅加达的情报送达后，初时并没有引起该机构的特别注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已经交往了多年，领导人互相访问也有过。“海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潘天年看过情报后，交给秘书，让“暂存”。

重新激起潘天年兴趣的是一星期后他听了国民党中央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的《蒋介石先生和陈诚谈话纪要》。蒋介石说，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陷于一时的军事作战。在“总体战”中，大陆是“主战场”，台湾以及海外是“支战场”。今后国民党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侧重对大陆的“政治作战”。“政治作战”的内容包括渗进大陆和“与中共有关系的海外国家”，发展“策反组织”、“冒险犯难”，有计划有组织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以配合“军事作战”。

潘天年马上想起雅加达发来的那份情报，他想利用刘少奇、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机会，实施暗杀，将中共的国家主席、外交部长置于死地，来一次“冒险犯难”。

行动会议在台北市西郊一幢花园别墅里举行。潘天年以会议主持人身份宣布了议题后，让秘书向各人分发了《太平洋新报》以300美元从阿里·达瓦纳那里买来的情报原件的影印件。

潘天年对与会的特工专家说：“经核查，这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的亲笔手迹；此外，据有关情报表明，中共方面的外交特使在10月中旬确实到达过雅加达，因此，这项情报的真实性不容怀疑。”

一个专家说：“那么我们言归正传，以什么方式解决中共的这两位要人？”

另一个专家接口道：“投毒和枪击的可行性大。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保安力量素质和技术手段都比较弱，刘少奇、陈毅即使带保卫人员，也是有限的，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明处对暗处，防不胜防。”

如何行动正待往更深处设想时，被一个一直没开过口的年轻专家打断了：“中共一向讲究简朴，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多半不会住饭店、宾馆，而住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这会增加行动难处。”

“何以见得？”有人问。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二（2）

“在中共和印尼的交往中，苏加诺曾3次访问中国，这个不说；中共要人曾两次访问印尼，一次是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后顺道正式访问印尼，一次是1961年3月陈毅访问印尼，和印尼签订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这两次访问，周、陈都住在大使馆里。一般说来，这次访问刘、陈也会这样，因此，你们说的一套计划就没有用。因为不管采用投毒还是枪击方式实施行动，都必须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悄然进行，还得具备深入使馆或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于我们自己的特工人员来说，是不可能获得的。那就得在他们的使馆内发展意志不坚定分子作为杀手，这种情况，据我所知，之前我们的各个特工机构包括本委员会在内，对中共驻外使馆和机构最起码进行过不止20次的尝试，花费了大量经费，还搭上了一些人员，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在大约还有半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们还想进行这种尝试的话，那显然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潘天年听了，微微点头，他本人也是一个特工专家，特工方面的著作就写了6部，已出版4部，这个年轻专家提出的异议，他已经想到，可谓不谋而合。他朝对方笑笑，以长辈对小辈的那种亲切口吻问道：“那么，你认为应当怎样下手？”

“我认为可以用爆炸的方式来解决刘、陈。”

潘天年又问：“如何爆炸你考虑过吗？”

“爆炸在雅加达实施，可以采用先进的定时或者无线电遥控炸弹。至于置放地点，凡是刘少奇、陈毅所到之处都可以考虑，比如机场、大使馆、几个通常外国元首来访时都会参观的名胜古迹、工厂、学校。”

有人问：“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印度尼西亚，他的活动一定有苏加诺总统陪同，爆炸物不认人，如果把苏加诺一起炸死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引起一阵七嘴八舌的争论，有的说苏加诺不是台湾的朋友，炸死活该；有的说不能炸苏加诺，恐怕会引起国际纠纷；有的说“中华民国”和印度尼西亚没有外交关系，无所谓外交纠纷……一时间，会场里一片热闹，恰似打翻了网船的小河汊。潘天年听了一会儿，不得要领，遂说：“这样吧，计划归计划，上报送审时另附一份报告，请上峰定夺。”

众专家一致说好。潘天年又问：“这个计划叫什么名称合适？”

窗外花园里传来修水沟工人用铁锹挖土的声音，有人灵机一动说：“就叫‘水沟计划’如何？”

一个多星期后，主管台湾情报工作的蒋经国召见潘天年，向潘宣布：批准实施“水沟计划”；同时传达蒋介石的口谕：“炸死刘少奇、陈毅，不惜搭上苏加诺！”

“水沟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三（1）

1963年3月下旬，地处江南的上海已经进入了桃花盛开的春天。

闸北区天目中路的北火车站，一列来自合肥方向的列车缓缓在站台一侧停靠。从车上下来的旅客中，有一个年过40的男子，姓许名均贵，是一个刚刚服完12年徒刑的刑释人员。

18年前，23岁的许均贵经人介绍加入了军统当一名小特务。不久，军统局首脑戴笠在从北平乘坐专机去上海时，由于上海上空气候恶劣，不能降落，遂飞南京欲降落于明故宫机场，但飞机飞到南京郊外附近的戴山时因高度有误而撞山坠落，机毁人亡。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许均贵走了局长毛人凤的一位亲戚的关系，借完成了一桩任务的由头，从一名没有军衔的小特务直接晋升到了中尉情报员，一年后又晋升为上尉情报小组组长，负责领导一支7人小组刺探解放区的经济情报。

在长达数年的反革命生涯中，许均贵对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罪行。解放后，许均贵自思罪孽深重，难逃法网，便带上铺盖去公安局自首。说也巧，他自首后的次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就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命令。“镇反”有政策，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许均贵的罪行，长两个脑袋也得给人民政府砍了，但他沾了自首的光，从宽判了15年徒刑，从上海押解安徽某劳改农场服刑。在农场里，许均贵又因积极改造而被减刑3年，这天刚获释返沪。

许均贵走出车站广场，刚想穿过马路去乘13路电车，忽然身边走过一个人，他马上一个转身，紧走几步，赶上那人，仔细看了看，叫道：“秦宏才！”

那人年岁和许均贵差不多，瘦高个子，脸上气色很好，穿一套藏青色毛料中山装，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看上去似短途出差的公职人员。他听见有人叫，冷不防吓了个激灵，定定神才望着许均贵说：“你认错人了，我不叫秦宏才。”

许均贵早已认出对方是自己当年在保密局时的部下，少尉情报员，便冷冷一笑，用唇音说：“一个靠吃盯梢饭起家的情报特工，是不会认错人的！”

许均贵没有认错，对方是他的老部下，不过已经改名叫秦永昌，而且今非昔比，不再是少尉情报员，而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工作委员会”华东处的一位科长，他是奉命来大陆华东地区作考察的，已经跑遍华东六省，剩下一个上海市考察过就要经香港返回台湾了，没想到刚出火车站就露了馅。秦宏才在先前一瞥之间，已经认出许均贵，情知不妙，尽管他有伪造的种种证件，但在这位老上司面前是没有用的。怎么办？看来只有先稳住对方，再伺机摆脱了。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三（2）

然而，秦宏才还没开口，许均贵已经扔下旅行包，一把扯住秦宏才的胳膊："走！跟我去派出所！"

"别……别……有话好说！"

两人推推搡搡之间，早已惊动了路人围拢来看热闹。火车站广场的民警见门口堵塞，快步过来看究竟，把许、秦两人请进了派出所。

秦宏才被捕后，表示愿意向老上司学习，走坦白悔过之路，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其中包括不久前听一位在"海外工作委员会"任职的老同事说起过的该机构正在实施一个暗杀即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刘少奇、陈毅的秘密方案。上海公安局立刻整理了专项材料，派机要通信员坐飞机赴北京即呈公安部。

公安部的侦查专家研究了秦宏才的有关口供，分析下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信，理由是台湾方面在军事"反攻大陆"失利后，会改变策略，从事重大破坏活动。一种认为不可信，理由是台湾的"海外工作委员会"和"大陆工作委员会"是有矛盾的两个机构，如同解放前的军统、中统，既不会有机构出面互通情况，其成员也不会冒违纪受罚的风险向他人（即便是同行好友）泄露消息。

但次日的情况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峰回路转式的变化：几天前，《人民日报》社收到了一封寄自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信函，意外发现信里面还有一个密封着的信封，上面写着：烦请贵报即时将本函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人亲启，切切！

这封函件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人：

我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籍华人，今冒昧地向您反映一个情况：不久前，我听到我的一个小辈亲戚说，4月份中国元首刘少奇、外交部长陈毅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台湾的特工部门出于反共需要，已命令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工组织执行"水沟计划"，谋害刘、陈。"水沟计划"的内容

是在刘、陈所到的某处埋设爆炸物，将刘、陈炸死。我的这个亲戚是执行“水沟计划”的特工之一，想来不会无中生有瞎说一通，希望引起贵方重视，予以防范。我不愿意看到祖国的领导人惨遭不幸的悲剧发生。

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三（3）

当天下午，这封函件就出现在分析秦宏才有关口供的会议上。结合秦宏才口供看，这封信函所检举的情况显然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台湾特工部门真的准备暗杀刘少奇、陈毅。

“水沟计划”作为一个专案被列进公安部的绝密档案里。专案内容当天晚上就被送进了中南海，作为急件出现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案头。

周恩来对该件作了批示：进一步对该情报予以缜密核实。由公安部与中央警卫局对此事进行会商，上报防范方案。

有关部门对这一情报进行了秘密调查，最后确认了该情报的真实性。于是，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局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对此事进行了会商，最后决定除了在刘少奇主席、陈毅外长出访时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外，在出访之前先由国内派一位反爆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技术性防范工作。

鉴于这种反爆专家只有部队才有，因此，公安部、中央警卫局就联名向中央军委呈递了一份专题报告，请求调派一名反爆专家赴印度尼西亚执行该项特殊使命。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四（1）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公安部、中央警卫局要求调派反爆专家去印度尼西亚执行特殊任务的报告，迅即指派了一名反爆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执行寻查、排除可能存在的爆炸物使命。

这位专家是工程兵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名叫张志贤，28岁，北方汉子，当过工兵，毕业于解放军高级工兵学校，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反爆专家。年轻的共和国给这位反爆专家提供的反爆炸手段非常有限，他只携带了一部半导体探雷器便匆匆上阵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事先已经接到国内的《情况通报》，并将有关情况通过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转告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此情况非常重视，苏加诺总统亲自向国家安保机构下达命令：迅速开展侦查、防范，并将进展情况通报中国大使馆。

张志贤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使馆负责保卫工作的官员向他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安保机构刚通报的两个情况：据工兵探测，拟安排贵国刘主席、陈外长下榻的国宾馆未发现爆炸物；经调查，刚承担中国大使馆维修工程的包工队队长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在雅加达的特务组织的小头目，此人目前下落不明。

如此看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很有可能是台湾特工实施爆炸行动的重点目标。

张志贤要来了大使馆房屋的建筑资料，仔细研究了构造情况，选定了几个重点部位：贵宾休息室、宴会厅和大使办公室。这3处都是刘少奇、陈毅来大使馆时必定要涉足的地方，因此必须进行重点搜检。

搜索开始了，张志贤手持半导体探雷器，对宴会厅、贵宾休息室、大使办公室的地面、墙壁进行缜密的检查。一寸一寸检查下来，未发现有爆炸物。

张志贤于是钻进了天花板和房顶之间的空间。当时印度尼西亚已经进入旱季，天天烈日高悬，气温高达40摄氏度，那狭小的空间离房

顶近，又不通风，热得像蒸笼。

张志贤从小在北方长大，从未体验过如此的酷热，一钻进去就大汗淋漓，全身湿透。更不妙的是屋架使用了大量的金属材料，那个半导体探雷器一凑近就“呜呜”叫，失去了它的正常功效。张志贤索性不使用探雷器，在狭如铁轨一样的屋架上爬行，用双手触摸每一根横梁立柱和每个角落。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四（2）

天花板里都搜索过了，仍无发现。张志贤于是扩大搜索范围，又检查了厕所，也没有收获。

难道敌特不打算在使馆制造爆炸事件？既然如此，那个小头目为什么充任包工队长承接了使馆包办维修工程呢？有这么个机会而不做手脚，这于特务的习性不相符合啊！张志贤决定大动干戈，来一个全馆大搜查。

大搜索的结果终于发现了爆炸物。那是隐藏于门厅底楼的天花板和二楼楼板那薄薄的夹层间的一个3公斤的炸药包，上面安放着一个用无线电遥控的引爆装置。

大使馆上下为之欣喜，厨房间的大师傅特地烧了几个拿手菜犒劳反爆专家。大使馆那位负责保卫工作的官员拿出一瓶珍藏多时的茅台酒，陪张志贤痛痛快快喝了几杯。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五（1）

张志贤对炸药包里的炸药进行了鉴定，其结果令人不解：这是一种硝铵炸药，即含有11%梯恩梯的2号岩石炸药。这种炸药通常使用于工农业上的探矿、开矿和开山修渠，来源比较容易。这种民用炸药虽然能制造爆炸事故，但爆炸杀伤力并不很大。张志贤陷入了沉思：台湾特务的装备竟简陋到这么个程度了？竟想用民用炸药来制造震惊全球的特大爆炸事件？这是不是有点玄乎？

反爆专家于是得出结论：这个炸药包是敌特临时拼装的一个用以转移我们反爆视线的障眼物。敌特在开始实施“水沟计划”时考虑到有可能会泄密，会对使馆进行搜索，所以在装修时玩了这么一手，指望我们的搜索到此为止。

于是，张志贤决定继续搜索，大使馆的房屋都已经查过了，接下来是搜索花园里。

几天下来，578平方米的大使馆花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检查过了，但没有新的发现。

这时，离我国领导人出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国内不时来电询问搜索情况，张志贤心焦如焚。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安保机构也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计划中涉足的地方进行了负责的搜索，均一无所获。

张志贤面对着墙上挂着的使馆区平面图，眨着眼睛思忖：那包炸药，会不会是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道具？敌人也许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大使馆，而在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搞名堂！他们会在哪里下手呢？

张志贤提了个要求：“给我安排一辆汽车，我要到外面去转转。”

一辆黑色“华沙”轿车驶出使馆大门，在机场通往国宾馆的公路上缓缓行驶。车内，张志贤睁着一双敏锐的眼睛，像猎人搜索猎物痕迹似地搜索着周围可疑的目标。

“华沙”轿车在公路上往返行驶了数次，当又一次开到市郊结合部的范围时，张志贤忽然招呼司机停车。原来，张志贤看到路旁有幢房子离公路特别近，不过30多米。这幢房子孤零零地耸立在田野旁边，特别显眼。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张志贤感到对它不大放心。轿车停下后，张志贤走近去看，这是一幢印度尼西亚通常见到的平房，约摸有60平方米面积，大门锁着，窗框上有铁栅栏，凑上去往里看，里面堆放着一个个麻袋包，原来是座仓库。

大使馆的司机也跟过来，往里看了看，说：“这麻袋里装的是糖。印度尼西亚最多的就是糖，卖不掉，只好储存起来。”

7.粉碎国民党特务谋刺刘少奇阴谋 五（2）

张志贤绕着仓库转了一圈，发现了可疑迹象：仓库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有堆过泥土的痕迹。他心里一动：莫非在这幢房子里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公路?

“华沙”轿车返回大使馆后，张志贤向大使馆方面汇报了他所发现的情况，表示了自己对此迹象的怀疑。大使馆于是便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紧急沟通，通报了上述情况。

数十名印度尼西亚安保人员迅速出动，封锁了那幢房子。打开了门锁后，张志贤进去一看，满屋子都是麻袋包包，里面装的果然是糖。张志贤请安保人员把麻袋包抬到屋外去，露出垫在下面的木板。掀开木板，红褐色的泥土上赫然露出一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地洞。

张志贤下到地洞内，下面是一条半人高的暗道，一直走过去，暗道尽头是公路下方。那里，安放着一个用防水油布裹着的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的大炸药包，已经装好了起爆装置，只要一通电，顷刻就会爆炸。

至此，这位由年轻的共和国培养的年轻反爆专家终于觉得心头一阵轻松，好似移开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

印度尼西亚警方迅速组织侦查，以仓库主人为线索，当天就将那几名执行“水沟计划”的台湾特务抓获。

不久，这几名特务都被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判了重刑。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抵达印度尼西亚，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后来，代表团结束了对东南亚四国的友好访问返回北京时，外交部长陈毅对前来机场迎接代表团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说：“安全返回，全仗军委派出的张志贤哦！”